

# 德州学院 学报

双  
月  
刊



编委会主任：李永平

编委会副主任：张秀玲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于家峰 | 马洪才 | 王鹤  | 田屹  |
| 吕志轩 | 刘印房 | 刘艳芹 | 许士才 |
| 孙乃龙 | 李永平 | 李春光 | 李洪亮 |
| 杨莲莲 | 杨颖  | 张秀玲 | 张建臣 |
| 张锦辉 | 陈立华 | 陈伟  | 赵岩  |
| 顾相伶 | 徐慧清 | 唐延柯 | 谈家水 |
| 黄传波 | 曾强成 |     |     |

主编：李永平

常务副主编：张秀玲

副主编：陈立华 谈家水 徐慧清

1985年创刊

2022年第38卷第5期

（总第185期）

2022年10月出版

# 德州学院学报

(双月刊)

2022年 第5期  
第38卷(总第185期)

## 文学·艺术研究

### “仁”与“佞”关系考辨

——兼探原始“仁”观念内涵的发展变化……………张德苏(1)

先秦文学中饮食的精神化与多维性…………… 昝风华 李桂廷(7)

《陈风·东门之杨》主旨辨析…………… 张媚东(14)

《晋书·王珣传》辨正…………… 高胜利(19)

论“相如词章启六朝之端”…………… 王飞阳(23)

### 从情景融合的运用看词体在发展初期的演进

——以敦煌曲子词、《花间集》、冯延巳词为例…………… 张 杏(29)

顾炎武山东诗歌研究三题…………… 索浩然(34)

### 草根英雄叙事与民族精神颂歌

——评电视剧《闯关东》…………… 刘希云(42)

消费文化视角中的体育新闻传播…………… 鲁 萌 汪 洋(47)

基于受众调查与空间环境分析的地铁广告传播策略研究…………… 曲璐璐(51)

## 哲学·政治学研究

### 亲爱有差等 仁爱归一体

——关于儒家“爱有差等”观点的一个批判性审视…………… 段方乐(55)

《神圣家族》对群众史观的历史性建构…………… 仇美荣 高 原(59)

---

---

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推进路径研究

——以山东省德州市为例·····李荣梅（66）

法学·社会学研究

我国延迟退休政策效应理论研究述评

——以政策评估为视角·····李 凯（71）

基于文化视角的城市社区管理问题分析及改革对策·····季晓东 季桂起 董开远（79）

历史文化研究

顾颉刚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戴 磊（85）

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策略研究·····文玉花 郭 斐（91）

地域文化研究·运河文化研究

隋唐时期大运河德州段历史功能考辩·····刘咏梅 王德胜（95）

风教一坏百年不可复振？

——基于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进士数量的研究·····李忠昊（99）

地域文化研究·董仲舒研究

《公羊董仲舒治狱》发微

——兼论“春秋决狱”与“决事比”异同·····何元博（105）

---

---

#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Vol. 38 No.5

October 2022

---

## MAIN CONTENTS

- An Investigating and Differentiating about Ren(仁) and Ning(儻)  
.....ZHANG De-su ( 1 )
- The Spiritualiz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ity of Diet in Pre-qin Literature  
.....ZAN Feng-hua, LI Gui-ting ( 7 )
-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Book of Jin·Biography of Wang Xun .....GAO Sheng-li ( 19 )
- Xiangru's Article: the Origin of the Style of the Six Dynasties .....WANG Fei-yang ( 23 )
- On the Evolution of Ci in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Emotions and Sceneries:Taking Dunhuang Quzi Ci,  
Huajian Ji and Feng Yansi Ci as Examples.....ZHANG Xing ( 29 )
- Sports New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 Culture  
.....LU Meng, WANG Yang ( 47 )
- Kindred Love is Different Benevolence is Attributed to Oneness  
——A Critique Perspective on Confucianism “Love Distinctions”.....DUAN Fang-le ( 55 )
-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Mass History in The Holy Family  
..... QIU Mei-rong, GAO Yuan ( 59 )
- A Review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China's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Evaluation.....LI Kai ( 71 )
- Gu Jiegang'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DAI Lei ( 85 )

# “仁”与“佞”关系考辨

## ——兼探原始“仁”观念内涵的发展变化

张德苏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 山东 威海 264209)

**摘要:**先秦文献中,“佞”字在多种情况下并非贬义,而且与“仁”字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意义关连,二者可以上溯到一个共同的语源——“人”。“人”字是早期“仁”观念的文字载体,它的内涵极为广泛,凡人的品质中美好的、正面的,包括外貌的俊美、身体的健壮、心灵手巧、勇猛善战等都可被纳入到“人(仁)”观念中,“佞”作为“多才而能言”这样一种重要能力,也包含在早期“人(仁)”观念之中。随着“人(仁)”观念在古代文化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仁”字被创造出来,“佞”义则包含其中。春秋时期,“仁”观念纯化的要求日益强烈起来,“佞”义就从“仁”中被排斥、剥离出来,创为“佞”字。

**关键词:**仁;佞;儒家思想;原始仁观念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2)05-0001-06

先秦文献让我们看到早期“佞”字在多种情况下并非贬义,它所内涵的某些品质,在那个时代是被人尊重并推崇的。进而我们还可以看到,“佞”和“仁”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意义关连,二者在中国文化的源头上共出于同一个泉脉,尔后逐渐分流,渐行渐远。本文试对“佞”与“仁”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梳理,并借此看到早期“仁”观念内涵上的某些特征。

### 一、先秦文献中“佞”字的非贬义用例的统计与分析

笔者对21种先秦文献进行了“佞”字用例的统计,其中《易经》《易传》《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孝经》《老子》《墨子》等9种文献没有出现“佞”字,其余12种存在“佞”字用例的文献。笔者分析了这些用例中,“佞”字的义类与褒贬色彩,见表1。

表1的用例数不是指“佞”字出现的次数。几个“佞”字出现于一段话中,或出现在有关连的几句话中,而且含义一致,表1只算一例。如《论语·宪问》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佞”字出现两次,表1计为1例。又如“佞夫”这一名字在鲁襄公三十年的《春秋》中出现1次,《左传》出现了4次,是同一事件中的同一人物,表1计为1例。

表1 “佞”字的义类与褒贬色彩统计表

| 文献名称  | 用例总数<br>(次) | 非贬义用例 |    |      |      | 贬义<br>用例<br>(次) |
|-------|-------------|-------|----|------|------|-----------------|
|       |             | 自谦    | 评价 | 有口才  | 人名   |                 |
| 《尚书》  | 1           |       |    | 1    |      |                 |
| 《左传》  | 15          | 11    | 2  |      | 2    |                 |
| 《谷梁传》 | 2           |       |    |      | 1    |                 |
| 《公羊传》 | 2           | 1     |    |      | 1    |                 |
| 《国语》  | 6           | 2     | 3  |      | 1    |                 |
| 《战国策》 | 7           | 6     |    |      | 1    |                 |
| 《论语》  | 6           |       |    | 2    | 4    |                 |
| 《孟子》  | 1           |       |    |      | 1    |                 |
| 《管子》  | 5           |       |    |      | 5    |                 |
| 《庄子》  | 6           |       |    | 3    | 3    |                 |
| 《荀子》  | 4           |       |    |      | 4    |                 |
| 《韩非子》 | 1           |       |    |      | 1    |                 |
| 总计    | 56          | 20    | 5  | 6    | 4    |                 |
| 比例(%) |             |       |    | 35   | 21   |                 |
|       |             |       |    | 62.5 | 37.5 |                 |

笔者以各文献的经典注本为主,参照各家意见,对每一用例中“佞”字的褒贬色彩进行了严格而慎重的甄别。判断褒贬的标准是这样的:如果“佞”的单字义是“巧调”、“谄佞”之义,如《荀子·臣道》中“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一语,王先谦注:“以佞媚为容态。”<sup>[1]247</sup>则直接判定为贬义;如果“佞”的单字

收稿日期: 2022-03-02

作者简介: 张德苏(1965-),男,山东德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化及文学研究。

义是“才也”“口才也”等，但整句意思是对“佞”的否定，如《论语·先进》“是故恶夫佞者”一例，孔安国注：“疾其以口给应，遂已非而不知穷”<sup>[2]465</sup>，也判定为贬义；只有当“佞”的单字义是“才也”“口才也”等义，且整句对“佞”无否定的情况下才判定为非贬义。

换言之，为了避免论证倾向产生的影响，笔者采取了不利于自己观点的判断标准，对贬义用例的判定较宽，对非贬义用例的判定较严。尽管如此，由表1仍然可以看到，先秦时期，“佞”字非贬义用法（占62.5%），远高于贬义用法（占37.5%）。

表1中“佞”字的“非贬义用例”，其含义有以下几种情况：

#### （一）自谦词——“不佞”

这是“佞”字非贬义用例中最多的一种情况，是当时的习语，共有20例，约占总数的36%。举数例如下：

1.《左传·成公十三年》：“寡人不佞，不能以诸侯退矣。”《正义》：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谦之辞也。”

2.《左传·昭二十年》：“臣不佞，不能苟贰。”杜注：“佞，才也。”

3.《公羊传·昭二十五年》鲁昭公两言：“丧人不佞，失守鲁国之社稷，执事以羞。”

以“不佞”为谦，那么“佞”必不能是贬义，就如阮元所说的：“古人每谦言‘不佞’者，皆谦不高材、不仁巧也。若‘佞’全是恶，岂古人皆以喜口调口给之小人待人，而自居于不口调不口给之君子乎？”<sup>[3]1013</sup>凡此用法，古注多释为“才也”或“口才也”。“不佞”相当于后来之“不才”而含义略宽。

#### （二）评价词——“不佞”

这种用法有5例，约占总数的9%。举其两例如下：

4.《左传·成十六年》：“君幼，诸臣不佞。”杜注：“佞，才也。”

5.《国语·晋语二》：“夷吾不佞。”韦昭注：“佞，才也。”

同为“不佞”这一语言形式，但从分析“佞”字字义的角度上讲，评价词“不佞”对本文观点有着更强的证明力。因为“自谦词”流行之后会成为固定的习语，从而使其语素“佞”字的意义变虚，游离于词义演化的流程之外。而对他人做评价的词却不能这样，它用的词必须是人所共知且意义明确的词，这样

的用法往往具有时代性。秦汉以后，“不佞”一词的评价用法消失，可以证明先秦时期，“佞”字义不同于后来。

#### （三）有口才者——“佞”“佞人”

这是“佞”字的名词性用法，先秦时期此用法也很多，表1统计中有6例，约占总用例数的11%。举几条典范用例并辨证如下：

6.《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贵不凌贱，富不做贫，功不遗罢，佞不吐愚。”<sup>[4]75</sup>吴则虞《集释》、张纯一《校注》都引俞樾《诸子评议》的观点：“佞者，有才辩之称，故与‘愚’相对。”<sup>[5]191</sup>与“愚”相对而与“贵”、“富”、“功”相并列，至少是一个中性词，无贬义。

7.《庄子·则阳》：“夫楚王之为人也，形尊而严；其于罪也，无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桡焉！”

从此句语势可以看出，“佞人”“正德”同为阻挠楚王凶暴的力量，“正德”是正面的，“佞人”也应该是正面的。但由于对于先秦文中“佞”字的褒义的生疏，后代学者对此处“佞人”往往理解不当。如成玄英疏云：“自非大佞之人，不堪任使。若履正怀德之士，谁能屈挠心志而事之乎？”<sup>[6]878</sup>将“佞人”解为与“履正怀德之士”相对立的“大佞之人”，这一解法极为迂曲，而且需要将原文读为“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桡焉”，这是先秦文中极少见的句式。又如陈鼓应译为“要不是小人和正德之士，谁能说服他！”<sup>[7]671</sup>把“佞人”解为“小人”，而与“正德”简单地并列在一起，意思有些滑稽与混乱。

晋人王穆夜尚知“佞”之“口才”义，释之曰：“惟正德以至道服之，佞人以才辩夺之，故能泥桡之也。”<sup>[8]1546</sup>此释极为顺畅。王叔岷赞同此说：“庄子之意，盖谓惟有佞人及正德之士乃能屈服楚王。王说是。成疏未得其旨。”<sup>[9]1000</sup>所以这里的“佞人”若不能断为褒义，也绝非贬义。

#### （四）人名——“佞夫”“不佞”“佞”

8.《春秋·襄三十年》：“天王杀其弟佞夫。”

“佞夫”是周灵王的儿子，周景王的弟弟。虽然《公羊传》中作“年夫”，然《左传》《谷梁传》皆与《春秋经》同作“佞夫”。且先秦时“年”字常常作“佞”的借字<sup>①</sup>。故天王弟名“佞夫”当无疑也。《左传·昭二十四年》又有名“阴不佞”者。杜注：“不佞，敬王大夫。”《战国策·赵策二》有齐国将军名“鲍佞”。先秦时期的确有难听的人名，如史鱣、史

① 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中，“佞”字多作“年”。刘玉麟《尔雅校议》云：“佞与年通。”（《尔雅诂林》771页）

狗，又如孟武伯名“彘”，“卫康伯名髡”。但一般不会使用表达道德缺陷的字，不止一人选择一个贬词为名字更属不可理解。“佞”字出现于人名中，很能证明“佞”字在先秦时期的褒义色彩有着浓厚的语言文化基础。

## 二、“佞”与“仁”的关连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有了一个更为惊讶的发现：“佞”和“仁”有着密切的关系。其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仁”含“佞”义，“佞”有时会直接写作“仁”

《论语·雍也》载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定州汉简本正作“不有祝鮀之仁”<sup>[10]28</sup>。阮元认为，《尚书·金縢》载周公自谓“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其中“仁”字乃为“佞”字。他说：“周之初尚有用仁字以寄佞义者，不似周末甚多分别也。”<sup>[31]1012</sup>俞樾也持同样观点，以为《金縢》中“仁”是“佞”的借字，他找到了音韵学上的根据：“古音佞与田韵，则仁声是也，佞从仁声故得假仁为之。”

(二)“佞”含“仁”义，“佞”的一些用法中包含着与“仁”对等的內容

9.《左传·襄二十三年》臧武仲说：“绝不佞，失守宗祧。”

10.《左传·昭二十年》卫灵公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

11.《左传·昭二十二年》宋元公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

12.《左传·昭二十五年》宋元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

“仁”的一个基本含义是“亲亲”，“亲亲，仁也。”（《孟子·告子下》）“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做不到“亲亲”就会被指责为“不仁”，《国语·晋语三》公孙枝曰：“杀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亲，不可谓仁。”<sup>[11]329</sup>如此，则11例、12例的“不佞”，都可解作“不仁”。“仁”又扩而大之为“尊祖敬宗，永保宗庙”之义。《孟子·离娄上》云：“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9例、10例说话人自责“不佞”的原因正与《孟子》之言不差分毫，作为卿大夫的臧纆失守宗庙，作为诸侯的卫灵公失守社稷。将此处的“佞”换成“仁”字，一样成立。

(三)“仁”“佞”易淆

春秋时人一方面常常“仁”“佞”连用，如《淮南子·人间训》记中行穆伯评饕餮闻伦为人“佞而不仁”；

《论语·公冶长》中或人叹冉雍“仁而不佞”。一方面又常辨“仁”“佞”的不同。无论是二者连用，还是极力辨别，都意味着，在那个时代，“仁”与“佞”二字含义相迭合，容易被人所混淆。

13.《论语·公冶长》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刘宝楠《论语正义》云：“当时尚佞，见雍不佞，故深惜之。”读此章，可明显地感受到“或人”对冉雍“仁而不佞”充满惋惜，他潜在的观点是：“仁”且“佞”才是完美的。在他思想中，“佞”不仅不需排斥，而且是一种能辅助“仁”的正面品德。阮元云：“可见仁佞尚欲相兼，不知其仁，始言佞异于仁，鲜矣仁，非绝无仁。”<sup>[31]1011</sup>孔子最恨“巧言乱德”“紫之夺朱”，所以清晰地指出了“佞”的弊端，否定了“佞”。

春秋时儒家人物反复指出“巧言”则“鲜仁”，其实质也是试图在“佞”与“仁”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如：

14.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15.曾子曰：“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笃，难于仁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16.《论语·公冶长》：“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17.《论语·颜渊》：“仁者其言也切。”

儒门反复辩难“巧言鲜仁”，其本质原因孔子说得很清楚：“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孟子·尽心下》）因为当时人们常把“佞”看作“义”，把“利口”当作“信”，而孔子能清醒地认识到二者“似是而非”。“似是而非”的危害重于显然的“大错大非”，所以孔子反复申说之。这正是“佞”与“仁”含义分离的开始。

(四)从文字学角度讲，“仁”“佞”为同源字、古今字。俞樾仅说“仁”与“佞”因为同音而假借，则低估了二者的关系

“仁”“佞”二字音同。《说文解字》云：佞，巧调高材也。从女仁声。段注对此论证详明。王力《上古韵部及常用字归部表》及《上古声母常用字归类表》，“仁”、“佞”二字同韵，都在“真部”<sup>[12]684</sup>；但不同纽，“仁”在“日母”<sup>[12]696</sup>，而“佞”在“泥母”<sup>[12]693</sup>。可是太炎先生曾提出“古音娘日二纽归泥”，《国故论衡》云：“仁声之佞，为乃定切。此则

人、仁本音如佞，在泥纽也”<sup>[13]27</sup>。又前引俞樾之论也可证“佞”“仁”之同音。

“仁”“佞”为古今字，“佞”义最初包含在“仁”字之中，西周时期，从“仁”字中分化而出，分担了“口材”之义。“佞”字带着“仁”旁，本身就可以证明两字的古今字关系。遗憾的是，由于“佞”与“仁”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开始分离，而且是在道德褒贬角度上走向了两极，所以到训诂之学兴起的秦汉时代，二者早已形同陌路，所以今天判断二者同源的直接训诂依据的确较为贫乏。除上文提出的材料之外，唐玄应《一切经音义》中有几段文字值得注意：卷三解“佞”字时引《说文》云：“口材也，亦德之称也。字从女从仁。”<sup>[14]153</sup>其“德之称”的说法，与“仁”相通。又，《一切经音义》卷十七与卷二十四两引《说文》“伪善曰佞”<sup>[14]800;1113</sup>，也可作为反义同源的根据。然而今本《说文》无玄应引文，使其证明力大打折扣。

尽管如此，二者同源而分流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下文我们将借助于文化发展的考察，继续论证“佞”“仁”同源的关系。

### 三、“佞”与“仁”的一源

“仁”与“佞”可以上溯到一个共同的语源——“人”。“人”在今天是表达人类这个生物群体的一个通名，但在远古时代并非如此，那时的原始人群往往只认本族人为“人”。如北欧的拉普人、美洲的加勒比人和基奥瓦人等，他们的族名就是“人”的意思<sup>[15]</sup>；“蛮”是上古苗瑶族的自称——mlwan（平），其义为“人”<sup>[16]</sup>；“匈奴”这一名称也是“人”的意思<sup>[17]</sup>。自称为“人”，而对其他部族则不称为“人”，也不视为“人”。我们的祖先也具有这样的心态，汉字系统能让我们看到这一点。自禹夏之后，中原部族自称为“夏”。《说文解字》云：“夏，中国之人也。从页从白，白两手，父两足也。”“夏”实际上是一个完整庄重的人形。而指称周边民族的用字则往往带有代表动物的偏旁，如“狄”、“貉”、“羌”、“蛮”、“闽”等，都是视这些民族为“非人”的意思。对那些与我们友好的族群或文明程度较高的族群，则造出带有“人”旁的字来指称，如我们的祖先认为西南的“僰人”“僂侥”略有人性，“故进之，字从人”。但“僰”“僂侥”所带“亻”旁，是侧面的人形，表示有限的肯定。古人认为东夷人“仁”，有君子之风，“故又进之，字从大”<sup>[18]147</sup>，“大”，是正面的人形，表示更高层次的肯定。如此下来，“人”这一概念就具有了评价意义，开始通向“仁”。

“人”字不仅用在族群的评价上，对个体的善

恶优劣也多用此字。凡人的品质中美好的、正面的、对部族有利的方面，包括外貌的俊美、身体的健壮、心灵手巧、能言善辩、勇猛善战等都认为是善的，给予肯定的评价，称之为“人”；反之，则认为是恶的，给予否定性评价，斥之为“非人”或“禽兽”。直到孟子，仍然延续着以“人”与“禽兽”的对立来表示道德与否，“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种“人”观念就是后来“仁”观念的原始形态。这种原始的“仁”观念产生于文字出现之前，因而在当时不可能获得特殊的文字形式，而且其语音形式与其母体“人”也没有任何差异。章太炎说：“仁即人字。自名家言之，人者为实，仁则为德，而简朴之世未能理也。”（《检论》卷五）<sup>[19]493</sup>这种语言形式为“人”的原始“仁”观念，下文将用“人（仁）”来表述。

先秦文献中还能看到这种用法的遗存：《郑风·叔于田》中有“洵美且仁”；《齐风·卢令》中有“其人美且仁”。这是《诗经》中仅有的两个“仁”字。梁涛先生认为：“与后世用法不同，主要是指有人样子，有男子气魄”<sup>[20]</sup>。屈万里认为应该是赞美猎人勇武之义<sup>[21]</sup>。这些看法很正确，此两“仁”都应作“人”，把人的身体素质的健美或外貌特征的俊秀评价为“人”，正是原始道德观念混沌的体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春秋时期，卫襄公的长子孟縶跛足，卫国孔成子与史朝因而想另立公子元为太子。史朝说：“孟非人也，将不列于宗。”勇武健美可称赞为“人”，跛足则被列为“非人”。

又如“不背本，仁也”（《左传·成九年》）、“度功而行，仁也”（《左传·昭二十年》）等语，这里的“仁”字与通常的含义不同，亦应是“人”字。“见仇弗杀，非人也。”（《国语·楚语下》）、“有五胜以伐五败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战。”（《国语·周语中》）、“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左传·宣二年》）这些都是用“人”作为是非判断词的例子。且让我们看到，这种原始的“人（仁）”观念内容很是宽泛。

“佞”在远古时代对一个部族的生存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佞”就是这种宽泛的原始“人（仁）”观念中的一个内容。借助先秦文献，我们看到，直到春秋时期，“佞”这种能力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直保持着其特有的价值：

取悦神灵。远古时期人们要用美好的言词来取悦神，一些民俗学研究可以证明这一点，屈原《九歌》透露出这种古老的祭祀风俗。通过众多的先秦文献，我们可以看到，直到周朝，“祝”这一通过语言与神灵

沟通、以文辞事神的人<sup>①</sup>在社会中有着重要地位。而口才、文采也是“祝”所必须具有的职业素质，所以孔子称“祝鮀之佞”并非否定祝鮀。

交往他国。直到春秋时期，诸侯间的会盟，若无口辩之人，常会使己国处于劣势。在鲁定公四年会盟之前，卫国大夫子行敬子预料到形势的复杂，就对卫灵公说：“会同难，嘖有烦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从！”而祝佗不负众望，以其口辩使卫国在诸侯盟会中获得了地位。《左传》中所记各国“行人”大都具有“口才便给”“婉而能讽”的能力。《礼记·经解》记孔子言各经之效，其中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由此可以推测，当时《春秋》所记重视辞令的积累。

讽劝君主。君权尊重，逆鳞难撻。古人对于能以“巧言”劝君者十分赞赏，常记录于史书。晋国的师旷颇具这种能力，《左传·昭八年》载师旷善谏，叔向引《诗经·小雅·雨无正》中“巧言如流”以美之。这个为后世所诟病的“巧言”在当时却是一种称美，甚至孔子也有“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的提倡。

这三个方面在古人的政治生活中都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当时对于有口才、能言、善辩之人甚为尊重，赞其为“人”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就是“佞”获得与“仁”相同的语音形式“人”的原因，这也是周公自称“予仁（佞）若考”、孔子赞“祝鮀之佞（仁）”的原因。如果我们把“佞”与“仁”比作阴阳两仪，那么在这种观念意识产生的早期，它们都混沌于“人（仁）”这个“太极”之中。

#### 四、“佞”与“仁”的两途

“佞”从原始的“人（仁）”观念中分离出来，首先源于二者性质上的差异与古人道德观念的日渐清晰。无论“佞”或者说“口才”有多重要，它毕竟只是一种“才”，一种能力。而原始“人（仁）”观念虽然混沌、驳杂，但它从一开始就是价值的判断，具有道德倾向。从道德的角度看，“才”具有两面性，能力的运用可能是道德的，也可能是不道德的，尤其是能言善辩有口才这种能力，进可以说服人，退可以取悦人，可以纾国难，也可以逞私欲。在远古淳朴之风衰落之后，更容易成为谋私利的工具。徐灏云：“佞者巧慧之称，人之巧慧，有邪有正，故佞有美恶。”（《说文解字注笺》卷十二）当人们认识到能力与道德的这一区别之后，“佞”就开始从“人（仁）”中分离出来了。这一分离早在“佞”这个字形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尚书·尧典》：“惇德允元，而难任人。”《史记·五帝本纪》作“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皋陶谟》：“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壬，佞也。《史记·五帝本纪》作“佞”。何以作“任”、作“壬”而不作“佞”？因为当时尚无“佞”字，但时人已经认识到“佞”的危害，需要把“佞”从一般性的“人（仁）”中区分出来，故而假同音之“任”“壬”来表达。反过来也可以说，在尚未创造出专字的情况下，古人仍然努力将“佞”从“人（仁）”中区别出来，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时人否定“佞”的急切态度。《尚书》中的这两个例子能保存下来意义极大，它既让我们看到了“佞”与“人（仁）”在早期的密切相关性，又让我们看到“佞”与“人（仁）”分离之始的情形。

“仁”“佞”两个新字形的出现标志着“仁”观念混沌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古人在道德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同时也加速了“佞”与“仁”的分化。这一过程大约发生于西周初年。西周初年天命思想的变化引起了政治观念的变化，周公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认识，认为只有“敬德”“保民”才能永保天命，于是源于人性人情的“人（仁）”观念被纳入到政治思想的框架中。作为一个重要概念，“人（仁）”应该有一个异于通常的形式，于是“仁”字就应运而生。当然由于天命思想的浓重，那时的“仁”字写作“巨”。读为“人”而从“尸”，这一巧妙的字形将新兴的“仁”观念与传统的“天命”思想连接在一起。

“仁”观念既成一重要的政治理念，自然不能久处驳杂的状态，早已为人所警觉的“佞”义不宜再包含于“仁”字形中，以免紫之乱朱。所以不久“佞”字就被造出来。“佞”字的出现是周人“仁”观念深化细化、逐渐剔除芜杂的表现，是“佞”与“仁”分离的最重要的里程碑。此后，“仁”表达基于人性、人情的道德观念，“佞”表达人的才能，尤其是口才。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仁”字出现于《尚书·金縢》“予仁若考”句中，最早的“佞”字出现于《尚书·吕刑》“非佞折狱，惟良折狱”句中。《金縢》在前，是周武王时代的作品，《吕刑》在后，是周穆王时代的作品。从“佞”字“从仁从女”的字形看，当是先有“仁”字，而后创造了“佞”字。造字之理的推断与文献遗存的实证若合符节。由本文的观点看，学界关于“予仁若考”之“仁”是“仁”还是“佞”的争论大可不必，因为初有“仁”字之时，“佞”的意思是包含在“仁”字中的。所以

<sup>①</sup>《说文》云：“祝，祭主赞词者。从示从儿口”段注：“此以三字会意，谓以人口交于神也。”

虽为“仁”字，其义为“佞”；也可以说，虽是“佞”义，却可以用“仁”字来表达。这正是“佞”尚未出现时的特有景观。

春秋时代，随着理性的逐渐高涨，“佞”的政治意义也就越来越降低了。求神问卜之事受到了普遍的否定，“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国将兴，听于人；国将亡，听于神。”而且祭祀中更强调对神灵的“信”，季梁说：“祝史正辞，信也……其言忠信于鬼神。”诸侯国间的交往虽然仍是盟会不断，但“君子”更强调实质性的“信”。“苟信无继，盟无益也”“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也就是说过去要通过天命、神灵来保障的东西，这时倾向于通过人性中的“仁”德来保障。在谏君方面，由于士大夫阶层地位的上升，直言切谏渐成时代风尚。如子路问事君之道，孔子就说：“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于是“佞”的地位迅速下降。

孔子的倡“仁”贬“佞”是二者拉开距离的又一重要因素。孔子挽救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局面的主要思路是“以仁维礼”，通过教化升发人内心的“仁”，用“不安”“不忍”之心来维护礼法秩序。所以孔子更进一步纯化“仁”的内容，排除传统“仁”观念中那些驳杂的因素，似“仁”而非“仁”的“佞”则首当其冲，《论语》中孔子主动谈到“佞”时，几乎都是否定性的。同时，孔子着力提倡“讷于言而敏于行”，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刚毅、木讷，近仁。”“仁者其言也切。”在“仁”与“佞”之间划出一道鸿沟，明确传达出“巧言鲜仁”的认识。孔子提升“仁”的同时，也降低了“佞”的地位，两者的天渊之势呈现出来。从上文的统计表中也可以看出这个趋势，《论语》中，“佞”字的贬义用例已经多过非贬义用例，此后的《孟子》《管子》《荀子》《韩非子》等书中已无非贬义用

例。汉代以后，连“不佞”这一习语性的谦词也消失掉了。后世说人有口才也不再“佞”字，而多用“有口”一词。

### 参考文献：

- [1]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2] 刘宝楠. 论语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3] 阮元. 经室集·释佞[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4] 张纯一. 晏子春秋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5] 吴则虞. 晏子春秋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6]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7]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8] 陆德明. 经典释文[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9] 王叔岷. 庄子校注[M]. 台北: 乐学书局, 1988.
- [10]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
- [11] 左丘明. 国语[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12] 王力. 古代汉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13] 章太炎. 国故论衡[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14] 玄应. 一切经音义(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 [15] 关键. 原始道德诸特征[J]. 民族研究, 1987(6).
- [16] 李永燧. 关于苗瑶族的自称——兼说“蛮”[J]. 民族语文, 1983(6).
- [17] 陆思贤. 匈奴族名原义探源[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1982(2).
- [18]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81.
- [19]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第三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 [20] 梁涛. 郭店竹简“身心”字与孔子仁学[J]. 哲学研究, 2005(5).
- [21] 屈万里. 仁字涵义之史的观察[J]. 民主评论, 1954, 5(23).

## An Investigating and Differentiating about Ren(仁) and Ning(佞)

ZHANG De-su

(Culture Communication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Weihai Shandong 264209, China)

**Abstract:** In the former documents of Qin dynasty, the word “佞” was not in a derogatory sense in many cases. There was a close meaning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words “佞” and “仁”, with the same etymology——“人”. The word “人” was the literal carrier of the former notions of “仁”. Its notion held an extensive connotation including all human fine and positive qualities, such as handsome appearance、strong body、ingenuity and bravery,etc. “佞”, as an important competence of being talented and soft-spoken, was also contained in the previous notions of “人(仁)”. With its continuous rising status in ancient culture, the word “仁” was then created and the demand of its purification became stonger. Thus the word “佞” was excluded、stripped、seperated from the word “仁” and has owned a more different meaning.

**Key words:** ren; ning; Confucianism; primary thoughts of ren

# 先秦文学中饮食的精神化与多维性

昝风华，李桂廷

(德州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 饮食历来是文学作品描写的重点之一, 先秦文学中也有较多与饮食有关的作品或作品片断。由于特定的生活状态和思维习惯的影响, 先秦文学所写的饮食, 通常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平面性的物质现象, 而是与诸多事物、情理相融相通, 从而呈现出精神化和立体、多维的特质, 具体表现为食与德、食“物”与食“德”的交融, 包蕴万物之理的饮食, 隐藏未来与祸福的饮食, 作为人物特定性格、情感之载体或符号的饮食等等。先秦文学中的饮食书写, 具有抒情、说理、叙事、写人等多方面的功能, 其流风余韵绵延不息。

**关键词:** 先秦文学; 饮食; 精神化; 多维性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2)05-0007-07

饮食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也是文学作品历来描写的重点之一。在先秦文学中, 与饮食有关的作品或作品片断也时时可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先秦文学作品所写的饮食, 通常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平面性的物质现象, 而是与诸多事物、情理相融相通, 有着丰富、复杂、深刻、厚重的精神内蕴, 从而呈现出立体、多维的特质, 并产生了独特的文学意义。正如奥地利裔美籍社会学家许茨所说, 日常生活世界“从一开始就是意义的宇宙,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意义结构(a texture of meaning)”, “这种意义结构来源于人类行动——我们自己的行动以及我们的同伴的行动, 当代人的行动和前辈的行动——并且一直是由人类行动规定的, 正是这一点把文化领域与自然领域区别开来了。”<sup>[1]</sup>在先秦时期, 由于特定的生活状态和思维习惯的影响, 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是充满了意义因素、精神内涵, 饮食自然也不例外。这一时期饮食的意义因素、精神内涵, 在先秦文学中得到了最多的记录和阐发。在日常生活日益平面化、碎片化的今天, 先秦文学中饮食的丰厚精神蕴涵, 特别值得探究。

## 一、食与德、食“物”与食“德”的交融

先秦时期, 饮食、礼仪与道德往往是交相融会、难分彼此的。《礼记·礼运》云:“夫礼之初, 始诸饮食。”<sup>[2]1415</sup>由此可见, 当时饮食在礼制、人伦方面的重要地位。《礼记·乐记》“夫豢豕为酒”章云:

“(故)酒食者, 所以合欢也。乐者, 所以象德也。礼者, 所以缀淫也。”<sup>[2]1534</sup> 施设宴饮酒食, 不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 还有着重要的联络彼此感情、和合人际关系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 宴饮酒食与礼乐是同属一体的。《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景公饮酒醒三日而后发晏子谏”章云:“古之饮酒也, 足以通气合好而已矣。”<sup>[3]</sup>最初人们饮酒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使身体气脉通畅, 并使群体关系和谐。一味求酣求乐, 以致妨害了本业、正事的宴饮, 是与这个宗旨背道而驰的。《左传》中也有类似说法, 如《庄公二十二年》云:“酒以成礼, 不继以淫”<sup>[4]1775</sup>; 《成公十二年》云:“享以训共(恭)俭, 宴以示慈惠”<sup>[4]1910</sup>; 《成公十四年》云:“古之为享食也, 以观威仪、省祸福也”<sup>[4]1913</sup>; 《定公十年》云:“夫享, 所以昭德也”<sup>[4]2148</sup>。《国语·周语中》“晋侯使随会聘于周”章亦言:“饫以显物, 宴以合好。”<sup>[5]</sup>《左传》《国语》中的上述言论所强调的是, 酒食宴享是用来促成“礼”的推行的, 它可以向人昭示并引人遵守恭俭、慈惠等美德, 有识者还可以从中观察人之威仪德行, 并据此预测祸福吉凶。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 先秦文学作品中的饮食, 是具有鲜明道德礼仪指向的饮食, 亦食亦德, 既是食“物”又是食“德”。

在先秦文学作品中, 饮食给人提供的不但是口腹、感官的满足, 更是精神的满足、道德的满足。

《诗经》中的宴饮不但用美酒盛饌迎合客人的口

收稿日期: 2021-12-16

作者简介: 昝风华(1974—), 女, 山东德州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研究。

鼻、肚腹，还用音乐歌舞娱乐客人的耳目、心灵，并以道德礼仪愉悦客人的情志、精神。《小雅·鹿鸣》云：“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sup>①</sup>毛《传》：“夫不能致其乐，则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则嘉宾不能竭其力。”<sup>[6]406</sup>这里强调的，正是通过宴饮使宾客获得志意、精神的满足。《大雅·既醉》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此处将“酒”与“德”并列，也就是说，口腹的满足与道德需要的满足至少是居于同等地位的。这虽是就祭祀神灵而言，同样也适用于宴飨人众。《诗经》中的饮食，又常以和谐亲朋、人际之关系为目的。《小雅·常棣》云：“宾尔笱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俱），和乐且孺。”《小雅·伐木》云：“既有肥羜，以速诸父。”“既有肥牡，以速诸舅。”“笱豆有践，兄弟无远。民之失德，干糗以愆。”只有在国家富足、社会太平的时候，人们才可以尽情地饮食宴乐，所以《诗经》中的饮食宴乐又常与对德政之颂扬联系在一起。《小雅·天保》云：“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毛《传》：“质，成也。”郑《笺》云：“成，平也。民事平，以礼饮食相燕乐而已。”<sup>[6]412</sup>《小雅·南有嘉鱼》所写宴饮，也是旨在称颂“太平君子至诚，乐与贤者共之”<sup>[6]419</sup>。能让人感受到亲朋之友爱、君主之恩德的饮食，自然也能给人以精神、道德的满足。

又如《战国策·魏策二》“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章写鲁君在诸侯宴会上举觞致辞，其言辞简洁有力地点出了一国之君沉溺于旨酒、美味、女色、台观，一味享乐的可怕后果，极具警戒人心的意义。诚如鲍彪在注释中所说：“举觞一时，而为天下万世之明戒”<sup>[7]</sup>。鲁君的这一番话语，必然会使得在座宾主杯中的美酒更为醇厚，更为甘爽，也使他们饱享了一次礼仪道德的滋味。

先秦文学作品不但强调饮食要给人以精神、道德之满足，还表现出在饮食方面对礼仪、道德的恪守和追求，以及对此类行为的赞扬。

《论语》之《乡党》篇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sup>②</sup>朱熹《集注》：“食精则能养人，脍粗则能害人。不厌，言以是为善，非谓必欲如是也。”<sup>[8]119</sup>《乡党》又云：“食馐而饫、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其中“不时”，大概是指食物不合时令，如五谷、果实尚未成熟就拿来吃

之类，或者也可以解释为“不是正当吃饭的时候”。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朱熹注曰：“此二者，无害于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sup>[8]120</sup>《乡党》又云：“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注：“齐（斋）禁薰物，姜辛而不臭，故不去。”邢昺《正义》：“酒不自作，未必精洁；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也。”“凡言不食者，皆为不利人，亦齐（斋）者，孔子所慎，齐（斋）必严敬，若必食之，或致困病，则失严敬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然。”<sup>[9]2495</sup>朱熹《集注》：“食以谷为主，故不使肉胜食气。酒以为人合欢，故不为量，但以醉为节而不及乱耳。程子曰：‘不及乱者，非惟不使乱志，虽血气亦不可使乱，但浹洽而已可也。’”“姜，通神明，去秽恶，故不撤。”<sup>[8]120</sup>另外，王夫之《四书稗疏》称不撤姜是为了“倦则食之，以却眠”<sup>[10]</sup>。《乡党》又云：“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何晏《集解》引周生烈注：“助祭于君，所得牲体，归则班赐，不留神惠。”引郑玄注：“自其家祭肉，过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余。”<sup>[9]2495</sup>《乡党》又云：“食不语，寝不言。”邢昺《正义》：“方食不可语，语则口中可憎。”<sup>[9]2495</sup>朱熹《集注》引范祖禹注：“圣人存心不他，当食而食，当寝而寝，言语非其时也。”又引杨时注曰：“肺为气主而声出焉，寝食则气窒而不通，语言恐伤之也。”<sup>[8]120</sup>《论语》所记孔子在饮食方面的诸多讲究，今人多以为是孔子生活奢侈乃至腐化的表现，但结合上述各家注解来看，孔子这样做，主要是出于斋戒、礼节，以及克制贪欲，奉守道德，维护身心健康之需要，故不应对其过多诟病。

楚辞中每每以饮食的芳香、净美或神异，象征品性的高洁、才能的出众、身手的不凡。《离骚》云：“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糜以为粮。”<sup>③</sup>《九章·惜诵》云：“搗木兰以矫蕙兮，繫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九章·涉江》云：“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九章·悲回风》云：“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秀秀。”《九歌·东君》云：“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这类饮食，浸渗着一种强烈的道德追求意识。

违背礼仪、道德的饮食，在先秦文学作品中则大

① 本文所引《诗经》文本，均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之《毛诗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② 本文所引《论语》文本，均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之《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③ 本文所引《楚辞》文本，均依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受挞伐。

《诗经》就描写和批评了宴饮时不守礼仪、不顾道德的行为。如《小雅·宾之初筵》所写:宴会刚开始的时候,客人们个个表现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但是醉酒之后,就把什么礼法、规矩都抛到九霄云外,变得威仪全无,丑态百出。最不像话的是,还有人以酒醉为荣,反以不醉为耻。饮酒放纵无度、忘乎所以之人,虽然爽快一时,但最终要受到应有的惩罚。如《小雅·小宛》所言:“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尔仪,天命不又。”

又如《左传·昭公九年》中,晋侯违礼饮酒,屠蒯酌酒进言,强调饮酒要合乎礼制、道德,并点出饮食、口味之事非同小可:饮食味正,可以使人血气流通;血气流通,可以使人志意充盈;志意充盈,可以使人言语得当;言语得当,可以使人号令正确。由后文可知,晋平公在屠蒯的劝谏之下,不但饮酒上有所节制,政治举措上也有所收敛。

在有识之士看来,不但“食”中有“道”,甚至在某些时候“食”可以与“道”同功,而且通常情况下“道”比“食”更为重要,更为可贵。《论语·卫灵公》记孔子语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邢昺《正义》:“人非道不立,故必先谋于道,道高则禄来,故不假谋于食。……人虽念耕而不学,则无知岁有凶荒,故饥饿。学则得禄,虽不耕而不馁。是以君子但忧道德不成,不忧贫乏也。然耕也未必皆饿,学也未必皆得禄,大判而言,故云耳。”<sup>[9]</sup><sup>[25]</sup><sup>[18]</sup>“道”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由孔子与邢昺之语可知,人无“道”则不能自立于世,乃至耕而无“食”;有了“道”,“食”往往便自然而至。孔子把“道”放在“食”之前,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孟子·告子上》“欲贵者人之同心也”章中说:“《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sup>①</sup>在孟子看来,道德、仁义会给人莫大的精神享受,饱享了道德、仁义的滋味,就对膏粱美食的味道失去兴趣了。《孟子·离娄下》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也是重道轻食之论。

## 二、包蕴万物之理的饮食

先秦时期的人们,普遍以一种统观万物、会通诸理的眼光去观照世界。在他们眼里,饮食这种极其寻常的生活现象中蕴含着重大、深刻的道理,此理可通

于家国、社会和人生。因此,先秦文学作品在说事明理时,惯于将饮食现象信手拈来,以为譬喻,这也使原本单一、扁平的饮食现象变得立体、多维起来。

先看《诗经》中的例子。《小雅·角弓》云:“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如食宜飵,如酌孔取。”这是用进食与饮酒应得其所宜,比喻对于老年人要体谅、尊敬,举措得当。《陈风·衡门》云:“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在这里,作者通过“乐饥”与“食鱼”,表达了一种知足自得的思想。

《左传·昭公二十年》中,晏子对齐景公说“和”、“同”之理,把“和”比作肉羹。肉羹的烹制需要鱼肉、水、火、醋、酱、盐、梅等物的互相配合,只有各样东西配合得恰到好处,才能成其和、正之味,使人食后心气平和。同样的道理,君臣之间要达到和谐状态,臣子不能一味附和国君,而应当从理义出发,发出不同的声音,拾遗补缺,抑恶扬善,这样才能政通人和。晏子还以饮食之和来比喻音乐之和。音乐和谐,也可以使人听后变得心气平和。晏子认为,饮食之五味、音乐之五声的调和,事关重大。他还以饮食和音乐为喻,说明“同”之不可取以及“同”与“和”之不同。由此可见,五味调和之事,确实深蕴妙理要道。

《国语·晋语八》“平公有疾”章中,晋平公患蛊疾,医和认为此病乃“谷之飞实”而生,并进一步解释道:“物莫伏于蛊,莫嘉于谷,谷兴蛊伏而章明者也。故食谷者,昼选男德,以象谷明;宵静女德,以伏蛊慝。今君一之,是不飧谷而食蛊也,是不昭谷明而皿蛊也。夫文,虫、皿为蛊,吾是以云。”<sup>②</sup>依医和之说,蛊是害谷之物,会让谷实飞起,由此产生蛊疾。在古人看来,谷这种东西有清明之气。当谷气起来的时候,蛊气就会伏藏,人吃了不朽不蠹的谷子就不会生病。此外,古代还有“食谷者智慧而巧”<sup>[11]</sup>之说,意思是以谷为食会让人变得聪明智慧,而且有仁爱之心。中国古人一向以谷为主食,所以医和讲人君应该在白天亲近有德之男,以效法谷气之清明;夜晚则应安于有德之女,持礼自节,以使蛊气伏藏,蛊害不生(女会害男,犹如蛊将害谷)。医和还指出,晋平公反其道而行之,好色无度,昼夜不分,就像吃饭不享用嘉谷却去食蛊一样,此乃抛弃如谷之明,反而为蛊作器,故而其命难以长久。

《孟子》一书也善于借饮食喻事说理。《离娄

① 本文所引《孟子》文本,均依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② 本文所引《国语》文本,均出自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

下》“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章，用向墓间祭奠者乞讨残酒剩肉以使自己吃饱喝足的齐人，比喻世上那些“求富贵利达”之人。二者的相同点在于，都是为满足自己的贪欲和虚荣心而不择手段，虽然人前看起来很是体面光耀，背地里却干着卑鄙龌龊、见不得人的勾当。《尽心上》记孟子之语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这就是说：饥渴会改变人本来的正常味觉，让人觉得吃的、喝的东西格外美味。利欲如同饥渴，也会改变人心本来的善、正之性，让人陷于对富贵功名的贪爱、迷恋。人能不让利欲侵害自己的善、正之本性，就不会因为在富贵功名方面比不上别人而忧虑了。其他如《公孙丑上》“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章，以“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比喻在暴政肆虐的时代实行仁政，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告子上》“富岁子弟多赖”章，以“刍豢之悦我口”比喻“理义之悦我心”，都堪称精到。

《礼记》中也有不少饮食类比喻。《学记》“虽有嘉肴”章云：“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sup>①</sup>此语强调人要努力拓展自己的见闻和学识：至道虽美善，不去学习，也无从知晓它的高妙；正如嘉肴虽甘旨，不去品尝，也不会知道它的滋味。能真正识知某种饮食的滋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礼记·中庸》“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章记孔子语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孔子慨叹很少有人能够常行中道，不是做得过了头，就是达不到标准，就好比人人都会饮食，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懂得饮食的滋味。“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一句，孔颖达《正义》引《异义》云：“张华辨鲈，师旷别薪，符（苻）朗为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鸡知栖半露，食鹅知其黑白。”<sup>[2]1626</sup>像张华、师旷、苻朗等人那样的吃到某种食物便能知晓其来源情况式的“知味”，才是真正懂得饮食的味道。要达到这个程度，不但需要过人的味觉天赋，也需要不同凡俗的志趣和非同一般的专精功夫。持守中道的难度及其践行途径，恰似饮食之“知味”。又如《礼记·礼运》“故礼之于人也”章中说：“故礼之于人也，犹酒之有麴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这句话虽然不长，

但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比喻意义：人需要礼，就好比酿酒需要曲蘖。没有曲蘖，酒就酿不成；没有礼，人也不能成其为人。酿酒用的米和器物，有优劣精粗之别——君子之人就像精米和嘉器，宵小之人就像粗米和敝器。即便是使用同样的曲蘖，优劣精粗不同的米和器物酿出的酒，味道也会有醇厚与醜薄之别。同样的道理，一样的礼由不一样的人去实行，也会出现行事厚薄之分——本来就为人纯厚的君子以礼加身之后，会变得愈加纯厚；本来就智识浅薄的小人采用了礼之后，依然会显得浅薄。

由上可见，先秦文学作品中用作譬喻的饮食现象，本身丰富多样，其所喻示的道理也是多样不一，涉及治国、为政、齐家、君臣相处、待人之道、生活方式、为人、处事、修身、养生、谋生、问学、遵道、守礼等众多方面。饮食之中，包蕴万物之理。这类譬喻的存在，进一步赋予先秦文学作品中的饮食现象以丰厚、复杂的精神内蕴，精警生动，发人深省。

### 三、隐藏未来与祸福的饮食

饮食是人所习见的生活现象，在先秦时期又与礼仪、道德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宴饮更与礼仪、道德不可分离），所以此时期的人们惯于从一个人对待饮食的态度、在宴饮中的表现等等，观察其状态、品行，乃至由此推测其未来。这类事情在《左传》中出现得最多。

例如《桓公九年》中，曹太子于冬日来朝，鲁国享之，“初献，乐奏而叹”，鲁大夫施父见了，说道：“曹大（太）子其有忧乎！非叹所也。”同年《春秋》经文云：“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sup>②</sup>杜预注：“曹伯有疾，故使其子来朝。”孔颖达《正义》：“朝礼当君自亲行，不应使大（太）子也。当享而大（太）子叹，明年而曹伯卒，知其有疾，故使大（太）子来朝也。太子不合称朝，摄行父事，故言朝也。”<sup>[4]1754</sup>先秦时有“唯食忘忧”<sup>[4]2119</sup>的谚语，《礼记》亦称“当食不叹”<sup>[2]1249</sup>，曹太子叹非其所，在时人眼里不唯失礼，而且是不祥之兆。据经传后文，曹太子射姑之父曹桓公果然在次年春天去世。

又如《襄公二十七年》中，齐国庆封到鲁国聘问，鲁国叔孙豹（叔孙穆子）与其宴饮，庆封“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襄公二十八年》中，庆封又到了鲁国（这次是来避难），叔孙豹又与其宴饮，庆封“泛祭”，叔孙豹“不说（悦），使工为之诵《茅鸱》，亦不知”。庆封在宴席间的这些表

① 本文所引《礼记》文本，均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之《礼记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② 本文所引《春秋》与《左传》文本，均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现,隐含着作者对此人既无礼节又乏学养之品行的贬责,也暗示着此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左传·昭公十二年》所写的鲁国享华定之事,与前述庆封之事颇为相似:宋国大臣华定来鲁国聘问,“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叔孙昭子据此预言华定“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据经传后文,至昭公二十年,华定果然因为内乱出奔陈国。

“民以食为天”,在食物相对匮乏的先秦时期,饮食在人们心中占据着更重的分量。《诗经·小雅·伐木》云:“民之失德,干糗以愆。”<sup>[64]</sup>这就是说,违礼失德之人会连干糗之食都不肯分给别人,这是行为有过错,会给自己招来责怪,引来麻烦。还有相反的情况:即使施舍一点饮食给人,施舍者也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在饮食宴乐之时,行为是否合乎礼仪、道德,也是事关重大。《礼记·坊记》记孔子语曰:“觴酒豆肉,让而受恶,民犹犯齿。衽席之上,让而坐下,民犹犯贵。朝廷之位,让而就贱,民犹犯君。《诗》云:‘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sup>[216]</sup>这段话中包含着一个“小事关乎大体”的道理:教育人懂得礼让,要从“觴酒豆肉”开始;一个人的丧亡,也往往是由不懂“觴酒豆肉”的礼让渐次进展而来。与此相应,先秦文学中的饮食类行为表现,有时又会种下直接招致未来祸福事件的根苗。

这类祸福攸关、未来所系的饮食之事,也是在《左传》中出现得最多。如《宣公二年》写到,宋国将领华元率领军队抵御郑国的进攻,在两国交兵之前杀羊犒劳众士,其御者没分到羊羹,因此怀恨在心,挟私报复,在宋师与郑国军队交战之时故意驱赶车马冲入郑国军队中,致使宋师大败。文中的华元固然难免存心不公、不恤下人之讥,其御者也未免太心胸狭窄、不顾大局了,所谓“残民以逞”。这段记事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对饮食小事与军国大事之关联的不动声色的揭示。《襄公二十四年》叙述了与此相似的一件事情:楚人伐郑,诸侯援救郑国。晋国的张骼和辅跖负责向楚国军队挑战,由熟悉地势的郑人宛射犬为他们驾车。挑战之前,张骼和辅跖自己在帷幄中,而“坐射犬于外”,并且“既食,而后食之”。宛射犬身为郑国公孙,不堪受此屈辱,就在挑战接近楚军营垒的时候“不告而驰之”,二人“皆取胄於羹而胄”。挑战完毕,宛射犬又不等二人上车,就驾着车冲出楚营,二

人不得不赶紧追着跳上车,抽出弓箭射击追兵,方才脱离险地。

在《宣公二年》中,还叙写了与前述“羊羹”之事形成对照的另一件饮食之事:晋国执政大臣赵盾(宣子)曾经于外出打猎时,在一棵桑树下见到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人,就给他一些吃食。这个人叫灵辄,他已三天没吃饭了,却还把赵盾给的食物拿出一半来放在一边,说要留给母亲吃。赵盾听后,就让灵辄把东西都吃完,又另外准备了一些饭和肉,让他带给母亲。后来赵盾在晋灵公于酒宴上设伏兵攻击自己时,获得当时已是晋侯甲士的灵辄的救助,得以大难不死。事后灵辄却不肯向赵盾透露自己的姓名和居处,见赵盾脱险后默默离去。饮食虽为轻微之物,但在关键时刻却能够救人性命,并给施舍饮食的人带来不可预估的回报。

《宣公四年》也叙述了一桩因饮食招致大祸的史事:子公(公子宋)与子家(公子归生)去见郑灵公,子公忽然感觉自己的食指动了一下,就给予家看,并说:“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来到宫中,国君的厨师正在为客人分割鼋肉。于是子公与子家“相视而笑”,郑灵公见状,问其缘由,子家随告之。请客人品尝鼋羹时,郑灵公独不分给予公。子公一气之下,“染指于鼎,尝之而出”。郑灵公也大怒,欲杀子公。子公强拉子家起事,先下手为强,把郑灵公弑掉了。文中围绕鼋羹而叙写的那些琐事,简直如同儿戏。更有戏剧性的是,区区“儿戏”竟然关乎人命、国运。

《定公二年》《定公三年》所写的邾庄公丧命之事,其缘起也是一点食物:邾庄公与臣子夷射姑饮酒,夷射姑“私出”,守门人趁机向他“乞肉”,夷射姑不但不给,还“夺之杖以敲之”。守门人怀恨在心,便故意“以瓶水沃廷”,邾庄公从门台上“望见之,怒”,守门人告诉他夷射姑曾在这里小便。邾庄公下令捉拿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废于炉炭,烂,遂卒”。夷射姑因为没给守门人肉吃而遭到诬陷,并且连带“卞急而好洁”的邾庄公也送掉了性命。

又如《战国策·中山策》“中山君飧都士大夫”章所写<sup>①</sup>:中山君宴飧宾客,司马子期在场,但是没分到羊羹,因而发怒跑到了楚国,并游说楚王攻打中山国,致使中山君弃国逃亡。逃亡时中山君发现有两个人拿着戈跟在后面,就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二人回答说:“臣有父,尝饿且死,君下壶餐饵之。臣父且

<sup>①</sup> 本文所引《战国策》文本,均依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来死君也！”于是中山君仰面喟叹道：“与不期众少，其于当厄；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国，以一壶餐得士二人！”这里面当然有夸张之笔、传说之辞，但其中所蕴含着的“小节关乎大局”的道理却是不可否定的。

#### 四、饮食的性格、情感意涵及先秦文学饮食书写的流风余韵

先秦文学作品中的饮食，除了具有上述礼仪、道德、事理、祸福、未来状况等方面的意涵，有时还是人物特定性格或情感的载体或符号。

《诗经·邶风·谷风》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是以苦菜竟然甜如荠菜的感觉，极写弃妇心中的苦痛。又云：“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尔新婚，以我御穷。”这是用人们过冬吃的干菜、咸菜，来比喻弃妇在昔日的丈夫那里不过是一种抵御贫穷之物，饱含着弃妇失望中又有几分觉醒的痛苦之情。又如《诗经·郑风·狡童》中“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的诗句，是写“我”对“狡童”寝食难安的爱恋之情；《秦风·权舆》中“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余”“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的诉说，是感慨个人境遇的今不如昔。《左传》所写的饮食之事，往往也有着特定的人物性格与情感的内蕴。如《成公十年》所写晋景公食麦之事：晋景公做了个厉鬼索命的恶梦，醒后召桑田巫解梦，桑田巫预言其将“不食新”。晋侯还是活到了麦熟时节，“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他在吃新麦之前还没忘了把桑田巫叫来，“示而杀之”。就在晋侯刚要吃新麦的时候，忽然感到肚子胀，乃“如厕，陷而卒”。新麦本是普通之物，但在作者笔下却散发着某种诡秘的气息，晋景公的残暴与无明、桑田巫的神奇与黠慧也在这气息中让人领受无余。再如《哀公十一年》所写轅咺备食之事：陈国轅颇在作司徒时，“赋封田以嫁公女”，并用剩下的财物给自己铸造了“大器”，因此遭到国人驱逐，出奔郑国。路上轅颇口渴，其下属轅咺拿出“稻醴”“梁糗”“臠脯”。轅颇见有酒有饭还有肉，大喜，就问饮食怎么准备得这么充足，轅咺回答说“器成而具”。轅颇又问轅咺当初为什么不劝阻自己，答言“惧先行”。不知轅颇享受这“稻醴”“梁糗”“臠脯”之美食的时候，能否从中品出自己的贪欲蒙心、轅咺的先见之明的滋味。其他如《战国策·赵策三》“齐人李伯见孝成王”章中，齐人李伯得到赵孝成王的赏识和重用，有人向孝成王报告李伯造反，孝成王“方馈，不堕食”，后来事实证明此人乃是诬告。作者用赵孝成王该怎么吃饭就怎么吃饭的神态举止，写出了他的不惊不怪，心有主见。

先秦文学作品中的各种饮食现象，有些俨然已成为某种人物性格、品行的符号。《论语》中的孔子，自言“发愤忘食，乐以忘忧”“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孔子弟子颜回也是“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与其师皆有一种安贫乐道、乐道忘我的心态与性格。《战国策·齐策四》“管燕得罪齐王”章中，田需批评管燕“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鹅鹜有余食”，此语与《孟子·梁惠王上》中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类似，均堪比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言。《庄子·逍遥游》中的藐姑射山之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饮食上也是不同凡俗。以上饮食现象，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之沉淀，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特定的人物性格、品行的符号或代名词。

先秦文学作品中的饮食，有着丰厚、复杂的精神内蕴和立体、多维的特质，与此相联系，先秦文学作品中的饮食，具有抒情、说理、叙事、写人等多方面的功能，由此产生了独特的文学意义。先秦文学对饮食类事物的种种书写，以其丰富、深厚的精神蕴涵和独特、多样的文学意义垂范后人，流风余韵绵延不息。仅是其中“一饭起恩仇”的叙事模式，在后世文学作品中即不乏其例。如《史记·楚元王世家》写到，刘邦因先前去长嫂家吃饭，其嫂“详（佯）为羹尽，栝釜”，而在称帝后不欲为自己的长兄之子刘信封侯，后在太上皇请求下才封刘信为“羹颉侯”<sup>[12]1987</sup>。《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说，韩信因贫贱之时常寄食于某位亭长，“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有位在河边漂洗丝絮的老妇却几十天如一日地给他饭吃，而在被封为楚王后“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又把那位亭长叫来，赐与百钱，并对他说：“公，小人也，为德不卒。”<sup>[12]2609、2626</sup>其他如《世说新语·德行》中写顾荣曾在酒宴间施炙于行炙人，后来在遭乱时得其相助<sup>[13]</sup>；《宋书·庾悦传》中写刘毅在给庾悦做下属时，不受其待见，向他乞讨宴请宾客吃剩的鹅炙都不被答理，后来刘毅发达，多次羞辱庾悦，庾悦最终毒疮发背而死；宋代梅尧臣有《杂兴》诗感叹苏舜钦遭人诬告之事云：“主人有十客，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虽云九客沮，未足一客嗔。古有弑君者，羊羹为不均。莫以天下士，而比首阳人。”<sup>[14]</sup>直到明清之际的白话小说《醒世姻缘传》中，还有相进士之管家相旺没吃到“青韭羊肉合子”，怀恨在心而泄露狄希陈阴事的情节。上述与饮食有关的叙写，从其叙事模式上说，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文学。由此可见，先秦文学中的饮食书写，具有不可遍举的发端肇始之功。

## 参考文献:

- [1] [奥]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M].霍桂桓,索昕,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37.
- [2]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 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9.
- [4]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 [5]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2:59.
- [6]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 [7] 刘向,集录.诸祖耿集注汇考[M]//战国策集注汇考(增补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1238.
- [8] 朱熹.论语集注[M]//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 [9]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0] 程树德,集释.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697.
- [11] 戴德,撰.王聘珍,解诂.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259.
- [12]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3] 梅尧臣,著.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53.

## The Spiritualiz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ity of Diet in Pre-qin Literature

ZAN Feng-hua, LI Gui-ting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chool,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Diet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focuses of literature description. There are also many works or pieces of works related to diet in Pre-qin literature.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pecific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inking habits, the diet written in Pre-qin literature is not a simple, flat material phenomenon, but is in harmony with many things and emotions. Thus, it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iritualiz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ity,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blending of "diet" and "morality", eating "food" and eating "morality", diet containing the principle of everything, diet hiding the future and good luck or bad luck, diet as a sign of character and affection, and so on. The dietetic writing in Pre-qin literature has the functions of lyricism, reasoning, narrating and describing people, etc. Its effects are long-lasting.

**Key words:** the Pre-qin literature; diet; spiritualization; multidimensionality

## 版权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北京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超星域出版数据库、中教汇据(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中邮阅读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相关稿酬不再另行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德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 《陈风·东门之杨》主旨辨析

张媚东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西安 710119)

**摘要:** 关于《陈风·东门之杨》的主旨, 学界存在诸多解读, 如刺时说、刺陈灵公说、失约说、饮酒达旦说、孤臣被弃说、婚礼说等。以朱熹为源的男女失约说比较妥当, 但后世承朱者过度阐释, 强调诗中等候者为男性, 失约者为女性的观点则有失偏颇。考证该诗“东门”意象与“杨”意象, 并结合周代婚俗礼仪, 得出诗歌主旨为陈国恋人相邀东门, 约会一方久候不至。至于失约者性别, 可保留文本部分想象空间, 无需作进一步辨析。

**关键词:** 《东门之杨》; 诗旨; 男女失约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2)05-0014-05

《诗经·陈风·东门之杨》一诗共两章八句, 现录原文于下:

东门之杨, 其叶牂牂。昏以为期, 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 其叶肺肺。昏以为期, 明星皙皙。

对《陈风·东门之杨》的解读, 历代学者存在差异。本文首先归纳、总结前贤对诗歌主旨的不同观点; 其次分析其中得失; 最后通过剖析诗歌“东门”意象与“杨”意象, 并结合周朝婚礼制度, 深入文本研究, 得出诗歌主旨。

## 一、《东门之杨》诗旨诸说

关于《陈风·东门之杨》的主旨, 前代已有诸多说法, 现分类、归纳诸家观点, 作如下概述:

### (一) 刺时说

最早记载该诗刺时说主旨的文献是汉代《毛诗序》。毛传云:“东门之杨, 刺时也。昏姻失时, 男女多违。亲迎女犹有不至者也。”<sup>[1]卷十二</sup>除亲迎时间存在异议外, 东汉郑玄大体遵循毛说。唐孔颖达接踵毛、郑二人诗旨刺时说,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诗中“杨叶”内涵: 全诗以杨为喻, “以杨叶初生喻正时, 杨叶已茂喻过时。”<sup>[1]卷十二</sup>不仅如此, 孔氏还特别强调周代举行婚礼时女性违背男性的现象众多, 并举一例, 言亲迎女方失约不至, 实则批判世风, “刺当时之淫乱也”。此后不少学者推崇毛说, 如范处义的《诗补传》、辅广的《诗童子问》、林崑的《毛诗讲义》等。他们皆依据时代风俗与毛诗观点详细说明诗中“杨”“昏”“明星”等词语内涵, 由此揭开全诗主

旨。如《诗补传》云:“诗二章皆比而赋之”<sup>[2]卷十二</sup>, 比, 即以东门之杨、启明之星比“女犹不至”“不能践行”<sup>[2]卷十二</sup>的失约行为; 赋, 即解释女方失约不来的原因是“上之人淫昏”<sup>[3]且由上化下, 致使民间“女复有异志”<sup>[2]卷十二</sup>, 故曰刺时。又如《毛诗集解》依次列举风诗中《唐风·绸缪》《卫风·有狐》《郑风·野有蔓草》《陈风·东门之杨》四篇, 通过比较唐与卫、郑、陈三国民风之异, 突出陈地男女相奔的风俗是由“兵饥丧乱”“民不安居”“政教不修”“礼仪不明”<sup>[3]卷十三</sup>的社会现状导致, 因此《陈风·东门之杨》一篇的主旨为“刺男女昏姻不得其时。”<sup>[3]卷十三</sup></sup>

### (二) 刺陈灵公说

明代何楷提出此说。其代表作《诗经世本古义》有言:“《东门之杨》, 刺陈灵公淫于夏姬也。”<sup>[4]卷二十六</sup>何氏论《诗》多凭《孟子》知人论世之旨。如其言《周南·关雎》为毕公时所作;《王风·黍离》为伯封时所作;《大雅·公刘》《邠风·七月》为夏少康时所作;《曹风·下泉》为周敬王时所作。这些说法不免牵强刻意, 不可全信。何氏对《东门之杨》的推断正是属于此类。

### (三) 失约说

失约观点按照不同申说重点可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 认为诗歌乃朋友相期不至之作。汉代申培主张这类观点。其《诗说》云:《东门之杨》与《月出》《东门之枌》《东门之池》三篇皆是“朋友相期不至而作, 兴也。”<sup>[5]卷一</sup>明代曹学佺《诗经剖疑》赞

收稿日期: 2022-02-27

作者简介: 张媚东(1998-), 女, 广东梅州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同此说。曹氏认为：《东门之杨》以杨柳起兴，昏日入后即二刻半时辰。当时日光隐没，明星悬空，类似《离骚》“初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的暗喻语言，实乃“以朋友二字发端”，余下缺文“或为相友之寒盟者而赋。”<sup>[6]卷十一</sup>第二类：认为诗歌乃恋人失约之作。宋代朱熹《诗集传》云：全诗共二章。第一章“兴也。东门，相期之地也。杨，柳枝扬起者也……此亦男女期会而有赴约不至者，故因其所见以起兴也。”<sup>[7]107</sup>南宋戴溪拥护朱氏观点。其续作《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解释该诗主旨为愆期迟归。按照《说文解字》说法，“愆，从心衍声，过也。”<sup>[8]220</sup>段注又言：“过者，凡人有所失。”<sup>[8]220</sup>由此可见，“愆期”一词和“失约”二字近义，与朱氏观点同出一源。元代梁寅《诗演义》补充朱子观点：恋人失约具体而言是女方失信。明代朱善《诗经解颐》又言：“此必男子有他志”<sup>[9]卷十二</sup>，故女方负约。近代学者大多赞同男女失约说法。如傅斯年《诗经讲义稿》认为：“《东门之杨》，男女相期于昏，而明星煌煌，犹未至也。”<sup>[10]87</sup>余冠英《诗经选》提到：“这是男女约会之词。东门是约会之地，黄昏是约会之时。”<sup>[11]84</sup>高亨《诗经今译》则言：“二人约定黄昏时相会于东门，而对方久久不来，作者唱出这首情歌。”<sup>[12]180</sup>程俊英、蒋见元《诗经著析》总结该诗“写男女约会久候不至。”<sup>[13]288</sup>第三类：认为诗歌乃失约之作，但不可分辨是友人失约还是男女失约。如《诗缙绪》言：“此只言其负期耳”，诗中景物用于歌咏，实“不必为男女期会。”<sup>[14]卷七</sup>

#### （四）饮酒达旦说

南宋王质提出此说。其《诗总闻》借题发挥，言诗中两人相期昏时，“在暗不认树叶，认树叶必明也，可见其饮酒达旦也……认树实亦必明也。”<sup>[15]88</sup>

#### （五）孤臣被弃说

此说由清末进士姜炳璋提出。其《诗序补义》曰：“《骚经》云：‘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九章》云：‘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它志。’”《东门之杨》沿袭屈子心志，“则为孤臣被弃，借事言情。”<sup>[16]510</sup>

#### （六）婚礼说

宋代程颐、程颢提出此说。两人搜取朱光庭、陈渊、李参、罗从彦等诸家集录，并精心挑选，共撰《二程外书》十二卷。书中有言：“‘东门之杨，其叶牂牂。’凡说婚姻，男女多言东。东取生育之意。杨，最得阳气之先者，言人反不及时。”<sup>[17]5</sup>又言：“‘昏以为期，明星煌煌。’此言婚姻昏时，今则‘明星煌煌’而不至。”<sup>[17]5</sup>清代王闿运补充二程观点，认为诗中女性婚期不至的原因是邦国交战，兵连祸结。

诚如傅斯年先生在《诗经讲义稿》中所说：“由古到今，关于《诗经》的议论非常复杂”<sup>[10]3</sup>，从西汉起，“一部绝美的文字书成了一部庞大的伦理学。”<sup>[10]9</sup>以上诸说经历多朝多人多事，阐述语境极其复杂，故今人还需立足文本，并参考《论语》《左传》两部文献，不涉伦理，不谈政治，仔细辨析。

#### 二、《东门之杨》诸说辨析

刺时与刺陈灵公说法的支持者主要是汉朝儒生及后代习儒者，前者属于泛说，后者落实到具体朝代的某一统治人物。

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此类学者论诗大抵不离“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sup>[1]卷一</sup>的诗教观念。故诗三百篇几乎首首关联历史，或批判世风，如将《邶风·柏舟》歪曲成“卫倾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sup>[13]47</sup>的诗歌，认为《卫风·伯兮》言春秋时代战争频繁，“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返”<sup>[13]143</sup>；或歌颂贤者美德，如解释《周南·关雎》《周南·麟之趾》乃王者之风，后妃之德。但值得警惕的是，借助史料评论诗歌的解诗方法并非偏离史实、生硬拉扯历史真人真事。否则以史证诗之“证”容易成为后辈高谈虚词、脱离实际的空泛行为。再者，历史与文学的分界点是，前者追寻事件真相，后者强调真实与人文关怀、审美体验的有机统一。作为中国古代早期诗体，《诗经》主题、艺术之美皆有待读者仔细品味，“一味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考证历史问题，通常不能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sup>[18]180</sup>针对该诗来讲，毛传最早提出诗之主旨为刺时，并将刺时的具体表现释作“昏姻失时，男女多违。”<sup>[14]46</sup>毛公说法错误有二：第一，因无同类事例的相关文献作为旁证，婚姻失时现象不可完全推导出作诗者创作动机必定为含讥带讽。第二，品读全诗，诗中文字并未透露任何关于古代婚姻礼仪制度、婚恋失礼场景的相关内容，至于男女失时现象众多的再度推想更属汉儒无稽之谈。后郑玄、孔颖达、范处义、辅广、林岍等人以此为源，对文本词汇进行阐发的做法更是漏洞百出，牵强至极。关于前人释诗多谈刺时之因，傅斯年先生从文体源流学的角度考察，得出古时“风”“讽”乃一字，其后“讽”字添加偏旁是汉儒所为。风诗最初并无“讽”义，只是由于战国诡词多谏净寓意，汉初学者大受启发，开始对《诗经》大谈刺时观念。

既然刺时说近乎吃语，刺陈灵公沉溺美色、淫于夏姬的说法便更难站稳脚跟。事实上，在十篇陈风作品中，年代可考者仅有《株林》一篇。据《左传》宣公九年、十年记载，夏南为陈国大夫夏御叔妻夏姬之子。夏姬貌美，灵公与之纵欲于株邑郊野，故诗人作

诗讥讽该事。至于《东门之杨》，其具体年代已无法考证，学者只可大致推断诗歌出自东周以后，不可明确敲定年代为周定王鲁宣公时。

关于失约说法，第一类学者认为失约对象为昔日朋友。溯源《诗经》时代“朋友”之名可知，“朋”指周人饮酒器皿或经济贝币；“友”从二又，亦取双手相交互助之义。先秦父系权力强大，王与各诸侯间等级关系森严，朋友情谊多以分封制度下的君臣、兄弟互助关系作为支撑，如《大雅·假乐》“惠于朋友，庶民小子”<sup>[13]620</sup>句，《大雅·既醉》“朋友攸摄，摄以威仪”<sup>[13]615</sup>句，《大雅·皇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既受帝祉，施于子孙”<sup>[11]589</sup>句。它们强调远近亲疏，关乎下一代的王位继承，绝非申培等人所谈之毫无政治目的的相期约会。第二类学者认为失约对象为恋爱男女，依据是：诗歌以杨起兴，“东门”则为二人相约场所。约会关系为女方不至，男方等待。笔者同意男女恋爱失约观点，但对失约关系不认同。第三类学者认为失期对象不必拘泥于恋爱男女，结合上述文字，可知其观点泛而不明，不可尽信。

饮酒达旦说。《诗总闻》对诗句“昏以为期”的解释为：夜色昏暗导致个体产生视觉障碍，故相期者无法识别东门树叶。这一解释勉强符合人类生活经验，但将“认树叶必明也”<sup>[15]88</sup>与“可见其饮酒达旦”<sup>[15]88</sup>直接挂钩则显突兀，不见任何文本根据。

孤臣被弃说法的提出者姜炳璋认为：该诗沿袭屈子心志，为借事寓情之篇。姜氏说法错误。文献使用者需具备基本年代意识。众所周知，屈原在世时间为约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278年，属战国时期。而陈风作品的时限下限仅为东周以后至春秋初年，因此此为年代较早文献继承年代较晚文献之谬谈。

婚礼主旨说的学者认为：东门、杨叶、明星等诗歌意象皆同男女生育、婚礼举行等民间风俗有关。的确，古有文献记载东寓生育，杨、阳同音，阳气刚强等说法。然而《诗经》研究除考察诗中名物、词语、训诂外，还应特别注意文本生成语境。诗歌仅渲染出约会之时“昏以为期”、明星闪烁的夜色氛围，并未明确交代二人相约动机即为举行婚礼。解诗者只可借助词语语码猜测二人关系亲密无比，或为恋爱双方。

综上，以上诸说皆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脱离文本内容曲解诗意。解诗者通常考虑文本以外的政治、道德、伦理等因素，强行抹杀本属诗歌文学的审美特质，进而陷入诗中求史而非以史证诗的阐释怪圈。其中，毛《序》、郑笺、范处义《诗补传》、辅广《诗童子问》、林岳《毛诗讲义》、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姜炳璋《诗序补义》、王质《诗总闻》的理论都不

离政治性质强烈的时代观点；程颐、程颢《二程外书》、王闿运《诗经补笺》的阐释意图迎合人类生存法则，紧密关联道德伦理；申培《诗说》、曹学佺《诗经剖疑》、刘玉汝《诗缙绪》的论诗说法先入为主，不可尽信，仅有以朱熹《诗集传》为源头的恋人失约观点详参各家，大胆质疑，最为贴切。

### 三、《东门之杨》诗旨辨

探究诗歌主旨需从文本内容出发，“通过对文本结构、意象、语义、内容等细致、深入地剖析、读解、阐释，实现对文本意义的深度理解。”<sup>[19]1</sup>就该诗而言，立足文本意味着抛弃与主旨无关的道德伦理因素，从原文挖掘诗歌意象、文字训诂等相关信息进行实际考察，不做过多政治性阐释。

#### （一）“东”与“东门”意象考

全诗共两章，每章开头都提到“东门”一词，“东”与“东门”有何寓意，笔者结合所得文献进行以下分析：

先秦时代，民风尚朴。万民对世界的认知直接源于自然界的具象物象。面对生活，人类不加猜测，不作设想，而是强调流于表层印象的主观之思。这种感性思维使得上古文献中到处充盈着描绘先民潜意识活动的文化印记。《尚书》有云：“东方者何也？动方也，物之动也。”<sup>[20]卷一</sup>由此可知，东指方位，东方即动，可释为万物震动。代表“六经之首”的《易经》也记载过相同观点，其云：“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sup>[21]卷十三</sup>具体来讲，万物之动包囊日月，发华草木，惊动鸟兽，撩拨人心。《灵棋经》撰者在第四百三十四卦中描述过此类景象：“日出东方，照我百通。余光所照，延及幽谷。官事散，病者瘥，行人至，市贾大获，婚姻和合，此卦大吉之兆。”<sup>[22]卷下</sup>日光冉冉东升，照耀四方，不仅使阴暗幽谷重现光明，而且驱逐病魔，唤醒人心，赐予先民生活希望。代表万物震动的节气，《尚书》有云：“东方者何也？动方也，物之动也。何以谓之春？春，出也，故谓东方春也。”<sup>[20]卷一</sup>先民在勃勃生机的春季释放内心最原始的行为冲动。青年男女或荷塘有遇，恋之无因，“伤如之何”<sup>[13]297</sup>；或月下相悦，“牢心悄兮”<sup>[13]293</sup>，幽思固结；或邀约城池，浸麻织布，放声对歌。“东”由最初的方位名词上升为富有深刻内涵的文化词汇。

既然“东”有如此丰富的内涵，那么地理位置靠近宛丘的陈国城门——东门，其城市方位的布局设定也绝非偶然。根据杨宽先生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中对“东门”地理位置的考证可知：陈国都城布局仿照成周洛阳建制，推行西“城”连结东“郭”的形式。东“郭”乃陈国市民官僚、地主、商人、手工

业者的居住区，是手工业作坊和商业集中之地。国家建筑坐东朝西，视东门为正门。1983-1985年间《考古》期刊陆续发表过中国学者对东城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商业作坊及宫城遗址的相关研究。

《诗经》中陈国青年仲春之月聚集东门相期约会的案例不计其数，代表作品如《宛丘》《东门之池》《东门之枌》《泽陂》。

《东门之杨》中男女情窦初开，钟情彼此。维系新生情感要求双方相互信任，坦诚沟通，“东门”便成青年男女敞开心扉，化解矛盾的情感圣地。百花齐绽、玄鸟欢和的春日本无甚恋爱枷锁，两性积藏内心的肺腑之言适合在乱花迷人的热闹东城大胆说出。再者，方位名词“东”的原始意蕴容易刺激恋爱者意识深层的情感冲动。身居东城街市，主人公隐藏内心的原型概念在脑海间歇浮现，璀璨繁星初上夜空，寂静黄昏促使其浮想联翩，满怀期待；一旦对方失约，候人青年的性欲本能与情感需求皆不可得到满足时，昔日甜蜜恋情被迫在漫长等待中消失殆尽，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最终演绎成“不胜清怨月明中”的声声哀叹，无计可消。

## （二）“杨”为何树试解

物象原本客观，不因人类感情发生变化，“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的主观色彩。”<sup>[23]163</sup>《诗经》作者取材生活，融合情性，吟咏成歌。在《东门之杨》中，诗歌对“杨”的描述为：“东门之杨，其叶牂牂”“东门之杨，其叶肺肺”。但“杨”究竟为何树，从汉儒注解《诗经》至今，论者说法不一。《尔雅·释木》《诗草木今译》《诗集传》《诗经剖疑》等主张杨为“蒲柳”；《毛诗名物图说》则认为杨乃圆叶“白杨”。

《诗三百》篇，除《陈风·东门之杨》外，涉及“杨”意象的篇目还有《小雅·菁菁者莪》《小雅·南山有台》《秦风·车邻》《小雅·采薇》四篇。《小雅·采薇》末章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sup>[13]361</sup>洪承珙曰：“《尔雅》只以柳为大名，曰桤，曰旄，曰杨，其种各异。古人言杨柳者，谓名杨之柳。”<sup>[13]361</sup>《说文解字》说法更加明确。其言：“柳，小杨也。”<sup>[8]112</sup>结合“依依”乃树叶柔媚随风飘拂之貌，可知“杨柳”为叶长如眉，枝条下垂的青青小杨。事实上，《诗经》文本也仅出现一篇植物名曰“杨柳”而非“杨”的《小雅·采薇》。至于其他四篇，《车邻》末章云：“阪有桑，隰有杨。”<sup>[13]258</sup>隰乃低洼湿地，为此杨生长之土壤条件。《南山有台》诗二章云：“南山有桑，北山有杨。”<sup>[13]372</sup>南北方位相对，“北山”泛指北面山坡。《菁菁者莪》末章曰：“泛泛杨舟，载沉载浮。”<sup>[13]381</sup>

可见此杨木质坚固，可造轻巧船只。《东门之杨》中形容杨叶的词汇为“牂牂”“肺肺”。两者皆与大、盛之义有关。结合类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对白杨“叶厚而密，乘风作响，甚悽听也”<sup>[24]卷四一二</sup>“高大而材美”<sup>[24]卷二三八</sup>“性劲直，堪为屋材”<sup>[24]卷四一二</sup>等描述，笔者断定《东门之杨》所谈“杨”树为枝干高大，材质坚劲的圆叶白杨。

考虑文本语境，全诗围绕昏“期”展开。白杨枝干粗壮、枝叶繁茂，正是男女约会时较易辨识的地理坐标。启明高照，招风圆叶沙沙摩挲，心念佳人久候不至。主人公彼时内心失落感伤却又无可奈何，只可举头邀叶，对影成三。清人王夫之曰：“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sup>[25]卷首</sup>白杨微风善摇，婆娑树影本身传递出生气勃勃、妩媚娇俏的生命动感。杨叶生理结构与悲哀之人苦闷伤感的心理结构两相比对，愁情意绪自然转移至景物身上。故其看杨似己，泪眼问叶，情景交织，虚实难辨。后代诗文中也常出现“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离别处”等诗句。诗人借助白杨意象抒发天地愁惨的表达方式正是继承了《东门之杨》的文化印记。“白杨”已从一株无情植物扩充成为文人墨客笔下传情的重要意象。

## （三）“昏”与“婚”：周朝婚俗辨

接下来分析每章后两句：“昏以为期，明星煌煌。”“昏以为期，明星哲哲。”<sup>[13]288</sup>许慎《说文解字》释：“昏，日冥也。”<sup>[8]135</sup>“冥”为幽，“日冥”可取日光幽暗、不见光明之义；“昏”字是“婚姻”之“婚”的本字。《正字通·女部》曰：“婚，古作昏。”<sup>[26]398</sup>《字触补》进一步解释：“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sup>[27]94</sup>古时礼法遵循黄昏娶妻，婚姻与黄昏有密切渊源，这或牵涉到远古时代的抢婚习俗。《周易》屯卦记载过一段抢婚场面：“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乘马班如，泣血涟如。泣血涟如，何可长也？”<sup>[21]卷二</sup>后代诸儒受此启发，在阐释该诗“昏以为期”<sup>[13]233</sup>一句时大多认同“昏”即“婚姻”，“昏以为期”<sup>[13]288</sup>即约定黄昏作为婚期的观点，并结合余下“明星煌煌”“明星哲哲”两句得出全诗主旨为婚姻失时。

然而，“昏以为期”之“昏”不可作“婚姻”解释。《礼记·昏义》第四十四则有言：“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sup>[28]卷四</sup>由此可知，汉式婚礼流程有六，其中，亲迎礼要求新夫亲自前往女方家庭迎娶新妇。具体形式

可参见《召南·鹊巢》《齐风·著》与《小雅·车鞳》三篇。一般而言,亲迎之初男方家庭需登高折薪、准备佳肴、安排四牡,婚恋青年更应盛装打扮,“充耳以素”“尚之以琼华”“充耳以青”“尚之以琼莹”“充耳以黄”“尚之以琼英”<sup>[13]207</sup>,如此一来,男女双方相约东门,男方迎亲,女方久等未至的说法便极不可信。

“昏以为期”之“昏”应释作日光幽暗,不见光明的幽静黄昏,双方关系为恋爱男女,二人相约黄昏时刻东门会面,然一方失约,过时不至。“明星”,即启明之星,常日落而出,又名长庚。“煌煌”“晔晔”意思相近,为繁星光明耀眼貌。全诗只字未言主人公之愁情,但借助寒冷星夜,摇曳树影,表达青年孤独心语。相比昔日繁华东门,此刻景色凭添伤感,凭增寂寞。朱熹《诗集传》认为该诗言男女期会而负约不至,笔者赞同此说。但其后承袭朱子一派的相关学者过度解释,提出诗中等候青年为男性,失约青年为女性的观点则缩小文本阐释空间,有失偏颇。综观全诗,诗中并无确指对星长叹之人的性别,而仅交代二人相约黄昏,若将失约情人视作男性,诗旨阐释同样合理。

综上,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阐释历史漫长悠久,当代学者不可全盘否定前代儒者的诗经解读,而应仔细辨别,适当吸收。把握诗歌内涵不仅需结合时代背景与文化思潮,而且要求立足文本,并参考相关文献与当时民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诸多学者,如闻一多、傅斯年、余冠英、高亨等已为后人做出榜样。今通过对诗中“东门”意象、“杨”意象及周朝婚姻礼仪制度的考证,得出《陈风·东门之杨》的主旨为:陈国恋人相约东门,约会一方久候不至。这种解释与朱熹《诗集传》观点一致,却又有别于承朱者等候青年为男性,失约青年为女性的看法,以期归正诗旨,丰富文本内涵。

## 参考文献:

- [1]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二十卷[M].清光绪二十四年点石斋石印本.
- [2] 范处义.诗补传[M].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刊通志堂经解本.
- [3] 李樛,黄熏.毛诗集解[M].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刊通志堂经解本.
- [4] 何楷.诗经世本古义[M].明崇祯十四年刻本.
- [5] 申培.诗说[M].明百陵学山本.
- [6] 曹学俭.诗经剖疑[M].明末刻本.
- [7] 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21.
- [8] 许慎,撰.徐铉,校.说文解字注[M].北京:中华书局.
- [9] 朱善.诗经解颐[M].清文渊阁四库丛书本.
- [10] 傅斯年.诗经讲义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11] 余冠英.诗经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12] 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13]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2021.
- [14] 刘玉汝.诗缙绪[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5] 王质.诗总闻[M].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 [16] 陈子展.诗经三百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 [17] 程颢,程颐.二程外书(12卷)[M].明弘治陈宣刻本.
- [18] 钱锺书.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 [19] 田中元.方法论视域下的文本阐释[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8.
- [20] 尚书大传[M].四部丛刊景清刻左海文集本.
- [21] 孔颖达,撰.周易注疏(十三卷)[M].北京图书馆藏南宋刊本.
- [22] 颜幼明,注.注灵棋本章正经[M].民国景印明正统本.
- [23]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24] 蒋廷锡,陈梦雷,等,辑.钦定古今图书集成[M].北京:线装书局,2016.
- [25] 王夫之.姜斋文集(十卷)[M].清同治四年湘乡曾氏金陵节署刻船山遗书本.
- [26] 张自烈.正字通(十二卷)[M].清康熙二十四年清畏堂刻本.
- [27] 桑灵直.字触补[M].清光绪小娜嬛书库刻本.
- [28] 叶德辉.仪礼解[M].民国郟园先生全书本.

(下转第22页)

## 《晋书·王珣传》辨正

高胜利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贵州 都匀 558000)

**摘要:**《晋书·王珣传》在记载王珣的事迹时有三处叙事不准确:一为“从讨袁真,封东亭侯”之事,实际上应当是“从讨袁瑾”;一为“诣族弟献之”之事,王献之在年龄上是长于王珣的;一为王珣卒年,王珣卒于隆安四年而非隆安五年。此三处叙事不准确的原因是因为史臣没有仔细核对事件发生时间以及没有厘清人物辈分关系所致。

**关键词:**《晋书》;王珣;事迹;晋中兴书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2)05-0019-04

琅琊王氏作为东晋南朝时期最具影响力的门阀士族之一,其家族中代表人物长期居于高位,把持朝政,这与他们善于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的特点不无关系。在政权更迭频繁的东晋南朝时期,总有琅琊王氏子孙以务实的态度积极参与时局变迁,审时度势,抓住机会,乘势而起。尤其东晋中后期,在琅琊王氏家族的权势地位下降之际,这种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其中,王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晋书·王珣传》中记载的有关王珣的事迹有多处叙事不准确,主要包括“从讨袁真”“诣族弟献之”以及卒年等信息。《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卷二“王珣事迹辨证”条进行了简单说明<sup>[1]</sup>,可惜未加详细论证,窃以为尚存未周之处,谨不揣浅陋,条陈讨论如次。

### 一、“从讨袁真,封东亭侯”——叙事不准确

据《晋书》卷六十五《王珣传》记载:

珣字元琳。弱冠与陈郡谢玄为桓温掾,俱为温所敬重,……从讨袁真,封东亭侯,转大司马参军、琅邪王友、中军长史、给事黄门侍郎。<sup>[2]1756</sup>

在上述叙事的文字中,《晋书》本传记载王珣“弱冠与陈郡谢玄为桓温掾”,转主簿后,“从讨袁真,封东亭侯”。而据《晋书》卷八《海西公纪》记载:

(太和)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马桓温帅众伐慕容暉……冬十月,大星西流,有声如雷。己巳,温收散卒,屯于山阳。豫州刺史袁真以寿阳叛。

十一月辛丑,桓温自山阳及会稽王昱会于涂中,将谋后举。十二月,遂城广陵而居之。五年春正月己亥,袁真子双之、爱之害梁国内史硃宪、汝南内史硃斌。二月癸酉,袁真死,陈郡太守硃辅立真子瑾嗣事,求救于慕容暉。夏四月辛未,桓温部将竺瑶破瑾于武丘。秋七月癸酉朔,日有蚀之。八月癸丑,桓温击袁瑾于寿阳,败之。<sup>[2]212-213</sup>

通过细致梳理上述史料可知,太和四年(369)十月,“豫州刺史袁真以寿阳叛”。太和四年(369)十一月,桓温与会稽王昱会于涂中,将谋后举。太和四年(369)十二月,桓温“城广陵而居之”。太和五年(370)正月,袁真以交通桓温罪名,杀害了梁国内史硃宪、汝南内史硃斌。太和五年(370)二月,袁真卒,袁真之子袁瑾嗣事,八月,“桓温击袁瑾于寿阳,败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二《晋纪·海西公》亦记载曰:

(太和四年)冬,十月,己巳,大司马温收散卒,屯于山阳。温深耻丧败,乃归罪于袁真,奏免真为庶人;又免冠军将军邓遐官。真以温诬己,不服,表温罪状,朝廷不报。真遂据寿春叛,降燕,且请救;亦遣使如秦。……(十一)辛丑,丞相昱与大司马温会涂中,以谋后举;以温世子熙为豫州刺史、假节。……十二月……大司马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太和五年)春,正月,己亥,袁真以梁国内史沛郡朱宪及弟汝南内史斌阴通大司马温,杀之。……二月,癸酉,袁真

收稿日期: 2022-03-25

基金项目: 2019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先唐吊文整理与研究”(2019 W160)。

作者简介: 高胜利(1982-),男,河南项城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卒。陈郡太守朱辅立真子瑾为建威将军、豫州刺史，以保寿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马爨亮如邺请命。燕人以瑾为扬州刺史，辅为荆州刺史。……秋，七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八月……大司马温自广陵帅众二万讨袁瑾；以襄城太守刘波为淮南内史，将五千人镇石头。波，隗之孙也。癸丑，温败瑾于寿春，遂围之。燕左卫将军孟高将骑兵救瑾，至淮北，未渡，会秦伐燕，燕召高还。<sup>[3]1547</sup>

综合上述史料可知，《晋书》卷八《海西公纪》与《资治通鉴》卷一百二《晋纪·海西公》所记载的内容大体一致。从太和四年（369）十月至太和五年（370）七月之间，桓温与袁真之间并没有战事发生，且袁真卒于太和五年（370）二月，而桓温与袁瑾之间是有战事的，其事发生在太和五年（370）八月。据此可知，《晋书》本传记载王珣“从讨袁真，封东亭侯”的事迹应该是“从讨袁瑾”。史臣没有认真核对事件发生时间，导致叙事不准确，实际上是王珣从讨袁瑾，以军功封东亭侯。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叙事不准确情况，应当是史臣采用了不恰当的原始文献所导致的，那么，这条原始文献出自何处呢？考《世说新语·言语篇》“宣武移镇南州”条记载曰：

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谓王东亭曰：“丞相初营建康，无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为劣。”东亭曰：“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国；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故纡余委曲，若不可测。”<sup>[4]156</sup>

按，此处王东亭即是东亭侯王珣，该条刘孝标注引《王司徒传》曰：

王珣字元琳，丞相导之孙，领军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称。大司马桓温辟为主簿，从讨袁真，封交趾望海县东亭侯，累迁尚书左仆射、领选、进尚书令。<sup>[4]156</sup>

有关《王司徒传》，遍检现存佚文的九家旧晋书，可以从中寻得蛛丝马迹，根据何法盛《晋中兴书》记载：

王珣字元琳，弱冠即与陈郡谢玄俱辟大司马桓温掾，温语人曰：“谢掾年三十，必拥旄杖节。王掾当作黑头公，皆未易才也。”

珣为大司马掾，转府主簿。时大司马温经略中夏，军国无宁，戎府多事。珣居要任有称绩，三军文武及数万人，悉识其面。

珣拜侍中、尚书左仆射，领吏部。时烈宗雅好典籍，深钦爱之，与郗恢、殷仲堪、徐邈并以才学文章为上所昵。<sup>[5]53</sup>

比对上述两则史料可知，刘孝标注引的《王司徒

传》当是出自《晋中兴书》。有关王珣的生平仕历，唐人所修《晋书·王珣传》记载曰：

（王）珣字元琳。弱冠与陈郡谢玄为桓温掾，俱为温所敬重，尝谓之曰：“谢掾年四十，必拥旄杖节。王掾当作黑头公。皆未易才也。”珣转主簿。时温经略中夏，竟无宁岁，军中机务并委珣焉。文武数万人，悉识其面。……（谢）安卒后，迁侍中，……征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转左仆射，加征虏将军，复领太子詹事。时帝雅好典籍，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并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sup>[2]1756</sup>

比较唐人所修的《晋书·王珣传》与《晋中兴书》有关王珣的记载可知，二者在叙述王珣的事迹时文字高度相似，某些地方更是直接袭用，比如“经略中夏”“悉识其面”“雅好典籍”等。可见唐修《晋书·王珣传》的史料也是出自《晋中兴书》，只不过叙事更为详细而已，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是也。由此可以推测唐修《晋书·王珣传》中记载王珣“从讨袁真，封东亭侯”的叙事当是取材于《世说新语·言语篇》“宣武移镇南州”条注引《王司徒传》。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此处叙事也可能出自除《晋中兴书》之外的众多旧晋书之一，由于诸家旧晋书已经亡佚，根据现存的佚文无法确定，姑存疑俟续考。

## 二、王珣卒年不准确

据《晋书》卷六十五《王珣传》记载：

隆安初，国宝用事，谋黜旧臣，迁珣尚书令。王恭赴山陵，欲杀国宝，珣止之曰……恭寻起兵，国宝将杀珣等，仅而得免，语在国宝传。二年，恭复举兵，假珣节，进卫将军、都督琅邪水陆军事。事平，上所假节，加散骑常侍。四年，以疾解职。岁余，卒，时年五十二。追赠车骑将军、开府，谥曰献穆。<sup>[2]1757</sup>

从上述这段文字可知，王珣于隆安四年（400）“以疾解职”，然又云“岁余，卒，时年五十二”，玩味其意，好像是王珣卒于因病解职一年后，即隆安五年（401）卒。然而《晋书》卷十《安帝纪》却记载曰：

（隆安）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二月己丑，有星孛于奎娄，进至紫微。三月，彗星见于太微。夏四月，地震。孙恩寇浹口。五月丙寅，散骑常侍、卫将军、东亭侯王珣卒。<sup>[2]252</sup>

此处记载王珣是卒于隆安四年（400）五月丙寅。众所周知，史书中“纪”的内容要比“传”准确些。除此之外，《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晋纪·安皇帝》亦记载曰：

（隆安四年）春，正月，壬子朔，燕主盛大赦，自贬号为庶人天王。……燕前将军段玘，太后段氏之兄子也，为段登辞所连及，五月，壬子，逃奔辽西。丙寅，卫将军东亭侯王珣卒。<sup>[3]1953</sup>

此处记载王珣亦是卒于隆安四年（400）五月丙寅。由此可知，《晋书》卷十《安帝纪》与《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晋纪·安皇帝》中所记载的有关王珣的卒年是相同的。因此，有关王珣的卒年应该是隆安四年（400）五月丙寅，以此可推知，其生年为晋穆帝永和五年（349）。是故，《晋书·王珣传》中有关王珣卒年的记载是不准确的。

### 三、“诣族弟献之”——人物关系有误

据《晋书》卷六十五《王珣传》记载：

初，珣既与谢安有隙，在东闻安薨，便出京师，诣族弟献之，曰：“吾欲哭谢公。”献之惊曰：“所望于法护。”于是直前哭之甚恻。法护，珣小字也。<sup>[2]1757</sup>

上述文字云王珣听闻谢安卒，“便出京师，诣族弟献之”，欲吊唁之。此处“诣族弟献之”句，人物关系有误，实际上王献之的年龄是长于王珣的。据前文考证可知，王珣生年为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卒于隆安四年（400）五月。而有关王献之的生卒年月，《晋书·王献之传》无载，但是依据其他的相关文献，爬梳剔抉，可以寻得线索。据《世说新语·伤逝篇》“王子猷、王子敬俱病笃”条记载：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sup>[4]646</sup>

此条刘孝标注曰：“献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而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引程炎震曰：“《法书要录》九载张怀瓘《书断》曰：‘子敬为中书令，太元十一年卒于官，年四十三。族弟珣代居之，至十三年而卒，年三十八。’案所载珣年与《晋书》合，知所称子敬之年亦当不误。此注或传写之讹耳。”<sup>[4]646</sup>那么，王献之究竟卒于哪一年呢？据《晋书》卷六十五《王珣传》记载：

辟州主簿，举秀才，不行。后历著作、散骑郎、国子博士、黄门侍郎、侍中，代王献之为长兼中书令。二人素齐名，世谓献之为“大令”，珣为“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时年三十八，追赠太常。<sup>[2]1758</sup>

由此可知，王献之于中书令任上病逝后，由王珣代居之，而王珣于“太元十三年卒，时年三十八”，

则王献之卒年必是在太元十三年（388）之前，因此，刘孝标注云“献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就是有误的。那么，王献之卒于太元十一年（386）是否可靠呢？据《晋书》卷八十《王献之传》记载：

寻除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及安薨，赠礼有同异之议，惟献之、徐邈共明安之忠勋。献之乃上疏曰：……孝武帝遂加安殊礼。未几，献之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对曰：“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献之前妻，郗昙女也。俄而卒于官。<sup>[2]1205</sup>

从上述此处文字记载可知，谢安卒后王献之曾上疏议加殊礼，此事之后“未几，献之遇疾”，“俄而卒于官”。则由此可知，王献之于谢安卒后不久也去世了，那么，谢安卒于何年呢？据《晋书》卷九《孝武帝纪》记载：“（太元）十年春正月甲午，谒诸陵。……八月甲午，大赦。丁酉，使持节、侍中、中书监、大都督十五州诸军事、卫将军、太保谢安薨。”<sup>[2]234</sup>据此可知，谢安是卒于太元十年（385）八月，那么依据上述文字“未几，献之遇疾”以及“俄而卒于官”，则可知王献之于谢安卒后次年去世即王献之卒于太元十一年（386）是符合逻辑的。据《历代名画记》卷五记载曰：

羲之子献之，字子敬（中品下），少有盛名，风流高迈，草隶继父之美，丹青亦工。桓温尝请画扇，误落笔，因就成乌驳犝牛，极妙绝。又书《犝牛赋》于扇上，此扇义熙中犹在。官至中书令。太元十一年卒，年四十三。赠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谥曰“宪”。<sup>[6]</sup>

上述此处文字亦记载王献之于“太元十一年卒，年四十三”，《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张彦远为唐朝人，去晋未远，所见史料较为丰富，其记载较为可信，可为一佐证。因此，综合上述材料，王献之于“太元十一年卒，年四十三”是可靠的。由此可推知，王献之的生年为晋康帝建元二年（344），如前文所考证，王珣的生年为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因此，王献之是年长于王珣五岁的。所以，《晋书·王珣传》记载王珣“便出京师，诣族弟献之”之事，人物关系是有误的。

综合上述考论，在东晋中后期，由于受到皇权和其他士族集团的压制，琅琊王氏家族的地位下降，王珣依附权势人物桓温，竭力维持家族地位，其事迹在琅琊王氏子孙中颇具代表性。然而，《晋书·王珣传》在记载王珣的事迹时却有三处叙事不准确：一为“从讨袁真，封东亭侯”之事，实际上应当是“从讨袁瑾”；一为“在东闻安薨，便出京师，诣族弟献之”

之事，王献之在年龄上是长于王珣五岁的，此处叙事，人物关系有误；一为王珣卒年，王珣卒于隆安四年（400）而非《晋书》本传所记载的卒于隆安五年（401），此处叙事亦是不准确的。三处叙事有误或者不准确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史臣没有仔细核对事件发生时间，或者是因为没有厘清人物辈分关系所致，唐人所修《晋书》之不严谨，由此亦可见一斑。

#### 参考文献：

[1] 曹道衡，沈玉成. 中古文学史料丛考[M]. 北京：中华书局，

2003：204—205.

[2] 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司马光，等. 撰. [元]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4] 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 余嘉锡，笺疏. 世说新语笺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5] 汤球，辑. 杨朝明，校补. 九家旧晋书辑本[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353.

[6] 张彦远，著. 秦仲文，黄苗子，点校. 启功，黄苗子，参校. 历代名画记[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11.

##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Book of Jin·Biography of Wang Xun

GAO Sheng-li

(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Qiannan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Guizhou Duyun 558000, China )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inaccuracies in the narration of Wang Pei's deeds in the book of Jin·biography of Wang Xun. One is "seeking Yuan Zhen and confiscating Dongting Hou". In fact, it should be "seeking yuan Jin"; First, Wang Xianzhi is older than Wang Xun; The first is the year when Wang Xun died. Wang Xun died in the fourth year of Long'an instead of the fifth year of Long'an. The reason for the inaccuracy of these three narratives is that Shi Chen did not carefully check the time of the event and did not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of the characters.

**key words:** Jin Shu; Wang Xun; deeds; Jinzhong Xingshu

( 上接第18页 )

## On the Theme of Dongmen Zhi Yang in Chen Feng

ZHANG Mei-dong

(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interpretations about the theme of Dongmen Zhi Yang in Chen Feng. Such as stabbing theory, stabbing Chen Linggong theory, cutting date theory, drinking theory, wedding theory and so on. The theory that a man and a woman cut the date derived from Zhu Xi is generally suitable. But later interpretation, emphasizing that the waiting people is male is biased. Basing on the research of the image of Dongmen and poplar in the Poem, combining with the wedding customs in Zhou Dynasty, we can find the theme of Dongmen Zhi Yang is two lovers dated at east gate, one of them did not come.

**Key words:** Dongmen Zhi Yang; poem theme; cut the date

# 论“相如词章启六朝之端”

王飞阳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贵阳 550001)

**摘要:** 司马相如既为一代辞宗, 又是千古赋圣, 其于中国文学史之意义巨大。然时贤方家于此多着眼于长卿开拓大赋之功, 少有跳脱汉代之限, 而将视角延至六朝文风之形成。今人追溯六朝文风之源, 多至魏晋曹植、陆机、谢灵运, 或及蔡邕、班固, 鲜有及相如者。前人早已指出, 相如当盛汉之隆, 气磅礴而词最温丽, 已开六朝之端倪。惜多点到为止, 或语焉不详。其实, 相如词章一气贯注、宏丽温雅, 其于句式、辞藻、用典、对仗、声律诸方面, 皆已开六朝之端。作此判断, 于相如本身和文学史梳理均有重要价值。同时, 也是对否认“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再次呼应。

**关键词:** 司马相如; 汉赋; 词章; 六朝文风; 文学自觉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2)05-0023-06

司马相如一代辞宗之地位, 为历代所公认。同代扬雄心折久矣, 在《答桓谭书》中谓“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 其神化所至耶”<sup>[1]274</sup>。班固《汉书·叙传下》云: “文艳用寡, 子虚乌有, 寓言淫丽, 讬风终始, 多识博物, 有可观采, 蔚为辞宗, 赋颂之首”<sup>[2]4255</sup>。这是给相如最官方的认定。自此而后, 相如的词章地位无可撼动。唐人多有病相如者, 盖本诸经学立场, 鄙薄屈骚, 连及相如。如李白直言“扬马激颓波, 开流荡无垠”(《古风五十九首·其一》), 但他还是以与相如比较而自豪“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二首·其二》)。这正如鲁迅先生讥讽相如为“帮闲”文人, 但也不得不承认“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 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sup>[3]111</sup>

正因为文采太盛, 而以赋名世的相如自然被后人追封为“赋圣”。南宋林艾轩云“相如, 赋之圣者, 子云、孟坚只填得他腔子满”<sup>[4]3300</sup>, 首倡“赋圣”之说。

明代胡应麟继之, 盛赞长卿六赋, 而以为“古今以圣归之”<sup>[5]257</sup>。当然, 从辞宗到赋圣, 这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sup>①</sup>透过这个过程, 相如的文学史意义不断放大, 它早已不能局限于“是故蜀始司马相如之述制, 而严君平、王褒、扬雄之俦继之, 词文遂最一代”<sup>[6]485</sup>这一地域思维, 也不能囿于开创汉代大赋并奠定范式的传统认识之中<sup>②</sup>, 而应该将视野拓宽, 看到相如词章之于六朝文风形成的意义。今人追溯六朝文风之源, 多至魏晋曹植、陆机、谢灵运, 再往上者, 也仅至蔡邕、班固, 鲜有及相如者。<sup>③</sup>其实明人冯时可早已指出“相如当盛汉之隆, 气磅礴而词最温丽, 然已为六朝端倪矣”<sup>[7]4</sup>, 这当是最为精确的判断。本文将从“气盛”和“文美”两个方面分析相如词章, 由此论述其之于六朝文风的开创作用。

## 一、气贯全篇: 相如词章的句式考察

相如词章最耀眼之处在于行文一气贯注、气势旁

收稿日期: 2022-05-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代赋论整理研究(19ZDA249)”。

作者简介: 王飞阳(1991-), 男, 安徽铜陵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诗赋研究。

① 按: 许结先生认为相如被誉为“赋圣”, 文辞只是基本因素, 还需要经学致用思想的介入。详见许结:《相如赋经典化史述》,《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4期。

② 这类论文可参看霍松林, 尚永亮:《司马相如赋的主体特征和模式作用》,《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刘跃进:《司马相如创作的时代意义》,《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李凯:《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学范式》,《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③ 这类论文可参看刘跃进:《蔡邕的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转变》,《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胡国瑞:《论陆机在两晋及南北朝的文学地位》,《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刘文忠:《建安文学对六朝文学的影响》,《文学遗产》,1985年第2期;骆玉明、贺圣遂:《谢灵运之评价与梁代诗风演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6期;于景祥:《骈文的形成与鼎盛》,《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魄。这得益于自身的学养、禀赋和胸襟，也有赖于时代的促成。赋重学问，尤其是一代之胜的汉大赋，最体现学养之渊深。<sup>[8]</sup>相如不仅精通小学，曾著字书，而且还是“经师”。《三国志·蜀书》卷八《秦宓传》载：“蜀本无学士，文翁使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达封禅，相如制其礼。”<sup>[9]</sup><sup>[19]</sup><sup>[73]</sup>可见相如学养之厚。另外相如才气纵横，为人风流不羁，“慢世傲诞”<sup>①</sup>，胸襟阔达，颇有战国策士之余风。当然，只有遇到“为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的汉武帝，才能造就“千古恩遇。”<sup>[10]</sup><sup>[261-266]</sup>可以说，没有这样的条件，“辞宗”“赋圣”之说便不会存在，而相如词章也就不会势如破竹，气贯全篇。

长卿留存词章不多，但多是气势贯注的绝佳范文。而气势之所以贯注，原因在于多用一顺到底的散语句式<sup>②</sup>，或四言，或三言，或三言、四言交叉使用。如《上林赋》中描写水势这段，历来为人称颂：

沸乎暴怒，汹涌澎湃，湔弗宓汨，逼侧泌滴，横流逆折，转腾激冽，滂漉沆溉，穹隆云桡，宛潭胶盩，踰波趋泥，涖涖下瀨，批岩冲拥，奔扬滂沛，临坻注壑，瀼瀼贯坠，沈沈隐隐，砰磅訇磕，滴滴渥渥，淅淅鼎沸，驰波跳沫，汨濔漂疾，悠远长怀，寂寥无声，肆乎永归。然后灏漾潢漾，安翔徐回，鬲乎滴滴，东注太湖，衍溢陂池。<sup>[11]</sup><sup>[23-124]</sup>

这段全用四字，“然后”二字连接，语意如水直下，一泄到底。气顺，在于意脉不断。赋本铺陈，大赋尤甚，其中描写多是一顺到底的散语句式，最能贯穿笔势。<sup>[12]</sup>

《子虚赋》中也有相似描写：

其山则盘纡峩郁，隆崇崔嵬，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垩，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琅昆吾，璚玖玄厉，硬石碨碨。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薜萝菖蒲，茝蒿蘼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sup>[11]</sup><sup>[119-120]</sup>

这段除“其山则”、“其土则”、“其石则”、“其东”，全是四言，既有描写铺陈，如“盘纡峩郁，隆崇崔嵬，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也有名物铺陈，如“赤玉玫瑰，琳琅昆吾，璚玖玄厉，硬石碨碨”。但都是一

顺到底的散语句式，气贯到底。

除四言句式外，三言句式也很常见。如《子虚赋》写到：

揜翡翠，射骏贲，微矰出，蠃缴施，弋白鹤，连驾鹄，双鸽下，玄鹤加，怠而后发，游于清池。浮文鹜，扬旌棹，张翠帷，建羽盖，罔璆瑁，钩紫贝，捩金鼓，吹鸣籁，榜人歌，声流喝，水虫骇，波鸿沸，涌泉起，奔扬会。<sup>[11]</sup><sup>[121]</sup>

这段除“怠而后发，游于清池”外，全是三字句，句式结构在“一二”和“二一”之间来回切换，且关键字都在动作上，一顺而下，气势奔腾。

另外，也有四言句和三言句组合使用的，如《上林赋》写到：

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棣，枇杷燃柿，亭奈厚朴，栲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萸棣，苍遽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貊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扞紫茎，发红华，垂朱荣，煌煌扈扈，照曜钜野。<sup>[11]</sup><sup>[126]</sup>

这段由“于是乎”开端，语气直下，刻不容缓，至“盖象金石之声，管籥之音”稍作停顿，然后接续意脉，直至完结，气势不断。

正因为此，前人论《子虚》《上林》才会感慨：“余谓二赋浩气内转，精光外溢，譬之长江巨河，大波堆银，细浪喷雪，心骇目惊，莫可名状，千里一曲，自成波澜，特人不见耳。”<sup>[13]</sup><sup>[78]</sup>相如散体大赋之所以气盛，主要原因就在于多用一顺到底的散语句式。

除大赋外，相如散文也常见这种句式。如《封禅书》写到：

然犹躐梁父，登泰山，建显号，施尊名。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滴漫衍，旁魄四塞，云布雾散，上畅九垓，下沂八埏。怀生之类，沾濡浸润，协气横流，武节飘逝，迳陕游原，迴阔泳沫，首恶湮没，闇昧晰，昆虫闾泽，回首面内。<sup>[14]</sup><sup>[100-101]</sup>

如《喻巴蜀檄》这段：

陛下即位，存抚天下，安集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顙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楚之长，常效贡职，不敢堕怠，延颈举踵，喁喁然皆向风慕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sup>[11]</sup><sup>[614-615]</sup>

① 分见：《世说新语·品藻篇》“未若长卿慢世”，《文心雕龙·体性篇》“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

② 按：时贤论相如大赋气盛，或认为在于题材宏大，布局错综，包揽古今，总括宇宙，但这只是相如赋“大”的表现，而非文气贯注之原因。

或三言，或四言，一顺到底，语意连贯，气势磅礴，所以“相如《封禅书》，文几三千言，前后贯串如一句”<sup>[15]217</sup>，诚非虚言。而“《喻巴蜀檄》一气浑成，其文章自有一种噩噩穆穆气象，非小儒辈所能措手”<sup>[16]122</sup>，亦非过誉。

相如词章气盛如此，如激湍迸发，波及深远。至于六朝，亦以气为重。六朝文常被讥为轻靡气弱，但多囿于经学视角，失之公允。且气本有刚柔之分，柔弱之气岂可言非气也哉！<sup>①</sup>其实，“六朝文之可贵，盖以气韵胜”<sup>[17]8435</sup>，这是至确之论。

六朝之文，多为骈体，四六句式渐趋定型，但“六朝文人仍能四、六句式的组合极尽转换调配之能”<sup>[18]</sup>。如虞信《哀江南赋序》写到：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为族，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禀嵩、华之玉石，润河、洛之波澜。……况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阶庭空谷，门巷蒲轮。移谈讲树，就简书筠。降生世德，载诞贞臣。文词高于甲观，楷模盛于漳滨。<sup>[19]104-106</sup>

这段句式多为六言，但仍穿插四言散语句式，虽为联对结构，若分而视之，仍多是散语，故气脉不断，一顺到底。当然，六朝文除四六骈对句式外，仍多见四言散语句式。如吴均《与朱元思书》全篇几乎尽是：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sup>[20]14</sup>

惟多用一顺到底的四言散语句式，才使文气贯注全篇。虽杂有联对，但并不妨碍“上抗下坠，潜气内转”<sup>[17]8432</sup>。

延及骈赋，虽逐渐小品化甚至诗化，远不及相如大赋之波澜壮阔，但仍可见四言散语句式，气贯全篇。<sup>②</sup>如江淹《恨赋》写到：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剑击柱，弔影惭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裂帛系书，誓还汉恩。

朝露溘至，握手何言？<sup>[11]236</sup>

《别赋》亦写到：

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桑中卫女，上官陈娥。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sup>[11]238-239</sup>

这与前举相如篇章并无二致，四言一顺到底，气行其间，情如水流，意脉不断。

由此可见，尽管六朝文有“无非骈体”之说，“但纵横开阖，一与散体文同也”<sup>[21]123</sup>，故行文亦重气韵，常用一顺到底之散语句式，其中多为四言，使之“气贯一篇”<sup>[22]1175</sup>。而相如词章，可谓是其不祧之祖。

## 二、首尾温丽：相如词章的华美之辞

相如词章另一个显著之处在于辞藻华美，或谓“首尾温丽”<sup>[11]371</sup>，或谓“蔚为辞宗”，或谓“真是文者祖”<sup>[23]162</sup>，或谓“信矣辞赋之祖乎”<sup>[24]66</sup>，其遣词造句功夫之高深，诚不刊之论。即有怒斥相如“以滥靡之辞，饰夸谀之智，举世慕之相承。至于魏晋、六代，而杂乱琐碎，不胜其弊”<sup>[25]168</sup>者，也反面证实相如词章实为六朝文风之源。或有为六朝鸣不平者，“人皆以为六朝之过，而安知实相如之徒首其祸哉”<sup>[26]299</sup>，更是指出六朝文风之形成，诚不能避相如而不谈。后世言六朝文章之特色，多言及辞藻、用典、对仗、声律四方面，而相如皆已开其端。

辞藻方面，相如真可谓自铸伟词，彰显辞家本色。饶宗颐先生认为相如在汉朝文学上之建树有两点，其一是新意。<sup>③</sup>就新意而言，相如临文造字，创造大量双声叠韵之词。如《上林赋》“消摇”“烂熳”，均出于创作语用追求，或因自所好，或为避重复，而更改偏旁，但本于音义，不属孳乳，异体变形而已。<sup>[27]</sup>一经传世，便成语汇，后世祖述不断。仅这两词，六朝文人沿用者便不在少数。“消摇”一词，见于《世说新语》三处，见于《宋书》三处。“烂熳”一词，见于江淹集一处，见于《金陵

① 按：台湾学者张仁青先生认为，散文主文气旺盛，则言无不达，辞无不举。骈文主气韵曼妙，则情致婉约，摇曳生姿。（参看张先生《骈文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可见，六朝文自有魅力，虽长期被经学视角中伤，但在明末复苏，也足见其本身之美难以诋毁。（参看郭英德先生《明末六朝文的流播与文风丕变》，《文学遗产》，2020年第1期。）

② 按：赋的小品化问题，可参看日本学者稻畑耕一郎：《赋的小品化初探（上、下）》，《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3期；许结：《论小品赋》，《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赋的诗化问题，可参看徐公持：《诗的诗化与赋的诗化——两汉魏晋诗赋关系之寻踪》，《文学遗产》，1992年第1期；韩高年：《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六朝赋与汉赋迥别，题材丰富、篇幅短小、铺陈减少、情韵增加、文字清简，当今学者多有精辟论述。但据此并不能否认六朝赋也重气韵，这与汉赋并无不同。

③ 参看饶宗颐先生：《司马相如小论》，载《文辙·文学史论集》上册，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第265页。按：饶先生认为相如另一个建树是夸饰，但夸饰凭虚本诸大赋，六朝虽也有大赋，然整体趋短写实，并不相伴，故不讨论。

子》一处，见于谢朓诗集三处，见于《玉台新咏》两处，见于虞信集两处。<sup>①</sup>

台湾学者简宗梧先生认为“司马相如是汉赋玮字的始作者”<sup>[28]80</sup>，肆加偏旁，灵活运用，也有祖述陈辞，但多为自铸，而这一创造，根本在于美的追求。赋本“美丽之文”，赋圣相如遣词造句，可谓竭尽所能，绞尽脑汁，以臻最美之境。六朝文风常被讥为“形式主义”，但若本之客观，六朝文章最大价值便在于美。虽情能动人，然为文首要仍在造辞<sup>②</sup>，而美最直接体现乃在辞藻。相如辞宗，早开唯美之风<sup>③</sup>，经魏晋诸子煽扬，至六朝文人推波助澜，遂成浪潮，这应是正确的判断。

至于用典，相如也是信手拈来。借用故实者，如《美人赋》“古之避色孔孟之徒，闻齐馈女而瑕逝，望朝歌而回车”，分用孔子、孟子典故；《难蜀父老》“媵媵无媵，肤不生毛”，用《庄子》“禹遇祖女”典；《子虚赋》“足下不远千里来祝齐国”，用《战国策》苏秦典；“彰君恶伤私义”，用《史记》乐毅典；《上林赋》“弯蕃弱、满白羽”，用《左传》子鱼典。祖述陈辞者，则为更多，如《长门赋》“夜曼曼其若岁兮”，“曼曼”祖之《悲回风》“终长夜之曼曼兮”<sup>④</sup>；“妾人窃自悲兮”，“妾人”祖之《管子·戒》“妾人闻之”；《难蜀父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祖之小雅《北山》；《上林赋》“偃蹇杪颠”，“偃蹇”祖之《离骚》“何琼佩之偃蹇兮”<sup>⑤</sup>；“振鳞奋翼”祖之《高唐赋》“振鳞奋翼”；“弭节徘徊”，“弭节”祖之《远游》“徐弭节而高厉”<sup>⑥</sup>。

以上所举，仅为少许，但由此足见相如亦好用典，且谙于此道。其满腹经纶，用三五典故，自是易

如反掌。六朝文士痴于用典，以炫学问，如虞信《哀江南赋》、江淹《恨》《别》二赋，几乎通篇用典，较之相如远过之。然用典风气之始，当起于相如。

词句对仗，其实早见先秦典籍，然出于顺势而行，不自觉而为之。至相如，已是有意为之。前举《子虚》《上林》大赋，多用一顺到底的散语句式，但还是多见刻意属对之处。如《子虚赋》“掩兔獐鹿、射麋脚麟”“白虎玄豹”“左乌号之雕弓 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纤阿为御”“雷动众至，星流霆击”“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下靡兰蕙、上拂羽盖”“禹不能名，契不能计”。《上林赋》之中，亦比比皆是。如“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浞、出入泾渭”；“掩以绿蕙、被以江蓠；糝以靡芜，杂以留夷”；“醴泉涌于清室、通川过乎中庭”；“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钜；建翠华之旗、树灵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游乎六艺之圃、骛乎仁义之塗”。对仗之多，不胜枚举。

在一顺到底的散语句式之下，仍属对如此，显然是有意为之。至于相如散文，属对更多，限于篇幅，不再列举。无疑这是出于美的追求，辞的考量，孰谓曹植、陆机为之祖乎！只是相如词章对仗，仍多带虚词，而六朝文人踵其事而增其华，以致对仗更严，至四六隔句对成风，遂为骈俪之文。然相如为之祖，当无异议。

至于声律，相如亦是精通。史书载“以李延年为协律督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

① “消摇”一词，分见《世说新语》“韩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摇”（《方正·第五》）、“规意消摇，卒岁而已”（《赏誉》刘孝标注引荀绰《冀州记》）、“在船忧邑，上岸消摇”（《赏誉·下》刘孝标注引《徐江州本事》）；分见《宋书》“消摇风尘外”（《雉子游原序》），卷二十二，志第十二）、“素好谈玄，注庄子消摇篇”（《何偃传》，卷五十九，列传第十九）、“乃述庄周大旨，著消摇论”（《隐逸传》，卷九十三，列传五十九）。“烂漫”一词，见《江文通集》“身识本烂漫”（卷三，《赠炼丹法和殷长史》）；见《金楼子》“聚之于傍，造烂漫之乐”（《卷一，箴戒篇·二》）；分见《谢宣城诗集》“琴瑟徒烂漫”（卷三，《秋夜讲解》）、“紫茄纷烂漫”（卷四，《行园》）、“烂漫已万条”（卷五，《咏兔丝》）；分见《玉台新咏》“烂漫兮客根”（卷九，《岁暮感衰草》）、“梅花自烂漫”（卷十，《暮寒》）；分见《虞子山集》“残花烂漫舒”（卷三，《和宇文内史入重阳阁》）、“烂漫开山城”（卷五，《杏花》）。

② 按：今人常囿于“修辞立其诚”之成见，肯定“因情立文”，而反对“为文造情”。其实这是偏见。文章能够动人，首要在于表达，否则类于泼妇骂街，焉能动人？而“文、人不一”“言不由衷”，也屡见不鲜。钱钟书先生早就提出文章首要在于形式，参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三联书店，2001年，第33至51页。

③ 按：龚克昌先生早就提出“文学自觉”的起点应在司马相如的时代，参看《论汉赋》，《文史哲》，1981年第1期；《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文史哲》，1988年第5期。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详论。

④ 按：“曼曼”一词，多见屈辞，除《悲回风》外，亦见《离骚》、《远游》，今举其一。

⑤ 按：“偃蹇”一词，多见屈辞，除《离骚》外，亦见《东皇太一》、《远游》，今举其一。

⑥ 按：“弭节”一词，多见屈辞，除《远游》外，亦见《离骚》、《湘君》，今举其一。

律吕，以和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sup>[21]045</sup>，可见长卿必通音律。从其《大人赋》诵完，而武帝有“飘飘凌云之气”来看，其词章诵读必为动听。且赋只诵不歌，无音乐辅助，则必倚仗声律。龚克昌先生曾提出相如在赋中多用叠字，不仅用于描绘，“而且仿佛可以听到声音、闻到气味、看到色彩、感到动静，展现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图画。”<sup>[29]</sup>今人研究相如大赋，多侧重其图案化、空间广、艺术性，而于其声律则问津不多<sup>①</sup>，饶宗颐先生亦曾深以为憾，并提出应多作赋音佚书之辑录。<sup>[30]</sup>其实赋本“不歌而诵”，这是赋一本质特点，而诵就必须强调声律和谐动听。

当然，相如词章之声律不同于六朝，不拘于四声八病，惟求琅琅上口，气贯全篇，其突出表现在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词。如“侈靡”“傲悦”“委蛇”“泛滥”“嵯峨”“偃蹇”“徘徊”“容与”“崑郁”“岑崟”“磷磷”“烂烂”“郁郁”“芬芬”“煌煌”“扈扈”“眇眇”“忽忽”“袞袞”“袞袞”“滴滴”“淅淅”等。除外，还有四字联绵词，即上两字和下两字声音相谐。<sup>②</sup>如“砰磅訇磕”“湔澌沔沔”“溘溘泌泌”“滂溟沆溉”等。“联绵词发展到这个阶段，也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sup>[28]83</sup>正因为多用联绵词，相如词章才会如此悦耳动听，其对声律之讲求毋庸置疑。六朝文人沿其绪，至沈约始专力研究声韵，而有“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之谈、“四声八病”之说。谓相如是其祖，应无大错。

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诗的律化、骈偶化都源自于赋<sup>[31]261-342</sup>。观相如词章，宛如一幅画，其中既有华美辞藻、典故陈辞，也有属对偶语、悦耳声律。而这一切均开六朝之端倪，明人冯君所言非虚也！

### 三、明灯彼岸：“魏晋自觉说”的雾霭

相如“以磅礴之气，驱磊砢之辞”<sup>[32]</sup>，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远不止于拓荒蜀文、开创大赋。今人多囿于“魏晋文学自觉说”，而否认魏晋以前其实早已“文

学自觉”，以致看不到相如之于六朝文风形成的开启之功，或视这一事实而不见。关于“魏晋文学自觉说”，早在四十年前，龚克昌先生就提出质疑，认为“文学自觉”的起点应回到相如那个时代。随后，这种声音开始受到重视，学界前辈相继发文否认“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正确性<sup>③</sup>。但遗憾的是，经过李泽厚先生的推重，“魏晋文学自觉说”风行学界，屹立不倒<sup>④</sup>，直至今日文学史教材仍在沿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袁行霈先生的说法，“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是这些变化中最有意义的。……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sup>[33]3-4</sup>随着教材大量发行，“魏晋文学自觉说”影响巨大，波及巨广，几乎成为共识，这正是鲜有文章论述相如词章之于六朝文风影响的主要原因。

其实透过相如词章“气盛”和“文美”的双重分析，足以证明冯时可所言“相如当盛汉之隆，气磅礴而词最温丽，然已为六朝端倪矣”，洵为卓见。也只有立足在这个文学史视野上，才能真正看到相如的价值，才能说“赋至相如，可谓杰人之制，命令百代矣。”<sup>[34]388</sup>一代辞宗，千古赋圣，可惜被“魏晋文学自觉说”的雾霭遮掩太久。当然，除龚克昌先生外，也有一些前辈点亮明灯。如王运熙先生道出“汉赋句式多整齐，重骈偶，辞藻富丽，开骈体文学先河。其代表作家，西汉为司马相如、扬雄，东汉为班固、张衡。西汉贾谊，辞赋外兼长论文，东汉蔡邕，特长碑文，两人的散文均富有文采，故亦为后人所推重。”<sup>[35]</sup>又如于景祥先生所言“汉代文学已经开始独立自觉的发展过程。……其实，汉代文学自觉的最突出表现之一是文人创作中对形式美的追求，特别是对偶俪、辞采、声韵的着意讲求。”<sup>[36]</sup>而曹明纲先生也认为“司马相如在后代所产生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辞赋创作

① 这类著作可参看万光治先生：《汉赋通论·第十一章》，巴蜀书社1989年；刘斯翰先生：《汉赋唯美文学之潮》，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

② 关于四字联绵词，参看简宗梧先生：《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第80至84页。

③ 最早质疑“魏晋文学自觉说”之说的是龚克昌先生，其两篇文章《论汉赋》、《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先后于1981年、1988年发表在《文史哲》的第1期和第5期。随后张少康先生发表文章《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魏晋始》，见《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而孙明君先生也在同年发表文章《建安时代“文的自觉”再审视》，见《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再后赵敏俐先生发表文章《“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见《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这些重量级文章的发表，其实早已摧毁了“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根基，何况它本来就是一种不科学的论断。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先生在1920年发表文章《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日本《艺文》杂志），最早提出“中国文学自觉起于魏”。而后鲁迅先生借鉴其说，发表著名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正式提出“魏晋文学自觉说”，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仅为鲁迅先生个人的“有感而发”，缺乏系统的论证。

④ 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85、95、96页。

的范围。”<sup>[37]</sup>惜言简意赅,未作深入阐发,也未就相如进行专论。蒋寅先生提倡一种“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sup>[38]1-72</sup>,立足文学本位的同时,回归历史和文献,惟此才能梳理脉络、接近真相。小子拙文,旨在还原相如词章之价值,重申其之于六朝文风形成的先导作用,同时也为了呼应前辈不算太远的先声。若“文学自觉”之说真能成立,那起点应在西汉,而非魏晋。至于司马相如,当是创基之人。

#### 参考文献:

- [1] 扬雄,张震泽.扬雄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 鲁迅.从帮忙到扯淡//且介亭杂文二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 [4] 黎靖德,王星贤.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5] 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6] 尹台.洞麓堂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77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 [7] 冯时可.雨航杂录//丛书集成初编(293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8] 易闻晓.汉赋为“学”论[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62-70.
- [9] 陈寿,裴松之.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0] 饶宗颐.司马相如小论[M]//文轶·文学史论集(上册).台北:学生书局,1991.
- [11] 萧统,李善.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2] 易闻晓.大赋铺陈用字考论[J].复旦学报,2017(1):88-96.
- [13] 陈去病.辞赋学纲要[M].国光书局,百尺楼丛书本,1927.
- [14] 朱一清,孙以昭.司马相如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 [15] 任昉,陈懋仁.文章缘起[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 [16] 洪若皋.梁昭明文选越裁[M]//四库存目丛书(28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 [17] 孙德谦.六朝丽指[M]//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18] 陈鹏.论六朝骈文的行文之气[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24-28.
- [19] 虞信,许逸民.虞子山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0] 吴均,林家骊.吴均集校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 [21] 孙星衍.仪郑堂文[M]//丛书集成初编(252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2] 谢榛.四溟诗话[M]//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
- [23] 邵博.题司马相如琴台[M]//袁说友,等.成都文类.北京:中华书局,2011.
- [24] 刘壘.隐居通议[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 [25] 吴海.闻过斋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1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 [26] 方孝孺.逊志斋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3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 [27] 易闻晓.辞赋联绵字语用考述[J].南京大学学报,2016(1):117-126.
- [28] 简宗梧.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
- [29] 龚克昌.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J].文史哲,1988(5):67-75.
- [30] 饶宗颐.赋学研究的展望——在第二届国际赋学研讨会上的演讲[J].社会科学战线,1993(3):206-208.
- [31] 朱光潜.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诗论[M].北京:三联书店,2014.
- [32] 蒋天枢.汉赋之双轨[J].志林,1940(1).
- [33]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2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 [34] 余寅.农丈人文集[M]//四库存目丛书(第16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 [35] 王运熙.从文论看南朝人心目中的文学正宗[J].文学遗产,1984(4):1-8.
- [36] 于景祥.骈文的形成与鼎盛[J].文学评论,1996(6):121-131.
- [37] 曹明纲.司马相如对辞赋创作的贡献[J].社会科学战线,1987(3):280-287.
- [38] 蒋寅.清代诗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从情景融合的运用看词体在发展初期的演进

——以敦煌曲子词、《花间集》、冯延巳词为例

张杏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敦煌曲子词、《花间集》、冯延巳词是初期词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发展阶段,其中都涉及情景融合的运用。从此视角出发,立足文本分析,可发现敦煌词以情感表达为主,景物处于次要位置,为情感表达服务,同时景与情都十分明确清晰,未能留给读者过多的回味余地和联想空间;《花间集》中景物描写占据了主体地位,情感表达则往往仅为某种情绪的偶然流露,因此造就了能引发更多联想又无法确指的“中间地带”;冯延巳词中景语作用极大提升,景句有了独立承担情感甚至容载深邃意蕴的能力,实现了景情的深度融合。由此可见,词体在唐五代初起之期就经历了十分精彩的演进历程,在情景融合的运用方面为后世词体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营养。

**关键词:**敦煌曲子词;《花间集》;冯延巳词;情景融合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2)05-0029-05

敦煌曲子词是现有文献中最早的词,是一部民间词的集合,反映了词从民间兴起时的原始形态。《花间集》是第一部文人词集,是文人对词体雅化的产物,奠定了“诗庄词媚”<sup>[1]</sup>、“词为艳科”<sup>[2]</sup>的基本格局以及婉约乃词之当行本色观点的基础。冯延巳词以高超的艺术水准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南唐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更被王国维评曰“开北宋一代风气”<sup>[3]108</sup>。从民间词到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再到冯延巳,词体经历了复杂的演进。至冯延巳,终于开始在词作中抒写个人情怀,取得了叶嘉莹先生《论冯延巳词》所言“词之体式自歌筵酒席之艳歌转入士大夫手之后,与作者之学识襟抱相结合所达致之一种特殊成就”<sup>[4]72</sup>。基于此,词体今后的繁荣发展成为可能,终于在宋代迎来了兴盛和高峰期。将宋代以前定义为词体发展的初期,那么敦煌曲子词、《花间集》和冯延巳词无疑是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发展阶段。现今学术界对三者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赡,但大多是从文献整理、词作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以及词史意义等方面展开。本文所择取的研究视角——情景融合的运用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论题。童庆炳在《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一书中指出:“情感必须经过对象化,才能变成可以把握的诗情。”<sup>[5]160</sup>“所谓情感的对象化也就是使情与景结合的过程。”<sup>[5]160</sup>“如果情

与景的关系处理得特别好,达到水乳交融的水平,那么诗的意象就构成并升华为意境,而意境乃是诗的极致。”<sup>[5]157</sup>童先生不仅强调了作品中情景融合运用的必要性,还指出情景交融,也即意境,是运用效果的最高衡量标准。从此视角出发,立足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从敦煌词到花间词再到冯延巳词,词人对情景融合的运用渐趋成熟,情景融合度不断提高,至冯延巳词达到了景情深度融合的高度。由此揭示词体在唐五代发展的初期就经历了十分精彩的演进历程,在情景融合的运用方面为后世词体的广阔发展提供了丰富营养。

## 一、敦煌曲子词中情景融合的运用——物感心动,直率无余

考察词作中情景融合的运用,首要前提是词作中有景物描写之句。敦煌曲子词叙事性强,情感表达往往直抒胸臆,其中涉及景物描写之作数量较少。笔者以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为底本(去除宣扬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部分,剩余考察对象约640首)仅统计得六十余首。这些词作往往感物动心,体现着“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sup>[6]</sup>的“物感说”传统。但词作以抒情为主,实则心(情)在物先。与有着“言志”传统的诗相似,敦煌词人在创作时即带着明确的意志观念和思想情感,故每首词主题十分明确,情感

收稿日期:2022-04-02

作者简介:张杏(1990-),女,山东新泰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表达直率无余。

具体来看,敦煌词中的景物多是花、月、雁、莺等常见物象之自然状态的白描,它们往往既作为一种情感的触动,亦烘托着这份情感,景因情设,景物自身没有更多深层含义。如失调名的“花发增思”:

花未发。增所思。及见花开转益悲。花开未发尚有期。独我情怀无见时。中宵月下空流泪。肠断关山知不知。

花的开与未开都引起了女子情怀的触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物心中早有相思之情的积聚,情在景先,写“花未发”和“花开”都是为了引出情感,而人物面对花的两种相反状态或“增所思”,或“转益悲”,足见相思之情浓度之大。“中宵月下空流泪”句中“月”本身即有着象征团圆和思念的传统文化意蕴,对其描写可谓完全为了烘托这份思念之情。再如《天仙子·谁是主》:

燕语莺啼惊觉梦。羞见鸾台双舞凤。思君别后信难通。无人共。花满洞。羞把同心千遍弄。

起句对“燕语莺啼”的描写是为了引出被惊梦之人,接着“鸾台双舞凤”显然进一步触动了思妇的情思,使其“羞见”,然后顺理成章地表情达意,点明“思君”主题,结尾处“花满洞”的描写反衬“无人共”的孤寂,仍旧是为情感表达服务。有些词作更是开门见山交代主题,如《捣衣声·三载长征》:

良人去。住边庭。三载长征。万家砧杵捣衣声。坐寒更。添玉漏。懒频听。向深闺远闻雁悲鸣。遥望行人。三春月影照阶庭。帘前跪拜。人长命。月长生。

开篇点明征妇思夫,接下来是一系列听觉描写,已经思念着三载长征之良人的思妇在万户捣衣声中“坐寒更,添玉漏”,种种声响加重着思念之情,故她只觉“懒频听”。接下来能带来书信讯息之雁、象征团圆之月显然更引起了她格外的关注,可以说正是为了再次映射其内心思念之情,才描写了这两种与相思离别息息相关的传统意象。有些词作还多以物候变化表示时间流逝,如《宫怨春·到边庭》之“去时花欲谢,几度叶还青”、《凤归云·征夫数载》之“累换星霜”、《破阵子·军帖书名》之“春去春来庭树老”,这里的景物描写都表现了时间的漫长,体现思妇对物候的敏感,以此烘托相思之情深,仍旧是为情感表达而设置。

同时,敦煌词中的景物描写和情感表达都十分明确清晰。任半塘先生的《敦煌歌辞总编》给每首词确定了题目,如上述所例举的数首,每个题目都是由词中原文提炼而来,任先生还在目录中按照内容划分

出了怨思、恋情、行旅、隐逸等等不同类别,足见敦煌词主题之明确。甚至同是思人主题,我们也可清楚区分出哪些为征妇思征夫词,如《凤归云·征夫数载》《阿曹婆辞·镇陇西》《宫怨春·到边庭》《洞仙歌·戍客流浪》《破阵子·军帖书名》等。同是思乡主题,又可清楚分出普通游子思乡和征人思乡等不同类别,前者如《秋夜长·在他乡》《菩萨蛮·求宦》《浣溪沙·远客思归》;后者如《临江仙·大王处分》《浣溪沙·山头水道》等。再至于《胡笳十八拍》组词,往往通过对胡地荒凉环境、风土人情的描写,烘托浓郁的思归之情,即使不看标题也能见出题意。

清人吴乔《围炉诗话》有言:“夫诗以情为主,景为宾。景物无自性,性情所化。……景中哀乐之情宛然,唐人胜场也。”<sup>[7]</sup>敦煌曲子词与此相似,以情感表达为主要功能,景物则处于次要位置,为情感表达服务,突显着词体初起之时与民歌式表达难解难分的阶段性特点。整体效果上,情与景的联系直接而紧密,往往以“见”、“远闻”、“愁听”以及“增所思”、“动人怀”、“争忍不思家”这样直率的表达方式相结合,两者间便缺少了耐人寻味的空间。加之敦煌词中景物与情感哀乐分明、真切具体,思乡、念人、厌战等不同的情感之间边界明确,直率无余,因此未能留给读者过多的回味余地和联想空间。

## 二、《花间集》中情景融合的运用——以景为主,情感偶现

《花间集》是酒席歌宴间供歌女演唱的、“用助娇娆之态”<sup>[8]</sup>的歌词,作为一种公共化写作的产物,词人创作时本就不重意志书写和情感表达,完全为了娱宾遣兴应歌而作,故词作以景为主,并出现了许多香草美人的形象。文人词家在创作中又无意却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学识修养、审美趣味投射其中,景物描写更加文雅精美,占据了词作的主体地位,而情感——更确切地说是某种情绪仅偶然流露,词作遂呈现出一种区别于敦煌词的精美的面貌,出现了精美的物,精美的情。叶嘉莹《论温庭筠词》一文有言:“良以温词多写精美之物象,而精美之物象极易使人生托喻之联想。”<sup>[4]39</sup>叶先生还引用了司马迁称赞屈原的“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加以说明。精美之物容易引发物芳志洁的联想,精美之情则区别于真实之情的具体真切,正是这种“精美”使得许多花间词作本没有特别的深层意蕴,却具备了可供联想和想象而又无法确指的“中间地带”。

以“花间鼻祖”温庭筠为例,他的一组十几首《菩萨蛮》很好地代表着花间词的风格。其中有的词作以一连串的精美物象描写和烘托美人的妆容服饰、起居

环境，往往极华丽、极精致，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和《菩萨蛮·水精帘里颇黎枕》，词人将一系列光色鲜艳、繁缛辉煌的物象罗列开来，烘托营造出一种华美的氛围和格调，但词中人物的哀乐并不明朗，情感表达无法确知。再如《菩萨蛮》：

翠翘金缕双鸂鶒。水纹细起春池碧。池上海棠梨。雨晴红满枝。绣衫遮笑靥。烟草粘飞蝶。青琐对芳菲。玉关音信稀。

全词除换头和结句，其余全是景语，景超越情，占据了整首词的主导位置。翠翘金缕、春池碧与红满枝仅从色彩上就勾勒出一幅华美多彩的画面，下片人物“绣衫遮笑靥”亦透着温雅秀丽。全词仅句末由“玉关音信稀”略微点出思人之情，且以叙事手法呈现，极婉约含蓄。整首词作中景物、人物、情感都展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敦煌词的精致、精美，能带给读者审美的愉悦，却难以真实动人，整体上情与景融合度不高。又如《菩萨蛮》：

杏花含露团香雪。绿杨陌上多离别。灯在月胧明。觉来闻晓莺。玉钩褰翠幕。妆浅旧眉薄。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

词中第二句“绿杨陌上多离别”所写到底是女子的梦境还是回忆又或者陌上别人的分离，历来颇有争议，都有可能不能明确指实。那女子是为这离别而“关情”吗？也无法确知。整首词中杏花含露、香雪、绿杨陌、灯月朦胧、晓莺啼叫，景色极精细美好，帘幕深闺中美人虽已妆浅眉薄，但她含情脉脉顾影自怜，“镜中蝉鬓轻”亦可见出她的精致美丽。这一系列景物与其中人物都是娇柔朦胧、低沉迷离的，仿佛是众多景色已指向一种淡淡的轻柔的哀伤，正适合抒发离别的缠绵之情，才点入了“离别”、“关情”等字眼，情只是这景中的一点闪现。甚至如此首《定西番》：

汉使昔年离别。攀弱柳，折寒梅。上高台。千里玉关春雪。雁来人不到。羌笛一声愁绝。月徘徊。

词写像苏武、李陵这样的使臣别汉的宏大主题，是对调名本意的承袭。首句点题，之后是一系列动作，“攀弱柳，折寒梅。上高台”，见出文雅，但不见任何情感的流露，让人觉得这份关乎王朝兴亡、不同于普通男女离别的离别之情，写来隔靴搔痒。下片则全是景色，“千里玉关”较为开阔，但衬之以“春雪”，呈现的是一种婉约的精致柔美，体现着温词的特色，与敦煌词中同调的《定西番》之“冲沙碛，冒风寒，度千山”所展现的秋冬塞外景象大不同了。“雁来人不到。羌笛一声愁绝。月徘徊”又转入闺情词常见的写法。整首词仅以一“愁”字点出离别情

感，汉史别汉与女子别夫写来竟无多少分别，自然难以引发共鸣和感动，整首词作景与情的融合度亦不高。

其他花间词人的词作也多以景为主，文雅而精美，情感偶现其中且难以指实。如韦庄《浣溪沙》：“清晓妆成寒食天。柳球斜袅间花钿。卷帘直出画堂前。指点牡丹初绽朵，日高犹自凭朱栏。含颦不语恨春残。”词中寒食清晓的时节、天气与美人之“妆成”的搭配，柳球穿过其头饰的细节描写，都极精微美好；美人直出画堂、指点牡丹、凭栏不语的动作亦文雅华贵。显然，这都是文人词家精心择取及艺术加工的结果。词中虽然人物和景物交织，却只在结句透露了一点“恨春残”的情绪，情感表达始终处于次要地位，难以给人真实感，情与景融合度不高。再如张泌《浣溪沙》：“偏带花冠白玉簪。睡容新起意沉吟。翠钿金缕镇眉心。小槛日斜风悄悄，隔帘零落杏花阴。断香轻碧锁愁深。”以对女子精美讲究的妆容服饰、雅致静谧的闺阁庭院的描写为主，是花间词常见的模式，女子也与这些首饰物象、闺庭景色一样只作为观照和描写的对象，甚至由“意沉吟”、“锁愁深”六字略微点出的人物伤感情绪也成了一种固定化的描写对象，全词极其优美却难以动人。再比如薛昭蕴之《相见欢》：“罗襦绣袂香红。画堂中。细草平沙蕃马，小屏风。卷罗幕。凭妆阁。思无穷。暮雨轻烟魂断，隔帘栊。”全篇写闺阁陈设及暮雨轻烟的景色，雅致精微，仅“思无穷”、“魂断”点出一点情感，但到底是何种情感却无从知晓，遂也未达至情景的高度融合。

随着这种从民间到文人的审美特质的变迁，词作呈现以景为主，情感偶现且难以确指的面貌，词体终于开始具有了王国维所言“要眇宜修”<sup>[3]211</sup>的韵味。那些以“照花前后镜”（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为代表的极度自我珍视的美人形象，兰麝、花草、珠帘、画屏、蛾眉等物象，都带给了读者审美愉悦的体验，赋予了词作一定的联想空间，引起了历代词论家多角度的解读和评价。但总体上，《花间集》中虽然景语成分大大提升，比例超过了情语，但公共化写作形成的固定统一模式，使得其中景色也呈现出模式化、序列化特点，缺乏个性，再加之情感的仅仅偶然流露，花间词中的情与景未能呈现完美融合。

### 三、冯延巳词中的情景融合——景语皆情语，景情的深度融合

冯延巳词与《花间集》产生时间相近而稍后，受晚唐五代时代风气的影响，冯词也未能完全脱离以花间词为代表的“五代风格”<sup>[3]108</sup>，其中也不乏闺情

绮怨之作。但冯延巳并未止步于此，他在许多词作中摆脱了代言体的束缚，将自身对人生之体验、感悟、思索等融入其中，真正以词体抒发一己之襟怀。甚至一些代言体词作，也不过在借词中女子表达自我情感。故不同于花间词情绪的偶然流露，冯词往往情感浓度极大。然而冯词仍是供酒席间歌唱的，属于公共化写作的范畴，所以其情感之所指仍旧不是清晰明确的，往往以愁、恨、惆怅、孤独笼统称之。《全唐五代词》收录冯词112首，其中有“愁”27处、“恨”20处、“惆怅”18处、“独”25处，忽略几者同时出现于同首词的情况，四者共占据了全部冯词的80%，张自文和刘扬忠分别以“浑然无际的愁海”<sup>[9]</sup>以及“浩茫无际的愁山恨海”<sup>[10]</sup>形容之。但冯词中的这片“愁海”不像敦煌词那样总是直接表达、直抒胸臆，而是与景物充分融合。又不同于《花间集》中景物所呈现的细弱朦胧、精美华丽的模式化，以及由此导致的难真切、难动人，冯延巳开始认真地给予景物充分关注，将情感倾注其中，以敏感细腻之“词心”精心择取和描绘，使得词作中的景与情取得了深度融合的效果。

首先，许多冯词虽亦以景为主，但通常乃通过景色的层层烘托将情感传达开来。如《酒泉子》：

芳草长川。柳映危桥桥下路。归鸿飞，行人去。碧山边。风微烟澹雨萧然。隔岸马嘶何处。九回肠，双脸泪，夕阳天。

词写离别，起句“芳草长川。柳映危桥桥下路”是对离别场所的交代，长川连绵流向远方，桥下路亦延展向远方，芳草与柳都是与送别相关的意象，此二句已可见出离别之意，是第一层的烘托。接下来离别已然发生，词人望向远方，鸿鸟飞归与行人远去形成鲜明对比，加深着别情的伤感，是第二层的烘托。换头句微风烟雨更为这场离别增添了迷离感伤的色彩，是第三层的烘托。接着是离别之后，只能听见对方马匹在隔岸的嘶鸣声，却无法知晓具体在何处，以听觉感受构成了第四层的烘托。至此，在这“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氛围中，伤感情绪再也难以收束，以“九回肠，双脸泪”六字直接抒情释放和爆发开来。因经过前面层层叠叠的铺垫和渲染，这种释放不似敦煌词那般扑面而来，也不像花间词那般浅淡难真。最后又以“夕阳天”景语收束，使得离别之情并未随着词作的结束而结束，而是弥散开来，留下不尽的韵味，形成了最后一层的烘托。整首词以景色层层烘托离情，步步递进，取得了极高的情景融合效果，故真切感人，能引发读者深刻的共鸣。《采桑子·马嘶人语春风岸》《临江仙·秣陵江上多离别》等亦同属此类。

其次，冯词中精彩的景物描写往往能传达一种独

立于显在抒情之外的深层次的人生感悟，从而能引发读者的哲理思考，以“堂庑特大”<sup>[3129]</sup>的面貌形成了艺术之境界。例如名篇《鹊踏枝》：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起句历来为人称道。宗白华《美学散步》有言：“中国画堂的帘幕是造成深静的词境的重要因素，所以词中常爱提到。韩持国的词句‘燕子渐归春悄，帘幕垂清晓’，况周颐评之曰：‘境至静矣，而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静而见深。’”<sup>[11]</sup>这里词人连用三个“深”字，杨柳与烟则由“堆”字相连，帘幕更是“无重数”，都是一种极数式的表达，其中所蕴含的“深静”可谓多倍于韩词。此句虽未涉及任何人物描写或情感的直接表达，但这种层层遮蔽的庭院景象，将深闺中人被禁闭、被阻隔，对所念人的游冶不归毫无办法、无可奈何的孤寂痛苦之情都展现出来了。同时，单就此三句景语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中受挫折、受阻挠，理想被各种外在条件所束缚却无能为力的生动写照？故此类词句往往能普遍引起人的感动和深刻共鸣。再如《鹊踏枝》：

秋入蛮蕉风半裂。狼籍池塘，雨打疏荷折。绕砌蛩声芳草歇。愁肠学尽丁香结。回首西南看晚月。孤雁来时，塞管声呜咽。历历前欢无处说。关山何日休离别。

上片秋景，词人一连用了裂、狼籍、打、折这一系列情感色彩极浓、力度极大的词语，呈现出一种彻底的断裂和摧折态势。《花间集》中情感色彩较为浓重之笔当属魏承班《诉衷情·银汉云晴玉漏》的“皓月泻寒光，割人肠”，“割”字力度极大，不过整首词也只这一字如此。这里冯延巳却在起句就直接以近乎惨烈的景色，传达浓郁到化不开的愁绪。下片晚月、孤雁、塞管与此呼应，而呜咽、历历、关山也呈现着凄凉、深重、荒远的色彩，传达出比文本所言“休离别”更深重的忧患之情，不再仅仅是儿女情长的小打小闹，而近乎上升到了一种颠沛流离的人生悲剧体验，整首词作遂达到了情景融合度极高的水准。又如下述《鹊踏枝》，更是此方面的代表作：

梅落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转。昨夜笙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无限。楼上春寒山四面。过尽征鸿，暮景烟深浅。一晌凭栏人不见。红绡掩泪思量遍。

起句和过片都是景语。起句将比喻与拟人两种修辞揉和，把落梅拟人化为多情，又比作雪，虽是

写景，却使得全词在首句就缱绻不已起来，呈现飘舞、回旋、往复之态，极其形象生动地表现了词人那种“年年有”、“还依旧”（见《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的固执的惆怅之情。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评：

“这梅花到落了，千万片都落了，这个梅花都没有放弃它的一份感情。……正是冯正中用情的那种固执，那种执著，那种在苦难悲哀走向灭亡之中，都要挣扎的用情态度。”<sup>[12]</sup>过片三句中“山四面”是空间，“过尽征鸿”是时间，“暮景烟深浅”中“深浅”这一矛盾统一体的运用，以同一事物相反的两面无意间展演出中华传统宇宙观中两两相对、相生相克、阴阳相合的哲学观念。烟有深浅，人有悲欢。如此三句便具备了时空与万物生成规律（两两相对），传达着溢出文本所言“笙歌容易散”之外的更深重的人生体悟，颇有尺幅千里之叹，使得小词这种极窄小的文体亦能承载无限深意，引发读者含蕴不尽地反复体味以及对于时间空间、宇宙人生的哲理思考。由此，冯词便形成了真正的艺术之境界。

冯词中其他许多景句也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与上述所举数例一同达到了王国维所言“无我之境”的水准。如《抛球乐》之“小院新池月乍寒”生动表现了全词所写红楼人散后由欢乐乍入孤寂的情感体验；《鹊踏枝》之“六曲阑干偎碧树”及《醉花间》之“桐树倚雕檐，金井临瑶砌”，景物都是两两相依相偎，自然见出深情，传达了对有所依傍和依靠的向往以及对自身孤独感受的反衬；《采桑子》之“一夜东风绽早梅”及《谒金门》之“举头闻鹊喜”以早梅绽放以及喜鹊鸣叫传达了龙榆生所言“于失望中见希望”<sup>[13]</sup>之情。再如“楼上重檐山隐隐”（《鹊踏枝》）及“楼上春寒山四面”（《鹊踏枝》）所蕴含的压抑与压迫感，“小桥流水共盘桓，波摇梅蕊当心白”（《抛球乐》）所蕴含的动荡感，“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鹊踏枝》）及“寒蝉欲报三秋候，寂静幽斋，叶落闲阶”（《采桑子》）所蕴含的孤独感等等，都是景语皆情语的情景交融典型词句。

要之，从敦煌词到花间词再到冯延巳词，词作中情与景经历了以情为主到以景为主再到景语皆情语、景情深度融合的精彩演进历程。至冯延巳词，景句终于有了独立承担情感，甚至容载深邃意蕴的能力。后世词体充分吸取了此时期情景融合方面的营养，走上了更广阔的发展之路。刘熙载《艺概》云：“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sup>[14]</sup>情无景恐难俊，景无情恐难深。不止晏欧，后世词家的优秀词作，如苏轼之“大江东去”、辛弃疾之“更能消、几番风雨”，无一非情景深度融合之作。正是景语所承载的深厚情感，赋予了词作超出文本以外的更深层次的情感蕴含，引发读者的哲理思索，创造出了意境这一表征情景融合最高标准的精彩之笔。

### 参考文献：

- [1] 李东琪. 李东琪词论[M]//唐圭璋. 词话丛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606.
- [2] 胡云翼. 宋词研究[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25.
- [3] 彭玉平. 撰. 人间词话疏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4] 缪钺, 叶嘉莹. 灵溪词说[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5] 童庆炳.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6] 孙希旦. 礼记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976.
- [7] 陶元藻. 全浙诗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99.
- [8] 欧阳炯. 花间集序[M]//赵崇祚, 编. 杨景龙, 校注. 花间集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1.
- [9] 张自文. 冯延巳词的审美价值[J]. 文学遗产, 1989(05): 16.
- [10] 刘扬忠. 唐宋词流派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91.
- [11]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45.
- [12] 叶嘉莹. 唐宋词十七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15-116.
- [13] 龙榆生. 唐五代词选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119.
- [14] 刘熙载, 著. 袁津琥, 笺释. 艺概笺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530.

# 顾炎武山东诗歌研究三题

索浩然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 济南 250100)

**摘要:** 明清之际, 顾炎武寓居山东期间, 前后创作六十余首纪事咏物等题材的诗歌。整理解读这些诗歌,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顾炎武来鲁去鲁在于抗清形势所需; 诗歌前后阶段比重悬殊体现出顾炎武思想由立志抗清到致力学术的转变; 旅居章丘期间, 顾炎武除置地于大桑家庄之外, 于他处另有田产。由此, 进一步还原顾炎武在山东的活动轨迹, 揭示其寓居于此的心路历程, 进而丰富学界对顾炎武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 顾炎武; 山东之行; 抗清; 治学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2)05-0034-08

山东之行是顾炎武人生经历中极为关键的一环, 自顺治十四年抵达山东至康熙十六年离开, 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 顾炎武的生活都与山东息息相关。在山东期间, 顾炎武写下了约六十首诗。研究这些诗歌, 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学者的生平, 廓清其研究中的一些谜团。

## 一、顾炎武在山东创作的诗歌概况

顺治十四年, 顾炎武始抵山东, 于山东各地游历。康熙四年, 顾炎武置地屋宇于济南章丘大桑家庄, 至此, 山东成为其“第二故乡”。康熙七年, 顾炎武卷入“黄培诗案”, 于济南下狱, 后经多方营救获释。康熙十六年, 顾炎武离鲁西去, 至康熙二十一年离世未再东返。今存顾诗中, 可确知作于山东的计四十六题六十首, 根据诗歌内容可大致分为纪游诗、赠答诗、纪狱诗、杂咏诗四大类(见表1)。

我们可以发现, 顾炎武在山东创作的诗歌, 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就创作时间而言, 初到山东的两年间创作的诗歌数量远多于之后十几年间所创作的。初到山东的两年间所作诗歌几乎占了在山东所作诗歌的一半, 其后十几年的时间创作明显减少。

2. 就诗歌题材而言, 纪游诗和赠答诗占比最高。纪狱诗为顾炎武山东诗歌中较为特殊的一个部分。顾炎武一生两度入狱, 一在家乡, 一在山东, 而在山东所作纪狱诗, 正是第二次入狱的真实写照。

3. 就整体数量而言, 现存《亭林诗集》中有

表1 顾炎武在山东所作诗歌分类表

| 诗歌类别          | 诗歌题目                          | 创作年份  |
|---------------|-------------------------------|-------|
| 纪游诗           | 《莱州》                          | 顺治十四年 |
|               | 《安平君祠》                        | 顺治十四年 |
|               | 《不其山》                         | 顺治十四年 |
|               | 《劳山歌》                         | 顺治十四年 |
|               | 《济南二首》                        | 顺治十四年 |
|               | 《登岱》                          | 顺治十五年 |
|               | 《谒夫子庙》                        | 顺治十五年 |
|               | 《七十二弟子》                       | 顺治十五年 |
|               | 《谒周公庙》                        | 顺治十五年 |
|               | 《谒孟子庙》                        | 顺治十五年 |
|               | 《济南》                          | 顺治十五年 |
|               | 《潍县二首》                        | 顺治十五年 |
|               | 《衡王府》                         | 顺治十五年 |
|               | 《重登灵岩》                        | 顺治十六年 |
|               | 《过苏禄国王墓》                      | 康熙六年  |
|               | 《题李先生矩亭》                      | 康熙十一年 |
| 《过矩亭, 拜李先生墓下》 | 康熙十三年                         |       |
| 赠答诗           | 《张饶州允抡山中弹琴》                   | 顺治十四年 |
|               | 《赋得秋柳》                        | 顺治十四年 |
|               | 《酬徐处士元善, 昔年新城之陷, 其母死焉, 故有此作》  | 顺治十四年 |
|               | 《邹平张公子万斛园上小集, 各赋一物, 得桔槔》      | 顺治十五年 |
|               | 《张隐君元明于园中置一小石龛, 曰仙隐祠, 征诗记之二首》 | 顺治十五年 |
|               | 《前诗意有未尽, 再赋四章》                | 顺治十五年 |
|               | 《为丁贡士亡考衢州君生日作》                | 顺治十五年 |
|               | 《酬归祚明、戴笠、王仍、潘怪章四子圭溪草堂联句见怀二十韵》 | 顺治十五年 |
|               | 《酬程工部先贞》                      | 康熙四年  |
|               | 《德州过程工部》                      | 康熙六年  |
|               | 《自章丘回至德州, 则程工部逝已三日矣》          | 康熙十二年 |
|               | 《潘生次耕南归寄示》                    | 康熙十三年 |
|               | 《兄子洪善北来, 言及近年吴中有开淞江之役, 书此示之》  | 康熙十四年 |
|               | 《过张贡士尔岐》                      | 康熙十四年 |
|               | 《送程工部葬》                       | 康熙十四年 |

收稿日期: 2022-03-21

作者简介: 索浩然(1995-), 男, 山东济南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续表1 顾炎武在山东所作诗歌分类表

| 诗歌类别 | 诗歌题目                                   | 创作年份  |
|------|--|-------|
| 纪狱诗  | 《赴东六首》                                 | 康熙七年  |
|      | 《子德李子闻余在难，特走燕中告急诸友人，复驰至济南省视。于其行也，作诗赠之》 | 康熙七年  |
|      | 《赠同系阎君明锋先出》                            | 康熙七年  |
|      | 《为黄氏作》                                 | 康熙七年  |
| 杂咏诗  | 《自笑》                                   | 顺治十五年 |
|      | 《秋雨》                                   | 顺治十六年 |
|      | 《颜神山中见橘》                               | 顺治十八年 |
|      | 《述古三首》                                 | 康熙九年  |
|      | 《德州讲易毕，奉柬诸君》                           | 康熙九年  |
|      | 《齐祭器行》                                 | 康熙十一年 |
|      | 《先妣忌日》                                 | 康熙十二年 |
|      | 《子房》                                   | 康熙十三年 |
|      | 《刘禾长白山下》                               | 康熙十三年 |
|      | 《岁暮二首》                                 | 康熙十三年 |

四百二十余首诗，加上集外诗补遗约四百三十首，顾炎武在山东所作诗约占其现存诗歌总量的七分之一，作诗数量与在山东的时间并不成正比。

## 二、由顾诗看顾炎武来鲁去鲁原因

顾炎武为何前往山东，关于此事，学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赵俪生为代表的“北上抗清说”；一种是王春瑜为代表的“北上游学说”。前者力主顾炎武北上山东是为了积极抗清，而后者则认为顾炎武北上山东是消极避祸。对此问题，研究者如黄正藩、孙雪霄、王延栋等均从赵俪生之说，对王说加以驳正。在此，笔者拟就所见材料对前人所述加以补充，以更好地证实北上抗清是顾炎武前往山东的主要原因。顾炎武久有北游之志，这一点可以从他来山东前的诗歌中找到一些线索。例如：

《将远行作》：“去秋窥东溟，今冬浮五湖。长叹天地间，人区日榛芜。出门多蛇虎，局促守一隅。梦想在中原，河山不崎岖。朝驰灞涧宅，夕宿骹函都。神明运四极，反以形骸拘。收身蓬艾中，所之若穷途。杖策当独行，未敢惮羸孤。愿登广阿城，一览舆地图。回首八骏遥，怅然临交衢。”<sup>[1]286</sup>

《流转》：“故乡不可宿，飘然去其宇。往历关梁，又不避城府。丈夫志四方，一节亦奚取？毋为小人资，委肉投饿虎。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sup>[1]294</sup>

《秀州》：“秀州城下水，日夜生春云。云舍秀州塔，鸟下吴江滨。我愿乘此鸟，一见沧海君。异人不可遇，力士难再得。海内不乏贤，何以酬六国。将从马伏波，田牧边郡北。复念少游言，凭高一凄恻。”<sup>[1]294</sup>

《赠万举人寿祺》：“南方不可托，吾亦久飘荡。崎岖千里间，旷然得心赏。会待淮水平，清秋发吴榜。”<sup>[1]296</sup>

《丈夫》：“丈夫志四方，有事先县孤。焉能钓三江，终年守菰蒲。如何驹隙间，流光日已徂。矫首望太行，努力驱盐车。风吹河北雁，飒沓云中呼。岂无怀土心，所美千里途。”<sup>[1]300</sup>

以上四首诗中，《将远行作》创作时间最早，作于顺治五年。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记载：“乙酉之夏，太安人六十，避兵常熟之郊，谓先生曰：‘我虽妇人哉，然受国恩，果有大故，我则死之。’于是先生方应昆山令杨永言之辟，与嘉定诸生吴其沆及归庄共起兵，奉故郎扶王永祚，以从夏文忠公于吴，江东授公兵部司务事既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先生与庄幸得脱，而太安人遂不食卒，遗言后人莫事二姓。次年闽中使至，以职方郎召，欲与族父延安推官咸正赴之，念太安人尚未葬，不果。次年，几豫吴胜兆之祸，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sup>[2]228</sup>自顺治二年，清兵至江南，顾炎武积极参与到抗清斗争中去，至顺治五年，江南一带抗清势力已被消灭殆尽，此时永历政权缩至西南一隅，抗清活动逐渐陷入低潮。面对这种情形，顾炎武产生了北上中原，寻求更加广阔的天地想法。关于顾炎武北上的原因，赵俪生先生说：“只要我们仔细地阅读他底年谱，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他在上述这些地方绕来绕去地旅行着，几乎是奇诡地访问着一些明朝的遗民和一些虽已出仕清朝然尚首鼠两端，汉奸气息不太浓厚的官吏。在这二十年的绕行里，他显然是在有所谋划，因为无论从他自己的诗文或从朋友对他的记载里，都看到他旅行得兴致勃勃，毫无衰飒老迈或感觉疲惫的迹象。”<sup>[3]</sup>顺治十二年，顾炎武因擒杀叛归仇家叶方恒的奴仆陆恩，被逮入狱，后经归庄等人营救出狱。顺治十四年即北上山东，故王春瑜以为顾炎武北上的主要原因是避祸。但从前引之诗可以看到，顾氏久有北游之志，避祸或是北上原因之一，但非最主要的原因。换言之，江南罹祸加速了顾炎武北上的进程，即使没有此次牢狱之灾，顾炎武亦会北上，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至于北上的理想之地，首推山西一带，如他在《秀州》一诗中所说：“将从马伏波，田牧边郡北。”<sup>[1]294</sup>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也说：“先生之居东也，以其地湿，不欲久留，每言马伏波、田畴皆从塞上立业，欲居代北。”<sup>[2]230</sup>

顾炎武北游为何先到山东而未去山西一带，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前期诗作中与山东相关的只有一首《淄川行》，此诗作于顺治四年，吴映奎《顾

亭林年谱》此诗下有注：“为孙之獬作也。之獬淄川人，天启壬戌进士，媚逆奄得官侍讲，名在逆案中。仕国朝，为礼部侍郎。顺治二年六月，升兵部尚书，总督军务，招抚江西。后乞归里中。十年九月，土贼丁可泽勾引叛贼谢迁等陷淄川，擒之獬，支解死。结语‘取汝一头谢元元’，当由之獬撻众怒耳。”<sup>[4][112]</sup>明末政治腐败，民怨沸腾，清军入关之初，江南民众并未立即展开反抗。陈正玺说：“当时江南人民对明王朝本已完全绝望，对清廷不甚了解，抱观望态度，甚至于还有某种幻想。”<sup>[5]</sup>而此时明朝降臣孙之獬为图个人富贵，向多尔衮献策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剃发。此令一下，立刻引起了江南民众极大的反感，大规模的抗清斗争也就由此展开。不仅南方民众，原本已在清廷治下的北方民众也屡有反抗，而建议剃发的孙之獬自然成为了广大汉人欲诛之的败类。顺治三年发生了谢迁领导的农民起义，次年起义军攻占淄川，将孙之獬一家尽行诛戮。受到传统与出身的影响，顾炎武对于农民起义军原本抱有敌对的态度，但农民起义军擒杀孙之獬一事，则让顾炎武看到了民众在抗清中发挥的力量，所以他在这首诗中热情地赞扬了起义军惩治败类的行为。清军南下之时，山东亦是被祸极惨之地，山东军民曾与清兵进行过非常惨烈的战斗。例如：崇祯十一年清军进攻济南，济南守军仅有一千余人，却与数万清军抗争了六十多天。后山东虽被清军攻占，但山东抗清未曾停止。根据安作璋主编的《山东通史·明清卷》，将山东主要抗清势力列表如下（见表2）：

表2 明末清初山东抗清势力一览表

| 领导者     | 活动区域              | 活动时间            |
|---------|-------------------|-----------------|
| 赵应元     | 周村、青州一带           | 顺治元年            |
| 张輿      | 高唐一带              | 顺治元年            |
| 张广      | 潍县、莱州、掖县一带        | 顺治二年            |
| 秦尚行、葛东方 | 昌乐、寿光一带           | 崇祯末年到顺治元年<br>年终 |
| 谢迁      | 淄川、长山、高苑一带        | 顺治三年到顺治四年       |
| 于七      | 山东半岛              | 顺治五年、顺治十八年      |
| 宫文彩、李文盛 | 嘉祥、单县、巨野、<br>金乡一带 | 顺治元年到顺治二年       |
| 张七、任七   | 山东、河北、河南交界地带      | 崇祯末年到顺治十二年      |
| 王俊      | 鲁南一带              | 崇祯末年到顺治九年       |
| 丁维岳、张尧中 | 兖东一带              | 顺治四年            |
| 孙化庭     | 济南附近              | 崇祯末年到顺治六年       |

由表2可以看出，山东地区的抗清运动持续时间长，且几乎遍及山东全境。《山东通史》称：“山东人民抗清斗争，是在明末山东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声势浩大，持续时间前后长达20多年。”<sup>[6]</sup>在江

浙地区抗清势力逐渐消歇后，山东的抗清斗争仍在继续，而顾炎武将北游的第一站放在了山东，或与此相关。

要想更好地说明顾炎武北上山东的原因，我们不妨从顾炎武山东诗中找证据。顾炎武在山东所作的十九首纪游诗，多有所寄托：或回顾国变，抒发亡国之痛；或歌咏历史上的忠臣义士，表示自己坚持抗争的决心。例如《莱州》一诗写崇祯五年莱州之围，《济南》一诗写崇祯十一年济南之围，在痛念往事时，不乏“计士悲疵国，遗民想霸图”<sup>[11325]</sup>，“百战祇今愁海岱，一麾犹足定青徐”<sup>[11328]</sup>这样悲中有慷的诗句。顾炎武作诗不喜用唐以后典故，但在《重登灵岩》一诗尾联则说：“莫问江南身世事，残金兵火一凄然”<sup>[11344]</sup>。顾诗中谈及金代，多用以影射清廷。明清之际的潍县相较于济南本非通都大邑，但是此期纪行诗中有《潍县》二首：一咏孔融，称赞其忠于汉室之气节；一咏夏代少康之事。据考证，潍县乃是夏代“斟鄩”所在地，少康依靠“斟鄩”“斟灌”二地遗民，令夏朝得以中兴。顾炎武在诗中喜用少康中兴的典故。例如：《感事》云：“旧国仍三亳，多方有二斟”<sup>[11260]</sup>；《路舍人家见东武四先历》云：“夏后昔中微，国绝四十载。但有少康生，即是天心在”<sup>[11301]</sup>；《又酬傅处士次韵》云：“三户已亡熊绎国，一成犹启少康家”<sup>[11360]</sup>。其中不难看出顾炎武希望他所处的时代也能有少康一样的中兴之主来挽回衰败的国运，故而特地有诗纪潍县之行。此外，《安平君祠》一诗咏战国时代田单复国，亦是此意。通过分析这些诗歌，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顾炎武选择先到山东，当是与抗清有关。康熙年间的诗中虽然仍有类似情感，但是无论是诗歌数量还是情感表达的强度，较之于之前都已经有所变化。此时顾炎武频繁来往于山西、陕西，河北一带，所作诗歌也多与此相关。此期顾炎武所结交诸友，既有傅山、李因笃这样籍贯为山陕一带者，也有朱彝尊、屈大均这样自南来北者，一时遗民集于山西一带。康熙五年，顾炎武与李因笃等二十余人垦荒于雁门之北，关于此事。孙雪霄说：“他认为垦荒于边地一来可使粟米充足、民生安定，二来可以寓兵于农，节省军费，是于国于民皆有裨益的明智之举，也是南明整顿军务、抗清复国的当务之急。从这些论述中可以体察得出，顾炎武在雁北雇人垦荒的举动实际正是对这一策略的实践，他期望通过垦荒，为将来抗清复国建立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基地。”<sup>[7]</sup>由此可以看出，顾炎武此时确已把经营的重心放在了山西一带。

顾炎武总结明亡的教训，认为风俗特别重要，其《日知录》第十三卷即专论风俗。杨洪波、姬洪称：“顾炎武揭示了不少在民风上存在的坏现象，并给予尖锐的批判。他指出：‘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弥谦弥伪，弥亲弥泛，弥奢弥吝’。”<sup>[9]</sup>顾炎武对山东的感情，与其风俗观之间亦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并且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初到山东之时，对山东颇有好感，广结友人。例如顺治十五年，他在章丘结识了张光启，并连为张光启赋诗六首，即《张隐君元明于园中置一小石龕，曰仙隐祠，征诗记之二首》《前诗意有未尽，再赋四章》。顾炎武连为同一人赋诗六首的情况并不多见。张光启世居章丘白云湖上，国变后足不履城市，顾炎武在六首诗中称赞了其气节及隐逸生活。康熙四年，顾炎武置地结庐于章丘大桑家庄，与张光启相隔不远，所以王冀民以为张光启当是顾炎武置产章丘之契机。大桑家庄的地产，却给顾炎武带来了第二次牢狱之灾。《与原一甥》：“天水本自无仇，衅起章丘谢生，千金被坑，偿以庄田十顷，主唆出此一稟，遂占收其田。”<sup>[11203]</sup>章丘谢长吉曾借顾炎武千金未能偿还，便以十顷庄田为抵押，对于顾炎武而言，本身已经吃亏，但后来谢长吉又想夺回自己的田产，便从中撺掇，使顾炎武卷入“黄培诗案”而下济南狱。被谢长吉陷害入狱后，“庄田之麦俱为刘棍割去，每日以数文烧饼度活”<sup>[11235]</sup>。“刘棍”指大桑家庄庄头刘成志。而“黄培诗案”中黄培之堂弟黄坦为图富贵，陷害堂兄，致使黄培被杀，更令顾炎武深恶痛绝。如果说与张光启等人的交往使顾炎武看到了山东民风之和善，此番经历则使顾炎武意识到了山东民风的恶劣之处。所以顾炎武在《为黄氏作》一诗中发出“齐虏重钱刀，恩情薄弟兄”<sup>[11381]</sup>的慨叹。“齐虏”一词显然已经充满了激愤，表现出对这些丑恶之辈的厌恶。《与原一甥》有“至于山东人情，固已不啻蛮髦”<sup>[11203]</sup>的感慨。《莱州任氏族谱序》称山东：“今且千有余年，而无一学者见称于时，何古今之殊绝也？至其官于此者，则无不变色咋舌，称以为难治之国，谓其齐民之俗有三：一曰逋税，二曰劫杀，三曰讦奏。而余往来山东者十余年，则见夫巨室之日以微，而世族之日以散；货贿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浇且伪；盗诬其主人而奴讦其长，日趋于祸败而莫知其所终。”<sup>[1136]</sup>由此可见，对于山东一地，顾炎武已经颇有失望，至济南狱结，其虽未彻底离开山东，但其在山东停留时间已相对减少，且之后的山东诗歌中亦很难找到初至山东时的激越。康熙十六年顾炎武离开山东后，至离世未再东归。

### 三、顾炎武在山东创作诗歌的数量问题

顾炎武山东所作诗约占《亭林诗集》总数的七分之一，且一半作于到山东的前两年。顾炎武一生中二十年的时间与山东有关，为何之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所作诗歌仅占总数的十四分之一？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顾炎武在山东的交游；二是顾炎武此时思想的转变。

顾炎武一生广交友朋，其中自然也少不了诗文赠答，因此赠答诗在顾诗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其北游之后所结交的朋友当中，与山东的张光启、程先贞，山西的李因笃、傅山，陕西的李颀等人，皆有诗歌赠答。顾炎武作诗赠答者，大都以诗闻名，像李因笃、傅山等人，虽然以学术著称，但同样擅长作诗，只是诗名为学名所掩，所以不显。朱彝尊、屈大均自南来北，与顾炎武相会于山西，虽然相处时间不长，顾炎武亦有诗相赠。而顾炎武的友人当中，另有一些不以诗闻名。例如张尔岐居济阳，顾炎武久居章丘，二人相从过密，顾炎武在《广师》中也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sup>[11134]</sup>，但《亭林诗集》中与张尔岐相关的仅有一首《过张贡士尔岐》，《集外诗补》中另有一首作于张尔岐逝世后的《哭张蒿庵先生》，此外诗中再无与张尔岐相关者。而与李因笃相关之诗，则多达11首。究其原因，乃是张尔岐毕生精研礼学，不以诗称，平生作诗不多。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一有《诗不必人人皆做》一条：“古人之会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诗。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诗何害。”<sup>[81460]</sup>王延栋在《顾炎武山东经历考述》一文中列举顾炎武在山东主要的交往对象有以下二十四人：赵士完、任唐臣、徐夜、张尔岐、张允抡、马骥、张光启、刘孔怀、颜光敏、程先贞、李源、李涛、李浹、谢重辉、李焕章、薛凤祚、王士祯、王士禄、张简可、马嗣先、张奉之、刘在中，以及疑似担任章丘县令的徐某、魏某。而在顾炎武诗中所涉及到的有以下六人（见表3）：

表3 顾炎武在山东诗歌唱和友人名单

| 姓名  | 诗题   | 数量<br>(首) |
|-----|--|-----------|
| 张允抡 | 《张饶州允抡山中弹琴》                                | 1         |
| 王士祯 | 《赋得秋柳》                                     | 1         |
| 徐元善 | 《酬徐处士元善，昔年新城之陷，其母死焉，故有此作》                  | 1         |
| 张光启 | 《张隐君元明于园中置一小石龕，曰仙隐祠，征诗记之二首》《前诗意有未尽，再赋四章》   | 6         |
| 程先贞 | 《酬程工部先贞》《德州过程工部》《自章丘回至德州，则程工部逝已三日矣》《送程工部葬》 | 4         |
| 张尔岐 | 《过张贡士尔岐》                                   | 1         |

参考张茜《清代山东诗文作家小传》<sup>①</sup>可知，顺康之际山东诗文作者数量不多，而顾炎武得以与之交游之人更少。顾炎武山东诸友中，诗名最盛者首推王士禛。王士禛小顾炎武十一岁，二人于顺治十四年相识，此时王士禛年仅二十四岁，次年方中进士。顺治十四年秋，王士禛客居济南，与诸名士会饮大明湖水面亭，因伤杨柳摇落，赋秋柳七律四首，一时名士共和之。顾炎武是否亲自参与了秋柳诗会，此事尚存疑问。王士禛《渔洋诗话》中举和诗者亦未录顾炎武之名，学者疑顾炎武和诗乃是在秋柳诗会之后。即便如此，顾炎武与王士禛曾有交往当是可以肯定的，但顾炎武与王士禛相关之诗也仅此一首而已。谢正光认为：“亭林与阮亭虽年辈颇悬隔，且复出处异抱，隐显殊途，惟确曾于顺治末年于济南论交；二人之情谊，且持续十数年之久。”<sup>[10]</sup>今本《顾亭林诗文集》中无一语道及王士禛，但王士禛书中多次提及顾炎武。其《池北偶谈》卷一五《谈艺五·劳山说》自注：“顾近寄所著《日知录》，内辨劳山三则，又与前说不同。”<sup>[11]</sup>《日知录》初刊于康熙九年，此距顺治十四年秋柳诗会已十三年，谢正光据此推断出顾王二人友谊持续十数年之久当是可信，并进一步得出了“既尝有赠书之雅，其视阮亭，又岂同泛泛之交”<sup>[10]</sup>的猜测。王冀民认为顾炎武“取友首重气节，次学问，又次词章”<sup>[12]685</sup>，顾炎武在苏州入狱时，好友归庄曾求助于钱谦益，钱谦益要求顾炎武拜自己为师，被顾炎武严词拒绝，以表示与贰臣划清界限。但顾炎武的思想与其后来的实际交游之间存在着矛盾之处。其《日知录》卷十九有《文辞欺人》条，称“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天下有高人而仕贼者乎？今有颠沛之余，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sup>[8]430-431</sup>。观察后来顾炎武所结交诸人，亦有降清后在清廷出仕者，例如程先贞。王冀民称：“邓氏且引先贞自题第三小像云：‘乙西北谒，赐蟒衣一袭。滥江干之役，腰横玉具，形色匆匆。’推知先贞此行，乃为清师招降钱谦益。信如是，则其人殆于顺治二年降清，以原官用；旋南下招降，为虎作伥；翌年乞归，犹以北谒赐蟒腰玉为荣也……今读先贞丙戌秋日初至桑园旧庄作所云‘漫游余缅想，触目泪盈巾’，似告归之日，犹存洞瘵之心。其谢亭林先生序诗：‘周行中土三千里，恸哭先朝十四陵’，似失足之后，尚余故国之思。”<sup>[12]674-675</sup>刘庆在《行万里路——顾炎武的交游与学术》一文中

对于顾炎武一生中的交游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顾炎武中年时期广泛结交清朝官员，但到晚年似乎又有悔意，删减书稿，除却不留意于后人之后文，如有关曹溶、申涵光的记录今皆不见，前云有关王士禛之事亦同此。由此推断，顾炎武或有更多唱和之作，但晚年随着思想的转变，删除了一部分。而在山东，能够因气节人格被顾炎武所认可，且又长于诗歌创作之人数更少，所以今见顾炎武在山东期间所作赠答诗并不多，这也就影响到了顾炎武在山东所作诗歌的总量。

顾炎武一生提倡经世之学，其于诗文创作也注重其社会功用。顾炎武明确提出了“文须有益于天下”<sup>[8]425</sup>的观点，他在《日知录》中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sup>[8]425</sup>顾炎武虽亦长于诗，但绝不以文人自命，对于“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sup>[8]429</sup>，顾氏甚为鄙薄，他赞同刘摯之“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sup>[8]429</sup>的看法。《亭林诗集》所收之诗，自崇祯十七年国变时起，此年顾炎武三十二岁。顾炎武在《从叔父穆庵君行状》中说：“自崇祯之中年，先王寿考七十余无恙。而叔父既免丧，天下嗷嗷方用兵，而江东晏然无事。是以余与叔父泊同县归生，入则读书作文，出则登山临水，间以觞咏，弥日竟夕。”<sup>[11]162</sup>其《三朝纪事阙文序》亦说：“臣祖老尚康强，而臣少年好游，往往从诸文士赋诗饮酒，不知古人爱日之义。”<sup>[11]155</sup>由这两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顾炎武年少之时也曾度过一段饮酒赋诗的潇洒快意生活。但是甲申国变之后，顾炎武的思想随之发生改变，作诗必有所寄托，所以《亭林诗集》所收之诗中很难见到有单纯地吟花弄月、游山玩水之作。他在《与人书二十五》中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sup>[11]98</sup>《与黄太冲书》称：“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篲，而于圣贤六经之指，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未得就正有道。”<sup>[11]238</sup>康熙六年所作《赠萧文学企昭》一诗中也说：“生年十五馀，即与人事接。中更世难婴，书史但涉猎。率尔好为文，蔚然富

<sup>①</sup>上海师范大学张茜博士论文《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未附《清代山东诗文作家小传》，将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的山东作家一一择出。

枝叶。终愧康成学，久旷周孔业。”<sup>[1]376</sup>由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得知，顾炎武中年后对自己年少之时吟诗作文颇有悔意，转为将精力放在研治经史上。顾炎武对于诗文，反对模仿。如《日知录》卷十九《文人摹仿之病》说：“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sup>[8]432</sup>《与人书十七》称：“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次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sup>[1]95</sup>而就顾炎武实际诗歌创作来看，风格类杜甫，其诗得杜甫之神，非泛泛学杜者可比。徐世昌称其诗“初自七子入，进而亦上，心摹手追，惟在少陵”<sup>[13]</sup>。孙雪霄认为其善于化用杜甫的诗句、诗境入诗，并与杜甫一样，有着忧患的诗思。但是杜甫晚年所作的诗歌在数量上远远多于早年所作，特别是其离蜀四处漂泊的最后几年间，所作的诗几乎占了其现存诗歌的五分之二，而顾炎武的情况恰与此相反。以康熙元年为界限，今见全部《亭林诗集》中此年之前所作的诗比之后所作的诗多了将近三十首，这还不包括他早年所作未收入《亭林诗集》中的诗。若观察其在山东创作的诗，则更加直观。顺治十四、十五两年间，顾炎武在山东所作诗，占其在山东所作诗歌的一半。康熙元年康熙十六年所作的诗占另一半，而康熙元年顾炎武恰好五十岁，这就与其所说“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sup>[1]98</sup>相互印证了。

顾炎武著作明确可知作于山东者，有如下几部：《韵补正》（顺治十四年）《山东考古录》（顺治十八年）《近儒名论甲集》（康熙六年）《山东肇域记》（康熙十二年）。另有相当数量的著作难以考定其具体年代，所以无法确知还有哪些著作是作于山东，包括《日知录》《音学五书》中的某些章节。另外顾炎武还曾参与《邹平县志》《德州志》《山东通志》的修撰。康熙九年，《日知录》初刻于淮安符山堂，结合顾炎武行迹可以推测，顾炎武当在山东做过《日知录》的修改删定工作。由此可见，虽然顾炎武在山东所作诗歌不多，但其学术活动与山东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其中年以后思想转变的一个佐证。

#### 四、由顾诗重析顾炎武章丘置地问题

《亭林诗集》卷五有《刘禾长白山下》一诗：“载未来东国，年年一往还。禾墟垂照晚，果落野禽间。食力终全节，依人尚厚颜。黄巾城下路，独有郑公山。”<sup>[1]397</sup>据考证，此诗当作于康熙十三年。王冀民《顾亭林诗集笺释》：“是年先生六十二岁。正月出都，由易州西行经广昌往山西，抵汾阳访碑。四

月，经曲周至德州。秋，返济南，回章丘之桑家庄度岁。”<sup>[12]820</sup>研究顾诗者，多以此诗为顾炎武躬耕于大桑家庄的写照。但根据顾炎武此诗所写结合章丘本地的地理环境来分析，我们可以判断出，顾炎武刘禾之处当不在大桑家庄，理由如下：

1. 长白山位于章丘东部，据《济南府志》记载：“长白山又名会仙山，山中云气长白，跨连四县之界。其东北属长山，北属邹平，西南属章丘，东南属淄川。”<sup>[14]</sup>康熙间《章丘县志》：“长白山，在县东三十里，古肃然。山高峻秀拔，远望苍翠参差，如笔架之状，故人呼为笔架峰。”<sup>[15]</sup>《章丘县志》所言“在县东三十里”，是指距旧章丘城而言。旧章丘，即今章丘区绣惠镇，长期是章丘县治所在。至1958年，章丘县治始迁至今明水街道，大桑家庄即位于旧章丘城西约八里处。由此而言，大桑家庄距离长白山三四十里，在大桑家庄向东北方向望去，可看到十余里外的女郎山，向东望可看到三十多里外的长白山，就距离来说，女郎山距离大桑家庄更近。顾炎武所到之处，留意于当地地理位置的考察，其《山东考古录》中亦有《辨章丘》一条，对于章丘地理环境，顾炎武显然进行过一番考察。既然顾氏深明当地地形，若将大桑家庄称为“长白山下”，岂不是自作谬误？

2. 大桑家庄不具备种水稻的条件。今天章丘种植作物以小麦及大葱为主。若想种禾，需要有充足的灌溉水源，大桑家庄距离东面的绣江河，西面的白云湖都有一定距离，附近无水源可供种植水稻。依据康熙间《章丘县志》所载《疆域图》可知，此处地理环境与今天相差不大。章丘种植水稻之处，多在东面，因其有水源可供灌溉，如现今之明水香米，即产于明水镇砚池村附近的百脉泉头。据《章丘县志》之《疆域图》所载，县东之漯河有二源，一为长白山，一为东陵山，由此，则长白山附近确实有水源可供灌溉，则在长白山下种稻亦有可能。

3. 诗之尾联提到了“郑公山”，此处所说“郑公山”即鬻山。康熙间《章丘县志》：“鬻山，在县东二十五里，淄川邹平二界。于钦《齐乘》云：‘《三齐略》曰：郑玄注诗书，栖迟此山，上有古井，独生细草，叶似薤，俗谓郑公书带草。一名曰长白山与黄塘岭相连，元遗山《济南行记》顾曰范文正公学舍在焉，故曰黄塘岭，盖未见古图经耳。’”<sup>[15]</sup>郑公山一说是今淄川之鬻山。今淄川之鬻山已辟为风景区，并建有郑公书院，章丘之鬻山则未有开发，上有雪山寺传是范仲淹所建，亦早已破败，旧址现为乡人祈福之所。顾炎武于《齐乘》一书颇熟，其《日知录》亦有征引《齐乘》之处，此处则采《齐乘》之说，相信章

丘巒山即为郑玄注书处。巒山位于长白山西侧，顾炎武刘禾于长白山下，向西即可看到巒山。

4. 顾炎武在大桑家庄的田产当以种麦为主，此处田产长期托人代理。《蒋山佣残稿》卷一《与魏某》：“薄产在彼既承金诺，必蒙照拂。但刘成志系无赖棍徒，迟进亦不过以雇工之人，无异使羊将狼。”<sup>[1187]</sup>卷二《答徐某》：“庄田琐事，仰累清神，兼以完口种麦，一一为之经理，心力交费，谊薄云天矣！”<sup>[1200]</sup>《亭林佚文辑补·与人书》：“庄田之麦俱为刘棍割去，每日以数文烧饼度活，何以能支？”<sup>[1235]</sup>由以上三则材料可推知，顾炎武此处所称之庄田系大桑家庄田，所种作为麦。顾炎武系狱济南时，所种之麦曾被当地无赖刘成志割去，使得顾炎武的生活陷入困顿。“魏某”顾衍生注为“章丘令”，当系章丘县令魏焕文无异议，康熙十五年就任，次年顾炎武离开山东。“徐某”顾衍生亦注为“章丘令”，但查乾隆年间《章丘县志》所载章丘历任知县，终顺、康二朝，章丘县令并未有徐姓者，而顺、康二朝章丘官吏徐姓者唯有典史徐继盛一人，康熙元年上任，六年去任，与顾炎武置地大桑家庄的时间相应。根据魏焕文与徐继盛在章丘任职时间推断，《答徐某》时间在《与魏某》之前，两者相距约十年，其间大桑家庄田产皆以种麦为主。

综上所述，顾炎武刘禾之地必非大桑家庄，故而《刘禾长白山下》一诗不可看作顾炎武躬耕于大桑家庄的写照。为何“长白山下”大桑家庄会联系在一起？考稽文献可以发现，此说肇自顾炎武嗣子顾衍生为其所著《年谱》：“案长白山在章丘、长山二县之交。刘禾处，即桑家庄产业也。”<sup>[16]</sup>顾衍生所作《年谱》为今传年谱中最早，距顾炎武最近者，按说当最为可信，故后世研究者如吴宓、王蘧常、王冀民、沈嘉荣、周可真等人皆主此说，以为确论。例如沈嘉荣说：“这些田地长白山下，介于章邱和长白山之间的大桑家庄。”<sup>[17]</sup>一方面沿袭了顾衍生之说，另一方面又加上了自己的臆测，因为大桑家庄位于章丘城西，实际上是章丘城介于长白山和大桑家庄之间。顾衍生虽为顾炎武嗣子，但其出嗣之事，始议于康熙十一年，次年，顾炎武寓书潘耒，令衍生北上。康熙十五年，顾炎武又命衍生北上至京。周可真《顾炎武年谱》：“先是康熙十二年冬，先生曾寓书潘耒，令衍生北上，未知何故三年过去而仍未北上。”<sup>[444]</sup>康熙十六年，顾炎武与顾衍生方于德州相见。吴映奎《顾亭林年谱》案云：“先三日，衍生及师李既足附沈度汪家眷舟至德州，将入都，先生留书张简可，止之。至是相见，行父子礼。”<sup>[450]</sup>顾炎武于是年离开山东，至卒未

再东还。所以，顾衍生真正跟随顾炎武的时间尚不足五年，且记顾炎武生平经历的现有材料中未见顾衍生曾到过章丘大桑家庄的记载。对于嗣父的生平，顾衍生并非深有所了解。这对嗣父子之间的关系，也颇为微妙。初见衍生不久，顾炎武在给李星来的信中称“嗣子颇佳”<sup>[1186]</sup>，但后来在给潘耒的信中则说“衍生质钝，未知能读书否”<sup>[1178]</sup>，给王弘撰的信中又说“小儿衍生虽极鲁钝，尚未有南方骄慢习气，幸待之以严，勿作外人视也”<sup>[1198]</sup>。据此来看，顾炎武对于这个嗣子并非特别满意，而就顾衍生所作《年谱》及其他文献，其“鲁钝”之处确实可以窥见一斑。如上文提到的“徐某”，顾衍生注“章丘令。代健菴。”<sup>[1200]</sup>顺、康间章丘没有徐姓县令，徐姓官吏唯康熙元年到六年间的典史徐继盛，典史一职主要掌管缉捕、稽查、狱囚、治安等，而《答徐某》中称“使至，知贵治西成得遂，四郊宁谧，为之色喜！非德威孚格，何以致此”<sup>[1200]</sup>，徐某指徐继盛基本可以确定。同时，顾炎武先后将田产托于徐某和魏某，就地缘关系而言，徐继盛是浙江处州府龙泉县人，魏焕文是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人，同为江浙人士，顾炎武更易亲近。由此考证可知，顾衍生对于顾炎武在章丘一带的交游缺乏了解，其所作年谱或注解，多有臆测之处。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称顾炎武“垦田于章丘之长白山下以自给”<sup>[229]</sup>，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也称“垦田于章丘长白山下”<sup>[18]270</sup>，至《清史稿·儒林传》云“垦田于山东长白山下，畜牧于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累致千金”<sup>[18]313</sup>，未将“长白山下”直接等同于大桑家庄，是可取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顾炎武在章丘旅居期间，除置地于大桑家庄之外，当于他处另有田产。

#### 结语

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sup>[19]</sup>反之，要想更好地“知其人”，则须对其诗书加以发掘。顾炎武在山东所作诗数量虽不多，但其中可以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结合顾炎武生平经历，全面梳理顾炎武在山东创作的诗歌，更能够廓清顾炎武生平研究中的一些模糊之处。山东之行是顾炎武生平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其思想发生变化的一个节点，其间，其精力更多转向了经史研究，凸显出作为学者的一面。对于顾炎武的学术著作，后世研究论著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对于顾炎武诗歌的研究，迄今为止仍然需要加以深入。梁启超评价顾炎武时说：“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我以为现代青年，很应该用点工夫，多参阅些资料，以看出他的全人格。”<sup>[20]</sup>顾诗是认识顾炎武生平的直接材料，细加分析，往往能够看到一些新颖之

处。要想更加完整地认识古人，应当全面掌握其所传文献，本着去伪存真的原则，结合实际进行分析，这一点是从事学术研究所必须注意的。

### 参考文献：

- [1] 顾炎武, 撰. 华忱之, 点校. 顾亭林诗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 全祖望, 撰. 朱铸禹, 汇校集注.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3] 赵俪生. 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底反清斗争[J]. 文史哲, 1951: 25.
- [4] 周可真. 顾炎武年谱[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8.
- [5] 陈正玺. 剃发令对清初政治的影响[J]. 南开学报, 1999(4).
- [6] 安作璋, 朱亚非. 山东通史·明清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4.
- [7] 孙学霄. 顾炎武诗歌考论[M]. 济南: 山东大学, 2011: 79.
- [8] 顾炎武, 著. 黄汝成, 集释. 栾保群, 吕宗力, 校点. 日知录集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9] 杨洪波, 姬洪. 顾炎武论“世风”一读《日知录》卷十三[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4).
- [10] 谢正光. 就《秋柳》诗之唱和考论顾炎武与王士禛之交谊[J]. 明清论丛, 1999(00): 67.
- [11] 王士禛. 池北偶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12] 王冀民. 顾亭林诗集笺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13] 徐世昌. 晚晴簃诗汇[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8.
- [14] 成瓘, 等, 撰. 济南府志[M]. 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 [15] 钟运泰, 等, 撰. 章丘县志[M]. 清康熙三十年刻本.
- [16] 顾炎武, 著. 王蘧堂, 辑注. 吴丕绩, 标校. 顾亭林诗集汇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1093.
- [17] 沈嘉荣. 顾炎武[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42-43.
- [18] 张穆, 等, 撰. 黄坤, 等, 编. 顾炎武年谱(外七种)[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19]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32.
- [20]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71.

## Three Problems in Gu Yanwu's Shandong Poetry

SUO Hao-ran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At the turn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u Yanwu lived in Shandong, he created more than 60 poems on chronicle, chanting and other them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by sorting out and interpreting these poems: Gu Yanwu came to Shandong and went to Shandong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of resisting Qing Dynasty required. The great difference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poem reflects the change of Gu Yanwu's thought from determined to fight against Qing Dynasty to devoted to academic study. During his stay in Zhangqiu, in addition to the land in SangJia Village, Gu Yanwu also owns other fields. This further restores Gu Yanwu's activity track in Shandong, reveals his psychological course of living here, and enriches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Gu Yanwu.

**Key words:** Gu Yanwu; a trip to Shandong;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 scholarship

# 草根英雄叙事与民族精神颂歌

## ——评电视剧《闯关东》

刘希云

(德州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闯关东》是新世纪以来涌现出的农民剧的经典之作。该剧在史诗品格的呈现、人物形象的塑造、审美风格的厚重大气几个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表现。它在思想性、艺术性上提供的宝贵经验,为中国同类型电视剧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

**关键词:** 闯关东; 史诗; 民族精神; 草根型英雄

**中图分类号:** I23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2)05-0042-05

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2008年出品的52集电视剧《闯关东》作为鲁剧农民剧类型的代表,在播出之际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好评如潮。作为一部主旋律作品,它为什么既叫好又叫座,它在同类型的剧作中,取得了哪些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9日给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回信中说:“广大社科工作者要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地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sup>[1]</sup>这可以说是中国社科文艺的顶层设计,而《闯关东》作为新世纪现实主义剧作的优秀代表,可以说契合了这种顶层设计。笔者试从史诗性、人物形象塑造和厚重大气的审美风格几个角度来分析这部剧作的成功之处。

### 一、移民的史诗,民族精神的颂歌

这部剧是编剧高满堂、孙建业根据我国近代史上规模较大的移民迁徙运动“闯关东”的历史写出的。历史上的闯关东始于1651年。清朝将东北视为龙兴福地,长期实行封禁政策。但黄河一带常年自然灾害,兵乱赋重,民不聊生。地广人稀的东北对以种地为生的中原人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近300年来,有3000万移民,冲破封禁政策,掀起了闯关东大潮。他们在白山黑水间垦荒种田、伐木等,极大地促进了东北经济的发展,并将中原的文化传统和乡土人情带到了这片黑土地,堪称近代史上的壮举。

如何艺术化地呈现这部波澜壮阔的移民史,应该说对编导们是极大的挑战。《闯关东》的编导们行程七千多公里,采访百余人,横跨黑、吉、辽、鲁四省,采集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在这种坚实的基础上,才动笔演绎那段荡气回肠的移民史。编剧高满堂就是闯关东人的后裔,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树碑”<sup>[2]</sup>。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高满堂深深为闯关东的山东人百折不回的闯荡精神所打动。这种从历史和生活中挖掘出来的素材,有着强烈的生活气息。创作者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闯关东生活进行了真实的反映。编剧们意识到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一个农耕民族被逼到背井离乡,在生存的绝境中激发出的强烈的生存意志和由这种生存意志所反映出的民族精神。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使得中国的老百姓安土重迁、固守家园、不愿背井离乡。但一旦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中国老百姓就会爆发出无所畏惧的血性、开拓进取的能力和死中求活的创造力。

史诗,是指能够全方位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和历史命运的英雄故事,包括神话、传说和历史演绎。“史诗也即诗史,即诗化的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不断积淀,具有丰富的多义性和内涵的开放性。史要真,而且必须真,诗是艺,要美。”<sup>[3]</sup>诗史就是要富有美感而又真实地呈现一个民族的历史。闯关东是一段真实的历史,现在山东、河北的很多居民祖上都有闯关东的历史,但是到底祖先在闯关东的时候经历了什么,大家又比较模糊。这种人

收稿日期: 2021-05-31

作者简介: 刘希云(1971-),女,山东德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人知道,又人人说不清的历史事件恰恰给创作者提供了发挥艺术想象的空间。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背景下,呈现中华民族一段缺失的历史记忆,讴歌中华民族在绝境中焕发的民族精神,正是当下文艺的使命。三千多万民众闯荡关东的历史遭际,清末民初到抗战爆发几十年动荡的时代背景,决定了闯关东故事属于宏大叙事。剧作者以朱开山一家闯关东的故事为主线,以1900年清末社会动荡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历史为背景,挖掘闯关东所体现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中,所孕育而成的精神样态。它是种族、血统、生活习俗、历史文化、哲学思想等所熏陶、融汇而成的文化慧命,是一个民族的内在心态和存养。”<sup>[4]</sup>民族精神表现在一个民族的气度、风范和日常行谊上,尤其表现在一个民族处于逆境中,所呈现出来的行为选择、意志品质、创造力和凝聚力。近代以来,由于国运衰微,一批思想者开始了国民性的批判,自严复的开民气、鼓民力、兴民德,到梁启超的新民说总结了十几条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再到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这股反思民族精神弱点的思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而正面表达民族精神的学者和论著鲜为人知。实际上,中华民族的文明能够延续几千年,其民族精神中一定有诸多可贵的文化因子,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信。《闯关东》就是一部很好地讴歌民族精神的剧作。剧中故事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困境的时候发生的,故事的源发地山东朱家裕一带连年灾荒,剧中女主人公朱开山的媳妇文他娘决定背井离乡带着三个儿子去关外找丈夫。故事一开始,就把矛盾和困难摆在观众面前,人物的选择是既然在山东不能生存了那就去闯关东,开创另一片天地。民族精神中那种不惧困厄,敢闯敢拼的精神就展现出来。在剧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朱开山身上,承载着更多民族精神的可贵品格。他的一生波澜壮阔,早年参加义和团,杀洋人,是山东出名的草莽英雄。他的口头禅是“冻死迎风口,饿死不低头”,传达出顽强的个人自由意志和反抗命运的刚毅精神。他凭借着勤劳、勇敢和智慧,在关外白手起家挣下两晌地和一个宅院,让一家人在元宝镇住下。为了给兄弟报仇,他勇闯老金沟,拼了性命运出了沙金,在放牛沟盖房置地,过上了安稳、殷实的农耕生活。为了躲避散兵骚扰,一家人到哈尔滨经商,开了山东菜馆。小儿子传杰在跑马帮途中发现了甲子沟煤矿,朱开山又聚集商界同仁成立山河煤矿,寻求民族工业的发展。他是一个不断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的人,虽屡遭挫折,却越挫越勇。在国难当头之际,他支持二儿子传武投身抗战,儿子死在战场上,他说这是朱

家的光荣。他既有勇,又有智;既有诚信仁义,又有应对复杂世事的成熟老练;既有家国情怀,又讲民族大义。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诸多可贵品格,朱开山的故事,演绎成了一曲民族精神的颂歌。这部剧作的艺术水准恰如李掖平教授评论新时代现实主义文艺时所说的:“创作者胸怀家国天下,用心、用情、用功,不断深化作品的主题立意和思想内涵,使其成为一盏以理想照亮现实,引领民众前行的灯火,标示出与新时代相匹配的历史深度和时代高度。”<sup>[5]</sup>

## 二、草根型英雄的塑造,传奇化的故事营造

一部剧作最重要的是故事和人物。创作最终要归结到人物的塑造,能不能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是一部剧能不能吸引人的重要因素。剧作以朱家父子四人为核心,通过他们的不同故事、不同选择,展现了1900到1931年的历史风云,塑造了几十个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闯关东》这部剧的核心人物是朱开山,对这个形象的塑造集中体现着剧作者对中国农民的思考,对民族性格的展示。他是一个草根出身的平民英雄。早年参加义和团运动,杀洋人,是山东地界的朝廷钦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只身闯关东,白手起家。在淘金生活中,朱开山经历了非人的磨难,与金把头 and 官兵、土匪巧妙周旋,死里逃生,为家族发展挣得第一桶金,表现了他顽强的生存意志。农耕生活中他与当地人和睦相处,因二儿子传武和秀儿的婚事、抗旱用水、防霜保苗,与当地大户韩老海多有摩擦,朱开山仁义待人,隐忍退让,低调处事,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经商生活中他带领全家来到哈尔滨开山东菜馆,遭到热河人潘五爷百般刁难,他以诚信为本,和睦为先,既不争强斗狠,也不做小伏低,他以仁义的情怀,机智过人的手腕,折服了潘五爷,化敌为友,开拓出更大的生存空间。开矿生活他超越了家族纷争,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宁死不屈,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朱开山一方面具备拓荒者的勇和闯的精神,杀洋人、闯关东、淘金、种地、经商、办矿等活动将那种从容不迫的冒险精神和智勇双全的处事能力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这种精神正是成千上万闯关东农民生存智慧和优秀品格的凝练和投影;另一方面他又具备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他的“仁”是宽厚的处事态度和与人为善,是最质朴的仗义和善良;他的“义”是家国大义,是对兄弟的一诺千金和面对侵略者的英勇抗击;他的“礼”在于他的恭谨谦和与他骨子里的倔强,在东北荒寂的黑土地上,严守着中原汉文化的门风和纲常;他的“智”体现在他遇事沉稳,能屈能伸,把握大局,成熟机敏;他的“信”是他一直以来的行为准

则,无论是婚约还是交往,经商还是开矿。朱开山所体现的中华传统美德被彰显得淋漓尽致。

除了传统美德和勇毅坚韧,朱开山还具有非凡的气度和超人的神力,这反映了剧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喜爱,编剧是把他塑造成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他是闹义和团时出名的平民英雄,民间传唱着歌颂他的大鼓词。淘金场上代小金粒受过,被活埋在井里,他竟能奇迹般地从土里拱出来。他夜晚放马探路,吞金外逃,还用马蹄金飞镖击毙金大拿,率众逃出老金沟,足见他机智过人,神勇超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朱开山集资兴办山河煤矿,与日本争夺甲子沟煤矿的开采权。“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亲率全家到前线劳军,声援传武和鲜儿在前方的抗战。传武为国捐躯,他说是老朱家的光荣。为了民族利益,他炸毁了山河煤矿,认为矿山不能留给日本人。这个形象几乎涵盖了所有中国农民的优秀品格,他既有儒者的温厚,又有侠者的勇武;既有拓荒者的闯劲与胆识,又有成熟男性的稳健与智慧;既有爱国爱家的大义大节,又有爱妻爱子的父性光辉。这是闯关东时代孕育出的大写的中国男性的形象,是一个在精神品格上熠熠生辉的草根型英雄,也是一个时期以来文艺作品中塑造出的最具性格魅力和人性光辉的中国农民形象。

鲜儿是剧作中塑造的另一个独具个性的女性形象。鲜儿从小和朱家大儿子朱传文订婚,在天灾人祸、颗粒无收的灾年,老朱家东挪西借筹到一担小米,想给大儿子娶亲,可粮食被土匪抢去了,谭家说没粮食不让传武迎娶鲜儿。文他娘又听闻朱开山在关东被官府抓住砍了头,她决定带着三个儿子去关东寻夫。鲜儿逃出家门,决定随传文私奔。但是在山东龙口没赶上渡船,只能和传文一起徒步闯关东。传文在路上病倒,她卖身救兄,违心做了童养媳。后来被唱戏的班主收留,学唱二人转。在王家班唱戏唱红又被恶霸凌辱逃到伐木场,千辛万苦找到元宝镇偏逢传文娶亲,随传武私奔,水上放排又被土匪打散,后落草,抢日本人洋行险些丧命,被传武和二龙山的弟兄劫法场救下。“九一八”事变后,她走上抗日前线与传武并肩作战,传武牺牲她回到朱家,击毙森田和几个日本兵,最后和朱家人坐着雪橇离去。鲜儿九死一生的传奇遭遇,把土匪、妓女、戏子、山场子、水场子的戏拉出来,极大地拓展了全剧的生活空间,增强了剧作的传奇性。鲜儿的经历,几乎承载了闯关东女性所遭遇的全部苦难。但她以顽强的生命意志战胜了这所有苦难,在抗日的烽火中成长为一位抗日志士。美丽刚强、饱经苦难的鲜儿是全剧最具个性、最让人尊敬的女性。

剧作还塑造了朱家的三个儿子,老大传文老实顾家,但懦弱自私;老三传杰学生意,跑马帮,创建山河矿,机敏灵活,眼界开阔;老二传武性格刚烈勇武,敢闯敢拼,最像朱开山。他不接受家里包办的秀儿,喜欢上了鲜儿。为了鲜儿他在山场子差点丧命,在水场子几回生死。在放排的河道上,他对重病的鲜儿不离不弃;在鲜儿千钧一发的断头台上,他勇劫法场。后来他参加东北军成长为一名抗战将领,英勇牺牲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上。他由一个活得自我的草莽少年,成为了一名民族英雄。

朱家的三个儿媳,出身不同,性格各异。那文是王府的格格,知书识礼,喜欢咬文嚼字,但足智多谋。最出彩的一场戏是放牛沟的农耕生活,农忙抗霜保苗招不到人手,那文向公爹借了十块钱,去镇上打麻将赌钱,大败各路神仙,为朱家招来了百余名短工,解了朱家的燃眉之急。这位从小在王府长大的格格,三岁就跟着王爷上牌桌,练就了一手的麻将绝技,她大节不亏,在传文投靠日本人的时候,果断地和丈夫决裂。秀儿是乡绅之女,善良忠厚,忍让克制,一直痴情传武却得不到回报,最后在一郎那里得到一份情感的回报。玉书出生于商贾之家,识文断字,热情开朗,比较时髦。

文他娘的塑造也很有特点,她贤惠宽容,深明大义。在听说自己的丈夫被官府杀头生死未卜之时,她不畏艰险,带着三个儿子走上闯关东之路,一路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等找到丈夫后,她操持整个家庭,为丈夫儿女营造一个温暖的家。在众多儿女中她格外疼爱秀儿,是因为秀儿痴情于传武却始终得不到回应。她收养日本人患病的弃儿一郎,并把他当做自己的小儿子抚养长大。当其日本的父母找上门来时,又无私得把一郎交给他日本的父母。后来一郎受到森田的胁迫铸成大错,她还是不离不弃,并说:“无论什么时候,你都是我的老儿子,这不怪你,怨娘没有看好你。”这是一位有着博大爱心的母亲形象,是中原文化熏陶出的母性的代表。此外像放牛沟的乡绅韩老海,跑马帮的张垛爷,元宝镇的富商夏原璋,哈尔滨的商人潘五爷,二龙山的土匪震三江等,这些人物都塑造得个性鲜明,血肉丰满。

除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塑造,一部剧要好看还在于故事讲述得精彩和生动,这就是故事营造的传奇性,戏剧冲突的强烈性。《闯关东》四个篇章,每一部分都为朱家设立了强有力的对手。“淘金篇”朱家的对手是金大拿,为了从金大拿的控制下带出金子,朱开山可以说是几次死里逃生。金大拿和金把头要合伙算计往外运金的淘金人,没想到朱开山偷听到了两

人的密谋,和工友们抓住了金大拿,指认了他为了金子害死自己弟兄的恶行,在金大拿要逃走的时候,用马蹄金把他击毙。情节紧张激烈,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农耕篇朱家的对手是韩老海,他是当地的大户,在其女秀儿和传武的婚事被传武拒绝之后,他带人砸了朱家,并毁坏朱家的庄稼。朱开山绑了儿子传武去给韩家赔罪,韩老海还是不依不饶,竟勾结土匪老蝙蝠绑架朱开山,朱开山制服土匪后,拿着飞镖和老蝙蝠的一缕头发,和韩老海讲和。故事在一波一波的冲突中推向高潮,然后矛盾又一个个地得到化解。“经商篇”朱家的对立面是潘五爷。潘五爷作为热河帮的首领,容不得山东人在哈尔滨街上开菜馆,一次次派人来刁难。最后潘五爷和朱家打赌,看谁能把货物运回来。潘家买通土匪以为能把朱家打败,而朱家却在震三江的帮助下化解了危机,潘家却赔上了儿子和财产,输人、输钱又输面子。朱开山却以德报怨,让自己的儿子认潘五爷为干爹,为他养老送终,充分彰显了朱开山的大仁大义。“开矿篇”朱家的对手是森田物产和日本关东军。森田物产先是和朱家争夺甲子沟煤矿的开采权,后来又控制车皮、抬高煤炭运价,借一郎之手入股山河煤矿,传杰起诉森田哄抬运价,最后山河煤矿胜诉。森田收买传文,登门来到朱家劝朱开山归顺日本人,鲜儿打死日本兵,传文得知传武的死讯后幡然悔悟,用传武的手枪打伤了森田,森田要逃走,被朱开山用飞镖击毙。矛盾一次次得到化解,又一次次升级,情节回环往复,曲折动人。这种传奇化的故事营造,戏剧冲突的紧张激烈,是这部剧吸引人的又一亮点。

### 三、厚重大气、朴实辽阔的审美风格

作为一部挖掘民族历史、展现民族精神的正剧,《闯关东》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风格,那就是厚重大气、朴实辽阔。首先这部剧在价值观上就胜出一筹。《闯关东》是真正地草根立传,为占我们民族的大多数的农民立传,它深入诸多普通人的内心,反映他们的爱恨哀乐,追求和梦想,发掘这些普通人内心的闪光点,用心描摹,仔细渲染,有一种对社会正义和民族正气的承担,对历史和现实作整体性发言的大气。这部剧是编剧们深入生活、考察历史的潜心之作,不是宾馆文学、游戏文学、会议文学,这种从生活中来的扎实和接地气是最有说服力的。剧作通过一家人闯关东的经历,反映了一段近代的历史,从山东农村到关外的元宝镇,从放牛沟到哈尔滨,从深山老林到农田耕种,从老林伐木到江上放排,从把头垛爷到土匪军官,从戏子格格到王爷大佐,这部剧有着极为开阔的叙事空间,对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抗战爆

发的闯关东生活做了全方位的反映。既展现出了闯关东的山东人在创业过程中的艰难困厄,反映出流亡生活的严酷,又展现出了山东人在应对各种各样的严峻挑战时的坚韧意志和生存智慧。它反映的生活充满了苦难和对人的磨难,它承认生活的艰难,且通过对艰难的战胜又赞美了人性的伟大,它气象阔大,雄浑高迈,不落俗套。可以说《闯关东》是一部有风骨的现实主义剧作,可用“风清气峻”<sup>[6]</sup>来概括这部剧作的审美风格。

其次《闯关东》又是一部蕴含着生活智慧的剧。在广阔的生活空间里,剧作呈现出了中国人面对各种艰险困苦时的从容应对和智慧练达。剧中人物经历的生活一般观众经历不到,但是通过他们的经历开阔了观众的视野,启发了观众的思维,打开了观众的想象和认知空间。剧作把个人和家庭的命运放到风起云涌的历史大背景中去展现,把个人叙事、家族叙事和历史叙事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充分展现了平民人物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和独特的生命体验,又抒写出他们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这部剧的主人公大部分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是农民、商人和军人,是父亲、儿子和女儿,但是这些普通人以他们的坚韧、顽强和智慧演绎出不凡的故事,做出了超凡的功业。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一家人创业的艰难,看到了民族工业发展的艰辛,看到了中国人团结起来抵御日本人的血性和担当,从而振奋了民族精神,弘扬了民族正气。在厚重大气故事讲述中,又给人生活智慧的启悟;在美的伦常日用的故事呈现中,给人以崇高的情感激荡,让观众在自我超越中体会到其崇高的审美追求。

其三,这部剧的画面和音乐也呈现朴素深沉、严肃凝重的特点。如何让作品看起来真实可信,剧作者对画面、色彩的呈现也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力求真实,还原现实生活的色彩世界。《闯关东》中的色彩基本以青灰色、灰黑色为主,包括人物的服装、环境色彩以及房屋建筑等,这种暗色调的色彩,贯穿了全剧的始终。男性的服装以灰色、黑色为主,女性的服装蓝色上点缀些白色的小花,符合那个时代乡村的打扮特点和贫寒的生活基调。在这种色彩的运用中,呈现的是白山黑水的辽阔,冰天雪地中的淘金生活,山场子、水场子伐木、放排的生活,漫天飞雪中运送货物的马帮生活。这种暗淡色调的运用符合普通人在流亡和战乱岁月中的苦难命运和剧作主题意蕴的深沉悲壮。这种乡土化暗淡色彩的真实再现还原了历史事件的朴素真实,也表达了剧作者深沉悲悯的人文情怀。音乐作为服务于影像表达的一种元素,需要融入电视剧创作的整体构思中,为作品的抒情达意、人物

形象的刻画起到辅助性的作用。《闯关东》的片尾曲《家园》，歌词是这样的：“冰雪早已覆盖我的足迹，远方的炊烟摇曳温暖的召唤，风儿无法吹断我回望的视线，家园好像永远征途漫漫。一座座山，一道道岭，一片片川，我的故土这么难舍难离。一路路风霜，一阵阵雪雨，一次次别离，为了希望我们永不放弃。不知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丹心豪义。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常在梦里来来去去。”词调很好地诠释了全剧的主题。在鲜儿投身戏班后，在台上唱这样的词句：“走一里，思一思，高堂老母啊。走二里，念一念，好心的街坊啊。走三里，擦一擦，脸上的泪呀。走四里，骂一声，狠心的张郎啊。走五里，叫一叫，喂过的骡马呀。走六里，瞧一瞧，放过的牛羊啊。走七里，望一望，平过的场院啊。”那种离家的不舍和对家园的渴望传达得质朴而动人。说到底，所有的叙事文本都是在情感表达中讲述故事、刻画人物、传达思想，元代戏剧大师汤显祖认为情是艺术产生的根源，是生命存在的真实状态和全部价值意义的湛然呈现。作为新时代现实主义剧作的优秀代表，《闯关东》不仅悦耳悦目、悦心惬意，而且达到了悦志悦神。“悦志悦神是一种高级的审美形态。悦志指的是对某种和目的的道德观念的追求和满足，是对人的毅力、意志、志气的陶冶和培育。悦神是指

投向本体的某种融合，是超道德的，是一种与无限相近的精神感受。悦志悦神与崇高的精神息息相关。”<sup>[7]</sup>

《闯关东》无疑是新世纪以来涌现的具有史诗品格的经典之作，通过它的成功我们发现这些展现齐鲁儿女英雄传奇和接地气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严肃正剧，是鲁剧擅长制作并广受市场欢迎的作品。鲁剧应保持这种特色，创作出更多优秀的类型剧，为中国电视剧的大繁荣做出贡献。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总书记给山大《文史哲》编辑部全体人员回信[OE/CD]. 人民网-教育频道.
- [2] 车东轮. 书写百姓的精彩人生——专访电视剧《闯关东》编剧高满堂[J]. 中国电视, 2008(3).
- [3] 田崇雪. 流亡的美学, 移民的史诗——长篇电视连续剧《闯关东》解读[J]. 中国电视, 2008(4).
- [4] 郑永扣, 寇东亮. 民族精神的当代价值[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8.
- [5] 李掖平. 像一盏盏灯火, 照亮现实世界——新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鲜明特色[OE/CD]. 天益爱思想网站.
- [6] 孔令顺. 风骨: 中国电影学派的知与行[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1(4).
- [7] 丁宣雅. 论近年国产电视剧的情感表达[J]. 中国电视, 2022(1).

## Grass-roots Hero Narration and Ode National Spirit

### —On TV Drama “Chuang Guandong”

LIU Xi-yun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School,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Chuang Guandong is a classic work of peasant drama that has emerged since the new century. The play in the epic character of the presentation, the image of the characters, the aesthetic style of the thick atmosphere of several aspects have made a good performance. It provides valuable experience in idrology and artistry, which can be used for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V plays of the same type.

**Key words:** Chuang Guandong; epic; national spirit; grass-roots hero

# 消费文化视角中的体育新闻传播

鲁萌<sup>1</sup>, 汪洋<sup>2</sup>

(1. 安徽三联学院 体育部, 合肥 230601; 2. 安徽新华学院 通识教育部, 合肥 230088)

**摘要:** 消费文化是消费主义社会中由消费行为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消费文化对体育新闻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消费文化中的体育新闻从传统的生产引导消费变成了消费引领生产; 运动身体在体育新闻传播中有了符号化特征; 人们对体育新闻的消费既有真实消费也有虚拟消费。这些因素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利益的追求、文化工业的复制和媒介的力量。消费文化中体育新闻传播要正视这些变化并积极应对。

**关键词:** 消费文化; 体育新闻; 传播; 拟态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2)05-0047-04

消费文化是消费主义社会中由消费行为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由消费社会所创造出来, 并保障、规范和制约人们消费的各种文化, 由社会集团所创造, 为大众媒体所传播, 为社会大众所接受, 为消费而消费的文化。<sup>[1]</sup>消费文化产生的土壤是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是二战后在西方社会兴起的诸多社会思潮中的一种, 它追求消费、享乐, 是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产物。消费文化不仅是消费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表征, 而且在各个领域引领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 对体育新闻传播过程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 一、消费文化的特点

当代社会, 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带动下, 消费文化从生产向消费转变, 物品的文化符号功能超过其使用价值, 得到突出体现, 媒体重构的幻象场景, 具有强烈的外在感染性, 消费文化呈现出独有的特性。随着时代的发展, 文化的运作体制从生产本位走向了消费本位, 消费至上变成一种意识形态。

### (一) 从生产转向消费

消费文化首先是从生产转向消费, 消费成为文化的一种主导力量。传统的社会是由生产占据主导地位, 生产决定消费。消费社会是在物质丰富的前提下形成的, 由生产转向消费, 消费成为生产的动力。人们不断地被鼓励消费, 用消费来刺激生产, 甚至成为生产的直接动力。不同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内容塑造了

不同的消费群体, 从而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 甚至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人们变得“为了消费而消费”, 消费成了人们存在的理由。<sup>[2]</sup>与消费文化相伴而生的就是商品广告。商品广告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 购买各种需要或者不需要的东西, 并不断强化人们的这种消费行为, 让人们认为消费是合理的, 需要源源不断地进行消费。

### (二) 符号化为表征

在消费社会, 商品的符号价值比传统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受到更大的关注。消费文化是以符号化形式为表征, 从经济价值为基础的使用价值扩展到以文化为符号的象征价值, 具有了意指的逻辑, 也就是鲍德里亚说的“意指逻辑的消费”。消费文化消费的不仅是传统的物的使用价值, 还消费着人们的观念、态度、甚至是某种生活方式。同时更加看重物体背后的象征价值, 比如身份、地位、情感, 甚至是一种价值认同, 从而将消费对象从物体的使用价值扩展到物体的社会价值。人们购买某种商品不是因为它的实用价值, 而是购买一种体验, 获得商品背后的精神满足和社会价值。于是消费的力量变得格外强大。消费文化让消费成为不同场域中各种权力的竞争与博弈的核心。正因为如此鲍德里亚说“消费看上去曾经是一种普适的价值体系, 但实际上它不过是一种制度、一种道德而已。在这一意义上, 它过去和未来都曾经是或

收稿日期: 2022-04-02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互联网+’时代体育新闻传播创新路径研究”(SK2019A0021);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项目(gxyq2020204)。

作者简介: 鲁萌(1988-), 女, 安徽合肥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体育教育研究。

者将会是任何社会中权力策略的一个要素”<sup>[3]</sup>。

### (三) 从消费物到消费拟态

消费文化中的消费行为与传统的消费行为有所区别,它不仅消费真实存在的物体,还通过媒介消费着虚拟的物像。媒介是消费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构成内容,它是信息的传递者,还是拟态环境的建造者。在媒介构成的拟态世界中,人们通过各种媒介认识、感受和理解这个社会,同时在不知不觉中消费着这种媒介化的产物。在媒介构成的拟态世界中,人们往往将这种虚拟的世界当做真实世界去感知、认同、接受,从而完成拟态的消费行为。

## 二、消费文化中的体育新闻传播

体育运动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态度和追求。但消费社会中的体育运动并不完全是亲身体验和实际参与,还被赋予了更多文化内容,成为一种运动身体符号,其中体育新闻成为人们构建这种符号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体育新闻是人们热爱体育运动而进行的自觉选择,同时又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成为一种非自觉选择。消费文化时代大量体育新闻的传播又让越来越多的受众关注体育运动,让体育运动成为国民共享的“盛宴”。

(一) 市场杠杆在消费社会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经济驱动成为体育新闻传播的首要驱动力

消费文化认为消费不再是生产的附属品或被动产物,而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导和引领。人们不是因为需要而消费,而是消费刺激需要。因此,如何在过剩的产品中促进消费是消费社会的重要任务。在这样的环境中,体育新闻也不再仅仅是需求的产物,还充当了人们需求的诱导和引领。只有通过获取人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情感认同等方式来满足人们的体验欲望,才能完成购买与消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闻媒介产生了深刻变化。从信息的匮乏到信息的过剩,一方面人们对纷繁复杂的信息缺乏判断和甄别的能力,对新闻媒介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新闻媒介在不断获得活力和动力的基础上又面临日益残酷的竞争。大多数专业体育报都没有了财政支持,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不少发行量一度很好的体育专刊都相继停刊。经济驱动成为体育新闻传播的首要驱动力,经济因素对体育信息的筛选在消费文化中不断加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全球体育运动的发展。

体育是消费文化时代中将无形情感表达转化为有形资本的核心生产领域之一。媒介公司、商业公司花费巨资购买体育节目,通常是以“免费”或部分收费

的形式出现,但体育协会、俱乐部、裁判和运动员、电视和体育管理公司、赞助商、广告主甚至政府之间都以经济为纽带形成某种“共识”。一个体育节目如果有必要可以不停地播放,并且有目的地被剪辑。体育媒介也在赛前不断激发人们观看的欲望,赛后通过鼓励对体育明星和体育精英人士的追捧来延长观看,从而实现消费链的延展。美国NBC电视网以15亿美元取得2006年冬奥会和2008年夏奥会的转播权,以22亿美元取得2010年冬奥会和2012年夏奥会的转播权。<sup>[4]</sup>作为回报,NBC收取的核心赛事的广告费不仅急速飞涨,而且在通过奥运会转播提升的电视收视率中获得了“溢出效应”——整个年度、各类型节目的广告权中NBC都处于优势地位。作为附加价值,NBC在媒介产业中也树立了更加权威的品牌地位,为在媒介产业中提供了重要的竞争优势。<sup>[5]</sup>

在消费文化时代,体育舞台上的主角成了赞助商和广告商,他们把所有赛事变成了一项项重要的买卖,而体育运动员作为雇佣者退居到次要地位,成为各种价值的一个复合体。伴随着2020东京奥运会上的夺金热潮与社交网络上的超高人气,运动员的商业价值进一步得到商家追捧。在2020东京奥运会上夺得男子67公斤级举重金牌后的谏利军,在短短5天时间里,就获得了平安健康险的签约。在奥运会结束后的第一天,创造中国田径历史的“苏神”苏炳添,正式成为小米品牌代言人。运动员的身价不仅与他们在职业生涯中获得的荣誉密切相关,还与他们的出镜率甚至相关娱乐新闻息息相关。比如安娜·库尔尼科娃,在网球职业生涯中她虽然没有获得过任何一项赛事的单打冠军,但却因其美貌而经常出现在生活类杂志的封面上,成为体育明星,其在场外的各种代言、拍广告等活动所获得的收入颇丰。《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21年全球收入最高的10名运动员中,巴西足球明星内马尔以9500万美元的收入,排在第六位。内马尔不仅是球场上的明星,还是社交媒体上的“网红”,在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上拥有2.82亿粉丝,是社交媒体上第三大受欢迎的“网红”运动员,也使他成为吸引品牌的主要人物。2020年成为彪马的品牌大使,代言其标志性的King鞋。另外,Epic Games在其热门游戏《堡垒之夜》(Fortnite)中有内马尔的游戏皮肤,还举办了一场赢得他战靴的比赛。<sup>[6]</sup>这就是消费文化时代体育明星通过媒介获得的附加值。

(二) 文化工业带来的新闻复制,体育新闻成为文化复制的产物

消费文化是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在迎合大众的本质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消费文化虽然在技

术支撑下快速、海量地向人们传递各种不同的体育新闻,但却是以一种复制化、雷同式信息传送给人们。只要是能迎合大众的需求,能广泛传播的信息,就会被不断地复制、推送,甚至炮制。打开各类新闻网站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全世界各类体育比赛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但新闻网站中推送的体育新闻却大多相似、甚至相同。2020东京奥运会比赛期间,我们几乎很难看到除了奥运会之外的其他体育比赛报道。除了传递比赛结果的硬新闻之外,还有很多对东道主日本的软新闻报道,比如对日本国歌的节奏、开幕式上的另类表演、体操运动员的失误、奥运村设施的吐槽等,新闻报道的相似度极高。在对运动员的报道上也多集中在部分运动员上。

打开体育网站或者各类流媒体,我们同样发现,内容设置和版面设计也极为相似。人们喜欢的足球、篮球、网球处于醒目位置,人们关注的内容反复不断地出现,尽管他们的标题不完全相同。在大数据的支持下,只要是人们关注的、点击率、收视率高的新闻就会被不断地、反复地推送。同样在对比赛的介绍和赛况的描述中,这种复制、雷同也屡见不鲜。消费文化时代,运动身体不只是物质实体、生物数据或生理学事实,而且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sup>[7]</sup>健康、矫健、充满力量的身体是体育运动的核心。为了迎合人们对运动身体这种心理需求,各类体育赛事报道往往过多渲染体育的力量,甚至将比赛比喻成战争,高频度地出现“横扫”“血战”“碾压”“血洗”“双杀”等字眼;在对教练和运动员的称号中喜欢使用“将帅”“掌门人”“老将”“射手”“战舰”,各种“军”“魔王”等。这些带有暴力甚至血腥的词汇让屏幕外的观众仿佛感受到赛场上的激烈和紧张。与原先简单直白地介绍赛况相比,人们更喜欢这种充满激情的介绍,尤其是在视频新闻中,这些词语和语气不断被重复,从而加深了人们对比赛的感觉。

在消费文化中,新闻产品成为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个产品,体育新闻的生产、传播和接受都在人们的需求指引下按照商品模式制造出来。那些受欢迎的新闻不断地被复制、不停地被播放并不断地被生产,不受欢迎的新闻则逐渐消失。于是在多次传播中,新闻经历了多次筛选,最终人们看到的似乎是自己喜欢的新闻,却没有认识到原本丰富的信息只剩下了这些所谓的受欢迎的新闻,这类新闻都具有“模具”式的特质或内容。

(三) 体育新闻从真实转播到拟态图景的构建,塑造了一个虚拟世界

1. “屏”世界的构建。与其他新闻传播相比,体

育新闻除了提供给人们各类体育信息之外,还在无形中构建了运动图景。这种运动图景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一种拟态图景。运动原本是一种亲身体验和经验性活动,由于在现代社会中受时间、金钱、精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人们有时无法完全亲身感受运动的快感,而媒介则可以借助技术力量为人们展现出一个屏幕上的“真实”世界。这种“屏”世界看起来似乎比真实场景还要真实。真实的运动场景往往受时间、场地、座位、观看视角的限制,无法捕捉到想要的所有场景,但在“屏”世界中却可以自由观看各类运动场景:全景与特写的任意切换、精彩片段多次不同倍速地回放、运动员与裁判的切换、场内比赛场景和场外专业人士介绍的切换、赢者欢乐与输者失落的切换、现场转播与往届比赛的回顾、汗水与悲伤等各种表情的特写等等,这些都构建了一个比真实世界似乎更真实的“屏”世界。

2. 拟态图景带来的狂欢“盛宴”。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是一种反抗霸权理论、是形成普天同庆自由民主的理想世界的文化策略。狂欢理论中塑造了一个游戏的、狂欢的集体仪式,是人们自由情感的宣泄和表达。体育的起源就是游戏,就是人们情感宣泄的方式。消费文化时代,媒介借助技术的力量,将场内和场外连接起来,形成一种虚拟视觉的狂欢“盛宴”。在拟态环境中,它不是对体育活动的简单复制,而是结合先进媒介技术所创造的新型“体育活动”。<sup>[8]</sup>有时场外这种“体育活动”的激情和兴奋甚至要比场内更热烈和沸腾,因为人们不仅可以看到比赛的实况,还能听到精彩的讲解、感受到球迷的热情。宽大的屏幕、高清的画质、环绕立体声、多机位视角、慢镜头重播,让人们得到情感上的认同和比置身现场更为真实的精神体验。人们没有因为不能亲临现场而减少了观看“盛宴”的喜悦。人们也忽视了这种狂欢“盛宴”实际上是技术力量的作用,是一种虚拟的图景。

3. 民族认同强化了虚拟图景的真实感。消费文化时代中体育新闻构成的拟态图景还以一种民族认同的方式让人们不知不觉深陷其中,并获得精神上的真实满足。比如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奥运会所赋予的政治认同无疑是突出的,而在消费文化中这种政治认同通过媒介化的图景突得更显著。人们通过赛事转播,通过媒介构成的奥林匹克影像世界,不断满足精神上的需求。在那些被精心观看的运动图景中,视觉化的身体与更为广阔的社会议题与民族、地位、身份相联系从而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力量。屏幕外观众的兴奋与激动并不少于领奖台上运动员的兴奋和激动,屏幕上出现的国歌、国旗和领奖台上的运动员都让赛场外的

观众将这种民族认同感上升到了极致。<sup>[9]</sup>

### 三、结语

体育新闻载体不仅为人们传递体育信息，更为人们构建了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在消费文化的指引下完成体育新闻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人们在体育新闻传播中不仅可以消费作为商品的体育运动，还可以消费作为身份、地位的精神价值，并在各种媒介构成的“屏”世界中获得满足。

### 参考文献：

- [1] 杨魁,董雅丽. 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27.
- [2] 王树良, 湛椿. 自我认同与符号消费: 网络自制节目中的符号建构研究——以《奇葩说》为例[J]. 国际新闻界, 2016 (10): 42-53.
- [3] 让·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 夏莹,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55-56.
- [4] 刘笑盈. 奥运赢家: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J]. 对外传播, 2009 (02): 58-60.
- [5] 大卫·罗. 体育、文化与媒介: 不羁的三位一体[M]. 吕鹏,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90.
- [6] 2021年全球收入最高的10名运动员[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9642354876107389&wfr=spider&for=pc>, 2021-05-13.
- [7] 陶东风, 和磊. 文化研究[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28-129.
- [8] 蒲李周. 基于大众传媒的现代体育拟态图景研究[J]. 新闻战线, 2014 (11): 151-152.
- [9] 付晓静. 1990年代以来媒介体育传播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47.

## Sports New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 Culture

LU Meng<sup>1</sup>, WANG Yang<sup>2</sup>

(1. Sports Department of Anhui Sanlian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2. General Education Department,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Hefei 230088, China)

**Abstract:** Consumer culture is a cultural form produced by consumer behavior in consumerism society. Consumer culture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sports news communication. Sports news in consumer culture has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production leading consumption to consumption leading production; Sports body has symbolic characteristics in sports news communication; People's consumption of sports news includes both real consumption and virtual consumption. The changes of these factors are mainly due to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interests, the replic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power of media. Sports news communication in consumer culture should face up to these changes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m.

**Key words:** consumer culture; sports news; dissemination; mimicry

# 基于受众调查与空间环境分析的地铁广告传播策略研究

曲璐璐

(安徽三联学院 动漫与数字艺术学院, 合肥 230601)

**摘要:**本土传媒界在地铁广告设计传播能力、学术研究水平、运营管理经验等方面长期处于劣势地位,致使资本实力雄厚的国外企业即使主要依靠常规化的传播策略,仍在我国地铁广告的市场份额中实现了野蛮式增长。调查表明,一方面,地铁乘客主流群体具有年轻化、收入水平偏低与消费高潜化的总体特征,受众对于广告的偏好呈现出不同年龄段共性需求与不同性别差异化需求并存的格局。另一方面,在幽闭的物理空间环境内,应基于理性思路为受众创设人性化的视听环境。在综合各项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制定出地铁广告的传播策略,其体系架构由产品定位、投放定位、媒介定位、情感定位和风格定位策略五部分组成,以期为我国本土地铁广告事业的发展壮大添砖加瓦。

**关键词:**地铁广告;受众;空间;传播环境;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 J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2)05-0051-04

2022年伊始,交通运输部权威发布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终大总结报告,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开通地铁轨道交通的城市共有51个,运营线路总计270条,总里程为8759公里。2021年月均运行280余万列次,进站量与客运量月均分别高达10.8亿人次和18.0亿人次之多。综合运营里程数、开通线路数、运载量等指标项,上海和北京现已位列世界十大地铁城市排名的前两位;广州、成都、武汉、深圳与南京五城的运营里程亦超400公里,跻身世界级地铁城市之列。

诚然,自北京于1997年开通国内首条地铁线路以来,中国地铁在短短25年间取得了全球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从地铁广告视觉传播方面来看,与历史悠久的伦敦大都会地铁(经典视觉形象设计系统)、莫斯科地铁(世界最美地铁)和斯德哥尔摩地铁(世界最长艺术长廊)等相比,我国大中城市的地铁广告事业普遍趋于年轻化,设计创意水平与运营管理水平粗放,尚处于由量变向质变的发展阶段。

## 一、地铁广告现状分析

### (一)设计传播现状

出入口通道、站厅层、站台层、地铁车厢及隧道是构成地铁空间的五个基本单元,综合不同子空间

或相对独立、或相互连通的构筑特征,大致可将地铁广告分为站内空间广告、车载空间广告与隧道空间广告三种基本类型。目前传统图文类地铁广告的占比极高,设计手法单调乏味,语言表现缺少新意,且以常规化的灯箱或大型墙贴为载体进行投放。缺乏新意的传播形式导致“过目不忘”的广告传播效果预期与受众“过目即忘”的实际传播“反效果”背道而驰。投放即失败的案例屡见不鲜,甚至成为地铁空间中视觉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极易令人产生厌烦心理。

### (二)市场份额现状

全球广告行业巨头主要源自欧美与日本。目前全球六大广告集团均在中国设立分公司,并积极开拓包括地铁广告在内的户外广告业务。以2005年进入我国内地市场的德高中国(隶属于全球最大户外广告公司、法国家族广告企业德高集团)为例,截止2022年3月,其子公司申通德高地铁广告有限公司已中标7个城市的地铁广告运营管理权,四大一线城市中,除深圳地铁的广告业务由本土公司经营外,其余均由其承揽,四大一线城市覆盖率高达75%;14个新一线城市中,覆盖率亦有28.5%之多(天津、重庆、南京和苏州地铁)。以点窥面,本土广告公司在与跨国巨头的

收稿日期: 2022-04-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传播技术与公共情感的形成及演化机制研究”(20CXW025)阶段性成果;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基于地铁媒体的‘体验式广告’创意策略研究——以合肥市为例”(SK2020A063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曲璐璐(1988-),女,河南南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视觉艺术、广告设计研究。

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

### (三) 学术研究现状

我国学术界关于地铁广告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可查的相关学术成果最早发表于2003年,而国外自20世纪80年代起即已开始呈现出多点开花、百家争鸣的研究局面,成果数量与质量明显具有优势。大卫·奥格威作为媒体品牌经营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对地铁广告媒体的品牌经营活动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sup>[1]</sup>克劳德·霍普金斯认为,地铁中的男性乘客往往更关注有助于“优化”生活的广告,女性乘客更倾向于关注能够“美化”生活的广告,广告的设计与投放应根据性别差异精准施策。<sup>[2]</sup>水野广和等人结合管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理论,开展了地铁公共空间设计与管理的学科交叉研究。<sup>[3]</sup>Darrel D.Muehling研究团队运用心理学理论,总结出影响地铁广告传播效果的受众认知逆反、情感逆反与行为逆反的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地铁广告设计、投放与延伸研究。<sup>[4]</sup>

国内方面,从学位论文来看,近五年来具备一定研究深度的成果主要有:张凤乔对中法两国地铁广告案例中所折射出的社会现象与发展动向差异进行了微观分析,这是为数不多的从社会文化层面专门开展中外地铁广告的比较研究。<sup>[5]</sup>李一凡运用营销学理论,认为地铁广告的场景营销策略应以实现数据分析定向化、消费路径聚集化、互动场景实体化及超连接双重化为目标。<sup>[6]</sup>王璐璐运用视觉传达理论,着重围绕构图、文字、图形和色彩四项形式美要素,开展了地铁广告的人性化设计实践应用研究。<sup>[7]</sup>刘晓岚认为地铁广告应增量建构文化功能,并需对存量功能进行优化。<sup>[8]</sup>李燕从设计要素和设计表现两方面入手,提出了视觉延展型地铁广告的创作理念。<sup>[9]</sup>以上均为硕士学位论文,目前尚未发现研究主题与地铁广告有关的博士学位论文。从对口专业期刊来看,由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主办的《城市轨道交通研究》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专门刊登地铁相关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但投融资、规划、土建、电力、车辆控制与管理等方面的文章占比较大,与本文相关的主题较少,地铁广告的研究力度与刊文现状有待改善。

## 二、地铁广告受众调查

受众是广告设计与投放的目标对象。在注意力经济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和广告市场极度细分化的双重背景下,地铁广告作为一个相对特殊的小众媒介,对于受众的偏好进行分析,有助于在传统广告创意规律与传播规律普适性趋弱的现状下,为制定行之有效的地铁传媒策略提供依据。

受新冠疫情影响,本文以合肥地铁乘客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就近调查。近年来合肥市的城建异军突起,在2021年中国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建设综合实力排行榜中,合肥在二线城市中排名第二。虽然未进行外阜调研,但合肥地铁作为中国地铁事业的典型样本与缩影,调查结果同样具有代表性,且目前该市已开通5条地铁线路,采用分时段、分线路调查进行增量补充,相较于多而散的模式,所得数据更具稳定性与信度。

按照不同性别各占50%的比例,分别于早中晚三个时段,在合肥地铁1-5号线向18岁及以上的成年乘客各发放问卷20份,总计发放300份。为了实现科教融合,项目组吸纳学生参与调查,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话术培训,既壮大了调查力量,又提高了调查结果的有效率,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98份(男150份、女148份),有效率高达99.33%。

### (一) 受访者基本情况调查分析

表1 受访者基本情况调查统计表

| 年龄段<br>占比(%)   | 社会角色<br>占比(%) | 月薪(元)<br>占比(%)     |
|----------------|---------------|--------------------|
| 18-29岁<br>51.3 | 职员<br>71.1    | <5000<br>45.6      |
| 30-39岁<br>29.5 | 个体经营者<br>15.8 | 5001-10000<br>36.2 |
| 40-49岁<br>15.5 | 学生<br>8.1     | >10000<br>13.8     |
| ≥50岁<br>3.7    | 退休、无业<br>5.0  | 无固定收入<br>4.4       |

如表1所示,在所有受访者中,18-29岁年龄段的占比过半,30-39岁中青年受访者的人数亦超1/4,以上两个年龄段的占比合计高达80.8%,从中可以看出,地铁乘客主流群体趋于年轻化的特征十分显著。超过七成的受访者在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单位工作,说明职员是地铁乘客的主流社会角色。从月薪情况来看,地铁乘客的收入水平总体不高,95.6%的受访者虽拥有固定收入,但其中有81.8%的月薪区间处于万元以下,月均收入低于5000元的受访者主要集中在正处于事业起步或事业上升期的18-29岁年龄段。

### (二) 受访者偏好调查分析

表2 受访者偏好调查统计表

| 共性偏好 | 男性其它偏好 | 女性其它偏好 |
|------|--------|--------|
| 健康医疗 | 汽车     | 服饰品    |
| 餐饮美食 | 置业     | 护肤品    |
| 公益广告 |        | 家居品    |

如表2所示,统计发现,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受访者对于地铁广告信息的共性偏好主要集中于三个

方面：第一，人们对于健康医疗广告的关注度最高，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现状下，大健康产业广告或将成为未来地铁媒介资源争夺的焦点。其次，从基本面来看，衣食住行产品虽同为民生需求，但除餐饮美食广告属于共性偏好外，受访者对于其余三类民生产品广告的偏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究其原因，从性别价值观和消费心理学角度分析，男性更加关注有助于提升生活品质的硬件产品消费信息，女性则倾向于关注有助于美化生活的软性产品消费信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共性偏好中的一大亮点，公益广告的关注度可被看作是反映社会文明程度和国民素质的一面镜子，通常情况下关注度越高，民众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越强。

### 三、地铁站空间与广告传播环境分析

地铁站由站厅和站台两大主要空间层级构成，中间由不同形式的出入口与通道相连接，以便于乘客进出站及换乘。广义上来说，地铁站综合空间还应包括地铁车厢与地铁隧道两个空间单元。在对地铁站空间的物理环境特征进行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从视、听两大维度进行地铁广告传播环境的全方位分析，有助于为制定符合受众需求的广告传播策略提供决策依据。

#### (一) 空间分析

如图1所示，站台位于最底层，该空间中的客流密度相对较高，且呈现交织性特征，所承载的基本功能主要包括乘降、候车与上下车三种。站厅层介于地表层与站台层之间，空间结构相对复杂，除需设置购票、安检、检票等基本服务单元外，还可根据空间面积大小设置咨询台、自助售货机、ATM机、休息座椅等人性化设施，空间功能具有综合性。就空间的开放程度而言，与机场、汽车客运站、火车站等地上公共交通枢纽空间相比，地铁站属于典型的幽闭式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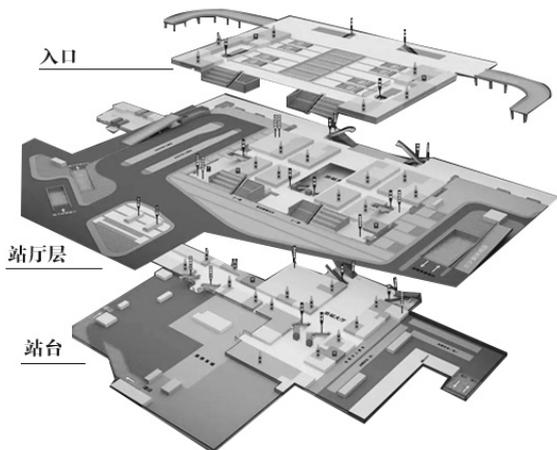


图1 地铁站空间示意图

#### (二) 广告传播环境分析

视觉传播环境是不同形式地铁广告均需重点考虑

的基本问题。灯光照明在广告展示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与常规室外广告的区别在于，地铁广告置于地下空间中无法获取自然光源，在环境光线相对昏暗的地铁站空间内，乘客的视觉敏感度较高，过度使用强光照明极易造成广告画面反光与失真，一味凭借灯光来追求炫目的视觉效果，最终或将迫使受众产生厌烦情绪。广告的色彩设计同样应以适度为基本原则，以免产生压抑感。适度的照明、简约大气的色彩服务于更好的创意表现形式，才是提高关注度的理性思路。

从听觉传播环境角度分析，地铁站内极少出现工业与建筑施工噪音，社会噪音的类型相对单纯，噪音强度相对较低，但受轨道交通噪音和人流通勤交错的时空属性等因素影响，噪音源具有持久性，故而除列车车厢以外，其它空间中并不适宜投放音频类广告。根据ISO环境噪声国际标准，并考虑到广告传播的车厢空间环境，音频的分贝数值应控制在55以内。

### 四、地铁广告传播策略

对受众、空间、环境的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地铁广告传播力的因素既呈现规律性，又具有特殊性，仍旧运用常规户外广告的传播策略注定“水土不服”。在传播过度的社会中，获得成功的唯一希望是要有选择性，集中火力于狭窄的目标细分市场<sup>[10]</sup>，打破陈规势在必行。结合AIDAS购置理论所提出的“注意→兴趣→欲求→行为”原理，应具体围绕产品定位、投放定位、媒介定位和风格定位五个维度进行综合体系构建（图2），以期实现地铁广告曝光度、关注度、创意度与影响力的全方位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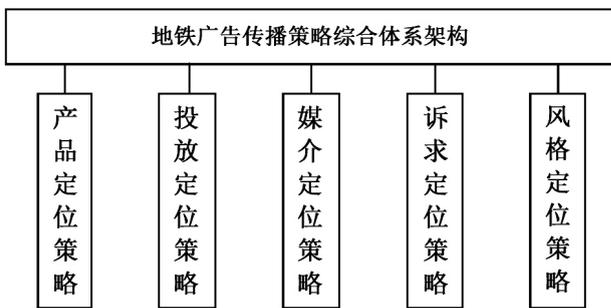


图2 地铁广告传播策略综合体系架构图

#### (一) 产品定位策略

产品定位是制定广告传播策略的先导环节，鉴于地铁广告传播对象的范围与属性相对集中，大部分乘客为收入中等偏下的高潜力年轻消费群体，故而不适宜在地铁中投放售价缺少亲民性的奢侈品类等昂贵商品广告，亦不适合投放与受众工薪阶层岗位属性不对标的农药化肥类或重工装备类广告。应根据年轻人的消费行为习惯与猎奇心理，综合运用实地调查与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重点围绕以食品、日用品、电子

产品和金融产品为代表的互联网产品广告和公益类广告进行匹配度的精准定位。

### (二) 投放定位策略

乘客人流量大的区域是地铁广告最为理想的投放地点。后驻广告一方面可以通过规模效应进行大面积造势,以此来弥补优质站层广告位资源与通道墙体广告位资源有限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从列车与隧道空间入手另辟蹊径,根据经费预算的多少,选择内外车身、车窗、车顶、站位拉手、座位等不同位置,亦可运用24帧LED静态连续显示或发光器动态视觉残留原理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技术实现插位投放。

### (三) 媒介定位策略

如果说投放位置是吸引受众眼球的关键,那么传播媒介则是抓住受众眼球的关键。如何在同质化竞争愈趋白热化的行业环境中实现突围,是策略制定者、设计师以及技术支持相关方均需着重思考的战略性问题。作为目前使用率最高的媒介,排除性价比优势外,单向传播的图文广告往往流于表面,信息表述缺乏交互性,投放媒介相对单一的格局亟待打破。相比之下,实物或模型展示、互动性装置等极少投放于地铁广告中的媒介形式,更能为受众带来新奇感与参与感。尤其是在以智能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新媒体形态下,通过二维码引流、手机端H5体验等方式来实现线下与线上多种媒介的自由切换与跨屏互动,可以有效激发传播媒介的时空潜能,打破辐射范围的限制,最终有助于将地铁空间中的固定位广告转化为“可移动的活广告”。

### (四) 诉求定位策略

诉求定位是广告与受众之间建立心理沟通机制的关键策略,分为感性诉求与理性诉求两大类。相较于单纯以传递产品功能信息为目标的直白表达方式,受众的价值诉求已然超脱了依靠产品质量本身激发购买力的理性消费阶段,更加倾向于接受蕴含感性共鸣的软性信息。地铁广告创意策划应深入研析情感营销与软文营销的成功案例,在此基础上结合产品或公益本身展开“小题大做”,重点围绕家国情怀、道德观念和爱心意识等为主线进行构思,力求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烘托卖点或实现教化目的。

### (五) 风格定位策略

受众感兴趣的,正是广告设计策划时需要捕捉的。通过洞察调查样本的风格喜好发现,地铁乘客更加乐于接受有趣味和有个性化的创意广告,从而为地铁广告的风格定位明确了方向。趣味化风格应基于以现实性、真实性为原则的故事情节趣味,以及符合大众审美接受能力的审美趣味两个维度寻找灵感来源,通

过有意味的形式,创设幽默诙谐的感官心理效应,以此来强化受众的记忆效果。公益广告可以通过运用寓教于乐的形式传播正能量与城市文化。个性化风格运用思辨性、时尚性或超时空性的设计语言,以契合年轻人追求与众不同与展现自我的心智特点,借助自媒体碎片化传播的优势,助力网红打卡地铁线路与网红打卡地铁站的打造。

### 结语

数字化时代,广告媒介愈趋呈现出多元化激烈竞争的格局,作为一类小众空间广告,目前国内学术界与业界对于地铁广告的关注度十分有限。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以及三孩政策的全面实施,未来开通地铁的城市预期将持续增多,如继续任由外国资本在该领域内野蛮扩张,势必将对我国广告产业的健全发展造成难以逆转的负面影响。

本文所制定的地铁广告传播策略综合体系中的五个分支架构既相对独立,又有机统一。在进行具体的设计策划活动时,应运用多种定位策略进行编码组合,以实现优势互补。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如果从传播策略以外进行叩源推委,经营策略与管理水平的成熟度不足,由此导致广告资源分配不科学、广告信息维护更新不及时等问题较为普遍,是制约我国地铁广告良性发展的另一项“卡脖子问题”。本土广告公司必须树立产业使命感与危机意识,不断壮大自身,积极开拓地铁广告业务,努力争夺地铁传媒的话语权。

### 参考文献:

- [1] [美]克劳德·霍普金斯. 顶尖文案:现代广告之父的文案写作技巧[M]. 张小默,译.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96-99.
- [2] [美]大卫·奥格威. 奥格威谈广告[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88-103.
- [3] [日]水野广和,阿岛国雄,小柳武一. A study on outdoor advertisement of the sight from the railway[J].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REVIEW,2017:13-19.
- [4] [英] Darrel D. Muehling, Jeffrey J. Stoltman, Sanjay Mishra.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gnitive Antecedents of Attitude-Toward-The-Ad[J]. Current issue & research in Advertising, 2019:41-51.
- [5] 张凤乔. 透过广州和巴黎地铁广告看中美社会与文化[D]. 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8.
- [6] 李一凡. 当前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广告的场景营销探析[D]. 沈阳:辽宁大学,2019.

(下转第65页)

# 亲爱有差等 仁爱归一体

## ——关于儒家“爱有差等”观点的一个批判性审视

段方乐

(德州学院 法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一些论者把“爱有差等”看作儒家仁爱思想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认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的血亲宗族构成的“差序社会”,血缘的亲疏远近,导致人与人之间“爱的差等”。不过,这种爱主要是一种以血缘的自然情感为尺度的“血亲之爱”,它不自觉地遮蔽了儒家仁爱范畴更高层次普遍性的内涵,更与儒家“内圣外王”“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相抵牾。实际上,儒学的仁爱思想存在着感性之情和理性之爱两个维度,其真正内涵是“亲爱有差等”而“仁爱归一体”。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语境中,澄清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儒家;仁爱;爱有差等;仁爱归一体

**中图分类号:** B2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2)05-0055-04

“爱有差等”的观点被当成儒家仁爱思想的基本内容,一度成为学术界很多人的共识。有的学者说:“儒家主张爱有差等,以对亲人的爱为出发点向外推向对他人的爱,最后推向对天地万物的爱。在向外推的过程中,爱的分量在逐步减少。”<sup>[1]</sup>显然,如果简单地以此为据,人们很容易把“爱有差等”当做漫长封建社会甚至今天的“不平等社会关系”的直接思想源头。鉴于这一学术问题关系到孔孟仁爱范畴的本质问题,甚至关系到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继承性问题,对此观点进行一个批判性研究,就显得颇为迫切。

### 一、中国传统社会关系下“亲爱有差等”的客观现实性

#### (一)“仁爱”出于“亲爱”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道德情感也是社会意识,必然受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制约。在中国历史上自然经济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条件下,传统居住环境通常是以家庭——家族为主的相对封闭的村落。任何一个人的出生和成长,首先离不开自己的家庭,而所有情感的原始发生也不可能不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情。这也是“亲”字(繁体字为“親”)造字的原初含义。从家庭、家族到宗族或邻里,然后接触外村人、外乡人或陌生人,这是千百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从童年时代

开始进行社会化的必经之路。费孝通先生说:“我们社会中最重要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人物。”<sup>[2]</sup>中国的儒家伦理及其道德感情的教化也正好与一个人的成长经历过程紧密吻合。因此,就逻辑出发点来看,儒家的仁爱是以亲情之爱为原点的。这也正是儒家提出“亲亲”这个概念的缘由。“亲亲”指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亲情之爱,对家庭以外,尤其是因客观条件限制不能接触的人,一开始不可能有这种感情。这样一来,别人相对于父母和家庭成员,亲情之爱的分配客观上就有了区别或差等,爱自己的父母自然会甚于爱别人的父母。所以,仁爱,就先秦儒家阐述的在一个人身上的逻辑发生方式看,的确内在地包含着“差等”的特点,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差等”主要是感性的血缘之亲或外推的地缘之亲,不是理性的最高层次的“仁爱”。

#### (二)“仁爱”不限于“亲爱”

许多论者,甚至包括个别思想大家都把“爱有差等”思想追溯到孟子,认为在孟子那里能够找到具体的根据。如《孟子·滕文公上》中有这么一段: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

收稿日期: 2022-04-24

作者简介: 段方乐(1969—),男,山东齐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研究。

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夷子属于墨家，主张“兼爱”，人与人之间无差别的爱。夷子说：“儒家的学说认为，古人‘爱护百姓就像爱护婴儿’，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就是，爱没有亲疏厚薄的区别，只不过施行起来是从父母亲开始的。”夷子是想说，儒家和墨家根本上是一样的。徐子把这些话转告孟子。孟子说：“夷子真的以为一个人爱自己的兄弟的儿子同他爱邻居家的儿子是一样的吗？那是有取舍选择的。婴儿在地上爬，快要掉到井里去了，那不是婴儿的罪过（老百姓犯了错误，也不是他的罪过）。人是由父母所生，这是上天所指定的人的唯一根源；而墨家主张爱无差等，把父母和陌路人等同起来了”。看来，孟子确实不买夷子的账，不认可墨家主张的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兼爱”观点。孟子为了让人能理解对别人的爱（执政者对百姓的责任），用“若保赤子”举出婴儿掉到井里的例子，只是来打个比方而已，并“不是说爱没有亲疏厚薄之别”。“爱”肯定是有亲疏不同的。显然，仅仅从这里的文字表述看，孟子主张的是“爱有差等”。赞同论者寻找根据好像是找对了地方。问题在于，站在今天道德认识论的角度，孟子语境中的“爱”，到底是一个什么范畴？有几个维度。墨家夷子说的“爱无差别”之“爱”和孟子说的“爱有差等”之“爱”，内涵和外延可否相提并论？孔子和孟子讲道德规范与道德情感的时候，表面上都是从家庭关系的亲情出发的。可是，如果我们从认识发展的层次来分析，“爱”与“亲”或“仁爱”与“亲爱”的层次是有差异的。孟子以打比方的方式，说明统治者对老百姓像家长对自己孩子一样，也是负有责任的，但又不等于墨子一派的“兼爱”。显然，孟子心目中暗示着不同的“爱”也有某种“类似性”。我们知道，超越血缘亲情的“爱”是一种倾向于普遍性的概念存在，而亲情感情更倾向于差异性的感性存在。用“亲爱有差等”的具体体验来否定墨家“爱无差别”的“兼爱”观点，非常有利于孟子的立场。但我们不能说孟子的爱就没有普遍性的层次和内涵，即他强调“爱的差等”一面，并不意味着就否定了爱的统一性的一面，否则就没有必要打比方。我们甚至可以假定孟子是在故意偷换概念，似乎用具体个体的“爱的方式”即亲近方式的不同表现（这些方式也可以提升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种种差异性的道德规范和情感）来

反对墨家的“兼爱”。等到孟子把“爱”进行扩充，要达到“仁民”的高度时，这样的“爱”就超越了感性认识的层次，达到“一体之仁”<sup>[3]</sup>的爱了。这才符合孟子道德认知的辩证逻辑，和孔子的仁爱逻辑的归宿是一致的。

## 二、儒家伦理“仁爱归一体”的逻辑归宿

### （一）“仁爱”具有普遍性

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对待别人的父母和对待自己的父母，在亲情上不可能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作为感性情感范畴的“亲近之情”，是“爱”的具体表达。这种还没有达到高度抽象概括的感情可以有差别。而“仁爱”主要属于理性情感的范畴，就像对阶级感情、阶级之爱的领会一样，必须经过理性的启发。人的出生环境和交往范围都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一个人从亲情上可能只是自发地局限于家庭成员，从友情上可能只是局限于朋友，从乡情上可能只是局限于家乡人。在没有交往的情况下，对陌生人无法拿出真情实感去嘘寒问暖，也是人之常情。社会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情况下往往被这种天然化自然化情绪化感情所支配。其实，这种亲疏远近是一种客观事实。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可是，当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时候，他并没有强调说这种“推己及人”是不适合于陌生人的；相反，这种“推广”适合于所有人，适合于天下人。由此看来，孟子批驳墨家，只不过是拿人们最熟悉的“亲情差异”的具体体验作为一个例子，去完成对墨家“兼爱”的否定，仅仅是一个权宜之计罢了。这也是孟子许多时候阐发自己观点的手段。和孔子一样，孟子也常常用这种比喻或类比的方法来说明儒家对天下人的“仁爱”情怀。“推己及人”就是一个情感泛化普遍化的理性行为，使“仁爱”达到一个理性化的思维层次。所以，仅仅从孟子对夷子的批驳或偶尔对“仁爱”充满矛盾的字面表述，就得出“爱有差等”是孟子或全部儒家仁爱思想的根本含义的观点，恐怕是以偏概全。

### （二）“仁爱”的普遍性归于“一体之仁”

从孔孟到董仲舒，再到宋明理学，“仁爱”伦理“一体之仁”的本体基石是贯彻始终的。在儒家道德形上体系里，“仁爱”主要表现为理性道德范畴。董仲舒说：“《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sup>[4]</sup>朱熹理学更是把“仁爱”高度理性化，“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循

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sup>[5]</sup>所以，如果不对感性之亲加以升华，就不容易理解它在道德认知上的思维高度。如果一个人道德感性的认识达不到道德理性，其“爱”就只能算是心理学中的“情结”或文学中的“情愫”。在道德认知上，这个人对他人的苦难就有可能无法体认。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亲人的感情往往是指情结在现实生活中的自然流露，所以，这种对亲人的“亲爱”之情可以只是无理性自然感性的表现，甚至可以是一种本能，即可以不是自觉的道德行为。其实，孟子对“爱”的各个维度是有全面的认识的。他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sup>[6]</sup>意思是讲：君子对于万物，爱惜它，但谈不上仁爱；对于百姓，仁爱，但谈不上亲爱，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这段话正是孟子对“亲爱有差等”和“仁爱归一体”最贴切的论述。孔孟儒学道德认知的起点，从孝悌之本的亲情开始，慢慢通过一种超越感性认识的抽象化理性化，通过“恕”的智识，自觉地“推己及人”“扩充自我”。在理性自觉上，“爱人”成为出于道德理念的自觉行为。这样，在主观意识上，将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统一在一起。仁人志士“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学圣贤设身处地考虑自己的何种行为将会保护他人的利益并为之积极奋斗，而侵犯他人利益的事情要努力避免。所以，一个人爱人，必是动用了高尚的道德情操，或者说是仁的自觉的显现。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点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德境界，再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政治追求，从而完成了儒家从家庭伦理到社会政治伦理的逻辑推演。

所以说，儒家的仁爱思想的叙述尽管是从血缘之“亲爱”出发的，但广而言之，是要走向跨血缘之爱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重庆先生认为：“‘差等之爱’是指‘差’在时序先后而非‘差’在程度多寡。”<sup>[7]</sup>此观点应该是基本符合儒家“仁爱”的本来含义的。从概念的抽象程度看，最高层次的爱应该能够涵盖较低层次的爱，“仁爱”比“亲爱”更抽象，就更全面地体现出儒家仁爱思想的“一体之仁”，也可以说各个层次的“爱”都归于作为孔子本体论范畴的“仁”。无论是血缘近的还是远的，无论是具有血缘的还是无血缘的，在“仁”的原则上，别无二致。这个原则的心理反映就是孔子强调的“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孟子那里就是“恻隐”。因此，孟子所谓的“爱有差等”，可以理解为“亲爱有差等”，更可以理解为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爱”的表达方式的

不同。但根本的意蕴总是要归结到“一体之仁”，也可以说成“爱归一仁”。这种爱就和孔子“泛爱众”之爱，普遍的人类之爱统一起来，也和孟子多次涉及的超越亲疏、更讲道义原则或正义原则的“浩然正气”公平公正之爱统一起来。出于“恕”或“恻隐”的社会规则就是一视同仁。针对不讲道义、不顾正义的人，不论亲疏，都要进行劝诫和惩罚；对坚持正义和道义的人都要进行褒扬。从这里看，儒家的仁爱既有高低层次之别，更有贯通于其中的“一视同仁”。爱亲人是爱，但是属于爱的低层次；爱众人是爱，是爱的较高层次；爱国家社会，甚至爱人类共同体，层次越来越高。归根结底，它们都可以归结为儒学伦理的本体——“一体之仁”。如此来讲仁爱，它是抽象性普遍性的爱，但在表现上又有具体性差异性。亲情有远近，但仁爱无厚薄。所有层次的爱的逻辑底色是“一体之仁”。总之，儒家“仁爱”的优秀传统道德思想既有“亲爱有差等”的层次，又有“仁爱归一体”或“爱归一仁”的层次。

### 三、儒家普遍性的“仁爱”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原则

(一)“天下为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向以“仁爱”为道德源头的“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作为中国传统优秀政治道德资源，越来越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引领。既然儒学思想中的“仁爱”不仅是一种源自家庭的感性亲情，更是超越家庭，推及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和自然界的普遍的理性道德之爱，那么，这种由里及外、由小及大的“仁爱”就是一种适合于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等诸多关系的道德准则。习近平说：“当今世界，各国人民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市场、资金、资源、信息、人才等都是高度全球化的。只有世界发展，各国才能发展；只有各国发展，世界才能发展”<sup>[8]</sup>。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也把中国儒家优秀传统的“仁爱”价值观当成同世界人民合作共赢建设美好世界的道德原则。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慈悲为怀、仁爱天下、爱好和平的民族，追求本国本民族利益的同时，一向兼顾他国利益。我们谋求本国的发展，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我们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我们与各国人民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了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二)“和为贵”是解决国际争端最具建设性的理念

新世纪以来，世界局势依然动荡不稳，地区冲突、文明冲突、环境污染、新冠肺炎等全球共同问题

仍然层出不穷。虚伪的西方“普世价值观”强调西方中心主义,忽视文明的多样性、多元性和共存性。它不能求同存异,不适应新时代各国发展的需要。在以儒家“仁爱”为基础的“和为贵”理念指导下,我们始终认为,对抗、冷战和战争只能是解决国际纠纷的极端手段,使用这些手段既不符合世界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也无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引发纷争的矛盾,还会造成财产和生命的巨大损失。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国际会议上强调,不同国家和地区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整个世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冷战思维零和思维必须摒弃,不能损人利己、只追求你输我赢。只有各国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

### (三)“一带一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我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为世界大家庭注入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实现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中国倡议和推动“一带一路”,就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具体实践。我们敞开胸怀欢迎各国搭乘中国“经济快车”,共享发展机遇,以实际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总之,我们之所以能够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美好蓝图并把它付诸实践,其思想之根就在于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的“天下为公”的“仁爱”情怀,其现实依据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新时代,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追求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的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得到世界人民的拥护。

### 参考文献:

- [1] 王涛. 论爱有差等与爱无差等[J]. 吕梁学院学报, 2014, 4(05): 63-65.
-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33-34.
- [3] 王阳明. 传习录全集[M]. 王先华, 译注.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 98.
- [4] 董仲舒. 春秋繁露[M]. 叶平, 注释.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 87.
- [5]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88.
- [6] 孟子. 孟子·尽心上[M].
- [7] 张恒. 吴重庆: 儒家的爱有差等吗[J]. 当代贵州, 2019(16): 74-75.
- [8] 习近平. 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 并肩实现地区繁荣稳定——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OL/R]. 新华网. 2014-11-17.

## Kindred Love is Different Benevolence is Attributed to Oneness ——A Critique Perspective on Confucianism “Love Distinctions”

DUAN Fang-le

(Law Department,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Some people hold that “Love Distinctions” is the main point of Confucianism Benevolence. The idea is that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s years Chinese is a “Differential Sequence Society” consisted of the blood clan regarding family as a center. The situation has caused “Love Distinctions”. However, this kind of love is mainly a natural love of the blood relation. It covers the inner university of Confucianism Benevolence unconsciously. It is not agree with Confucianism political ideal of “Inner Sageliness and Outer Kingliness” and “the whole world is for all”. In fact, Confucianism Benevolence has two dimensions: sensitive emotion and reasonable love, that is to say, its true intention includes “kindred love is different” and “benevolence is attributed to oneness”. 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to clarify this question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Confucianism; benevolence; love distinctions; generalized benevolence

# 《神圣家族》对群众史观的历史性建构

仇美荣<sup>1</sup>, 高原<sup>2</sup>

(1.宁夏警官职业学院, 银川 250021; 2.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 银川 750001)

**摘要:**《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群众史观的原初文献, 从中我们可以管窥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原理和观点雏形。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直接确认了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创造性地把费尔巴哈关于“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的人”的观点应用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社会生活中去。“现实的个体的人”集成“群众”充当历史主体, 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实践过程中创造历史。无产阶级因其被剥削的彻底性, 成为了群众中最坚定的革命力量, 充当了革命的领路人。

**关键词:**《神圣家族》;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 历史性建构

**中图分类号:** B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2)05-0059-07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 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 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 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sup>[1]241</sup>在《神圣家族》中, 马克思恩格斯借助对青年黑格尔派英雄史观的批判密集性地输出了群众史观的原理和观点雏形, 第一次集中阐述了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 一、“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sup>[2]287</sup>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直接确认了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神圣家族》时期的马克思尚未形成自己的成熟理论体系, 此时他仍然要借助费尔巴哈理论去批判和突破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批判过程中有破有立, 破的是“批判的批判”的思辨谬论, 立的是自己新观点的雏形。马克思第一次将费尔巴哈的“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的人”的观点引入人的社会生活。个人是群体和人类存在的前提, 没有具体的个人, 人类和群体都将陷入虚无。因此, 构建群众史观, 首先要对个体的人进行考察。

### (一)“现实的个体的人”

经考察, 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个体的人”应当具备这样三个层次: 首先, 这个“人”区别于包括黑格

尔、神圣家族、费尔巴哈在内的以往一切理论或只强调物质、或只强调意识的“抽象人”, 它是现实的、自然与精神统一的人。其次, 这个“人”具有实践性, 自然与精神是在人的实践中才获得了统一, 实践成就了真实的、现实的人。最后, 这个“人”具有社会性, 人在印证自己现实性的实践中同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

1.“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唯物主义的思维路径是从经验和现象出发, 从个别抽象出一般。因此, 对“人”这个类的特征考察必须从现实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个体入手。《神圣家族》开宗明义, 指出思辨唯心主义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其“用‘自我意识’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sup>[2]253</sup>。鲍威尔们将人的真实存在抽象化, 人不再是现实的人, 而是自我意识主宰的人, 人与抽象的自我意识划上了等号。在历史观上, 他们把人抽象成某种历史范畴, 把人看作是历史用以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要打破对人的思辨抽象, 使人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人, 使自我意识成为人的自我意识, 就必须对现实的人以及人的现实的历史发展进行深入考察和科学揭示。在《神圣家族》中, 马克思分析了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二人对黑格尔体系两个要素的片面发展, 得出结论: 他们两人虽然都批判黑格尔, 但实则并未超出黑格尔体系, 都只是将其中一个要素进行了片面的阐释、彻底的发挥。而真正克服了黑格

收稿日期: 2022-03-29

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2020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访谈式教学法在思政课教学改革中的创新研究”(20JDSZK111)。

作者简介: 仇美荣(1989-), 女, 江苏滨海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尔体系的,只有费尔巴哈。站在费尔巴哈的肩膀上,马克思清晰地看到了破除宗教和思辨哲学迷信的方法,就是把历史主体的地位重新拉还给“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因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sup>[2]295</sup>

仔细研读《神圣家族》文本,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开始减少一般性地使用“群众”和“个人”,同时频繁地使用“工人”和“资本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更多带有身份特点的名词来说明现实社会中的现实的人了,同时用对平等原则下资产阶级的极端富有和无产阶级的极端贫穷的描述来展现现实的人的真实生活状态。马克思强调“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是真实地生活在客观世界中并受其制约的人,并且人与人之间相互区别,这种区别不仅存在于个人的能力、禀赋之中,还与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息息相关。18世纪的人与古典古代共同体的人不同,源于18世纪与古典古代完全不同的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不是“批判”笔下带有群众性特征的毫无差别的人,而是真实地存在在社会中共同承担和体验社会甘苦的人类一员,有一切的“人间激情”,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英雄和领袖也不是神,他们与普通群众一样,有血有肉、有悲有喜、有思想有行动。

2.“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现实的个体的人”不是抽象的“类”和“种”,而是现实地“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论证过:现实的人就是积极主动地改造客观对象世界的人。实践活动至少得包含两个基本因素,即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其中,实践活动的主体即人,人必须具有能动性,也就是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实践活动的客体即黑格尔的自然。从这也可看出,旧哲学未能形成科学的实践观的原因,就在于旧唯物主义的自然排斥了人,而唯心主义的精神又排斥了自然。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然与精神以人为基点结合起来,精神和自然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了结合,最终得以成就“现实的人”。

在《手稿》时期,马克思已经不再将实践只当作理论的批判活动,但是仍然使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类费尔巴哈式术语来表述人的实践活动。而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非常明显地进行了话语转变,类本质之类的话语偶有出现,逐步以“物质生产”、“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这些具体的表述来代替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类抽象术语。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出发,将“实践”理解为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的确证方式。人通过实践活动改造世

界、创造历史。鲍威尔们妄图用思想解放代替现实的人的解放,而现实却是如果不通过“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来实现思想,思想便毫无用武之地,这个世界也会一成不变照旧运转。

人类生存的首要工作是创造物质生活,人们在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中确认自身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的个体的人”是现实地、能动地以种种形式进行实践活动,实现改造世界目的的人。人因为能够进行劳动实践而成其为人,并且,人只有在劳动实践中才能完成自身发展和自我实现。因此,在谈论历史和研究历史活动时,我们必须依靠实践。

3.“同别人发生联系的独立的人”。“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必然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联系的独立的人。”<sup>[2]312-313</sup>

首先,“市民社会的成员决不是原子。”<sup>[2]321</sup>原子,意味着自满自足、没有需要、绝对充实,同任何东西都毫无关系、毫无指涉,但人显然不是。“独立的人”不等于原子个人,“独立”是指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与其他人相区别,每个人都与他人不完全相同。这种“独立”是共性下的个性,是以相互联系为前提的区别。“现实的个体的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而是生活于现实的实物世界中与别人发生种种联系的人,是被各种社会关系包裹着的人。他的所有行为都无法规避地与周围的人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如出生时与父母的血缘关系、工作时与周围人的同事关系等,他不可能是原子个人,封闭、孤立。这就是被绝对批判鄙弃的“人的关系的现实丰富性”<sup>[2]294</sup>。

其次,“现实的个体的人”是以需要为基础产生利益关系的人。马克思认为“利益”是一个社会关系范畴,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无意识的自然必要性”的纽带。人有需要、有需求是利益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他的每一种生命欲望都会成为一种需要”<sup>[2]322</sup>。

“需要”是要求得到满足和实现的,因此每个个体都必须为满足种种需要而建立起与周围人、事、物的利益关系,而每个个体本身也同样成为了他人满足自身需要、实现自身利益的一环。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人与人之间最基础的物质生产关系。“对象作为为了人的存在,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了他人的定在,是他同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同人的社会关系。”<sup>[2]268</sup>此处的“对象”早期被翻译成“实物”。此时,马克思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劳动产品背后的生产实践,并将之视为社会关系产生的基础,这种转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十分关键。马克思强调,不同的经济状况

和工业条件下进行的物质生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关系。费尔巴哈也讲人与人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但是他认为这种相互依赖和相互需要不是因为利益需要,而是由抽象的人类本质决定的。而马克思揭示的人的相互需要特别指向人的社会性,揭示了人的本质,人是以需要、利益为目的从事现实生产实践的人,人存在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并受这些关系制约、为这些关系所决定。

(二)“现实的个体的人”集合成“群众”充当历史主体

“现实的人类活动无非是由人的个体构成的群众的活动。”<sup>[2]292</sup>前文已经揭示人的社会性,我们无法找出一个不沾染任何社会关系的原子个人,因此,“不应当根据单个个人的力量,而应当根据社会的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的力量。”<sup>[2]335</sup>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必须也只能被理解为群众,因为没有办法将历史肢解拆分开来,从而具体到每一个个体如何创造历史。《神圣家族》中的“群众”概念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阐释:

第一层含义,是指作为精神的敌人的“群众”。这是鲍威尔们设定为精神的对立面那种“群众”。绝对批判排斥任何实体,任何实体性的存在都是精神的威胁和阻碍。群众作为实体的代表,阻碍了精神构建历史的活动,必然为绝对批判所蔑视和摒弃。在鲍威尔及其伙伴那里,群众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抽象范畴,它作为精神的对立面——“物质”而存在,是绝对批判为了实现精神的狂欢而捏造出的敌视进步的“人格化的对头”。群众集合了一切消极的、精神空虚的、懒惰肤浅自满的品质,是“这些品质的虚幻的人格化”<sup>[2]291</sup>。在绝对批判的世界观里,精神与物质天然对立、绝对对立。投射到历史观领域,就是作为精神的化身的少数杰出个人与物质的消极群众相对立。但是绝对批判的群众并不同于现实的群众,它只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抽象的固定的不变的概念、范畴,是为了圆满绝对批判的唯心史观而存在的。

第二层含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概念。仔细研读文本,可以发现《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的“群众”指的是全体人。马克思在揭露绝对批判对历史活动失败的不恰当归因时,曾明确指出,以往革命活动之所以失败,根本上是源于那些革命所代表的群众的有限性和不完全性,它们只考虑了有限的群众,也即少数人的利益诉求。比如以全体人名义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实则只考虑了资产阶级私利而枉顾其他绝大多数群众的现实利益诉求,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失败。从这一点可以推断,马克思恩格斯的广义“群众”,应是

包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

但是,社会历史分析的前提,是要将一般人民群众与统治阶级区分开来。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概念是历史的、具体的,它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sup>[2]287</sup>。显然,这里的“群众”不是指全体人,因之如若代表全体人,其便不存在扩大的空间和可能。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它是指“人数众多的、与资产阶级不同的那部分群众”<sup>[2]287</sup>。在《神圣家族》阶段,资产阶级尚未也不可能意识到自己也是私有制条件下人自我异化的表现,因为他们是私有财产运动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甚至将这种异化状态视为自己对社会的有效控制。所以,他们享受并极力维持这种状态。而无产阶级的异化状态则站在了资产阶级的极端反面,他们一无所有。无产阶级在这种极度贫困状况下必然产生破坏和消灭私有制、私有财产的强大动力。因此,这里的“群众”概念显然不包含资产阶级群众,而更多是从革命动力意义上界定“群众”的内涵,其构成主要包括无产阶级。而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和群众意识的觉醒,革命的需要体现为越来越多群众的共同需要,群众队伍会继续扩大,一些“正处在转变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的阶级或阶层也会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

因此,本篇文章里的“群众”指代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狭义“群众”。他们是进行社会生产实践的广大劳动群众,在数量上占人口的大多数,在经济和政治状况上处于社会底层、绝大多数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在范围上囊括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他们不仅不是历史进步的阻碍,反而是历史车轮的推动力,是历史的创造者。

## 二、利益是群众创造历史的内生动力

“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得到确认后,首先需要重新定义“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即群众在满足自身需要和目的的实践中创造历史。其次是厘清历史中精神与群众的关系。思想理论只有符合群众的需要和利益诉求才能真正凝聚起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力,使自身转化为现实。

(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通过考察“现实的个体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对“人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的还原,实现了对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回归,为历史寻回了主体。绝对批判把现实的人从历史中排除,将自我意识供上高台,到处贩卖着思辨的高明,颠倒现实的人与真实的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绝对批判宣扬“人为了历史能

存在而存在”<sup>[2]284</sup>。这样，历史就具有形而上学的主体性，真正的人成为了形而上学主体的体现。在历史活动中，群众的活动和活跃的群众无足轻重，重要的只是一种思想。而群众只有在绝对批判需要他们为失败的历史活动背负责任时才与历史发生关系。绝对批判到处只看到进步的精神，看不到思想着和活动着的现实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着力把被绝对批判颠倒了的人群与历史的关系矫正过来，严正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sup>[2]295</sup>。首先，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人的活动的历史。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是人，是人民群众决定历史的任务和内容。当然，这绝不是宣扬历史目的论。在历史进程中，从来都不存在什么预先设定的目的。其次，人民群众进行历史活动是有其内生动力的。群众史观的构建基础是现实的个体的人，这些市民社会个体并不是青年黑格尔派宣称的利己主义原子，而是具有生命欲望和需要的、作为感性现实存在的人。人与生俱来就是社会性的，因此尽管人们起初总是出于满足自身的需要和要求的去改造外部世界，但结果必须是每个人的目的和动力以及他们展现出的真正力量形成巨大的协同作用，这种合力最终决定了历史的方向和进程。不可否认，杰出人物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杰出人物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必须要有能够让其发挥其才能的社会条件。因为杰出人物本身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他仍然是从广大人民群众中以加速历史进程为目的的积极活动中脱颖而出的。因此，究其根本，满足自身的欲望和需要是人民群众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等社会实践的内生动力以及目的，历史就是在人民群众的这种满足自身需要和目的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

(二)“‘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那么人民群众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满足自身的“利益”。利益是人类行为的驱动力，人类的一切行为始于利益、终于利益。霍尔巴赫说：“促使我们去爱或去恨某些东西的……始终都是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利益。”<sup>[2]337</sup>人的善恶并非与生俱来，它取决于共同利益将人们团结起来还是分离开来。物质利益是市民社会的联系纽带，利益是个体集成群众去共同行动的最牢靠粘合剂。无数史实也已向世人证明了利益的强大力量，它曾“胜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主义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sup>[2]287</sup>

但是，批判哲学家们显然没能认识到物质利益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在历史观领域始终将

精神与群众对立，认为历史活动中唯一重要的只是思想，如若思想未能保证革命活动的成功则是因为这种思想为了博得群众的喝彩、赢得群众的青睐，而满足和屈从于对自己的肤浅的理解。在对革命活动成败原因的认识上，绝对批判把历史上所有革命活动的失败原因都扣在了群众头上。显然，马克思远比批判哲学家们来得深刻。他不仅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动力，还看到了隐藏于革命活动背后、真正决定革命成败的内容，即思想与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sup>[2]286</sup>一场革命能否成功，根本上取决于它是否真正体现人数众多的、那部分群众的真正利益，取决于革命目标是否符合群众的共同期待。

当然，这个利益不是私人利益，而是组成社会的群众的普遍利益。这种普遍利益，当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叠加，但它与个人的特殊利益并不冲突。马克思在对洛克、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有关共同利益与道德原则的思想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后，得出结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原则，那就必须使人们的私人利益符合于人类的利益。”<sup>[2]335</sup>人是社会的人，每一个个人要实现自身的利益必须创造道德原则以保障社会的良性运作，而道德原则是必须具备普适性的，因而它所争取的必须是组成社会的群众的共同利益或普遍利益。但是，“任何在历史上能够实现的群众性的‘利益’，在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在‘思想’或‘观念’中都会远远超出自己的现实界限，而同一一般的人的利益混淆起来。”<sup>[2]286</sup>比如，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为了吸引更多的革命力量进入其队伍中来，资产阶级把自己的阶级私利同全人类的利益混同，刻意制造了共同利益的假象，让群众以为这场革命是为了实现人们的共同利益，诱导他们加入革命队伍。然而，虚假形象总有被戳穿之时，随着革命的开展，群众逐渐意识到自己被蒙蔽了，他们以为的共同利益实际是资产阶级私利。认识到真实的革命目的后，群众的参与度和热情度锐减，慢慢变得被动和消极，最终必然退出革命队伍。因此，革命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这场革命追求的是否是真正的、群众的普遍利益。

马克思强调思想的实现离不开对利益的关注和满足，实则是为了驳斥鲍威尔等人“哲学是超实践的”这一唯心主义观点。思想不能脱离群众的利益，那它在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其实，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就已经论证了哲学与群众的关系，“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sup>[3]19</sup>这一观点在

《神圣家族》中变得更加通俗易懂起来,“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sup>[2]320</sup>任何一种思想理念,如若不能符合群众的需要和利益,它就不会为群众所掌握,自然难以得到实现和普及,其最终只能陷入空洞之中。理论要为群众服务,思想要得到实现和转化就必须始终从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出发,必须要与“物质的、实际的变革”“实实在在的实践”结合起来。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只有在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才能获得价值和灵魂。

### 三、社会革命是群众创造历史的现实途径

群众的利益需要与现状之间是有差距的,仅靠符合群众需要的思想理论是无法弥合这个差距的,最根本的也是唯一的途径就是“物质的、实际的变革”,即社会革命。群众在社会革命中以思想为指引实现自己的目的和需要,这条革命道路的最终指向是实现“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 (一)“实实在在的实践”:社会革命

马克思主义从不否认思想的作用、理论批判的价值,“但是,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那是不够的。”<sup>[2]288</sup>人的解放是一个现实的活动过程,思想和精神的解放只是其中一部分,最终仍必须通过体现群众现实利益的社会革命来完成。

绝对批判披着革命的外衣,装出一副俨然要批倒一切的革命架势,但自我意识哲学实则是蔑视群众、敌视革命实践活动的理论。他们把一切对象、一切实体、一切现实的社会关系都抽象成为观念、范畴,认为只要在思想上扬弃了这些观念和范畴就实现了对现实的改造。青年黑格尔派始终在玩弄概念和范畴,他们一味崇尚理论批判,用精神的至尊至上性蛊惑人们:只要摆脱思想枷锁,贫穷困苦的生存状况就能得到改善,就能摆脱政治制度的束缚获得解放。他们崇尚这种纯粹的思想斗争,并私以为这就是“革命”。他们企图通过精神的、批判的思辨形式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然而事实却是,“精神的一切进步到现在为止都是损害人类群众的进步,群众陷入了日益严重的非人境遇。”<sup>[2]290</sup>可见,单纯的思想批判并不能使人获得实际解放。

“群众的这些实际的自我外化以外在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所以群众必须同时以外在的方式同它们进行斗争。”<sup>[2]288</sup>鲍威尔们在批判法国社会主义时,采用了他们惯用的偷换概念的手法,将《和平民主日报》所鼓吹的那种掺了水的傅立叶主义当作法国人的“社会理论”的全部来批判,认为“他们的社会幻想、他们的和平的民主还远没有摆脱旧秩序的前

提”<sup>[2]354</sup>。而事实却是,“人民拥护共产主义,不过分裂为许多不同的派别。”<sup>[2]354</sup>绝对批判谈论的傅立叶主义,只是部分主张博爱主义的资产阶级人士所坚持的社会学说,它并不是法国人多秉持的主流社会理论。被绝对批判判定已然日薄西山的“真正的运动和对这些各不相同的社会倾向的改造”<sup>[2]354</sup>,实则方兴未艾,并且正在实实在在的实践中逐步转变为现实。在阶级社会里,这种实践就是社会革命。

#### (二)革命前途:“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按照恩格斯的主张,历史是具有目的性的人的活动。任何历史时期,满足自身需求是人民群众开展实践活动的唯一目的。利益的实现和满足是他们创造历史的唯一动力,这种动力极其强大,强大到足以推动历史的车轮前进。革命是阶级社会里群众实现自身利益的主要形式,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也早已在其生存现状和历史使命中显现出来了。

前文我们已经分析了无产阶级的“非人的生存现实”,他们退无可退,唯有奋起反抗。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需要就是要改变自身贫困到无以复加的生存状态,消灭私有制这一异化的根源,将人从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无产阶级社会最底层、毫无政治经济地位的处境,导致了其必然是所有阶级中最公正、最无私的阶级。这种大公无私性,使得无产阶级天然地具备了代表全人类利益的立场。它是一切被压迫阶级的代言人,它的解放意味着全人类的解放。其次,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具有泛国家化的特点,这种剥削和压迫的国际性导致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在整个人类意义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解放才是彻底的、保险的、牢靠的。因为在国际资本主义包围圈里的零星胜利随时有被破坏和颠覆的可能和风险,并且只要资本主义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们就必然不会放弃任何复辟的希望和尝试。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注定是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称之为“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群众的社会主义与批判的共产主义有着根本区别,后者在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母体中孕育产生,而后者则是构筑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批判的社会主义必然是不可能真正落地成为现实的,而群众的社会主义是实践的,是真正群众性的事业,它的理论指向必将通过群众的实践、真正的社会革命来达成。共产主义的实现途径是群众的革命实践,群众社会革命的目标前途是共产主义。

#### 四、无产阶级是群众中真正的革命依靠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社会时发现了这样一个现

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绝大多数从事着艰苦劳动的人并未换得自身的物质享受，而占人口少数的资本家们却能坐享其成、盆满钵满。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现象的不公正和不合理性，并呼吁通过革命实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人的完全解放。这里的革命指的是被压迫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那究竟应当由谁来开展革命的实践活动呢？

前文已经对狭义“群众”进行了分析，群众生活社会最底层，他们都有奋起反抗、进行革命的理由和动力。因此，群众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革命的力量。但是，群众的构成是历史的、具体的，且并不单一。这就导致这样一种状况：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及其影响的扩大化，“群众”中的不同构成会因为受到各种不同的影响而产生革命目标和方向的分化，有些人可能成为更加坚定的革命力量，而有些人则甚至有可能转成为反革命的力量。显然，革命进程的向前推动决不能仰仗那些摇摆不定的“群众”，必须在这个“群众”中找到真正革命的阶级，这个阶级的革命愿望最为强烈，革命决心最为坚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个阶级承受的剥削和压榨最为严重，哪个阶级就具备最为强烈的革命愿望和最坚定的革命信心，就能成为革命的坚定依靠力量。沿着这个思路，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无产阶级”。

在《导言》时期，马克思就已经将德国解放的希望寄予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被压迫到彻底，它“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sup>[3]115</sup>而到《神圣家族》时，他们二人已经从纯粹理论分析深入到经济社会现实领域，发现了人非人的异化根源在于私有财产，要想获得人的彻底解放，私有财产必须被瓦解。而资产阶级作为受益方，必将是这场瓦解运动的阻力。因此，私有财产走向瓦解的唯

一路径，只能是由被私有财产运动压迫和剥削最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非人化处境并奋起反抗、消灭这种非人化。无产阶级的现实生存状况极端窘迫，加上他们身上的贫困无法掩饰、不可抗拒，他们在严酷的劳动训练中锻炼了革命的意志、坚定了寻求解放的决心，产生出了对这种非人性状态的巨大愤慨，产生出了破坏和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强大动力。他们已然无路可退，只能奋起反抗，消灭这一切非人性生活条件的根源——私有制和私有财产。循着资本主义的剥削链条，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处于私有财产运动这根食物链上最底端的阶级——无产阶级。他们是群众中最具革命性的力量，最为坚定、最可依靠！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神圣家族》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而未给予足够的关注。直至近年来，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神圣家族》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启导，但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神圣家族》是否从根本上形成了唯物史观，而对其中蕴涵的群众史观的文本研究则相对冷寂。然而，纵观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形成过程，《神圣家族》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它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相关原理和观点雏形的首次集中亮相。于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确认了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开始关注“现实的个体的人”，关注群众的生产活动、生存条件、利益诉求和历史使命等等。《神圣家族》为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成熟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宝贵的基础，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完善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Mass History in The Holy Family

QIU Mei-rong<sup>1</sup>, GAO Yuan<sup>2</sup>

(1. Ningxia Police Vocational College, Yinchuan 750021, China;

2. Yinchuan Tanglai Hui Middle School, Yinchuan 7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Holy Family is the original document of Marx and Engels on the view of mass history, from which we observe the principle and view prototype of Marxist view of mass history. Marx and Engels directly confirmed the historical subject status of the masses in the Holy Family and creatively applied Feuerbach's

view of "realistic man based on nature" to the social life of real and living people. "Realistic individual people" integrate into "masses" to act as the historical subject and create history in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pursuing their own interests. Because of its thoroughness of exploitation, the proletariat has become the most firm revolutionary force among the masses and served as the leader of the revolution.

**Key words:** The Holy Family; Marxism historical view of the masses; historic construction

---

( 上接第54页 )

[7] 王璐璐. 地铁广告人性化设计的应用研究[D]. 青岛: 青岛大学, 2018.

[8] 刘晓岚. 我国地铁公共空间文化功能建构及优化研究[D].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9] 李燕. 地铁广告视觉延展设计研究[D]. 天津: 河北工业大学, 2018.

[10] 薛可, 陈俊, 余明阳. 整合营销传播学——移动互联网时代的IMC新论[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79.

## Research on Creative Strategies of Subway Advertisement Based on Audience Survey and Spatial Environment Analysis

QU Lu-lu

( College of Animation and Digital Art, Anhui Sanlian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

**Abstract:** The local media sector has long been in a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 areas of Metro advertising design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y, academic research level,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etc. As a result, even if the foreign enterprises with strong capital mainly rely on conven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still in China's subway advertising market share to achieve a brutal growth. The survey shows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mainstream group of subway passengers ha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youth, low income level and high consumption potential, the audience's preference for advertising shows the pattern of the common need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the different needs of different genders.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claustrophobic physical space environment, we should create a humanized audio-visual environment for the audience based on rational thinking.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results,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subway advertisement is formulated. The system structure consists of five parts: product positioning, launch positioning, media positioning, emotional positioning and style positioning, with a view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ocal subway advertising add brick and tile.

**Key words:** subway advertising; audience; spac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communication strategy

# 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推进路径研究

——以山东省德州市为例

李荣梅

(中共德州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 山东 德州 253015)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根本遵循。在实践中, 山东省德州市探索形成了村级治理“一部四会一网一社”机制和社区治理“一核多元”机制等较具普遍意义的典型经验。但同时, 也存在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不足及基层治理机制和具体制度欠缺或执行不力等较具普遍性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 基层治理应在以下方面进行路径完善: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建立健全体制机制, 补齐基层治理的制度短板; 加强组织领导, 提高基层政权治理能力; 充分调动群众及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 健全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机制。

**关键词:** 基层治理; 根本遵循; 实践考察; 完善进路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2)05-0066-05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基层的延伸, 是指在乡镇(街道)、村(社区)的管理范围内, 通过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自治, 并与各类社会主体合作运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向基层群众提供公共服务, 完成公共事务管理, 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以及化解矛盾的过程。<sup>[1]</sup>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及社会力量是基层治理的主要主体, 各主体的治理方式不尽相同, 基层治理主体和基层治理方式构成了基层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

## 一、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 就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内涵丰富、相互贯通、针对性强, 深刻阐述了“什么是基层治理、为什么要加强基层治理、怎样推进基层治理”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 (一)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心所在

注重基层,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鲜明特点。2014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 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

了, 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要深入调研治理体制问题, 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 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 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 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sup>[2]</sup>2020年8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再次强调: “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 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sup>[3]</sup>2020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再次指出: “只有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强、把基层政权巩固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才能稳固。‘十四五’时期, 要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上下更大功夫。”<sup>[4]</sup>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突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体现了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的战略思维, 树立了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

### (二) 基层治理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引领带动作用以及调节平衡作用。2015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 深入拓展区域化党建。”<sup>[5]</sup>2021年6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调: “社区治理得好不好, 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

收稿日期: 2022-02-21

基金项目: 山东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专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研究”。

作者简介: 李荣梅(1981-), 女, 山东禹城人, 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

员。”<sup>[12]</sup>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就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紧补齐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各种短板，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sup>[17]</sup>

### （三）基层治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根本政治立场。首先，基层社会治理是为了人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基层治理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从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sup>[18]</sup>，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sup>[9]</sup>，再到《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sup>[10]</sup>，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基层治理人民主体的强调。

### （四）基层治理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和方式

创新是长远发展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中突出强调创新。第一，创新基层治理体制。《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sup>[10]</sup>的基层治理体系，从而确保基层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第二，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的群众权益维护机制、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基层治理的投入保障机制、规范运行机制和队伍培养机制等，从而保证社会治理的常态化、长效化。第三，创新基层治理方式。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激发基层活力，提升社区能力”<sup>[5]</sup>，这是对多重治理的强调。此外，在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总书记反复强调要重视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在基层治理中的运用，《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也明确提出“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的“智治”要求，并作出了具体部署。<sup>[10]</sup>

### （五）基层治理要坚持全周期管理理念

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有经验，也有教

训，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着力完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sup>[11]</sup>全周期管理，即要求以系统集成的方式方法，建构基层治理完整链条，从源头到末梢，从常态到非常态，实现全流程、全要素管控，打造多主体、跨区域、差异化基层治理新格局。<sup>[12]</sup>第一，建构多主体参与、协同高效的基层治理体系。这里的多主体包括党委、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力量。这里的协同高效，强调的是基层各级组织、部门、机构和人员应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进行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应对作战。第二，实现基层常态化治理和非常态化治理动态衔接。《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在深入总结各地新冠肺炎疫情基层防控经验基础上，从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多个层面对“健全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机制”作出了明确部署。

## 二、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考察——基于对山东省德州市的调研

近年来，德州市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积极探索创新，在创新实践中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较具借鉴意义的典型经验，但同时也存在较具普遍性的问题和短板。

### （一）典型经验：基层治理的“德州探索”

1. 一个村级治理的有效机制：武城县的“一部四会一网一社”。一部四会一网一社，是指党支部领导、村民议事会协商决策、村民委员会执行、村民理事会协助、村民监事会监督、网格化管理、合作社促增收的“支部统领、主体分工”治理机制。这一机制从2017年开始探索实行，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加强了党对乡村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农村党支部把各类型的组织有效整合起来，统筹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抓发展，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得到有效加强。二是激发了治理活力。通过健全组织、搭建平台，配套议事决策、财务管理、村务监督、小微权力清单、合作社管理等一整套工作运行制度，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促进了群众自主议事、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形成了民事民议、民事民管、民事民办的治理机制。三是增进了民生福祉。践行共建共治共享，村庄和谐稳定，资源得到整合，产业得到发展，群众得到实惠，促进了富民强村。

2. 一个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机制：武城县的“一核多元”组织体系。2020年初，武城县开始探索实行“党支部领导、业委会监督、物业服务、共建单位帮包、网格员管理”的“一核多元”治理机制。其核心是建立健全小区党支部（包保单位负责组织在小区居住的所有党员到小区报到，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党支部委员会，支委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党支部书

记),然后协同建立“红色业委会”,再由业委会选聘物业企业和规范物业管理,从而实现社区治理的有效提升。这一机制运行已有两年,作用已经显现,不仅推动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了公职人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而且有效调动了小区业主参与治理的主体意识,改善了物业服务,有效提升了城市治理水平。

3.一个把小微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有效举措:宁津县的“清家底+权力清单+智慧村务”。“清家底+权力清单+智慧村务”,其核心是权力清单,清家底和智慧村务分别是它的“前伸”和“后延”,三个环节环环相扣,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权力清单”,即科学制定并向社区(村)干部群众大力宣传小微权力清单。“清家底”,即通过“四项清理”(摸清底数、理清产权、审清旧账、交清欠款)行动对一些拖欠集体资源承包费或是集体资产资源产权不清、合同不规范的,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彻底清理。把“家底”摸清、旧账算清,公开出去的村级事务才不至于是一笔“糊涂账”。“智慧村务”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互联网+权力清单”的小微权力运行监督平台,即群众可以通过网络和电脑、手机客户端,通过相应的账户和密码登录,查询所在村的权力清单制度执行情况。除了电脑查询平台,宁津县创新开发了“智慧村务”手机APP,为群众打造了“指尖上”的监督平台,实现了账本进手机、公开无限期以及举报随手可点击。另外,为方便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查询监督,县里为各乡镇(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和部分村统一配备了“智能触摸查询一体机”,扩大了“线上公开”覆盖面。

“清家底+权力清单+智慧村务”的做法,实现了把村级小微权力运行规范到位、公开到位,从而巩固了基层党建,推进了乡村善治。

4.一个积极有效的村级治理社会组织:陵城区乡村文明新风公益基金。公益基金以村为单位设立,由社会募捐资金构成。村党支部通过上门走访、召开座谈会、发放倡议书、举办募捐大会等形式,组织引导种养大户、创业有成的企业家、经商大户等能人以及在外工作人员、普通村民等人员自愿募捐而成。公益基金主要用于表彰奖励本村涌现的道德先锋、文明榜样,救助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困难家庭,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等公益事业,以及本村内开展的村容村貌提升、敬老爱老、孝德评选、慈善事业等民生公益活动。在基金管理方面,成立村级“公益基金”议事会。“公益基金”议事会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负责“公益基金”的组织募集、研究使用和申请发放等工作。

陵城区乡村文明新风公益基金在村级治理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第一,吸纳了社会力量参与到村级治理中,提高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化程度。第二,缓解了村级组织缺钱为民办事的压力,村级组织在开展公益事业和公益活动中增强了凝聚力。第三,通过开展文明新风评选表彰活动,提升了村民的精神面貌,助推了乡风文明,也激活了文化和道德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 (二)从德州实践看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短板

1.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不足,制约基层治理中“党建引领”作用发挥。第一,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治理效果不佳。目前,德州市仍存在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而且,有极少数基层党组织“整了瘫、瘫了整”。这一不足对基层治理的制约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暴露明显。党组织班子强的村能在第一时间建立村头卡点,而且能有效带动党员、群众志愿者参加村级防控,实现群防群控。而在党组织软弱涣散的村,这些工作相对被动。第二,村(社区)后备干部不足。在农村,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党员干部后继乏人现象严重导致乡村治理能人大量流失。在街道社区,由街道干部兼任社区书记的现象仍然存在。第三,城市社区党建基础还比较薄弱。部分城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功能不完善,部分城市社区服务半径过大,管理服务不够精准。还有部分社区党组织覆盖不到位。

2.基层治理机制和具体制度欠缺或执行不力,成基层治理的制度短板。(1)治理机制方面:整体而言,实践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乡村、街道社区没有明晰的治理机制,仍处在“稀里糊涂过日子”的状态。没有思路,没有办法,没有机制,大大制约了治理成效。(2)具体制度方面:第一,部分制度执行不到位。其中,两个问题最为突出。一是“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执行不力。从调研情况看,绝大部分村庄都了解这项制度,但是有部分村庄以“程序太繁琐”“会议开不起来”为由执行不力。二是执行“双报到”制度存在形式主义现象。实践中,仍有少数单位和社区对“双报到”制度的意义认识不清,没有找到有效的措施充分发挥该制度的功能。第二,部分制度有待优化。调研发现,有三项制度亟待完善。一是基层考核机制有待优化。部分指标设置不够精准,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不够。二是村(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需要进一步统筹整合。目前,在农村和城乡社区,享受工资待遇的工作人员主要有党支部书记、主职干部、纪检委员、网格员和计生主任。这些人员工资标准不一,发放部门也不同。部分乡镇干部反映,对这些工作人员的报酬支出并未实现效果最大化。三是惠农项目和资金需要进一步明晰整合。近年来,随着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从中央到地方，对基层投入较大，惠民项目和资金比较多，但在乡镇（街道）层面，并不全部了解这些惠农政策，导致不能充分利用。

3. 乡镇、街道责权不匹配，影响基层治理效率。第一，乡镇街道无行政执法权，却因“属地管理”被问责。调研发现，在县乡层级，很多原本应由县（市、区）直部门承担的事项，比如污染企业的关停、河道治理、拆违拆临这些涉及环保、安全、交通、国土等领域的任务，往往由乡镇“协助办理”。但是，实践中，因为乡镇没有相应的行政执法权，所以容易因为“执法无据”而产生问题。问题产生后，问责部门却往往依据“属地管理”进行问责，乡镇干部便成了被追责的对象。属地式问责的泛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干部的担当尽责。第二，乡镇街道无必要的财权、用人权、用地权，却要承担大量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由此陷入“小马拉大车”的困境。

4. 群众和社会力量未能充分参与基层治理。调研发现在一些城市社区（特别是一些村改居的社区），管理粗放问题突出。管理粗放的主要原因是管理人员少，管不过来，特别是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之后，部分社区管理压力加大。这就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志愿者、义工、楼道长甚至是普通群众的力量。反观城市居民的治理主体意识，相当多的社区普遍存在有“区”无“社”现象，部分居民缺乏社区认同，对小区里的事务呈现“弱参与”状态。

5. 应急管理机制不够健全。从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来看，当常态化治理切换到应急管理响应模式时，部分地方基层治理在资源动员、应急处置、协调配合、服务供给、治理手段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和不足。以智慧治理为例，疫情期间，相当多仍处于传统治理阶段的乡村、街道社区需要的大量数据基本全靠人力手工采集，不仅效率低、准确率低，也增加了工作负担和交叉传染风险。

### 三、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完善进路

#### （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党建引领”基础

1. 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根基。一是深化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规范化管理。健全选拔任用、履职尽责、激励保障、考核监督制度，实现“落好书记一颗子，激活党建一盘棋”的效果。二是实施农村后备干部“递进培养计划”。新发展党员重点向40岁以下的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人员等倾斜，通过多种形式扶持返乡人才就地创业，对有发展潜力的致富能手重点培养。三是创新服务载体。通过农村党支部领办创办土地股份合作社等多种形式，促进集体增收和农民富裕，增强党组织的组织力。四是紧扣乡村振兴主题，

深化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提高组织活动实效，使支部切实担负好直接教育、管理、监督党员和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的职责。

2. 推进城市基层党建提质增效。首先，合理调整城市社区规模，可以探索运用“红色业委会”方式建立健全小区党组织，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有效覆盖。其次，加快实行社区党组织书记专职化管理，按标准配齐全日制社区工作人员，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落实社区专职工作者工资、保险等待遇。三是推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站）建设，创出品牌、创出特色，因地制宜有效增强社区服务功能。

#### （二）建立健全体制机制，补齐基层治理的制度短板

1. 因地制宜构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效机制。其一，前文所介绍的德州市武城县村级“一部四会一网一社”治理机制和社区治理“一核多元”组织体系值得借鉴。第二，通过“组织嵌入”，有效构建党建引领下的城乡基层治理网络。在城市，建立健全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总支——网格党支部——楼宇党小组的四级党组织架构。在农村，健全完善乡镇党委——社区党总支——村党支部——村民小组党小组组织架构。在此基础上发掘优化村庄、社区资源、积极引入多元主体，完善“党组织+”基层治理组织体系，依靠党建引领，构筑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网络。

2. 完善相关制度并强化执行。第一，持续改进县（市、区）综合考核和乡镇（街道）综合考核。第二，对村居工作人员的工资报酬进一步统筹整合。第三，尝试在县（市、区）一级设立惠农政策整合中心。中心可以挂靠于县（市、区）农业农村局，研究承接整合惠农政策，为乡镇（街道）统筹利用提供服务。第四，建议推广借鉴德州市宁津县“清家底+权力清单+智慧村务”的做法，把“四议两公开”贯穿于小微权力运行全过程。第五，做实共驻共建双报到工作，充分挖掘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做到这一点，可以构建完善两项制度。一是创新平台载体，建立驻区单位党组织、在职党员“双报到”“红色账户”管理模式，对开展为民服务活动的党组织、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党员统一实行积分管理。二是定期召开共驻共建联席会议，就如何开展共驻共建、志愿服务活动等事项及时总结经验，制定措施，从而形成务实管用的运行机制。

#### （三）加强组织领导，提高基层政权治理能力

1. 规范乡镇（街道）权责事项，为乡镇（街道）赋权赋能。加快推进《山东省乡镇人民政府工作条例》实施，明确主体责任清单和配合责任清单，有效解决一些地方和部门以“属地管理”名义把责任层层

下移给乡镇和村居等问题。同时,落实落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相关规定,依法赋予乡镇(街道)综合管理权、统筹协调权和应急处置权,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依法赋予乡镇(街道)行政执法权。此外,市、县级政府要规范乡镇(街道)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事项,将直接面向群众、乡镇(街道)能够承接的服务事项依法下放。<sup>[10]</sup>

2.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绝大部分基层工作所承载的都是来自上级的政策。调研中发现,基层中部分治理问题,并不全在基层,或者说单靠基层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就需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即立足实际对市域社会治理统筹谋划、推动实施,从而高效补齐基层治理中的体制机制短板、解决基层治理资源不足等问题。

(四)多措并举,充分调动群众及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

1. 调动村(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加强村(社区)自治组织建设,选好配强村(居)民委员会领导班子,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妇女和儿童工作、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通过相应委员会的工作去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带动群众参与到基层治理中。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探索建立村(社区)议事厅、议事会、议事坛等基层协商组织,为村(社区)居民搭建“有事好商量”的平台,培育居民参与自治的能力。充分发动村(社区)居民广泛参与讨论,形成反映居民共同意志的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逐户签约,督促落实,利用公约规范居民的言行。

2. 畅通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途径。第一,积极培育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德州市宁津县宁城街道从实际出发,将为民项目分为了政策宣传类、党建联建类等10大类。基于这一分类,街道社区积极孵化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以此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赢得了社区居民的高度赞扬。第二,引入专业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评估、检测、咨询等方面,第三方机构参与社会治理、社区服务呈现出越发活跃的景象,我们应在这方面大胆尝试探索。第三,加强社区志愿者制度建设。通过创新志愿服务组织形式、落实多元融合的服务体系等方式,建立起稳定的、真正有志愿精神的各类志愿者队伍,以满足村(社区)日常治理尤其是突发事件或重点工作推进中对志愿者的需求。

(五)健全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机制为做到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应加快

《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相关规定的落实落细。第一,增强乡镇(街道)应急管理能力。健全乡镇(街道)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建立应急管理队伍,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保障,细化应急预案。同时,应通过强化乡镇(街道)属地责任和相应职权,保障其构建起多方参与的社会动员体系。<sup>[10]</sup>第二,增强村(社区)组织动员能力。加强群防群治、联防联控机制建设,完善村(社区)应急预案;在村(居)民委员会下设立公共卫生委员会,并使其发挥知识普及、组织活动开展等作用。第三,县级以上政府应为基层治理提供必要的支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明确乡镇(街道)、村(社区)基层阵地建设的功能及面积、推进阵地建设时,应充分考虑其中的应急功能。市、县级政府应强化应急状态下对乡镇(街道)人、财、物的支持。

#### 参考文献:

- [1] 向春玲,胡万玉,傅佳薇.推进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贯彻落实之要[J].党课参考,2021(16),19-39.
- [2] 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加强和创新特大城市社会治理[N].人民日报,2014-3-6(01).
- [3] 下好先手棋 打好主动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综述[N].光明日报,2021-4-15(01).
- [4] 习近平.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9月17日)[EB/OL].人民网,2020-9-19.
- [5] 授权发布:《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七)[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8-2-9.
- [6] 社区治理得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EB/OL].青海新闻网,2021-6-10.
- [7]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集体学习时强调 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不断把党的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EB/OL].人民网,2021-6-30.
- [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3.
- [9] 本书编写组,编著.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21-23.
- [10]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21-7-11.
- [11] 习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EB/OL].人民网,2020-3-31.
- [12] 倪明胜.以“全周期管理”重塑基层治理格局[N].光明日报,2020-3-31(02).

# 我国延迟退休政策效应理论研究述评

## ——以政策评估为视角

李凯

(安徽工程大学 人文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延迟退休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 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前期学界主要关注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对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家庭生育、经济发展、老年健康、社会就业、社会福利、企业发展等的影响, 后期对“该不该”及“要不要”延迟退休进行了深入研究。今后的研究会向政策事前评估、政策执行和效益评估, 以及政策配套制度转移。

**关键词:** 延迟退休; 政策评估; 效应; 述评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2)05-0071-08

### 一、引言

21世纪初以来为应对“未富先老”引起的一系列冲击, 延迟退休政策被提上政策议事日程。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将研究制定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2016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阐述了延迟退休的重要性。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将逐渐“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2021年2月12日, 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明确规定将在“十四五”时期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延迟退休作为一项涉及面广、影响程度深远、实施难度大的公共政策, 除具备一般公共政策特征外, 还具有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等特征, 导致政策实施影响将不仅仅是延长公众退休年龄如此线性而简单, 还势必会对我国经济、社会、民生等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因此, 在政策制定伊始, 充分估计政策实施可能带来的影响, 在合乎法理和道德伦理的基础上, 确保政策实施的可操作性、平顺性以及政策后期评估的良好效果, 从政策评估视角充分探讨政策实施可能产生的效果和影响是非常有理论和现实价值的。

国内学者通过参照国外或本国政策模拟等方式对我国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梳理发现, 针对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的研究结论分散化、研究视角单一化。因此, 本文对政策预执行和实施效应等方面所作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归类, 对我国“该不该”及“要不要”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加以研判, 并对该问题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以期和政策制定提供全面决策参考。

### 二、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影响

结合学界研究结果, 我们按照延迟退休政策执行效果或影响角度进行分类, 主要有: 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家庭生育、经济发展、老年健康、社会就业、社会福利和企业发展。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 (一) 养老保障

学者结合目前比较关注的几种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 或者通过构建模型, 按照既定的政策实施时间和实施步骤, 研究延迟退休对弥补养老基金缺口的作用。如假定2025年起每4年延迟1年, 逐步将目前的男女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分别提高至2049年的男性65岁和女性60岁<sup>[1]</sup>, 对抑制基金缺口扩大仍有显著效果<sup>[2]</sup>, 特别是在短中期, 每年的收支缺口会因此减少40%-70%, 养老压力高峰期将大大推迟。延迟退休政策也

收稿日期: 2022-04-20

基金项目: 安徽工程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延迟退休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研究”(KZ420202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0YJA840003)。

作者简介: 李凯(1988-), 男, 安徽桐城人, 博士研究生, 讲师, 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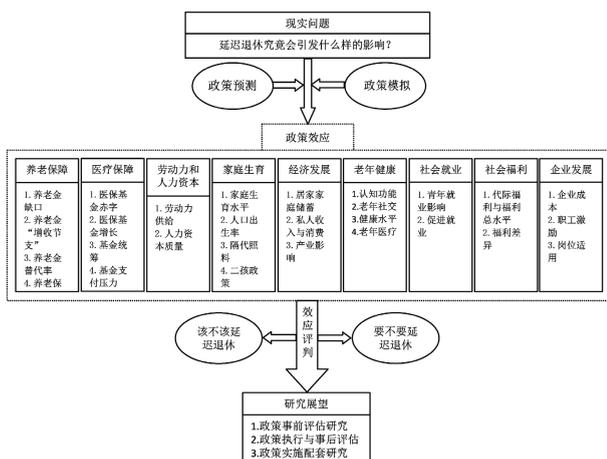


图1 研究脉络示意图

可以在降低缴费率和征收体制改革基础上的养老保险基金出现累计赤字的时点进一步推迟，促使基金在较长时间内可持续运行。<sup>[3]</sup>

另外，如果从2022年开始退休年龄每年延长6个月<sup>[4]</sup>，将有效推迟养老金首次出现缺口的时间。而高建伟和伊茹通过测算三种不同延迟退休方案对缩减基金缺口的贡献率，发现三种延迟退休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均可缓解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问题，减轻基金支付压力。<sup>[5]</sup>杨钊认为，目前的养老金账户将在2050年出现亏空，实行延迟退休政策可以使得2050年养老金累计金额保持大量盈余且实现大幅上升。<sup>[6]</sup>

但也有学者认为，延迟退休对弥补或缓解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作用有限。熊婧和粟芳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对缓解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有及时效果，但随着时间流逝，基金的缺口压力仍会再次出现并逐步提升，延迟退休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缺口问题，仅仅是推迟了缺口的形成时间。<sup>[7]</sup>其不但会降低现存工作代在退休后的养老待遇，甚至还会加重延迟退休到期以后若干新生代的养老负担。<sup>[8]</sup>同时，在债务风险层面，延迟退休将导致“中人”的过渡性养老金增加，并伴随增加社会总转制债务规模，最终会导致转制债务的风险增加。<sup>[9]</sup>黄林峰和卢媛从海南个案视角，也证明了延迟退休不是改变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的根本解决办法，决策层面希望通过延迟退休改变养老金缺口的目标可能无法实现。<sup>[10]</sup>

延迟退休实现基金的“增收节支”方面，有研究表明，延迟退休年限越长，延迟退休对于缓解养老保险收支压力的作用越明显。<sup>[11、12]</sup>延迟退休对养老金可持续的直接效应是增收减支，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创造更多的生产价值和延长缴税时间的方式，间接促进基金可持续性。<sup>[13]</sup>比如，姚海洋等的模拟研究显示在新人加入的基础上，单位缴费率下降为16%，从2022

年开始每3年延长男女职工退休年龄1岁，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余额还会保持增长趋势。<sup>[14]</sup>孙娜娜以北京市为例的研究认为，延迟退休能够明显增加每年的养老金收入，减少养老金支出，延迟“收不抵支”现象的来临。<sup>[15]</sup>冯梦琪和张释文也发现，延迟退休年龄可以使得加入企业年金后的总养老金财富随着退休年龄的提高而增加。<sup>[16]</sup>

也有学者以机关事业单位基金统筹为出发点，研究长期双轨制背景下，事业单位延迟退休的“增收节支”功效。以机关事业单位并轨后养老保险统筹账户财政支出水平和降费率后财政支出为出发点，延迟退休带来的财政支出的降低部分大于降低缴费率而增加的财政支出，是缓解降费率带来财政压力的有效措施。<sup>[17]</sup>王雅和薛惠元也认为，延迟退休改变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缴费年限和缴费人员数量、比例，延迟退休前后的当期基金收支缺口大幅度减少，因此，延迟退休能够明显改善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状况。<sup>[18]</sup>

此外，延迟退休有利于缩短养老金个人账户的收支差距，提高社会整体养老金替代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养老保障水平<sup>[19]</sup>，还可让社会统筹养老金最优替代率下调，从而大幅度降低社会统筹下养老金缴费率，提高个体效用。<sup>[20]</sup>

在推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方面，陈曦等研究发现，延迟退休能够缓解地区间养老保险人口结构离散发展趋势，降低老年抚养比地区差距，缩小城镇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地区差距，对推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具有显著功能<sup>[21]</sup>，同时还能够优化养老保险制度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收入再分配效应<sup>[22]</sup>，优化养老保险统筹机制。

由此看来，尽管延迟退休存在对弥补或缓解养老保障基金缺口的作用有限等不足，但是不影响学者们就延迟退休对弥补养老金缺口、养老金“增收节支”、提高养老金替代率以及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等方面产生共识。

## (二) 医疗保障

学者们认为延迟退休可以改善医疗保障基金现状。一方面可以使得城镇职工医保基金当期和累计赤字的时点均分别延后8年和20年。<sup>[23]</sup>还可以使得城镇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入年均增长率提高1.59%，而支出年均增长率不变，当期结余年均增长率提高102.21%，累计结余年均增长率相应提高1249.82%，显著改善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收支关系。<sup>[24]</sup>另外，还能够有效提高“二孩”政策在解决医保统筹基金短期赤字和累积赤字的效果，极大缓解我国职工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支付压力。<sup>[25]</sup>

但也有学者认为延迟退休的这部分功能有限。幸超基于统筹账户的精算模型发现，延迟退休年龄后，基金累计赤字开始出现的时点将推迟6或12年，短期可改善基金财务运行状况，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城镇职工医保基金的财务危机。<sup>[26]</sup>因为，虽然2025年预计的基金赤字可降低1/3左右，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医保基金运行压力，但是长期来看无法避免参保年龄结构逐步高龄化带来的影响。<sup>[27]</sup>赵建国和刘子琼也发现，现行制度下，延迟退休只有配合个人账户调整才有利于基金长期稳定运行。<sup>[28]</sup>

### （三）劳动力和人力资本

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的前5年，会显著提高劳动力供给，释放二次“夕阳红利”，同时也为注重质量的二次人口红利提供“窗口期”。<sup>[29]</sup>尽管延迟退休在提高中国劳动参与率的效果上贡献有限，却在一定程度上拖住了经济活动人口迅速下降的趋势，还是有利于释放人口红利的政策效果的。<sup>[30]</sup>但邹铁钉运用养老金缺口度量模型研究发现，延迟退休对新增就业市场劳动力会产生挤出效应，不仅不利于解除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还会增加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sup>[8]</sup>

从人力资本角度，延迟退休除可以保留较早退休的健康劳动力外，更有利于保留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者。<sup>[31]</sup>如以医疗卫生行业为例，延迟退休可以充分发挥高端人才的人力资本效能，并弥补高端行业的人力资本不足等问题。<sup>[32]</sup>在知识密集型的行业中，延迟退休也有利于老年人力资本的充分有效利用。<sup>[33]</sup>另外，延迟退休对人力资本的影响除表现为数量上的存量再次变现和重新配置外，还对人力资本质量的变现形式之个体、结构、资源配置效率等产生重要影响。<sup>[34]</sup>也就是说，延迟退休还具有额外的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效应，在长期内，延迟退休有助于提升产出，在社保降费的背景下，给了政策制定者更大的调整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的空间。<sup>[35]</sup>

但也有学者认为，延迟退休对单纯的劳动力和依附于劳动力之上的人力资本的影响有很大区别。通过延迟退休所带来的劳动力增加只会减缓偏离稳态增长的收敛速度，但不影响稳态增长，而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增加则会带来整个经济的发展。另一个方面，延迟退休对人力资本存在的部门及竞争性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二者应区别对待。<sup>[36]</sup>

### （四）家庭生育

学者们主要从家庭的生育水平、人口出生率、隔代照料以及二孩政策实施影响等角度，分析延迟退休对家庭生育的影响。

延迟退休不仅有助于改善家庭养老状况，还能提

高家庭生育水平。杨华磊等通过要素内生的世代交叠模型并经推演发现，与退休老人再就业对家庭养老和生育的负面影响不同，延迟退休增加的产出和社会资源通过配套生育支持增加了生育资源。<sup>[37]</sup>延迟退休可以避免养老对生育的挤出效应，还可以避免养老高峰期到来所造成的重度社会养老负担挤占生育资源，从而提高生育水平。<sup>[38]</sup>

严成樑考察了延迟退休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延迟退休使得职工期望老年时增加收入而减少青年时期的储蓄，并减少青年时期工作时间转向抚育子女，从而提高人口出生率。<sup>[39]</sup>景鹏和郑伟也认为延迟退休有助于遏制生育率下降<sup>[40]</sup>，耿志祥和孙祁祥却认为尽管延迟退休会提高均衡时的生育率水平，但是幅度非常有限。<sup>[41]</sup>

邹红等认为祖辈的退休与年轻家庭的隔代照料之间有着显著关系，尤其是女性祖辈延迟退休很可能会降低年轻家庭获得隔代照料的可能性，加剧年轻家庭对儿童照护需求无法满足的矛盾。<sup>[42]</sup>封进等也认为父代退休提供隔代照料可以缓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时间价值与生育之间存在的冲突，但是延迟退休会间接导致一些女性由于父代提供照料时间的延迟而提高生育年龄，而生育能力随着女性年龄增长而自然下降，不利于生育率的提高，对放开生育政策效果有较大影响。<sup>[43]</sup>

在二孩政策影响方面，王丽莉和乔雪认为孩子作为家庭投资品的属性较强，延迟退休会部分抵消二孩政策效果。<sup>[44]</sup>周坚和何敏认为，在生育保险与城镇职工医保的合并背景下，研究发现延迟退休可以抵充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基金支出风险。

### （五）经济发展

延迟退休可以增加人们的工资收入，理性行为人会降低工作期的预防性储蓄。<sup>[41]</sup><sup>[80]</sup>延长退休年龄1年，会使城镇居民家庭储蓄率下降大约1个百分点。<sup>[46]</sup>刘璨等研究也发现，延迟退休政策在政策宣告期就显著降低了中国城镇家庭储蓄率，<sup>[47]</sup>主要影响途径为家庭可预期收入增加，家庭中每多一个尚未退体的劳动力，其储蓄率大约降低5%；可供工作的时间每多一年，储蓄率大约降低0.2%。

在经济增长影响方面，刘渝琳和李宜航认为延迟退休在短期内通过社会储蓄率的增长促进社会财富积累<sup>[48]</sup>，并为整个社会投资和消费提供动力<sup>[49]</sup>，推动经济增长。也有学者认为，延迟退休微观层面未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宏观层面有利于就业、产出和消费增长，并有助于稳定通胀和工资膨胀。<sup>[50]</sup>对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供给促进效应优于第三产业，对产业升级

有一定影响,同时可能还会加大去产能的压力。<sup>[51]</sup>

#### (六) 老年健康

部分学者认为延迟退休可以延缓老年群体认知功能衰退。研究发现,退休对认知<sup>[31][110][52]</sup>、自评健康、抑郁均产生了负面影响且对女性、教育程度较低、45-54岁的人群影响更深<sup>[53]</sup>,退休还会通过显著减少人们的社交活动和休息时间来危害健康,因此适当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能够缩短退休持续时间,对抑制认知衰退有积极作用,有助于优化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状况,提高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另外,黄乾和于丹还佐证延迟退休政策对男性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能力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可显著提高低龄老年人健康水平。<sup>[54]</sup>

也有学者通过研究老年医疗服务支出探寻延迟退休对老年健康的影响。魏宁和周绿林通过研究延迟退休前后个体的门诊利用、门诊次数、住院利用和住院次数变化,发现延迟退休对个体的医疗服务利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以降低个体的医疗服务利用和支出,即延迟退休有利于提高个人健康水平。<sup>[55]</sup>何庆红等和Li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sup>[56]</sup>,从退休后医疗支出的角度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识别了退休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推断如果延迟退休,可能对男性的健康以及医疗支出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对女性的影响相对较弱。<sup>[57]</sup>

#### (七) 社会就业

部分学者认为延迟退休不影响青年就业。他们认为延迟退休政策不会产生代际之间的“挤出”效应,老年劳动力不会对青年劳动力产生“替代”<sup>[58,59]</sup>,也不会降低市场整体就业率,且高学历老年劳动力的增加反而有助于提升年轻劳动力的就业率<sup>[60]</sup>,也即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是一种“正效应”。而且,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岗位创造效应足以超越岗位占用效应,在分年龄段劳动非完全替代和劳动供给内生时,延迟退休对就业的积极效应更加明显。同时,延迟退休对就业的效应在东部地区产生正面效应。<sup>[61]</sup>

部分学者认为延迟退休还能促进就业。王竹和陈鹏军利用2006-2017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延迟退休在大多数行业中并不会对青年人就业产生显著影响,而在少数几个有影响的行业中,延迟退休反而会促进青年人就业率的提升。<sup>[62]</sup>延迟退休在长期内会产生一定的就业“吸纳效应”。<sup>[63]</sup>

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延迟退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就业。有学者通过对OECD国家进行研究,发现延迟退休老年就业对青年人就业有明显的“挤出效应”<sup>[64,65]</sup>,对青年和老年劳动力的冲击效应尤为显著,

冲击效应在性别间也显示出显著的差异<sup>[66]</sup>,但是可以采取一定措施降低或抵消这种影响。

#### (八) 社会福利

部分学者认为延迟退休可以增进社会福利。延迟退休导致的收入增加等正面影响大于劳动供给增加所产生的工资降低的负面影响,延迟退休增加了社会福利,退休年龄延长3年能够增进各代人的福利。<sup>[67]</sup>延迟退休提高了劳动人口平均年龄,促使其更接近全要素生产率取得最大值时的劳动人口平均年龄,进而提高老年人养老福利。<sup>[68]</sup>

而且,延迟退休的福利效果还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延迟退休对于男性养老福利保障水平的影响小于女性。<sup>[19][82]</sup>封进等认为,由于女性延迟后每年的养老金增加部分抵消了养老金减少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女性养老金下降幅度较小,延迟退休显著增加女性的期权价值,女性总体上却有更多的福利改善;同时延迟退休给工资较高和失业概率较低的女性带来的福利改善更为显著。<sup>[69]</sup>

还有学者研究发现,延迟退休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中处于职业生涯中期人员的负面福利影响较大,对处于职业生涯后期的劳动者正面福利较多。<sup>[70]</sup>

但也有学者认为延迟退休减少了福利。延迟退休对休闲偏好较高的职工不利。<sup>[71]</sup>在预期寿命没有达到一定年龄的情况下过度推迟退休年龄反而会使个体效用下降。<sup>[20][40]</sup>而且,在目前确定型养老待遇下实施延迟退休,不仅难以改善老年人养老福利,长期还会损害老年人现有福利。<sup>[72]</sup>

#### (九) 企业发展

延迟退休对企业的人力资源规划、员工敬业度、激励等均存在影响。延迟退休有利于企业人力资源规划、减少招聘及培训费用,同时还能发挥老员工整体绩效和减少福利薪酬管理难度。<sup>[73]</sup>研究数据还证明,40岁以上员工选择延迟退休比不延迟退休时的敬业度均值要高出15.24%<sup>[74]</sup>,适度延迟退休还有利于员工激励<sup>[75]</sup>。另外,延迟退休对不同行业以及岗位的适用性存在差异<sup>[76]</sup>,如采矿业等适用性较低,在金融业等适用性一般;在管理岗适用性较高,在基层业务适用性较低,在技术岗适用性一般。

### 三、总结、思考与研究展望

#### (一) 总结与思考

延迟退休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影响及效应是多方面的,宏观层面对经济发展、养老及医疗保障、劳动力供给等有潜在影响,对延迟退休个体的健康、福利、家庭生育等也有较大冲击。研究视角的不同,呈现了政策实施效果

和影响的多样化。通过前文对延迟退休政策效应的评估，引发我们进一步探寻“该不该延迟退休”以及“要不要延迟退休”的思考。

1. 关于“该不该延迟退休”。目前学者们认为延迟退休的正面效应主要有：①弥补养老基金缺口，实现养老金的“增收节支”，提高养老金替代率以及促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②改善医保基金的现状，缩减短期赤字和累积赤字；③提高劳动力供给，释放二次“夕阳红利”，充分利用高质量人力资本；④提高家庭生育水平，提高人口出生率；⑤减少家庭储蓄，促进消费和经济增长；⑥延缓老年群体认知功能衰退；⑦不挤占青年就业，还能促进就业；⑧增进具有性别差异的社会福利；⑨减少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成本，提高员工敬业度等。而负面效应主要有：①对弥补或缓解养老保障基金缺口的作用有限；②对医保基金长期作用有限；③部分抵消二孩政策效果，加剧年轻家庭对儿童照护需求无法满足的矛盾；④对部分行业新增劳动力具有挤出效应；⑤影响男性健康和增加医疗支出；⑥对休闲偏好较高职工福利有不利影响等。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延迟退休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足之处。政策实施效应似乎很难权衡，也就造成很难研判到底“该不该”延迟退休。笔者尝试从公共政策质量和政策评估两个视角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公共政策质量是指公共政策能够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能力<sup>[77]</sup>，而高质量的公共政策一般指结果很好的政策，且对环境具有较强回应、制定过程和内容合理、切实关注利益相关者利益、有效执行且结果合乎政策目标。<sup>[78]</sup>延迟退休政策是我国对当前国内人口老龄化加速、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主动回应。政策从提出到制定充分鼓励广大学者从学理角度展开讨论，而且从目前政策制定原则“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来看，政策切实关注特殊个体利益，不实行“一刀切”，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推进。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延迟退休政策符合高质量政策的一般性原则，也具备了一项“好政策”所必备的基本条件。

其次，从政策评估角度来看，无论是基于何种政策评估模式和方法，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都不可避免地产生至少两方面的影响，即正效应和负效应。判断一项政策到底该不该实施，主要标准就是政策的正效应要大于或远超过负效应。而纵观以往能够实施且被社会公众接受的“好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负效应，后期须持续加以完善。<sup>[79]</sup>因此我们认为，作为政策实施主体，应该更加注重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即要确保政策正效应远大于负效应，同时采取

适当合理措施弥补政策实施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通过前文梳理发现，延迟退休在社会功能表现方面，社会正效应远远大于负效应，其有限负面效应或风险也非原则性不可被社会公众接受的问题，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弥补。

因此，从政策质量和评估角度看，作为一项已经在全球普遍实施的公共政策，我们应该充分看到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经济发展挑战和威胁等方面的诸多正面效应，同时充分考虑并正视政策实施所引发的一部分负面效应，做好顶层制度设计、完善配套措施，确保延迟退休政策能够平稳、有效实施，成为一项真正的“好政策”。因此，应该延迟退休。

2. 关于“要不要延迟退休”。如果说“该不该延迟退休”探讨的是延迟退休的必要性，那么“要不要延迟退休”就是从合理性和可执行性对延迟退休主体要不要接受这一角度进行的探讨。尽管我们的论证以及以往学者研究均表明，应该延迟退休<sup>[80]</sup>，但是目前社会公众对延迟退休政策在态度上仍有抵触。这就需要我们透过政策本身去分析问题的本质，探讨到底要不要延迟退休。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探讨。

宏观层面：其一，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格局分化<sup>[81]</sup>逐渐加深的现状影响政策接受度。伴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社会利益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利益多元化格局进一步加深，多元利益主体都试图参与各项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社会政策并积极发挥作用。而任何一项公共政策改革，想要实现帕累托改进，就必须对已有的利益格局进行重新调整、分配<sup>[82]</sup>，延迟退休政策就是一种对已有利益格局进行重新规划、利益主体权益的重新分配过程。这其中涉及公共部门（如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如企业、专家、个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必然有些人利益受损，而有些人会受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加剧了公共政策接受的复杂性和难度，归根到底是站在不同利益主体角度分析，导致政策利益分配结果的差异化。延迟退休不仅仅只是延长退休年龄如此简单，而是伴随国家养老、医疗、个体退休权益等一系列利益交织，再加上我国长期以来的“双轨制”甚至“多轨制”，延迟退休必然激起多重利益主体的利益分化与矛盾。延迟退休对受损者利益侵占越多，反对的声音也就愈发强烈，政策接受难度也就进一步加大。

其二，中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尚未成熟<sup>[82]20</sup>、社会保障结构性失衡等问题影响了政策接受度。首先，社会保障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之一，力求公平是其制度建立的出发点和归宿，本应是更加注重公平。而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中

存在一些不尽公平的地方，比如长期以来广为争议的双轨制、医疗保险的城乡差异和群体化、养老保险缴费与收入差异化等，导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出现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群体差异，延迟退休要求的起点公平与上述矛盾不可协调，就造成了延迟退休政策制定过程中对公平的追求更加困难。其次，根据亚当斯对公平的理解，社会公众对公平的主要判断来自于结果对比<sup>[83]</sup>，即延迟退休政策使得本应“一视同仁”的退休变成“因人而异”，即公务员等群体享受延迟退休政策带来的正效益，而广大企业职工却需要承担工作年限增加、缴费年限延长等负效应，对比后的“不公平”感加剧，并自然地由延迟退休政策“延伸”至社会保障制度。再次，由于目前延迟退休后的制度保障建设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延迟退休的公平性较目前的退休制度规定只会有退无进，这也更强化了社会公众对现有养老保障“不公平”的认知和延迟退休政策的抵制。

微观层面：延迟退休对具有极强福利刚性的退休制度挑战影响政策接受。退休制度是工业化发展的产物，退休后可以享受保障被视为一种福利，具有福利刚性的特质。福利刚性是指人们对自己目前所持有的福利待遇具有只允许其上升不允许其下降的心理预期，具体而言体现为规模只能扩大不能缩小，项目只能增加不能减少，水平只能升高不能降低。<sup>[84]</sup>对广大公众而言，退休属于休闲产品，本质上是一种属于私人的排他性福利，因此具有很强的福利刚性特点。而延迟退休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延长了社会公众的工作时间，在预期寿命横向稳定的前提下，无疑会缩短休闲时间。在公众看来，这是对其私人福利的一种赤裸裸损害，退休的福利刚性原则决定了一旦福利下调就会遭受非议。所以，尽管政策宣传中表示延迟退休的实施会增加个体福利，但无法从根本上弥补退休的刚性福利对社会公众所带来的福利损害的强烈的既视感。

因此，要不要延迟退休本质上反映的是政策可信性以及社会公众是否接受延迟退休的问题，但是从目前的环境和背景来看，社会公众接受延迟退休政策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也就是对“要不要延迟退休”可能公众给出的回答是不要。

(二) 展望

目前，延迟退休政策已然成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举措之一，涉及养老、医疗、人口结构、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对我国社会体制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影响，是对新时代我国政府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一项重要重要考验。学术界对于“应该”延迟退休已经形成

共识，但是在“要不要延迟退休”上存在一定分化。因此，为了确保延迟退休政策能够平稳落地、主动被社会公众接受以及有序开展，进一步加强延迟退休政策评估领域的研究和探索就显得很有必要。对此，基于政策评估视角，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开展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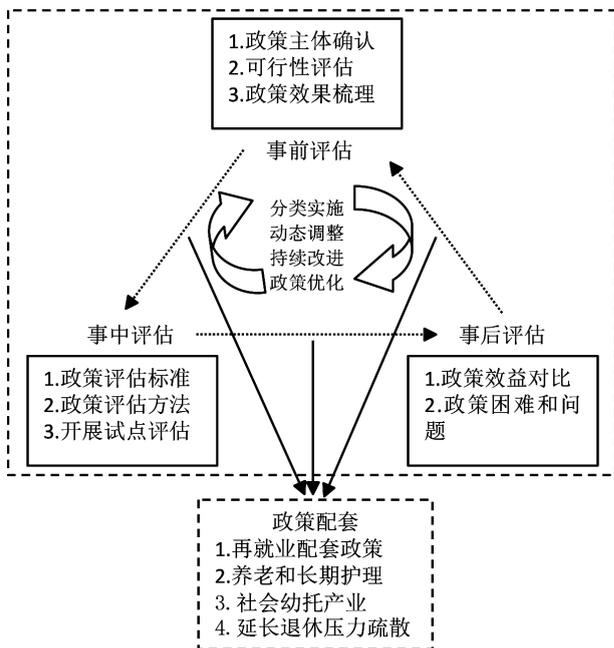


图2 研究展望示意图

1. 政策事前评估。首先，延迟退休是一场关乎全体劳动者利益的重大改革，但延迟退休应该首先从哪一类主体开始实施阻力最小，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未形成一致看法；其次政策可行性方面，已有调研数据显示社会公众对延迟退休方案普遍反对，究竟是哪一类群体无法接受，是对退休方案和内容方面无法接受、还是对政策实施成本存在顾虑，这些都需要更广泛的数据调研；最后，尽管本文对政策实施效应进行了梳理，但是由于研究方式、精力等限制了梳理的全面性和深度，需要借助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开展定量研究，尽可能全面模拟政策实施效果。

2. 政策执行研究和效益评估。由于延迟退休尚未全面开始实行（部分城市曾开展过试点），目前国内针对政策真正执行的研究基本还属于空白状态。即使延迟退休政策在全国范围或城市试点实行，政策执行评估涉及的评估标准、评估方法等基本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确定。另外政策执行过程和效果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这些都需要学者们从跨学科角度，对试点城市开展数据调研，以评估政策执行在社会经济各层面带来的连锁反应。同时通过政策实施前、中、后的效果进行对比，对政策不足的地方进行动态调整和持续改进，持续优化政策。

3. 政策配套制度研究。延迟退休主体对延迟退休后养老、就业等政策配套与辅助能否同步推进表示非常关切,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多停留在政策建议层面,具体哪些措施以及如何实施并未深入探讨。比如,如何完善劳动力市场的配套政策、如何完善养老和长期护理体系、如何健全社会婴幼儿托管机构建设、如何化解延迟退休群体心理负担等等,都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

### 参考文献:

- [1] 刘万. 延迟退休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收支影响的净效应估计——基于2025年起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假设[J]. 保险研究, 2020(03): 105-127.
- [2] Zhou S, & Gao Y, & Wang X. A Study on the Expected Retirement Age Prediction of 1049 Nurse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layed Retirement Intention[J]. Health, 2020, 12(09): 1318-1331.
- [3] 曾益, 魏晨雪, 李晓琳. 征收体制改革、延迟退休年龄与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基于“减税降费”背景的实证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19, 16(04): 108-118+173-174.
- [4] 田月红, 赵湘莲. 渐进式延迟退休对养老金财务可持续性的影响[J]. 财经问题研究, 2018, (04): 84-91.
- [5] 高建伟, 伊茹. 延迟退休对缩减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贡献率测算[J]. 统计与决策, 2018, 34(04): 58-63.
- [6] 杨帆. 延迟退休对养老金可持续性影响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20(05): 91-101.
- [7] 熊婧, 粟芳. 延迟退休对我国养老保险收支平衡的影响[J]. 上海金融, 2017(12): 18-25.
- [8] 邹铁钉. 延迟退休与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的财政及就业效应[J]. 经济评论, 2017(06): 92-106.
- [9] 赵越强, 柏满迎. 中国养老保障体系转制债务风险的压力测试评估[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 35(04): 80-96.
- [10] 黄林峰, 卢媛. 延迟退休对养老保险收支均衡影响的政策模拟研究——以海南省为例[J]. 调研世界, 2019(03): 16-20.
- [11] 于文广, 李倩, 王琦. 基于年龄与工资水平差异的延迟退休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影响[J]. 中国软科学, 2018(02): 54-67+102.
- [12] 韩冰洁, 周志凯. 延迟退休年龄对职工养老金财富的作用研究——基于个体生命周期精算视角[J]. 社会保障研究, 2018(02): 36-46.
- [13] 魏瑾瑞, 夏宁璐, 陈子昂. 老龄化、延迟退休与财政可持续性[J]. 统计研究, 2018, 35(10): 81-88.
- [14] 姚海祥, 向旭东, 张玲. 新人加入条件下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持续性研究[J]. 金融经济研究, 2019, 34(04): 58-70.
- [15] 孙娜娜. 延迟退休对养老金收支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J]. 调研世界, 2017(09): 3-9.
- [16] 冯梦骥, 张释文. 延迟退休政策对养老金财富数量的影响[J]. 经济与管理, 2020, 34(01): 71-76.
- [17] 陈洋, 张霁雯, 穆怀申.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统筹账户降低缴费率对财政支出的影响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0(08): 62-73.
- [18] 王雅, 薛惠元. 基于政策仿真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可持续性研究[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0(04): 53-64.
- [19] 郑睿臻, 许志华, 梁海艳. 延迟退休对不同性别的养老保障分析[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2(05): 80-88.
- [20] 周海珍. 延迟退休对基本养老金最优替代率的影响分析[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9, 32(05): 35-41.
- [21] 陈曦, 穆怀申, 范璐璐. 延迟退休的养老保险缴费率地区差异收敛效应研究——基于供给侧改革降费率视角[J]. 人口与发展, 2017, 23(04): 2-10.
- [22] 周海珍, 曹航玮. 延迟退休政策下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9(06): 94-100.
- [23] 冯莉, 杨晶.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可持续性评估——基于延迟退休和全面二孩政策调整的考察[J]. 财经问题研究, 2019(08): 122-129.
- [24] 张鹏飞, 仇雨临. 全面二孩政策和延迟退休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影响[J]. 上海经济研究, 2020(03): 62-74.
- [25] 殷俊, 田勇, 薛惠元. 全面二孩、延迟退休对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支平衡的影响——以生育保险和职工医保合并实施为背景[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9, 34(05): 60-68.
- [26] 幸超. 延迟退休对城镇职工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影响——基于统筹账户的精算模型模拟分析[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03): 84-91.
- [27] 封进, 王贞. 延迟退休年龄对城镇职工医保基金平衡的影响——基于政策模拟的研究[J]. 社会保障评论, 2019, 3(02): 109-121.
- [28] 赵建国, 刘子琼. 延迟退休、个人账户调整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可持续运行[J]. 社会保障研究, 2020(01): 11-22.
- [29] 刘晓光, 刘元春. 延迟退休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估算[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7, 31(05): 68-79.
- [30] 王贵东. 二孩政策及延迟退休下的中国人口结构测算: 2015-2050年[J]. 人口与发展, 2019, 25(04): 2-10+77.
- [31] 杨李唯君, 冯秋石, 王正联, 曾毅. 延迟退休年龄对中国人力资本的影响[J]. 人口研究, 2019, 43(01): 102-112.
- [32] 牛天明. 延迟退休年龄对医疗卫生行业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 中国卫生经济, 2016, 35(02): 11-12.
- [33] 张磊. 延迟退休对养老改革的影响及启示[J]. 人民论坛, 2015(36): 146-148.
- [34] 袁廿一. 延长退休年龄影响人力资本的传导机制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1(04): 29-34+57.
- [35] 邱牧远, 王天宇, 梁润. 延迟退休、人力资本投资与养老

- 金财政平衡[J]. 经济研究, 2020, 55(09): 122-137.
- [37] 郭兆晖, 孙金山, 郭路. 基于劳动力就业视角的中国经济增长分析: 理论与实践[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0, 36(12): 19-26.
- [38] 杨华磊, 沈政, 胡浩钰. 延迟退休挤占家庭生育水平吗?[J]. 财经研究, 2018, 44(10): 53-66.
- [39] 吴义根, 杨华磊. 节欲、推迟养老与生育补贴——生育力量释放的对策[J]. 西北人口, 2018, 39(01): 65-69+78.
- [40] 严成樑. 延迟退休、内生出生率与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16, 51(11): 28-43.
- [41] 景鹏, 郑伟. 预期寿命延长、延迟退休与经济增长[J]. 财贸经济, 2020, 41(02): 39-53.
- [42] 耿志祥, 孙祁祥. 延迟退休年龄、内生生育率与养老金[J]. 金融研究, 2020(05): 77-94.
- [43] 邹红, 彭争呈, 栾炳江. 隔代照料与女性劳动供给——兼析照料视角下全面二孩与延迟退休悖论[J]. 经济学动态, 2018(07): 37-52.
- [44] 封进, 艾静怡, 刘芳. 退休年龄制度的代际影响——基于子代生育时间选择的研究[J]. 经济研究, 2020, 5(09): 106-121.
- [45] 王丽莉, 乔雪. 放松计划生育、延迟退休与中国劳动力供给[J]. 世界经济, 2018, 41(10): 150-169.
- [46] 周坚, 何敏.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 人口老龄化、雾霾污染与政策冲击[J]. 上海金融, 2019(07): 11-20.
- [47] 章元, 王驹飞. 预期寿命延长与中国城镇居民的高储蓄率——来自地级市城镇家庭的证据[J]. 中国人口科学, 2019(02): 16-26+126.
- [48] 刘璨, 凌晨, 邹红. 延迟退休政策宣告与城镇家庭储蓄率变动[J]. 财贸经济, 2019, 40(04): 130-145.
- [49] 刘渝琳, 李宜航. 延迟退休年龄是否会带来二次人口红利?[J]. 人口与发展, 2017, 23(05): 30-41.
- [50] Zhan C. Extending Retirement Age and Increasing Consumption: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J]. Canadian Social Science, 2015, 11(11): 103-106.
- [51] 陈利锋, 钟玉婷. 人口老龄化对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兼析延迟退休的宏观经济效应[J]. 西部论坛, 2019, 29(03): 36-46.
- [52] 鲁元平, 朱跃序, 张克中. 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经济增长及产业效应——基于动态CGE模型的分析[J]. 财贸经济, 2016(10): 30-44.
- [53] 刘亚飞, 罗连发. 退休对认知能力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兼论延迟退休的“健康红利”[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0(10): 99-112.
- [54] 董夏燕, 臧文斌. 退休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J]. 人口学刊, 2019, 39(01): 76-88.
- [55] 黄乾, 于丹. 延迟退休会损害健康吗? ——基于对退而不休的研究[J]. 人口与发展, 2019, 5(02): 76-85.
- [56] 魏宁, 周绿林. 延迟退休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研究[J]. 中国卫生经济, 2019, 38(02): 49-51.
- [57] 何庆红, 赵绍阳, 董夏燕. “退休—医疗服务利用之谜”及性别差异[J]. 人口与经济, 2019(06): 97-113.
- [58] Li W.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Health of Retirement to the Working Population—Based on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J]. Americ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2017, 07(04), 429-443.
- [59] 杨馥, 郑丽. 延迟退休、家庭代际转移与青年就业[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7, 30(02): 111-117.
- [60] 戴卫东, 李凯. 延长退休年龄挤占就业岗位吗? ——基于安徽省芜湖市的调查[J]. 科学决策, 2014(06): 58-68.
- [61] 张志远, 张铭洪. 延迟退休政策对就业率的影响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 2019, 33(09): 103-110.
- [62] 张熠, 汪伟, 刘玉飞. 延迟退休年龄、就业率与劳动力流动: 岗位占用还是创造?[J]. 经济学(季刊), 2017, 16(03): 897-920.
- [63] 王竹, 陈鹏军. 延迟退休会挤占青年人就业吗? ——基于19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J]. 经济体制改革, 2019(02): 181-186.
- [64] 李磊, 席恒. 我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对青年人的就业效应研究[J]. 管理评论, 2019, 31(01): 255-267+278.
- [65] 李亚军, 张亮. (2017). 延迟退休背景下青年就业促进政策的作用——OECD国家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7(05): 60-67.
- [66] Meiling Z. Delay Retirement Impact on Young People's Employment[J]. World Economic Research, 2018, 7(02): 42-47.
- [67] 曾霞, 姚万军.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就业冲击效应——基于OECD国家数据的实证检验[J]. 西北人口, 2020, 41(02): 27-38.
- [68] 叶兵, 许志伟, 管毅平. 提高退休年龄对社会福利的影响——金融改革背景下的动态分析[J]. 中国经济问题, 2017(04): 14-26.
- [69] 杨华磊, 沈政, 沈盈希. 延迟退休、全要素生产率与老年人福利[J]. 南开经济研究, 2019(05): 122-144.
- [70] 封进, 韩旭, 何立新. 中国城镇劳动者退休行为及延迟退休的福利效果[J]. 劳动经济研究, 2017, 5(05): 18-40.
- [71] 周二华, 张天骄. 延迟退休波及的不同群体差异: 源于职业生涯[J]. 改革, 2015(07): 65-71.
- [72] 殷红. 延迟退休对职工福利水平的影响——基于效用视角[J]. 人口与经济, 2019(01): 80-94.
- [73] 杨华磊, 王辉, 胡浩钰. 延迟退休能改善老年人福利? ——基于代际支持视角[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9(02): 44-55.
- [74] 周二华, 黎倩. 延迟退休的成本收益研究: 基于企业视角的分析[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5(15): 63-67.
- [75] 刘敏, 余江龙. 延迟退休、敬业度与老年员工激励[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9, 35(06): 14-25.

# 基于文化视角的城市社区管理问题分析及改革对策

季晓东<sup>1</sup>, 季桂起<sup>2</sup>, 董开远<sup>3</sup>

(1.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 200336; 2.德州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3.山东华宇工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 目前的城市社区管理以行政诉求和商业诉求为主, 缺乏文化的介入, 这种社区管理模式已经落后于不断发展的社会管理需求与文明国家建设, 需要大力改革。当下, 应立足“以人为本”理念提升城市社区管理的价值理性, 加强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确立文化建设主题, 做好社区管理文化建设的规划, 以规划指导建设, 将一般性的文化建设内容与居住者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 让这些文化建设内容潜移默化地影响、熏陶居住群体的精神, 真正发挥好文化建设的作用。通过这样的改革, 大力提升城市社区管理的能力与质量, 进而增进社会管理的整体水平。

**关键词:** 文化视角; 城市社区管理; 问题分析; 改革对策

**中图分类号:** C91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2)05-0079-06

## 引言: 居住的意义及社区文化属性

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 人们对居住的选择虽然表面上看来是一种个体行为, 但一旦其居住地点与居住方式确定下来, 那么其居住就必然与周围的环境发生关系, 这些环境因素既包含自然因素也包含人际因素。无论是自然因素还是人际因素, 都是社会组成的必要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说, 居住也是一种社会行为, 具有明显的群体性, 除非出现像“鲁滨逊”那样的极端个例。居住的这种群体性也就决定了居住必然带有特定的文化属性。

从法律上讲, 居住是一种以用益物权为制度保障的行为。居住权除了具备物权和用益物权的一般特征之外, 大体说来还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居住权的主体是特定的自然人。第二, 居住权的客体是房屋。第三, 居住权的内容是占有、使用。第四, 居住权是一种无偿用益物权。由于居住权主要是为了解决特定人的生活居住问题, 所以不便要求具有有偿性, 有学者将其称为“恩惠行为”。第五, 居住权具有长期性、终身性。这一点是居住权的重要特征。从以上内容看, 居住权主要是从个体的角度确定居住者的基本权利, 而社区管理首先尊重的应该是这种个体权利。换言之, 社区管理必须是以尊重并保障居民的居住权为前提的。

从文化的意义上讲, 居住与一种特定区域及社会关系相关联, 应受到一定的道德、法律、习俗、规章

及生态要求的约束, 它不仅是法律行为, 而更是一种特定的文化行为。作为文化行为, 居住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 而是在与周围环境包括自然与人文环境发生联系的过程中居住者基本权利实施的行为, 所以居住者应该接受周围环境对其居住行为的必要的约束与协调。而社区管理正是以行政的方式对居住者实施约束与协调。社区管理在尊重居住者基本的居住权利并在法律层面上尽可能保障这种权利的前提下, 必须以相应的道德、法律、习俗、规章及生态要求等约束与协调居住者的居住行为, 并以此为基础对居住者实行必要的管理和提供相应的服务, 这是居住的文化属性赋予社区管理的责任与义务。这种责任与义务除了形成制度层面的各种刚性工作规定与行为实施外, 其实还有很大程度上的弹性管理与服务空间。前者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的工作, 后者则主要表现为管理、服务与居住之间更深层次的文化行为。

如果把社区管理理解为一种文化行为, 那么它除了具有法律意义上所赋有的行政特征外, 还应该具有以下不应忽视的文化特征: 第一, 社区管理很大程度上需要考虑到地区传统形成的道德、习俗甚至宗教习惯的影响; 第二, 社区管理应照顾到自然环境、人际环境的影响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在满足人们最低层次的居住条件下应把环境管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管理; 第三, 作为文化行为, 社区管理应该重视被管理区域的文化氛围的营造, 应以现代文明作为基本价值

收稿日期: 2022-03-03

作者简介: 季晓东(1986-), 男, 山东德州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社会管理研究。

导向,通过管理行为形成居住者群体的文化凝聚力;第四,社区管理应与国家的社会文明建设保持密切联系,成为社会文明建设的基层单元,需要以国家认同的价值观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成为社会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五,社区管理需要在规范居住者遵从法律规定及管理要求的同时,通过各种服务措施,在管理者与居住者之间、居住者与居住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责任与义务的相互认同关系,以保障管理的顺利实施及有效结果。

目前我国居民的居住地主要有城市社区与乡村社区两种类型。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市规模与数量急剧增大,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社区管理是城市管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它的管理能力与水平直接关系到城市管理的优劣,应该得到高度重视。但是,从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社区管理的现状来看,社区管理的能力与水平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文明的要求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这其中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社区管理中文化导向的错位或缺失。本文正是基于以上视角,对社区管理能力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提出一些看法,意在增强社区管理的有效性,以促进社区管理的科学化、人文化和现代化。

### 一、当前城市社区管理现状与问题分析

社区管理与城市的形成相伴随。对城市社区的管理可以说是自古有之。如唐代的里坊、宋代的街巷管理,以及从宋代延续到民国的保甲制度,等等。然而传统的城市社区管理与经济、社会大步跨入现代化的今天有所不同,二者既具有管理制度、管理方式的区别,也有了巨大的文化差异。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发展缓慢,居住者群体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商业活动和人际交往规模较小,人们的生活模式变化迟缓,社区管理有着较大的弹性空间,很多矛盾的解决依靠居住者自身形成的内在张力。在这样的城市,社区关系主要是几代人常年居住形成的邻舍关系,这些世代比邻而居的居民之间有着较多的感情联系与道德约束,有超越行政管理的民间伦理权威及潜在的人情认知。这些都在社区矛盾的化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与新中国成立后设立的居委会都借助了传统形成的文化力量实现社区的稳定。

城市进入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之后,大量现代化社区如雨后春笋争相涌现。与传统的社区生活相比,现代的城市社区失去了以往熟人社会的特性,成为了人口规模巨大、人员构成复杂的陌生人社会。这带来了社区管理的困难度与复杂性。在这样的新型社区里,传统的相互接近与熟知的街坊邻里关系不复再现,代

之而起的是成分与经历差异很大的邻里关系,把他们组合在一起的只是一种居住联系,而没有或缺少文化联系。

目前我国城市主要基于行政诉求和商业诉求,以居委会与物业公司相混合的方式进行社区管理,管理者虽然并不具有正式的政府身份,但其管理方式大多模拟着行政管理的模式。我们一般对社区管理的定义是“社区管理是指一定的社区内部各种机构、团体或组织,为了维持社区的正常秩序,促进社区的发展和繁荣,满足社区居民物质和文化活动等特定需要而进行的一系列的自我管理或行政管理活动。”<sup>[1]</sup>这种在政府指导下的社区管理,其特点主要有:第一,制度化。现在无论是居委会还是物业部门,在对社区的管理上,基本遵循的大都是制度化管理,即用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作为对社区居住者的居住行为的制约,其服务功能只是作为这种制约的附加条件。这些规章制度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单方面意志与要求,很少能够反映被管理者诸多方面的实际生活需求,尤其是一些特殊住户的个性化需求。第二,指令性。目前我国大多数居住社区,在制度化管理的层面上,行政权力的运用往往采取一种指令性的方式,这从社区在具体管理项目上多利用“通告”这一方式来表达管理者的管理意愿即可看出。这种“通告”往往要求被管理者无条件执行,否则便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一般很少征求被管理者的意愿,也缺乏可以调和、协商的余地。第三,综合性。社区管理涉及到居住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区域建设、设施维修、配套服务、资源调控等,小到居住者具体住所的老旧破损的维修、邻舍矛盾的调解、违规行为的处理等等。综合性要求社区管理具有针对居住者各种需求的全方位的管理功能,任何功能的缺失都会给居住者的正常居住带来一定的困难和影响。第四,统一性。社区管理的统一性是其制度化、指令性执行层面的体现。为在居住者来源多样、居住情况复杂、居住环境杂乱的社区中实现有效管理,不得不在管理上强调统一性,达到统一整合管理资源、协调管理步骤、实现管理目标的效果。第五,货币化。与传统的街区自治、邻舍互助不同,新型的社区管理一般由物业部门将管理与服务的各项功能货币化,以收取特定的物业费及其他资源使用费用为手段,将管理与服务落到由具体的收费所支持的项目上。货币与项目相挂钩,保障管理与服务的具体落实,没有物业费及其他管理费用的缴

纳,居住者将无法享受到社区承诺的任何管理保障及其服务。第六,互助性。在有些规模较大、居住时间较长的社区,作为体现居住者诉求及利益保障的一种组织形式,居委会在代表居住者物业权益的前提下与社区行政、物业部门一起实施社区管理,在这种管理行为的实施上,业主可以通过相互沟通、协商的形式提出居住者的权益诉求,也可以在行政管理、物业部门的参与下实现居住者之间的利益协调与互助。

由于我国现行社区管理的行政性质及其特点,这种模式在管理上具有刚性突出而柔性较少甚至缺失的特点。刚性管理有其管理力度大、见效快的特征,但也易于产生矛盾。从相当多的案例可以看出,目前社区管理中出现的矛盾主要是由刚性化的行政权力过于强大,而柔性化的文化因素过于弱势而造成的。其比较突出的现象有以下几种:一是管理者对居住者权利的不够尊重或侵犯所形成的矛盾。譬如某些社区在没有充分征求居住者意见的前提下,擅自提高管理费用,并在没有做好动员、说服工作的情况下,对迟缴或没有缴纳有关费用的居住者硬性断水、断电或采取其他限制措施,酿成比较大的矛盾。另外,还有管理人员因态度、方法以及制度执行上认识的失误、偏差而与居住者发生矛盾,甚至造成比较大的冲突,导致矛盾的激化与升级。二是管理者的管理或服务缺位,造成居住者生活不便或权利受损而形成的矛盾。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有些管理部门或物业机构收取了居住者的费用但没达到业主预期的相应管理要求和服务质量,因而产生矛盾。三是居住者相互之间的权利侵犯或利益纠纷所造成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目前社区管理中比较常见的。如上下楼层之间因为噪音问题频繁发生矛盾甚至是较为激烈的冲突,这在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社区管理的缺位是这类矛盾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四是居住者违反社区管理有关约束规定或触犯环境应有的道德习俗所造成的矛盾。

上述这些矛盾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管理的质量与水平,同时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社区管理中所存在的这些矛盾,如不能够得到有效解决与化解,不仅影响到社区居住者的生活质量、社区的安全稳定,如果矛盾扩大与激化,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甚至造成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所以如何针对社区管理的不足及缺陷,通过社区管理改革,减少与化解矛盾,保持社区的安全稳定,使居住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保障,是我们社区管理亟待进行的必要工作。从文化的视角看,笔者认为这种改革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在刚性的制度化管理之外,强化对社区管理的文化属性的认识,克服在社区管理观念上

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覆盖与侵蚀,由此对社区管理的现有模式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切实提升社区管理的能力、质量与水平。

## 二、立足“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升城市社区管理的价值理性

“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由我国社区管理的制度特征及文化属性所决定的。城市社区管理的对象是人的居住,居住作为人在城市生活的一种基本需求,其权利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同时,我们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保障最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及利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社区管理必须依照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性质,落实制度所赋予人们的根本权益。这是社区管理确立“以人为本”理念的法学前提。任何与这一理念不相符合的管理意识及行为都是与国家制度所规定的社区管理的初衷和宗旨相违背的。既然城市社区管理应该建立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之上,那么如何保障人们享有共同幸福的权利,就应该在社区管理中得到必然体现。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刚性的行政化管理是远远不够的。社区管理应该在刚性的行政化的制度管理之外容纳更多的满足人们居住需求的柔性服务内容,尤其是在社区管理中营造出一种富有人情色彩的人文精神。

“以人为本”理念的确立与人文精神的营造,是对管理者从业素质及管理能力的很高要求。这就涉及到城市社区管理的队伍构成及其建设问题。据笔者调查,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人员的总体素质不高,具有适宜从业能力的人员占比数量较低。他们多数几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社区管理学习及培训,与社区管理部门的关系只是一种单纯的雇佣关系,工作职责仅仅限于雇佣合同约定的内容,管理的方法与手段都较为简单、粗疏,与居住者的关系也较为单纯、松散。在他们那里很难形成一种建立在较高文化层次上的管理理念与精神。对于这样一支社区管理队伍,各级政府应该从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出发,结合城市发展的实际,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切实改造,以理念转变与素质提升为抓手强化建设,以适应新时代社区管理的需要。

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营造社区管理的人文精神,加强管理队伍建设,需要社区管理在组织机构上进行改革。在这其中,一些城市社区的探索值得重视与借鉴。如地处成都繁华地带的益州社区,在基层管理组织的改革方面进行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尝试。这个社区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产业社区,“辖区内有物业小区17个、企业4000多家,服务人口达12万。人员来

源广泛,居民群众和企业需求不一致,居住者、经营者之间时有矛盾、纠纷。”社区领导机构从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入手,“建立楼宇社区综合党委,形成社区党委+楼宇综合党委的新格局;成立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联合辖区机关、驻区企事业单位等党组织,通过召开会议、集中议事等方式,定期研究社区党建重点难点工作、公共服务优化机制等,强化组织协调。”<sup>[2]</sup>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为确立良好的管理环境创造了较好的组织基础。他们调动了管理队伍与居住者党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落实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为居住者与企业的安居乐业、有效经营,创造了良好环境和氛围。

“以人为本”理念的确立与人文精神的营造应该作为社区管理的主导贯穿于一切工作,从加强学习、重视培训、业绩评价、考核监督入手,逐渐形成社区管理的长期习惯与作风,渗透到每一位管理人员的工作与心灵中。首先,加强管理人员的学习非常重要。根据调查了解,管理人员的知识、素质与能力长期得不到更新与改善,对社区有效实施管理造成了很大困难。其次,建立对社区管理人员的定期培训制度很有必要。社区管理的内容复杂而多样,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具备专业化的知识、素质和能力是无法真正胜任的。现在很多社区管理人员缺乏必要的业务培训,即使像供水、取暖、排水、网络等简单的维修、服务,也没有能力去做,居住者或业主不得不求助于一些专业的维修机构,在物业费之外还要额外付出大量费用,加重了居住者的负担,也极易引发管理者与居住者之间的矛盾、纠纷。再次,制定社区管理人员定期走访、调研制度。建立对居住者生活及需求的全面了解,详细掌握所管理区域内的社会状况,是社区管理最基本的管理步骤,否则管理者就很难有针对性地开展管理活动,实施管理措施。但是目前的很多社区由于缺乏定期走访、调研机制,很难对管理区域内的居住者的基本情况了解到位,更谈不上全面把握社区的总体社会状况,他们所依据的大多是一些例行公事的统计数据。这非常不利于社区管理能力与水平的提升。第四,把“以人为本”理念纳入对管理人员的业绩评价中,建立居住者对社区管理人员的评价机制和考核机制。社区管理是一项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双向活动,居住者对管理人员的认可程度、满意程度是评价社区管理业绩的重要标志,这涉及到管理者的态度、行为及管理效果等。由居住者实施对管理者的评价及考核,比单纯的投诉机制更能够引起管理人员的重视。在评价及考核的过程中,管理者与居住者

可以实现双方的有益互动,就一些共同关心的管理内容进行讨论、磋商,形成密切接触的互动关系,也能够有效拉近管理者与居住者之间的距离,有益于管理者“以人为本”理念的形成与落实。

### 三、依据城市社区管理文化属性的管理模式改革思路

依上所述,城市社区管理要能够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管理为民,服务为民,仅仅依靠现有的行政管理+市场运作的模式是不够的。很显然,行政管理的刚性特征因过于拘泥于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方式,相对忽略了居住者的多样性、细微性的生活需求,尤其对居住者文化需求的关注度明显不足;市场运作则因为注重的是利益方面的责任分工,强调了金钱关系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简化为一种交易关系,更是难以满足居住者生活需求的复杂性。这种管理模式很难做到从社区管理的文化属性出发制定管理政策与实施管理行为,更不用说对被管理者给予必要的人文关怀。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重视与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多样化、细微化、复杂化,尤其是注重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满足人们的文化生活需求,正日益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城市社区管理对此也应该进行必要的改革及提升。对现有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改革的思路可考虑从以下几点入手:

其一,加强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改善社区管理机制,营造和谐的社区环境。201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代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sup>[3]</sup>社区管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层工作,体制、机制创新也甚为重要。对于这一点,建议由国家或地方立法机构对城市社区管理制定统一的法律、法规,将城市社区管理纳入社会治理的统一的法治体系。目前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虽然由城市基层街道办事处作为行使社区管理的行政主体,并有居民委员会的参与,但是在各个居民居住小区的社区管理中,街道办事处只是名义上的管理者,而实际的管理者则是各个居民居住小区的物业机构。这些物业机构的管理主要着眼于居住小区的安保秩序和物业维护,管理的方式也没有统一的法治模式,很多管理方式与手段大多取决于物业公司的自行设置。街道办事处很少参与到居民小区的实际管理中,只在宏观方面进行例行公事的指导与监控。国家或地方立法机构有必要从现有城市社区管理的状况出发,明确规定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在居民小区管理中

的地位、职责与作用,统一物业机构的管理模式,切实加强物业机构管理工作的督查与监管。同时,发挥党和政府基层组织的作用,增设民意代表参与管理,开展居民互助活动,这样有利于社区管理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管理的同时更多融入对居住者的人文关怀。特别是要在立法中重点强调社区管理文化建设的必要性,规定文化建设是社区管理不可缺少的内容,推动社区管理者重视文化建设,懂得如何依法开展文化建设。

其二,根据社区所在的地域环境和居住者的社会特点,确立文化建设主题,通过各种手段营造社区特有的文化氛围。目前我国的社区管理,主要凸显的是行政管理的特征,同时加上市场运作的一些机制。很多社区由于文化建设的缺位,造成管理刚性过强而弹性不足。管理的手段单一,易于激化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与冲突。社区管理的文化建设是引导社区管理走向人文化、弹性化的必要途径,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丰富管理内容,增加管理手段,改善管理方式,特别是有益于协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社区管理的文化建设应根据所在地域的环境特征和居住者的社会特点,确立文化建设主题,通过各种手段营造社区特有的文化氛围。自然环境中的山川地貌、人文环境中的历史文化遗产、社区居住者的社会群体特点都可以成为社区管理文化建设的资源。在充分发掘与利用这些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通过集思广益,选择与确立适合于社区特点的文化建设主题,围绕文化建设主题开展社区居住者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营造社区特有的文化氛围。如有的社区根据老年人居住者较多的特点,设计“孝”文化主题,开展敬老尊长、弘扬孝道的文化活动,营造“孝”文化氛围;有的社区根据居住者经商从商较多的特点,设计“儒商”文化主题,开展诚信经营、文明经商的活动,营造“儒商”文化氛围。有的社区地处革命老区,以传承“红色文化”为主题,在居住者中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营造“红色文化”氛围。这种文化建设,有助于形成居住者的文化认同,增进文化凝聚力。还可以加强管理者与居住者的文化联系,建立两者之间的文化沟通渠道和感情纽带。文化宣传与文化活动既要有氛围烘托,也要有细节渗透,形成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这对提升社区管理质量有很大裨益。

其三,发挥社区居住者中一些文化知名人士、文化特长人物的作用,让他们利用自己在文化上的专长参与到社区管理的文化建设中去。发挥这些文化知名人士、文化特长人物的作用,首先需要管理者主动、积极地去做好他们的工作,在充分尊重他们地位、人

格、能力的基础上,调动他们参与社区管理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并通过相应的社区机构将他们组织在一起,形成社区管理文化建设的基本队伍;其次,要发挥他们在社区管理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与为他们的居住生活的服务结合起来,帮助他们解决好居住方面遇到的各种困难,用心做好对于他们的团结工作,使他们能够在对社区管理充分信任的前提下真心实意投入到社区管理文化建设中去;再次,随着他们在社区管理文化建设作用的发挥,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自愿的情况下吸收他们参与其他的社区管理工作,利用他们的文化优势,加强社区居住成员之间的沟通,形成以文化活动为载体的新型社区沟通机制,这样既可以增强社区生活的文化气氛,又有利于解决一些刚性的行政管理不好解决的问题。

其四,做好社区管理文化建设的规划,以规划指导建设,在规划引导下开展活动。既要做好社区管理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也要做好每年的年度规划;既要做好硬件方面的规划建设,也要做好软件方面的规划建设。社区管理的文化建设硬件是基础,但软件是关键,这都需要统一规划建设。社区管理文化建设的年度规划包括项目或活动的主题及意义、主要内容、组织机构、队伍组成、实施步骤、预期效果、考核评估等等,项目或活动完成后建立台账,以资后续工作借鉴。在实施规划的过程中,应根据社区居住者不同的文化需求,做好不同文化群体的组织协调,让不同文化群体尽可能参与到社区文化建设的活动中来,让社区文化建设惠及广大居住者,充分发挥社区管理人文关怀的作用。

其五,社区管理文化建设要注意把一般性的文化建设内容与居住者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不仅有组织地实施文化项目,开展各种文化活动,还应该将这些项目或活动内容渗透到居住者的日常生活中去,让这些文化建设内容潜移默化地影响、熏陶居住群体的精神,真正发挥好文化建设的作用。否则就容易形成文化建设与日常生活两张皮。说到底,社区管理文化建设的作用不仅只是丰富人们的生活内容,更重要的是影响居住者的精神素质,切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譬如,在社区开展传统文化活动,就应该把传统文化的仁爱、忠孝、诚信、谦虚、勤劳、节俭等等理念贯彻其中,结合人们日常生活内容,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去影响到居住者。在社区开展现代文明教育,就应该把尊道德、讲礼貌、爱自然、讲卫生、勤锻炼、乐互助、善学习、求上进、睦邻舍、讲团结等等这些基本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渗透到各种文化建设项目与活动中去,使人们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受到教

育。要注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注意从引导人们的生活习惯入手,建立现代文明行为规范,提升居住者的文明素养。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中,应该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借助于传统文化资源来建构适合于现代人生活的现代文明。这应该是社区管理文化建设的主导方向。同时,社区管理也应该注重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救助,社区管理人员中应配备适量的心理咨询人员,开展对居住者的心理疏导。要注意发挥现代网络技术的作用,把网络也建设成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现代文明精神的阵地。说到底,城市社区管理的文化建设必须与人们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切实起到改善人们精神生活质量的作用,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

**结语: 居住应该成为一种“诗意的栖居”**

马克思认为人的理想的生活状态应该是一种审美

的状态。这种审美状态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人的和谐统一、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劳动与生活的和谐统一。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经说过:“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sup>[4]</sup>。而能够使人们逐渐进入居住的“诗意的栖居”或审美状态,发挥好文化的功能尤其重要。

#### 参考文献:

- [1] 城市社区管理[OE/CD]. <https://baike.so.com/doc/6977793-7200494.html>.
- [2] 全域大党建、城乡精治理——四川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N]. 光明日报, 2020-09-27(6).
- [3] 青连城. 习近平总书记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OL]. 人民网, 2017-08-17.
- [4] 海德格尔. 人诗意地栖居[M]//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02.

(上接第78页)

- [75] Lin Y, Zhang L. Reward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s of the Flexible Retirement System in China[J]. *Advances in Applied Sociology*, 2018, 08(05): 366-377.
- [76] 葛建华, 赵梅. 延迟退休的适用性矩阵: 对不同行业和岗位的分析[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8(02): 81-91.
- [77] Knoepfel, P., Corinne, L., Frédéric, V. & Hill, M. *Public Policy Analysis*[M].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2007.
- [78] 陈水生. 什么是“好政策”? —公共政策质量研究综述[J]. *公共行政评论*, 2020, 13(03): 172-192+200.
- [79] 路春艳, 张景鸣. 城镇职工延迟退休意愿分析[J]. *调研世界*, 2019(09): 17-23.
- [80] 郑功成.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22): 19-27.
- [81] 靳卫敏. “延迟退休”决策中的观念与利益博弈[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2(03): 37-41.
- [82] 于长永. 延迟退休年龄: 基于退休源头视角的争议透视[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1(01): 11-21.
- [83] 孙伟, 黄培伦. 公平理论研究评述[J]. *科技管理研究*, 2004(04): 102-104.
- [84] 黄少安, 陈言, 李睿. 福利刚性、公共支出结构与福利陷阱[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01): 90-113+206.
- [85] 赵昕. 家庭联合退休行为研究述评与展望[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21, 38(03): 109-126.

## A Review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China's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Evaluation

LI Ka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ublic policy for China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has aroused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 In the early stage, the scholars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retirement policy on the perspectives of pension security, medical security, labor and human capital, family ferti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lderly health, social employment, social welfare,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Further, the scholars studied deeply whether or not to delay retirement. The research will transfer to policy prior assessment, implementation and result of policy, and policy suppor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evaluation; effect; review

# 顾颉刚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

戴 磊

(南昌大学 历史系, 南昌 330031)

**摘 要:** 顾颉刚生前十分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历史脉络中, 顾颉刚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足迹。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 顾颉刚基于“学术救国”的考量, 大力倡导中国近代史研究, 积极开展中国近代史研究, 并广泛搜集了中国近代史史料。顾颉刚的研究理念和实践, 为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化、专业化做出了有益探索。

**关键词:** 顾颉刚; 中国近代史研究; 史料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2)05-0085-06

顾颉刚(1893-1980), 江苏苏州人, 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位巨匠。其一生建树甚多, 成果丰硕。对于顾先生的学术,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他在中国古史、民俗、沿革地理、边疆与民族等领域的成就。而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有专文对此予以讨论。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 顾颉刚就大力倡导并积极开展中国近代史研究, 并广泛搜集中国近代史资料, 为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化做出了诸多探索。梳理和讨论顾颉刚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念与实践, 有益于我们认识顾颉刚的学术思想及贡献, 也有益于厘清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轨迹。

##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倡导者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中国的史学研究处于一种畸形状态, 研究多在古史方面, 而忽视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学者明确指出当时的史学界“嗜古成癖, 注意上古史而忽视近代史”<sup>[1]</sup>。这种局面的出现, 原因是多方面的。彼时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关注的人少, 亦属正常。正如罗家伦所说: “研究中国近代史是实际的需要, 也是知识的要求; 但是中国现在看重这种研究的很少……这也有这些缘故。第一是因为学者的好古心, 觉得材料愈古的愈可尊重。”<sup>[2]</sup>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核心人物, 1923年就提出了著名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说, 在古史研究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也意识到了彼时史学界重古

史研究, 轻近代史研究的不良风气。1929年, 顾颉刚于《对于苏州男女中学的史学同志的几点希望》一文中说道: “我觉得现在一般人研究历史, 往往喜欢上古。差不多以为惟有上古是历史。其实这是错误的。须知史是多方面的, 不能偏重上古, 看轻了近代, 也不能注意近代, 忽视了上古。不过因为近代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sup>[3]74</sup>1945年, 顾颉刚又在其《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强调道: “当代史学界中, 有许多学者集中于古史的研究上, 已得到相当的成就, 对于中古史以及近代史的研究, 反而热心较差, 这种畸形的发展可以说是史学界的不良现象。”<sup>[4]427</sup>不难发现, 顾颉刚是一位特别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古史研究学者。他强调中国近代史与现实的关系更为紧密, 并呼吁更多人去研究中国近代史。

八国联军侵华以后, 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反帝救国运动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之下, 顾颉刚认为救国不能光喊口号, 而是要下死功夫做研究, 倡导学术救国。他认为, “我们要救国家于危殆之中, 学术的研究应当极端注重”<sup>[5]200</sup>, “表面的工作已经做了不知多少次了。如果能以开会, 请愿, 贴标语, 喊口号而救国的, 中国也早已成了强国了。这个觉悟, 如还没有, 正不必空言救国。此后我们所要下死功夫研究的, 就是怎样可以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 真正去唤醒民众, 作有效的抵抗?”<sup>[3]88</sup>由此, 顾颉刚自20世纪二十年代起, 就大力倡导研究中

收稿日期: 2022-04-22

基金项目: 2020年南昌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骨干培育项目“史地教育委员会与抗战时期的学人及学术”(QN202005)。

作者简介: 戴磊(1989-), 男, 江西抚州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

国近代史。正如他在写给谭惕吾的信中所说：“救国的方法万端，研究学问也未始不是一种救国的工作。例如五七、五九，是大家纪念的，究竟我们中国吃了廿一条的亏到怎样？怕没有几个人能说。这是不能责之于社会上活动的人的，只有我辈缩在后面的人能担当这个责任。你学史学，研究近世史是可以直接救国的，你还是选取这条路吧！”<sup>[6]259</sup>很显然，顾颉刚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则是学术救国的重要手段。因为研究中国近代史，能够解释现在，唤醒民众，而不是把救国停留在表面的喊口号上。基于此种认识，顾颉刚冀图改变现状，鼓励人们投入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之中。

其一，引导更多的青年学子去研究中国近代史。1925年10月，顾颉刚在《再论救国与工作》一文中就呼吁年轻学子们从不同学科背景出发，选择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题目。他说：“无论做什么学问，都须有一种练习的题目。政治运动的方面很复杂，在现在中国政治状况百孔千疮的时候，可以着手的方面尤为繁多。要寻一个练习的题目，是极容易的事情。例如学法律的便可选一个‘领事裁判权’的题目，学经济的便可选一个‘关税协定’的题目，学政治的便可选一个‘帝国主义’的题目，学历史的便可以选一个‘国耻史’的题目，……例如领事裁判权可以就法理与事实分工研究，又可就甲国与乙国分工研究；关税协定可以就条约与统计分工研究，又可以就输入货物与输出货物分工研究；……我们认定了一个题目，就可以留心收集材料，把收得的材料随时排比整理，把整理所得的结果随时发表，务使一班人确能知道救国的不容易，务使他们所作的救国运动不致随着兴致而为起落。有了这种清楚的智识之后，岂但一班国民的救国运动不致如此的有始无终，就是学生界自身也不致如此的有始无终了。”<sup>[5]202</sup>1930年7月，他在致罗家伦的信中也强调：“以近世史的复杂与切用，实当有许多人从事工作，乃现在青年学子喜治古史而不喜治近代史，弟每叹息。推原其故，只因古史方面有弟等鼓吹，而近代史方面，兄等乃不作鼓吹也。窃谓此事鼓吹之责，兄义不容辞，应急以研究方法昭示青年，使毋向二千年前的故纸堆中钻去。”<sup>[7]254</sup>不难看出，顾颉刚是希望罗家伦等人能积极引导青年学子们去研究近代史。

其二，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去落实研究工作。这里以顾颉刚的友人罗家伦和谭惕吾为例。罗家伦在留学欧美时（1920-1926），就明确地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定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并希望能够写出一部中国近百年通史。但其于1926年回国后，研究工作进展十分缓慢。针对此种状况，顾颉刚曾多次致信罗家伦。1926年12月9日，顾颉刚致信罗家伦，说道：

“兄和孟真归国后，不想作文发表。专事作文发表固然无聊，但胸中实有意见，何必藏起呢？”<sup>[7]246</sup>1930年7月31日，顾颉刚致信罗家伦，说道：“兄常谓不敢写文，此故是郑重，但好久不写终要不能写，且材料搜集是会完的，如要等待材料搜完而后作文则实无此事。故有许多地方不得不鲁莽一点，只要许人驳诘或常自修改，则一时鲁莽固无甚弊害也。愿兄遭此横逆，不要灰心，努力于‘自己园地’的修治。等到你自己的园地垦殖完工时，这辈无聊的捣乱者早已化为飞尘了。”<sup>[7]254</sup>1932年2月13日，顾颉刚又致信罗家伦，说道：“国民精神昏庸衰老如此，欲求国之不亡，何可得也，……兄所作为积极之工作，尤足以唤起国民向上之精神。愿分篇发表，待将来集为一书。”<sup>[7]255-256</sup>可见，顾颉刚多次劝慰罗家伦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并希望罗家伦能及时地将经验总结、心得体会、学术思考以及研究成果公开发表。顾颉刚还希望谭惕吾也能够下定决心，积极寻找近代史问题，搜集材料，落实研究，争取成为近代史专家。1928年8月4日，他致信谭惕吾，说道：“现在我们的生活比较安定了，我对于古代史，你对于现代史，虽仍不能上研究的轨道，总算日在接触之中了。我很希望我们从此预备，在以后的适当的环境中成此巨著。假使此书分为二册，则即以鸦片战争为分界，在此以前直至上古，为上册，由我主之。这或者有人要怀疑，以为上册年代太长，史事太多。材料的分配不免太轻重了。但是我以为我们作史，应以历史上问题之多少为标准，尤其作民众读物的史，应以说明切身的关系为主体。照我想，过去的三千年历史中所包含的问题与最近的一百年历史中所发生的问题相较，在数量上必可相当；何况在切身关系上，近代史的重要远过于古代史呢。……你如果肯答应我的，我希望你先在笔记簿上寻出近代史中的问题，提出了题目之后，再去搜集材料，就比较容易。……我更希望在这五六年内，你能以发表论文，在社会上获得近代史专家的地位，使得将来能得到文化机关的供给，游历各国，去搜集材料和解决问题。”<sup>[6]259-260</sup>

##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践行者

顾颉刚本人也积极投身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践之中。他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应当重点关注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太平天国史和清史三个方面。<sup>[8]300-301</sup>直到晚年，顾颉刚依然在呼吁加强上述三方面的研究。<sup>[9]452-454</sup>具体而言，他强调研究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是因为他认识到“中国到现在还不能翻身，帝国主义还是加紧的压迫，经济的侵略，武力的压迫，那一方面不够厉害。我们要使人人明瞭这种详细情形，一部

详细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有待于纂作的。我们要用客观的史学意义，说明各种必然现象。”<sup>[8]300</sup>他强调研究太平天国史，是因为他认识到“太平天国虽然只短短十几年的历史，可是直接间接于推翻满清帝制都很有影响的。我们距太平天国还不远，应该尽力搜集中外书籍中的材料，访问各地故老能说洪杨事者，完成一部比较完备的太平天国史。”<sup>[8]300-301</sup>而他强调研究清史，则是因为他认识到，“虽然已有《清史稿》，可是满清一代，外交上，财政上，学术上，各方面与外国的关系最大。应去用新史学的方法，才能编一部比较完备的清史。材料应考各种外国书籍，方法应当尽量用各种图表。”<sup>[8]301</sup>若是从实际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顾颉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实践主要集中在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方面。

顾颉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始于1925年的“五卅惨案”之后。该年六月，北京大学为“五卅”事件成立了救国团，并在《京报副刊》上编辑出版《救国特刊》。顾颉刚是救国团的重要团员。1925年6-10月间，他在《救国特刊》上发表《上海租界》《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之一——江宁条约》《不平等条约之二——天津条约》《不平等条约之三——中法条约（天津条约之二）》等文章。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顾颉刚又特别关注近代以来的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边疆的历史。他在1938年1月又写作了《英帝国主义与中国边疆》《帝俄时代与中国边疆》两篇文章。顾颉刚写作的这些文章带有强烈的致用意图，能作为向群众宣传动员的工具，供一般社会民众的阅读。他自己也曾说过，“我们作史，应以历史上问题之多少为标准；尤其作民众读物的史，应以说明切身的关系为主体。”<sup>[6]259</sup>顾颉刚是希望广大民众能借此弄清中国衰败由来，以历史唤醒民众，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这些文章的写作，是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和需要，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性和普及性。

顾颉刚的《上海租界》一文中梳理了上海租界是被帝国主义偷去的经过，指出：“上海的租借是鸦片战争来的，鸦片战争是从英商私卖鸦片起的，他们得了租界之后，先收市政权，再收司法立法权；他们不认上海为中国的土地，不认上海为有国家保护的人民。”顾颉刚还在文中呼吁中国人民应当勇敢地夺回租界。他说：“试问他们得到这许多权力全是偷来的与抢来的。哎呀，偷了人家的东西，抢了人家的东西，还要摆出十足的架子给主人看，这是什么话！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对待他们，就是理直气壮的向他们取回偷去和抢去的东西。”<sup>[5]134</sup>

顾颉刚的《鸦片战争》一文回顾了鸦片战争的过程，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人第一次在武力上丢脸的事情，也是中国人受西洋人压迫的开头。可是，中国是虽败犹荣，英国是虽胜犹辱，因为鸦片原是害人的毒物，中国人拒绝他是要做人，英国人强迫人家吸食毒物是先把自己的人格打消了呵！这件事情只要永远记在人的心里，英国的耻辱就永远洗刷不去。”<sup>[5]135</sup>他在文中还痛陈了鸦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危害，指出“一般没志气的中国人，不想想鸦片战争的痛史，大家很高兴的收受了这宗号称洋药的毒物，一个个的在家里吞云吐雾起来，仿佛有了鸦片战争才能得到这种福气似的。诸位试想一下，我们的家族，我们的亲戚，上一辈人的不抽鸦片烟的能有几个？一想到了这种情形，恐怕都不免要叹一口气吧？然而外国人赚了我们的钱，却在旁边笑我们了，他们把我们的烟枪、烟斗、烟灯、烟盒、烟盘，收了一个全分，放在博物院里，给大家瞧，说中国人抽烟的样子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抽烟的人多，所以国家贫弱的不成样子了！可怜，可怜，中国人出了这许多钱，受了这许多气，伤害了这许多人的身体，弄到底，却卖主取笑了一阵！他们不是把我们中国人当做猴子一般的耍弄吗！”<sup>[5]140</sup>

顾颉刚的《不平等条约之一——江宁条约》《不平等条约之二——天津条约》《不平等条约之三——中法条约（天津条约之二）》三篇文章搜集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中法条约》的原文，并在条约原文的后面写下自己的按语。顾颉刚认为：“我们仅喊‘废除不平等条约’，可是不平等条约究竟有多少个，内容是怎样的，却很少有人知道。不知道而尽力嘶喊，那不是空喊了吗？”他希望人们能够清楚地弄明白不平等条约的数量、内容和危害，进而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他说：“要是不平等条约本是一个海上蜃楼，我们只消念了一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咒语就可顷刻消灭于无形的，我们当然不必如此费事。倘使大家还知道不平等条约如石头般的顽强，如水银般的无孔不入，如苍蝇般的一粒细小的卵，只要任他生殖到九十六回，便可三绕大地，杀尽人类而有余，我们要废除它，当然不是轻易的事。我觉得除了确实确实的明白之后，大家肯立起了百折不回的志气，肯用尽自己的精力去从事撤废运动之外，是没有做成希望的。‘天助自助者’，我们懒惰成性的中国人还有力自奋勉，博得上天的佑助的一天吗？”<sup>[5]142-143</sup>

顾颉刚的《英帝国主义与中国边疆》《帝俄时代与中国边疆》两篇文章分别回顾了英、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边疆的历史，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呼吁

人们团结起来，挽救危亡，巩固边疆。他在《英帝国主义与中国边疆》中说：“他们把握住了我们沿海的重要城市，更想占有我们的西南半壁，好同缅甸、印度联作一块；他们为了贩卖鸦片毒物，不怕羞耻，对我们开爨，对我们首创不平等条约，引起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我国的野心，几陷我们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这实在是我们的最大敌人。只因十余年来，日本对我们作露骨的掠夺，而英人虽暗地不息侵略，表面上却颇客气，例如归还威海卫，取消镇江、九江、汉口等租借，撤退占据云南的军队，遂得转移我国国民的视线，仿佛他们真有好意对待我们似的。我们国民决不可因此小惠而忘大祸，应当对于英人的行动加以严密的监视，再从速实际调查，确定滇缅界线，安抚藏民，使他们明瞭自身的地位，知道惟有共同团结才可挽救危亡，这样，我国西南边疆便有屹然巩固的一天。”<sup>[10]</sup>

### 三、中国近代史史料的搜集者

史料搜集是研究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和水平。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罗家伦、蒋廷黻、陈功甫等学者以及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机构积极开展中国近代史史料搜集工作。对史料进行搜集和整理，也是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界的共识。顾颉刚也认识到了搜集新史料的重大意义，“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籍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sup>[4]324</sup>。他在中国近代史史料的搜集方面同样功不可没。顾颉刚搜集工作主要是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禹贡学会三个时期。

在厦门大学任教时期，顾颉刚受罗家伦的影响，形成了注重搜集近代史史料的观念。罗家伦生前把史料的搜集工作视为科学历史学的前提，还在留学期间就开始着手搜集中国近代史史料。1926年7月，他携带大量从国外搜集到的史料和图书归国。回国后，罗家伦依然在为搜集近代史史料奔波。1926年8月11日，顾颉刚因前往厦门大学任教，路过上海，拜访了罗家伦。据顾颉刚致胡适信中描述，“此次过沪，晤志希。他预备以毕生之力成《中国近百年史》一书，搜集材料已有数百种，将编为‘史料丛书’”。<sup>[7]436</sup>此外，罗家伦还对顾颉刚谈及了自己“中国近代史博物馆图书馆”之设想。1926年9月8日，罗家伦又致信已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希望顾颉刚能够推动厦门大学赞助其搜集中国近代史史料。他在信中说：“弟之研究，非有大宗经费搜集材料不行。厦大诸公如能从这方面赞助，受益者不仅弟之研究，而为将来之学术界（即将来研究之人）。弟于中国近代史留心以来，

不敢谓有研究，但于材料方面略知其所在及性质（大都指欧美方面），深感此时如不搜集，则多过一年，即困难一年。……如厦大或厦大校董能举行此事，将来以此地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之宝藏及策源地，则可使将来政府见而生愧（指像样的政府而言）。”<sup>[11]377</sup>罗家伦在信中还为厦门大学拟定了六项搜集计划。一是可以设法购得的原本材料；二是不可购得而可照相或钞写的；三是尚可得的绝版西文书籍关于中国史料者；四是随时购买新出的西文书籍关于中国史料者；五是尚可得到，但是已绝版的中文书籍关于中国之史料者；六是随时购买新出的中国文的史料。<sup>[11]377</sup>罗家伦希望厦门大学至少能先做三件工作：1.派人去北京将清宫重要档案照相及抄写副本；2.资助其愿前往北京，研究清宫文件；3.设法购买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供词原稿。<sup>[11]378</sup>他还指出：“此等工作，日本人早经注意，而中国尚无萌启，可叹！可叹！”<sup>[11]378</sup>很明显，罗家伦在信中给顾颉刚强调了搜集近代史料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了具体的计划。但此时“陈嘉庚先生本年秋间橡皮业失利，除教员薪金外，每月以致校中百务停顿”<sup>[11]379</sup>，无法提供“大宗经费”。罗家伦寄予厦门大学搜集史料的希望成为了泡影。

通过与罗家伦的多次交流，顾颉刚对于搜集中国近代史史料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刻。顾颉刚认为罗家伦在信中所提出的史料搜集计划“非常周密”<sup>[7]245</sup>。1927年，顾颉刚离开厦大，转而任教于中山大学。他将罗家伦写给他的信定名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刊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二卷第十四期。客观而言，在搜集中国近代史史料方面，顾颉刚所受罗家伦的影响很大。这也是顾颉刚日后积极搜集近代史史料的动因之一。顾颉刚赞同罗家伦的“中国近代史博物馆图书馆”之构想。1927年6月9日他在致罗家伦的信中说：“弟意，南京最好设立一个史料库，自本年正式成立政府起，一切公文均保存在内，以备国都中各机关各学者的应用。本年以前之公文，亦应尽力搜集。吾兄任编史委员长，此事大可即办。将来党军到北京，即可合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京师图书馆、北大研究所（中藏明清档案甚多）为一大规模之博物馆，以故宫全部为院址，南自中华门，北至地安门皆在内，分为图书、古物、史料三部。广东方面，由弟等努力为之。将来全国南北中各有蒐集史料之机关，于研究历史上非常方便，而兄要做的近百年中国史也一定做得成了。”<sup>[7]250</sup>对于罗家伦所提编辑史料丛刊一事，顾颉刚也是十分认可，指出：“以前，兄拟编辑史料丛刊，希望把这项工作仍旧做下去。弟苟有所见，亦当代为

搜集。”<sup>[7]250</sup>

入职中山大学后，顾颉刚切实地开始着手搜集中国近代史史料，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1928年夏秋间，顾颉刚被中山大学派往江浙一带购买书籍，收购了大量珍贵的近代报刊杂志。他回忆道：“我定的计划里很注重搜集近代史料，可是近代史料不在藏书家注意的范围之内，书贾也看作无用，所以书铺里是很难找到的。偶然有几处零落的旧家当它废纸卖，我便很高兴地收受了。……经了五个月的时间，居然得到旧杂志数百种。三十年来支配全国思想的刊物，如《万国公报》《格致益闻汇报》《湘学报》《知新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庸言报》，都有了。尤快乐的，清末大学士王文韶家里散出一大批旧官报，如《谕摺汇存》《北京新闻汇报》《时事采新汇选》等，保存了光绪一朝的公文，都买来了。陈乃乾先生在上海替我买到《政府公报》《外交报》《江苏公报》，民国以来《申报》全份，我自己又在杭州买到《浙江公报》《浙江军事杂志》，以及浙江咨询局和省议会的全份刊物，二十年中的重要史料虽然不完全，总算有了一个模。……我切盼各处的图书馆都能注意到‘当时’和‘当地’的材料，轶出通常的藏书范围，专到旧家去寻废纸，到小书摊上去寻破杂志，使得研究近代史的都得着检取材料的方便。我更希望本校将来能够建立一个‘近代史料大库’。”<sup>[8]290-291</sup>

1929年1-2月，顾颉刚担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期间，他制定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计划书》，强调历史方面的工作以搜集近代史史料为重点，包括：一，尽量收集两粤官厅旧档案；二，登报征集近三百年史料；三，征求地方志及家谱；四，征求一切私人记载。五，征求各种宗教史料。六，搜集旧报纸及旧杂志。……十，编纂史料丛刊。……十二，设立革命史料陈列室。<sup>[8]299-301</sup>不难看出，这一时期顾颉刚搜集史料的视野开阔，范围延展，包括了档案、报纸杂志、私人记载等多方面。顾颉刚的史料搜集也明显带有罗家伦的影子，体现在编纂史料丛刊、设立革命史料陈列室等方面。《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计划书》的出炉，标志着顾颉刚对近代史史料的内容以及搜集方式的认识更为成熟、系统。然而，顾颉刚于1929年5月返回了北平，担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他未能亲眼见到《计划书》中近代史史料搜集各项工作的开展。

禹贡学会于1936年5月成立之后，在顾颉刚的主持之下，大规模搜集中国近代史史料，尤其是档案史

料，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早在1930年，顾颉刚就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档案史料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性。他说道：“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中央研究院、故宫博物院，所存皆甚多。乃近代军事史唯一材料，将来不知道能作多少的工作。……能整理好，能做出部很好的近代史来。以前的近代史，因无此方面的材料，故不易见好。今能从此方面入手，能得到好结果那是必然的。”<sup>[8]327-328</sup>1936年6-7月间，禹贡学会从纸商手中买来为数约四千多斤，三四万卷的档案史料。这些档案囊括的范围广阔。其中既有户口、田赋、漕运、白粮、仓储、库藏、盐课、常关、海关、杂课、杂税、粮饷、驿站、河工、洋药、土药、洋货、土货、水旱、囚粮等方面的普通档案，也有大量“各处所没有看见的特殊的档案”<sup>[9]226</sup>。禹贡学会所搜集特殊档案的具体类别、内容、价值情况。（见表1）

不论从时代上看还是从内容性质上看，禹贡学会购买的档案都是特有的史料。因为当时故宫文献馆、北大、史语所搜集到的清季光宣两朝的档案少之又少，而禹贡学会有了两朝档案，就可以补充各处之不足。另外，这些档案与近代史研究关系十分密切，因为“光宣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不过的时代；中法战争，甲午及庚子之役，都在这个时期发生；帝国主义的经济的侵略，都在这个时期开始产生实际的影响，从而更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两朝之多特殊的档案，即以此故。”<sup>[9]227-229</sup>禹贡学会购买的档案是研究近代帝国主义侵华史、边疆史、战争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灾害史的一手史料，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 余论

20世纪初至四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萌芽和兴起阶段<sup>[9]12</sup>。在这一阶段中，顾颉刚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足迹，其贡献不应被忽视。自20世纪二十年代起，顾颉刚就立足于“学术救国”的考量，大力倡导中国近代史研究，推动改变当时“注意上古史而忽视近代史”的不良风气。他主张把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相结合，而不是单纯为学术而学术，并写作了一批有着现实观照的文章。由于强烈的学术致用，使得顾颉刚的这些文章具有了明显的政治性色彩。顾颉刚还搜集了大量珍贵的中国近代史史料，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建设。总之，顾颉刚的研究理念和实践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也扩大了中国近代史的影响，为推动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化、专业化做出了有益探索。

表1 禹贡学会所购特殊档案一览表

| 序号 | 档案类别           | 备注  |
|----|----------------|---|
| 1  | 边疆档案           | 禹贡学会本来注重边疆问题, 恰巧这次关于边疆和国防的档案很富。计有: 1. 内外蒙古、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处的各盟旗, 军、政、口税、马市的档案; 2. 新疆省俄商、卡伦、汉、回、教民各档案; 3. 青海、甘肃等处之边备及剿平回乱等档案; 4. 东三省将军、府尹、副都统及总督、巡府等的册报档案; 5. 西南各省的土司苗蛮档案; 6. 西藏办事大臣及交通道路台站各档案。 |
| 2  | 海防档案           | 这类档案也是于中国国防上很重要的。计有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份, 都是太平天国及甲午战争以后政府对于该各省重新布置海防军备的纪实。   |
| 3  | 甲午档案           | 这是东三省及关内外在甲午战争时代的档案。从这种记载上, 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军队的怎样调遣布置, 以及子弹军需的如何运输供给。   |
| 4  | 庚子档案           | 这是八国联军入北京的时候, 俄人占领东北各地的详实记载。见了这种档案, 可以知道当时俄人在那里是如何的野蛮, 残暴, 不人道。如何的破坏东三省; 如何的危害三省同胞的生命财产。  |
| 5  | 太平天国暨甲午庚子以后的档案 | 这是清政府经过太平天国之役、中日之役、联军之役以后, 对于全国各省地方军备政治财政各种问题的善后档案。   |
| 6  | 充军档案           | 这是清季囚犯充军实地的档案。这些档案中, 我们可以知道这种政策的重要性及我民族向外发展的状况。   |
| 7  | 垦边档案           | 这是边省各地方开垦荒地的档案册。这种档案册也非常可以注意: 其中所垦之地, 皆有图形, 且详载垦户地亩之坐落、四至、面积、弓尺、科则、收价等。   |
| 8  | 银价粮价档案         | 这是各省府厅州县地方所调查呈报的各该地方每年每月的各种银价钱价暨各种米豆麦面粮食等等的价值变迁之报告。   |
| 9  | 械器档案           | 这是各省所设机器局购买外洋械器, 聘用外洋技师, 暨制造各项械件枪炮子弹的档案。  |
| 10 | 湖北枪炮局档案        | 这是湖北枪炮局所独有的专门册籍, 其性质内容, 大抵与各省械器局的档案相似。  |
| 11 | 江南制造局档案        | 江南制造局在中国近代史上, 占很重要的地位, 其档案之性质内容, 也和前项相仿佛。   |
| 12 | 铁路工程及铁路货捐档案    | 这是清季建筑各项铁路的工程及津浦铁路的各类货捐的档案。其中对于建路时的购地, 中外技师, 内外款项, 及各种工程之开支, 至为详细。其津浦货捐档案, 对于该路各站卡之货物明目种类, 所载亦甚详。   |
| 13 | 西北通商档案         | 这是俄国领事暨中国地方当局所调查报告的新疆各地中俄贸易情形册。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西北人民需要的是什, 俄人所交易的是什, 中国对俄贸易是怎样的失败, 地方入超是怎样的悲惨惊人!   |
| 14 | 总税务司档案         | 这是清季总税务司赫德裴式楷、安格联等对于该司各种收支的总报告。   |
| 15 | 易知由单档案         | 这是一种盐课的易知由单, 记载各种不等的科则、商户, 乃清季政府所以取信于民的重要材料。关于易知由单, 只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大库档案中发现了些关于田赋条编的, 至于盐课的易知由单档案, 则各处皆鲜见到。   |

资料来源: 顾颉刚:《禹贡学会的清季档案》,《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二》, 中华书局2010年版, 第226-228页。

## 参考文献:

- [1] Cyrus H. Peake, 著作氏, 译.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资料[J]. 清华周刊, 1933(11-12): 1108.
- [2] 罗家伦.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J]. 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 1931(1): 139.
- [3] 顾颉刚. 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4] 顾颉刚. 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5] 顾颉刚. 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6] 顾颉刚. 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7] 顾颉刚. 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8] 顾颉刚. 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9] 顾颉刚. 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10] 顾颉刚. 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374.
- [11] 罗久芳, 罗久蓉, 编. 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M].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2009.
- [12] 龚云. 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取向[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 45-60.

# 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策略研究

文玉花<sup>1</sup>, 郭斐<sup>2</sup>

(1. 山东警察学院 办公室, 济南 250200; 2. 齐鲁师范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济南 250013)

**摘要:** 高校档案信息化能够为档案提供良好的存储环境, 提升档案管理质量, 促使档案管理规范化, 促进档案资源开发利用, 推进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当前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存在重视程度不足、人员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不完备、管理手段滞后等问题, 应强化档案信息化建设理念,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档案队伍结构, 逐步实现以信息化、数字化、智慧化为中心的现代化档案管理。

**关键词:** 高校; 档案管理; 信息化建设; 策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 C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2)05-0091-04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明确提出了“档案馆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 保障电子档案、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成果等档案数字资源的安全保存和有效利用”<sup>[1]</sup>。

《“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在发展目标中指出, 档案信息化建设再上新台阶, 同时在主要任务中强调, 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 引领档案管理现代化。<sup>[2]</sup>

高校档案信息化是指高校档案部门按照国家档案管理部门的要求, 以档案信息化资源建设为核心, 以纸质档案数字转化存储为基础, 以计算机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多媒体技术及网络平台建设为手段, 以最前沿的档案管理理论为指导, 集自动检索、信息管理、高效存储等为一体的现代信息化管理模式, 是提高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的重要工作<sup>[3]</sup>。高校发展过程中各项工作的开展都要以充分、完整、准确、全面的信息为基础, 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分析、决策和判断。档案管理只有全面实现了信息化, 才能在海量的信息资源中快速提取准确信息, 高效服务于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 一、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研究现状

我国档案信息化建设研究起步较晚。自2002年国家档案局发布《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 尤其是《“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发布后。国内相关研究才开始启动。董金玲认为档案全文数据库建设缓慢, 亟待加强<sup>[5]</sup>。路玲玲从管理体系、信息

安全、管理人才、利用率等方面研究了高校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sup>[6]</sup>。刘小雪基于新《档案法》, 对应用系统、信息资源、标准规范及人才队伍等进行了探讨<sup>[7]</sup>。夏秀琴针对浙江地方高校在档案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解决措施<sup>[8]</sup>。李爱华认为高质量研究成果、高校档案工作者研究成果、调查分析和量化分析成果及具体门类研究成果较少<sup>[9]</sup>。梳理近年来相关文献, 基于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研究还需要从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加强。

## 二、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的作用

### (一) 提供良好的存储环境

高校档案信息化管理是由组织实体和软、硬件系统构建的一种计算机网络信息环境, 其关键步骤是将馆藏量巨大的纸质原始档案, 通过数字化采集, 运用计算机技术转换为多种格式的电子文档, 实现全面数字化, 形成数量众多、类目丰富的电子档案信息资源, 建立起高校电子档案数据库。数字化档案的出现, 有利于原始档案的长期保存、管理和利用, 由此彻底改变了传统载体档案环境要求高、占用空间大、易腐蚀老化等现象, 解决了档案库房空间不足及管理

### (二) 提升档案质量管理

信息化时代, 高校档案的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先进的智能管理方式下, 无论是原始纸

收稿日期: 2022-04-19

基金项目: 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地方师范类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研究”(ZZ2019013)。

作者简介: 文玉花(1965-), 女, 山东惠民人, 副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档案管理、教育管理研究。

质档案的保存,还是数字化档案的利用,都在有序而高效地进行。首先,档案信息化将为当今社会发展提供巨量精准可靠的信息资源,服务广大师生在日常的教学科研学习及行政管理工作中多样化的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有效扩大了档案资源信息化管理的服务领域,丰富了档案资源管理的手段及方式,最大限度的实现档案资源利用价值,促进了档案管理质量的提升。其次,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档案在信息化管理模式下,充分利用云平台及大数据手段,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网上远程共享。档案人员利用计算机将档案系统与学校其他业务系统如科研系统、教务系统以及办公自动化系统等通过网络进行对接,对各部门工作中不同类目、不同内容的电子文件资料及时上传、随时接收、归档存储、管理利用,继而保证档案资源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提高了档案资料收集的时效性,大大减轻档案部门的工作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极大改变了原有的人工化、扁平化的高校档案管理模式,推动了档案管理工作从“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变,实现了档案扫描全文和目录的固有模式向丰富多样的大数据档案模式的转化,基本完成了档案的数据化管理。对档案全文的著录数据化,对文本和图像中的数字内容实行数据化的识别、分类、著录和标引,能够快速准确地利用检索词检索到与之相对应的档案信息内容,大大节省了查阅时间,提高了档案管理工作效率,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优质高效的档案信息服务。

### (三) 促使档案管理规范化

档案信息化推动了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首先,通过对信息化建设大力宣传,提高高校师生的标准化、规范化意识,明确档案管理部门和学校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建立标准统一的高校档案管理体系。学校层面制定档案部门的管理职能、岗位编制、人员调配和全校档案管理的发展规划,给予宏观上的指导。作为具体职能执行的档案部门,具体负责贯彻落实学校决策,做好档案的一系列信息化管理工作。负责党群、行政、人事、科研、教学、基建、财会等具体工作的职能部门,依据本部门的立卷归档范围,严格按照分工,由部门兼职档案员做好档案材料的收集、立卷、录入、挂接工作,由此实现高校档案管理规范化。其次,根据高校档案管理的专业化特性,以《档案法》《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在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制定详细的高校档案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具体细化量化工作标准,明确档案部门和学校职能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在档案管理过程中的职责范围和主体责任,杜绝档案信息资料丢

失、泄露以及失真等情况的发生。<sup>[4]</sup>

### (四) 促进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高校档案工作实现了由传统封闭馆藏管理向现代化开放型信息管理的快速转化,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采取加密设限管理手段,充分保障了档案信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利用者可以随时通过电脑端和微信端进行远程预约查询,极大方便了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社会共享。

随着档案社会效益的凸现,人们的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利用对象也发生了新的改变,社会公众对档案的利用率不断攀升。高校电子档案的出现和逐步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了档案工作的服务范围,加大了档案资源的开发力度,使档案利用走向社会,超越时空局限,便于更多的人深入了解档案、广泛使用档案,充分体现了档案的社会价值。

### (五) 推进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

高校档案是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中长期积累形成的原始记录,是高校建设发展的宝贵财富。档案信息化能够为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精细化、深层次的利用服务。譬如,高校教学评估工作,查阅各种原始档案材料已经成为评估专家全面了解和深入考察学校办学情况,由此对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作出全面、客观、公正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档案信息化之后,各部门在评估工作时间短任务重,需要提供完整、系统、准确的档案资源的情况下,能够快速精准地提供各种教学资料,保证教学评估工作的顺利进行。

## 三、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一) 重视程度不足

大多数高校将工作重点放在学校的基本建设、教学质量、科研水平等方面,注重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和社会影响,忽视对档案信息化的了解和关注,影响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资金保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档案人员的配备,进而影响着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速度。因此,不管是档案信息化的发展决策、档案系统的设计开发,还是档案队伍建设,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并且,由于学校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已经开发和正在运用的档案管理系统软件,缺乏正常维护、升级缓慢,档案数据库建设严重滞后,影响了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进程。

### (二) 人员结构不合理

保证档案信息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人员结构从数量到质量的合理配备。现代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迫切要求档案工作人员实现由复合型人才向专

业技术管理人才的转变,档案队伍人员结构要合理,既要满足数量要求,又要达到质量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档案信息化建设顺利进行。

当前,在高校档案队伍建设中存在着人员配备明显不足、专职档案人员数量较少、年龄结构失调和专业技能水平较低等问题。在人员数量上,伴随高等教育规模的逐年扩大,高校档案的数量和种类大幅增加,但是,在实施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传统的手工管理方式仍然占居主要地位,大量繁重的工作任务落在了少量的档案人员身上,导致工作质量与效率大幅度下降。在年龄结构上,据调查发现,高校档案人员中一部分是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他们具有较高的信息技术素养和满腔工作热情,但是缺少工作实践经验和能力;另一部分是工作经验丰富但是思想观念陈旧、缺少工作热情的中年人,由于他们对现代信息技术难以掌握,更倾向于继续使用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他们工作方式的陈旧落后和工作态度的固步自封,不仅影响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进度,还影响档案管理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甚至影响了年轻人的工作积极性。在专业能力上,档案人员自身固有的知识结构与档案专业的要求相差甚远,缺乏档案专业知识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有机融合,从而导致新的技术手段难以得到广泛合理的运用。

#### (三) 基础设施不完备

档案信息化就是通过计算机利用电子手段把各种传统载体形式的档案信息资料转化为电子形式,并基于网络进行管理和利用的现代化管理模式。信息化建设的顺利实施要以先进的软件和硬件设备为基础,智能化档案管理系统和共享系统为支撑,才能合理有效地开展档案业务工作。传统的档案管理流程是用手工方式进行文件资料的扫描采集、保管利用。实现数字化后的电子档案,数据资料一次录入数次利用,能够真正实现档案管理的智能化和现代化。在硬件设备方面,部分学校的计算机、高清扫描仪、打印机、复印机、存储设备等老化陈旧而且数量配备严重不足。在软件设施方面,高等院校虽然已经全面实现了使用OA办公系统收发文件并开发了档案管理系统,但是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智慧档案数据库,缺少相对应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和远程共享系统,严重影响了信息化建设的质量和速度。

#### (四) 管理手段滞后

高校档案实现信息化管理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全新的现代化管理方式满足师生员工和社会人士对档案信息的多样化利用和共享。社会公众对档案信息资源的需求程度以及档案信息的获取途径和检索方式决定

了档案利用率的高低,因此,要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和大数据手段从永久保存的角度出发,不断改进现有的存储模式,以便捷性利用为目的,不断优化检索方式,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利用率。当前,大多数高校仍采用纸质档案馆藏为主的储存模式,电子文件的数据存储模式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仍然以手工方式为主、计算机等电子设备的编研方式为辅,沿用传统的目录查找获取档案信息资源,管理手段严重滞后。为了保护档案信息的安全性,防止纸质档案损坏和丢失等现象的出现,档案人员减少档案借用查阅,直接降低了档案信息资源的利用频率。另外,少数高校由于信息化管理落后,淡化了数据库检索利用,依然采用手工检索,严重阻碍了档案信息资料的有效利用。

### 四、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策略

#### (一) 强化档案信息化建设理念

理念的确立决定了行动的执行力。信息化建设是档案管理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现代信息技术的引进是其建设基础,信息化意识的确立是其发展的思想保障。用现代信息化的管理技术代替传统的手工操作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思想理念的迅速转变,信息化意识的逐步增强和新技术手段的广泛运用,可以更好地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进程。

首先,学校领导要从重视档案存史资政育人的高度出发,关注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并从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政策上给予大力扶持,为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在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先进的信息管理设备、现代化技术手段的不断引进以及高水平技术人才的持续培养,这些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依赖于学校给予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因此,提升学校领导对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高度重视,能够有效保障建设过程中所需的资源供给,促进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有序进行。

其次,要大力宣传档案信息化建设对教学和科研以及学校未来发展的促进作用,提高全体师生和有关行政部门对档案信息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参与。

再次,为了保证档案信息化建设迅速开展,及时满足档案信息资源周期性更新和临时性增加的需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高校特点的档案信息化建设规划,使学校领导和师生对整个工作有全面了解和深刻认识,同时也为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提供了依据和指导。

#### (二)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前提条件是相关硬件和标准化管理软件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了满足档案信息

化建设的要求, 需要实现计算机、扫描仪、复印机、大容量移动硬盘等硬件设备的购置及更新换代, 现有档案管理系统需及时开发并升级为标准化智慧管理系统。而高校档案管理软硬件设施无论是前期的开发配置, 还是后期的管理维护, 都需要一定资金的支撑。因此, 只有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及时满足信息化建设所需要的软硬件设施配备, 才能更好地保障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发展。

### (三) 优化档案队伍结构

档案工作人员是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实施者和执行者, 合理的人员结构, 才能保障信息化建设质量和速度的提升。由于现阶段高校档案人员的整体年龄偏大, 知识结构老化, 接受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偏低, 对信息化建设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 因此, 更倾向于使用传统的手工方法管理档案信息。对信息技术存在抵触情绪的人员, 应该对其大力宣传信息化建设给档案管理带来的便利, 促使其提高思想认识, 使其从思想上认同、从行动上支持和参与档案信息化建设。

高校档案信息化管理具有技术含量高、保密性强、涉及面广等特点, 需要具备专业信息素养的人来完成。目前, 高校档案人员中具有专业背景的人才占比较低, 大部分人员专业不对口, 接受专业学习和培训交流的机会有限, 从而导致了档案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普遍不高, 很难满足档案信息化建设对人才的迫切需求。针对这些问题, 高校需从继续教育和人才引进两个环节着手, 进一步优化档案队伍人员结构<sup>[10]</sup>。

大力加强对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 采用请进来的办法, 邀请档案公司的专业人士进行档案信息数字化采集、电子文档录入挂接、智能化档案管理系统和共享系统的操作使用等培训, 是提高档案管理人员整体素质的重要手段。利用走出去的方式, 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情况下, 选派人员分期分批外出进修学习, 鼓励和支持他们积极参加专业学术交流研讨, 使其开阔视野, 及时了解和掌握档案管理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手段。除了提高专业管理水平以外, 良好的职业道德是档案人员必备的专业素养。根据档案管理的保密性原则, 通过学习《档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培养档案人员良好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 维护档案信息资源的安全性, 利用信息化的管理手段, 减

少档案信息的丢失、泄露。

档案管理工作在高校发展中普遍存在边缘化倾向, 导致有些专业人员无意从事此项工作。档案信息化建设的专业性要求, 又急需一批高水平专业人才的加入。因此, 学校要从发展角度出发, 不断引进具有高水平的信息技能档案管理专业人才, 充实档案队伍建设, 提高档案人员素质, 优化档案队伍结构, 同时要制定优惠政策, 防止人才流失, 真正解决信息化建设中专业人才缺失的问题。

### 结语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 信息发展瞬息万变。高校档案管理要以信息化建设为契机, 广泛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 实现优良的大容量数据存储和资源利用, 提高档案管理和档案利用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实现管理理念和工作方式的转变, 变“被动式”为“主动式”, 不断创新档案管理新体制, 紧密结合高校的各种档案利用需求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服务, 发挥档案在高校发展中的价值引领优势, 服务于高校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

###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N]. 中国档案报, 2020-06-25 (001).
- [2] 本刊讯. 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J]. 中国档案, 2021(6): 18-23.
- [3] 金江梅. 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影响因素分析与对策研究[J]. 兰台内外, 2020(16): 4-6.
- [4] 周春娜. 大数据环境下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研究[J]. 信息记录材料, 2021, 22(1): 136-137.
- [5] 董金玲. 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现状与对策[J]. 陕西档案, 2019(1): 27-28.
- [6] 路玲玲. 大数据视阈下高校教学档案信息化建设探[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22(3): 30-32.
- [7] 刘小雪. 新《档案法》背景下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探究[J]. 城建档案, 2021(12): 30-31.
- [8] 夏秀琴. 加快地方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对策研究[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0(9): 106-109.
- [9] 李爱华. 近20年我国高校档案信息化内容建设研究综述[J]. 档案管理, 2020(3): 86-87.
- [10] 田璐.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探究[J]. 兰台内外, 2021(18): 37-38.

# 隋唐时期大运河德州段历史功能考辨

刘咏梅<sup>1</sup>, 王德胜<sup>2</sup>

(1.德州学院 图书馆, 山东 德州 253023; 2.德州市政协文史办, 山东 德州 253000)

**摘要:** 大运河德州段是今天山东境内唯一的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的重叠段, 其开凿于隋代, 在隋唐时期对于国家和城市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隋唐大运河开凿目的主要是货物运输, 在隋唐时期的历史变迁中, 它具有实际的战时物资运输的军事功能、平时南北物资调配的漕运功能和对德州城市发展的促进功能。

**关键词:** 大运河; 德州; 军事功能; 漕运功能; 城市发展

**中图分类号:** K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2)05-0095-04

大运河德州段, 是今天山东境内唯一的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的重叠段, 由卫运河和南运河组成, 从夏津、武城境内和德州市区穿过, 全长141公里。作为沟通南北的水运通道, 在隋唐时期乃至后世对于国家和城市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一、隋唐时期大运河德州段的开凿

隋朝因为漕运与军事修了五条运河: 广通渠、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河, 除广通渠以外, 其他4条运河均呈南北走势, 相互衔接, 史学界统称隋唐大运河。

隋唐大运河是在地方性运河的基础上开通的, 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地方政权开凿的运河从客观上为隋运河开通做了准备。隋开皇四年(584), 隋文帝在关中开广通渠, 自大兴城(今长安)西北引渭水, 略循汉朝漕渠故道而东, 至潼关入黄河, 长一百多公里。大业元年(605), 隋炀帝开通济渠, 从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到黄河, 再从板渚引黄河水流向东南, 至盱眙北, 达于淮河。同年, 隋炀帝又征民夫开邗沟, 引长江水经扬子(今仪征)到山阳(今淮安), 与淮水通, 上接通济渠, 下接江南运河。永济渠, 开凿于大业四年(608), 南引沁水通黄河, 北通涿郡(今北京), 全长一千多公里。江南河开挖于大业六年(610), 从今镇江南至余杭, 入钱塘江, 全长四百公

里。

流经德州段运河名永济渠。《隋书》记载:“四年春正月乙巳, 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 引沁水, 南达于河, 北通涿郡。”<sup>[1]</sup>永济渠的兴修并非平地开凿, 而是借用了白沟、屯氏河等旧有河道。《元和郡县图志》<sup>[1]</sup>记载:“白沟水, 本名白渠, 隋炀帝导为永济渠, 亦名御河”“汉武时, 河决馆陶, 分屯氏河, 东北经贝州、冀州而入渤海。此渠盖屯氏古渚, 隋氏修之, 因名永济。”<sup>[2]</sup>永济渠分为南、中、北三段: 自沁水左岸开渠, 至浚县入白沟为南段; 利用曹魏白沟, 自浚县至天津市沽河为中段; 从天津至今北京为北段, 系改造古潞河、桑干河河道而成。在隋代各段运河中, 永济渠是唯一一段“丁男不供, 始役妇人”<sup>[3]</sup>的河渠, 可见当时这项工程之艰巨, 工期之迫切。

德州段运河属于永济渠中段。关于永济渠德州段的河道情况, 《隋书》等早期文献中记述均较为简略。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与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sup>[2]</sup>, 对隋永济渠的地理径流等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叙述, 可见其概貌, 是目前查阅隋永济渠的重要资料。

唐朝《元和郡县图志》记载, 永济渠主要流经内黄、洹水、馆陶、永济、临清、经城、漳南、长河、

收稿日期: 2022-02-21

作者简介: 刘咏梅(1970-), 女, 山东德州人, 馆员, 主要从事地方文献研究。

①《元和郡县图志》: 亦称《元和郡县志》。唐朝李吉甫撰, 为唐朝地理总志, 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全书记载了疆域沿革、水利、经济和人口等。疆域沿革追述到周、秦、西汉, 保存了可贵的史料。该书取材广泛, 引用书籍和碑记100多种, 体例也比较完善, 对后世方志的编纂有很大影响。

②《太平寰宇记》: 北宋乐史撰, 我国宋朝第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全书以道为纲, 府县为纬, 详细叙述宋初行政区划的变化, 是继《元和郡县图志》之后又一部大型总志。该书对唐、五代、宋初历史地理及社会经济有很高史料价值。

东光、永清等地区,其中贝州的漳南、德州的长河段在今境内<sup>[4]</sup>,具体位置为:

漳南县,“永济渠,在县东五十里”<sup>[2]</sup>。

长河县,“永济渠,西十里。”<sup>[5]</sup>

宋朝《太平寰宇记》记载,贝州的武城、漳南、历亭,德州的将陵段永济渠在今境内,具体位置为:

武城县,“唐调露元年移于永济渠北义王桥西二里。”<sup>[6]</sup>

漳南县,“永济渠在县东五十里。”<sup>[6]</sup>

历亭县,“隋开十六年于今县东永济渠南置历亭县属贝州,遥取汉历县为名。后以其地下湿咸卤,移就盘河置,在古历城西七十里,今理是也。”<sup>[6]</sup>

将陵县,“永济渠,在县西十里。”<sup>[7]</sup>

清朝康熙年间,田雯著《长河志籍考》援引《金史》记载:“将陵县有永济渠,即今州西卫河是。”<sup>[8]</sup>

永济渠一度被称作御河,正史、类书、地方志等均有记载。隋朝时就有说法。《中说》<sup>①</sup>记载:“御河之役,子闻之曰:人力尽矣。”<sup>[9]</sup>此后,又有《隋书》记载:“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sup>[10]</sup>《初学记》<sup>②</sup>更明确无误地说明隋朝就已经有了御河之名:

“隋炀帝于卫县因淇水之入河,立淇门以通河,东北行得禹九河之故道,隋人谓之御河。”<sup>[11]</sup>成书于清朝康熙八年的《禹贡锥指》<sup>③</sup>对永济渠的历史渊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永济渠,即古之清河,《汉志》之国水,《水经》之清、淇二水。曹公自枋头遏其水为白沟,一名白渠。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一名御河,今称卫河者也。”<sup>[12]</sup>乾隆《德州志》记载:“名永济渠,一名御河。”<sup>[13]</sup>

永济渠的建设,打破了原有的河道格局,河北道境内淇水、漳河、滹沱河、寇水(唐河)、拒马河、桑乾河及潞河(白河)等都集中涌向天津海河,后入渤海。德州区域水患严重,尤其是汛期,威胁更大。《黄河水利史述要》记载:“高宗永隆元年(680)河南、河北大水,溺死者甚众”<sup>[14]</sup>。为了分泄黄河洪水,唐朝统治者在永济渠以东(今德城区四女寺水利枢纽附近)开挖了减河,增加了新的入海通道。永济渠以西,利用淀泊滞洪,并在唐朝久视元年(700)开马颊河,又称新河。<sup>[4]</sup>新河的上游,从今河南省濮阳县和清丰县之间的黄河故道起,向东北延伸,至山东省平

原县城以西,流经秦汉时期的古黄河道;中游从今平原县城西至乐陵市城南,是依照汉代屯氏别河北渚的路线;下游从乐陵城南至无棣埕口镇南,而后流入渤海,是沿用鬲津河故道。史载:因河道上宽下窄如马颊而冠以夏禹疏九河之一的“马颊”之名,遂称马颊河。《新唐书》记载:德州平原郡“有马颊河,久视元年开,号新河”<sup>[15]</sup>。

## 二、隋唐时期大运河德州段的军事功能

晋末以来,高句丽政权崛起于东北,不断向西营州等地侵扰,隋炀帝欲伐高句丽,需要一条转送军资器械的运渠。从大业元年(605)至大业六年(610),隋炀帝完成了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全长两千多公里的大运河工程,形成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北抵华北平原,南达太湖流域,东至淮海的物资交流水运网络。为保障永济渠开通,隋炀帝让阎毗<sup>④</sup>提前结束守孝。《隋书·阎毗传》记载:“寻以母忧去职。未期,起令视事。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sup>[16]</sup>可见当时对这项工程的重视。

唐朝杜佑在《通典》中对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意义予以了较为客观的评价:“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大业七年(611),隋炀帝曾乘坐龙舟,从江都启程,渡黄河经永济渠,于当年四月至涿郡。不久,他下令讨伐高句丽,诏征天下兵,不分远近,会于涿郡,同时利用大运河运送军需,永济渠的水运顿时繁忙起来。《资治通鉴》记载:“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sup>[17]</sup>大业九年(613)和十年(614),隋炀帝第二次和第三次东征高句丽,仍以涿郡为基地,通过永济渠大量调集全国各地的兵员和物资。<sup>[4]</sup>永济作为军备运输线的永济渠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隋末乱政特别是三征高句丽,直接破坏了运河沿线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永济渠段流经的今山东馆陶、临清、武城、德州等地百姓遭受灾难尤其严重。《隋书》记载:“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sup>[18]</sup>德州区域的刘霸道、窦建德、刘黑闥、张金称接连起义。彼时永济渠沿线成为群雄逐鹿的主战场,民运及经济运输作用一度损失殆尽。

①《中说》亦称《文中子》,旧本题隋朝王通撰,其编写体例属语录式,记载的是王通与其门人、朋友问答之语,且涉及王通身后之事,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比较有价值的地位,是后人研究王通思想以及隋唐之际思想发展的主要依据和参考。

②《初学记》唐徐坚撰,唐玄宗时官修类书,现存唐代四大类书之一。

③《禹贡锥指》清胡渭撰,宋代以来《尚书·禹贡》研究之集大成。成书于康熙八年(1669),至今仍是研究《禹贡》和历史地理的必读书。

④阎毗:(564年~613年),字号不详。北周到隋朝时期大臣。

唐朝时期,永济渠保证了物资运输,对巩固北部边疆起到重要作用。贞观末年,唐太宗数次对辽东用兵,其军粮绝大部分取自河南、河北二道,通过永济渠转运。北宋《册府元龟》<sup>①</sup>记载:“太宗贞观十七年时征辽东,先遣太常卿韦挺於河北诸州徵军粮贮於营州,又令太仆少卿萧锐於河南道诸州转粮入海。”<sup>[19]</sup>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突厥、契丹起兵反唐,北部地区形势严峻,利用永济渠调运军用物资任务甚是繁重。至唐玄宗天宝元年,范阳、平卢节度使驻军已达十二万八千人,居全国军镇之首。当时永济渠边的清河郡为重要物资储存地,号称“天下北库”。天宝末年安史之乱,颜真卿在今陵城区任平原太守,清河人李萼代表清河郡来向颜真卿借兵,介绍说:“天下北库,今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斛。昔讨默啜,甲兵皆贮清河库,今有五十余万事。”<sup>[20]</sup>此后,颜真卿正是凭借“北库”的装备和物资,在今陵城区一带抵抗安禄山的叛乱。同时,领导平原、清河等郡军民赢得了堂邑大捷,打了安史之乱以来的第一场胜仗。

### 三、隋唐时期大运河德州段的漕运功能

从秦汉到隋唐的大部分封建王朝,都以关中地区为政治、军事中心,但关中地区的农业中心——渭河平原人多地少,加之自然环境恶化,产出已不能满足,特别是到了唐玄宗时期,兵制由兵农合一变为兵农分离,军队的给养由国家负担,物资缺口进一步加大。彼时,黄河下游、河北平原和江淮流域,《北史》称:“国之资储,唯籍河北。”<sup>[21]</sup>因此,从这些地区调运粮食及其他物资供给长安,成为隋唐两代统治集团财政上的大事。<sup>[22]</sup>

隋炀帝开凿了大运河,但因国祚太短,没有充分享用到大运河带来的福泽。<sup>[23]</sup>唐朝统治者在隋朝运河的基础上继续疏浚扩充<sup>[24]</sup><sup>43</sup>,使大运河成为唐朝的经济大动脉。从隋末至安史之乱,因运河而繁盛,长达一百五十余年。

德州属于河北平原郡,为河北道重要城镇,安史之乱前是粮食、绢丝、棉类等主产地,农业发达,当时的贡赋,黄河流域关中以下大体以丝麻为主,只有河北道一地,都是丝织品,并形成以河北定州为中心的集散地。<sup>[25]</sup><sup>46-49</sup>《唐六典》<sup>②</sup>记载:绢分八等,这八等中,第一至第四等的绢产地,大都在通济渠和永济

渠流域。其中,德州的绢丝名列第三等。“凡绢、布出有方土,类有精粗。绢分为八等,布分为九等,所以迁有无,和利用也。宋、亳之绢,复州之纴,宣、润、沔之火麻,黄州之贄,并第一等。郑、汴、曹、怀之绢,常州之纴,舒、蕲、黄、岳、荆之火麻,庐、和、晋、泗之贄,并第二等。滑、卫、陈、魏、相、冀、德、海、泗、濮、徐、兖、贝、博之绢,杨、湖、沔之纴,徐、楚、庐、寿之火麻,绛、楚、滁之贄,并第三等。”<sup>[25]</sup>

除了绢丝,河北区域也是唐代前叶中央财政重要租赋来源地。流经这里的大运河为永济渠段,“阔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sup>[2]</sup>,通运条件良好,租谷调运频繁,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漕运尤为繁盛。洛阳含嘉仓出土的铭砖<sup>③</sup>显示,当时转运的粮食主要来自河北地区。其中第五十号粮窖出土的铭砖记载:“天寿元年,德、濮、魏、沧等州,粟八千六百九十五石。”<sup>[26]</sup>唐玄宗后期,任用裴耀卿为江淮都转运使,经营漕运。裴耀卿曾担任冀州、定州、济州三个州的刺史,他主持建设了大批沿河物流仓储基地。《通典》记载:“臣常任济、定、冀等三州刺史,询访故事,前汉都关内,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师,缘河皆有旧仓,所以国用常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实深。”<sup>[27]</sup>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九月,魏州刺史卢晖移永济渠,同时沿渠建设仓楼百余间,用来储存来自南方的货物,活跃市场经济。此举极大便利了德州,田雯在《长河志籍考》中作了较为明确的描述:“开元二十八年,刺史卢晖徙永济渠注魏桥,通江淮之货,迳德州境内,又沧州有永济堤。”<sup>[8]</sup>《新唐书》亦有记载:“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sup>[28]</sup>由此可见,当时河北区域仍为粮食主产地,并且转运方式为先把粮食运至沿河仓库,然后通过永济渠、渭河漕运至京都长安。

安史之乱期间,永济渠沿线为主战场,其水运中断,运输功能逐渐丧失。安史之乱平息后,途径德州的永济渠为藩镇盘踞,其中魏博、成德、幽州“河朔三镇”各拥兵数万,地方租米不入中央财政,唐朝政府被迫从对河北、河南区域的财政依赖转向江淮,唐初凭籍永济渠大规模调运物资的情形不再出现。但这一条贯穿南北的水运经济大动脉却愈加受到唐朝统治

①《册府元龟》:北宋王钦若撰。北宋四大部书之首,为政事历史百科全书性质的史学类书。

②《唐六典》:题唐玄宗御撰,李林甫奉敕注。是一部关于唐代官制的行政法典。

③ 铭砖:又称之为“刻铭砖”,其砖方形,正面磨光,文字记载有墨书和阴刻两种。此处指洛阳含嘉仓出土的铭砖。20世纪70年代含嘉仓粮窖遗址在洛阳被首次发现,出土了记载有“含嘉仓”等字样的铭砖,其上记录了该窖储粮的品种、来源、数量、时期和仓窖的位置等。含嘉仓粮窖的发现,表明唐王朝直接控制的粮食数量巨大,同时反映出当时农业的发展和漕运的畅通。

者的重视。<sup>[24]43</sup>而彼时“河朔三镇”能够长期存在,也是凭借了该区域由运河而带来的优越地理优势和厚实经济基础。

#### 四、隋唐时期大运河德州段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从北魏孝文帝前后至隋朝建立,因地处南北咽喉要道,加之富庶的经济因素,永济渠德州段沿岸区域成为南北政权激烈争夺之地。<sup>[24]46</sup>

唐朝时期,发达的农业经济与便利的漕运条件促进了德州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当时的德州繁华程度超越了苏州,直比杭州。《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当时的苏州为“户六万八千九十三”,杭州为“户八万四千二百五十二”。“德州平原郡,上。土贡:绢、绫。户八万三千二百一十一,口六十五万九千八百五十五。县六:安德,长河,平原,平昌,将陵,安陵。”<sup>[15]</sup>德州当时有八万三千多户,人口近六十六万,盛产的绢、绫是上乘贡品,并通过漕运畅销全国。

隋唐时期,大运河还给德州带来南北思想的交融和城市文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儒、佛、道三教在德州蓬勃发展,相互争鸣。当时德州运河区域房氏(居于今平原县)、崔氏(居于今武城县)和孟氏(居于今临邑县德平镇)是倡导儒学的代表。这段时期永济渠德州段沿岸佛寺众多,永庆寺和慈氏寺最为著名,在当时的北方影响较大。道教在德州一带也得到较快发展,史料记载,唐朝全国有名的两大观之一——万松观就坐落在今德州市郊赵虎镇,占地千余亩<sup>[24]61-62</sup>。二是永济渠德州段沿线区域文化艺术百花争艳。在德州,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状元孙伏伽,唐朝诗人孟云卿、高适、孟郊、李愚、孟简、宋若昭等在诗歌领域各领风骚<sup>[24]54</sup>,更是吸引李白、骆宾王等众多文人墨客前来访友游历,并留下诸多佳作,其中骆宾王的长篇诗作《夏日游德州赠高四》成为研究唐朝历史风貌的重要文献。唐朝天宝八年(749)颜真卿出任平原太守,留下千古书法名帖《东方先生画赞碑》<sup>[4]</sup>。三是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于德州,在婚丧、节日、服饰、居住及交通行旅等方面,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运河风情和民俗文化。当时的运河号子和宁津杂技一直传习至今,现已分别被确定为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sup>[29]</sup>。

#### 结语

综上所述,大运河德州段在隋唐时期具有战时物资运输的军事功能、平时南北物资调配的漕运功能及对德州城市发展的促进功能。德州段运河工程体系虽历经变迁,但保存基本完整。2017年6月国务院批

复《德州市整体城市规划》,该规划中提出了打造城市与水岸互动,构筑“水城一体”独特风貌的愿景。2020年3月《山东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出台,德州培育鲁风运河品牌,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新亮点工作进一步提速。在此背景下,大运河德州段未来在德州城市形象塑造中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1] 李月红. 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御河[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0(4): 162-170.
- [2]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十六)·河北道一[M].
- [3] 司马光. 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一卷)·隋纪五[M].
- [4] 王德胜. 隋唐时期的运河德州段[N]. 德州日报, 2021-03-12(03).
- [5]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贝州[M].
- [6] 乐史. 太平寰宇记(卷五十八)·河北道七·贝州[M].
- [7] 乐史. 太平寰宇记(卷六十四)·河北道十三·德州[M].
- [8] 田雯. 长河志籍考(卷二)·永济渠[M].
- [9] 王通. 中说(卷八)·魏相篇[M].
- [10]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M].
- [11] 徐坚. 初学记(卷六)·地部中[M].
- [12] 胡渭. 禹贡锥指(卷十三下)[M].
- [13] 乾隆. 德州志(卷三)·河渠·运河[M].
- [14] 本书编写组. 编. 黄河水利史述要[M]. 北京: 水利出版社, 1982.
- [15] 欧阳修, 宋祁, 范镇, 吕夏卿. 新唐书(卷三十九)志第二十九·地理三·德州平原郡[M].
- [16] 隋书(卷六十八)·列传第三十三·阎毗[M].
- [17] 司马光. 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一卷)·隋纪五[M].
- [18] 隋书(卷七十)·列传第三十五·杨玄感[M].
- [19] 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八)·邦计部·漕运[M].
- [20]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七)·唐纪三十三[M].
- [21] 李延寿. 北史(卷十五)·列传第三[M].
- [22] 任紫钰. 浅谈隋唐大运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J]. 中国文化遗产, 2016(5): 108-113.
- [23] 王德胜. 古城德州: 因运河而生, 因运河而盛[N]. 德州日报, 2020-11-06(04).
- [24] 田贵宝, 田丰. 德州运河文化[M]. 北京: 线装书局, 2010(6).
- [25] 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常平署[M].
- [26] 沧清. 含嘉仓铭砖初探[J]. 考古, 1982(03): 304-309.
- [27] 杜佑. 通典(卷十)·食货十·漕运[M].
- [28] 欧阳修, 宋祁, 范镇, 吕夏卿. 新唐书(卷五十三)志第四十三·食货三[M].
- [29] 王德胜. 德州风情[M].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8: 167-176.

# 风教一坏百年不可复振？

## ——基于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进士数量的研究

李忠昊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 自明代洪武年间到清代光绪末, 山东运河区域进士总数达到1112人, 所占山东省内总进士数比例平均每朝代维持在27%左右。期间明代中期和清代中期运河区域进士人数明显增多, 最高占比超过50%, 明清之交和清末下降尤为严重, 其变动与京杭大运河兴修、畅通、繁荣、衰落等时代背景具有高度一致性。从地域分布来看,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沿线各府进士数量差距较大, 济南府进士人数占比一直位于前列, 而沂州府、曹州府等较为落后; 同一府不同时期的差距也比较大, 兖州府、东昌府明代占比较大, 清代占比明显下降, 但去除行政区划划分因素, 其运河区域进士数量亦处于领先地位。总体来看,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由于商品经济发展、交通便利、文化交流频繁, 促进了文化教育发展, 使进士数量长久多于其他地区。

**关键词:** 明清时期; 京杭大运河; 山东运河区域; 进士数量

**中图分类号:** K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2)05-0099-06

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南北交通枢纽, 京杭大运河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命脉, 更是一条特殊的文化传播带, 各地物产及文化习俗皆沿此线交汇传播。在历史上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台儿庄等山东沿运城市都是因运河而兴盛。“薄海内外, 舟航之所毕由, 达官要人之所递临, 而兵民杂集, 商贾萃止, 骈檣列肆, 云蒸雾滃”<sup>[1]</sup>, 运河文化和齐鲁文化在此交融。唐代确立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人才与官吏的创举。“凡诸州每岁贡人其类有六: 一曰秀才, 二曰明经, 三曰进士, 四曰明法, 五曰书, 六曰算”<sup>[2]</sup>, 并称通过最后一级中央政府朝廷考试者为进士。所谓“大业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 而升诸司马, 曰进士”<sup>[3]</sup>, 这极大地激发了学子读书的热情。在科举考试中进士登科的数量也成为衡量当地文化教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自古以来, 山东就有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美誉, 以先秦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传统得到了良好的传承, “俗近奢华而有礼, 士虽务名而好学”<sup>[4]</sup>。元代以降, 京杭大运河流经山东西部后, 便捷的交通使其成为“水陆都会”之处, “四方舟车所辏, 奇技淫巧所

集”<sup>[4]</sup>, 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然而有史料记载, 商品经济的繁荣削弱了当地“人情敦厚俗有儒学, 朴而不华淖有风骨”<sup>[5]</sup>的淳朴民风, 使明清时期社会呈现出“民逐末利, 仰食机利”“风俗犹江河也, 趋日下矣”<sup>[6]</sup>的趋势, 甚至出现“风教一坏百年不可复振, 则所以潜移而默化者, 岂区区语言文告间哉”<sup>[7]</sup>的呼号, 痛斥文化教育的衰败。那么, 在大运河流经山东段后,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真的出现“民竞刀锥, 趋末者众”, 从而彻底“弃文从商”, 以致文化习俗恶化、教育风尚衰弱了吗? 然而事实却是便捷的运河交通使得当地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进一步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 一、明清山东运河区域进士数量的时间变化

明清两代共录取进士51447人<sup>[8]</sup>, 其中山东籍3997人<sup>①</sup>。在经济与文化重心不断南移的影响下, 山东考取进士总数量仍位居全国第五<sup>②</sup>, 亦不可谓之没落。

以时间为维度考察, 可以观察出京杭大运河在畅通繁荣与堵塞衰落阶段, 山东运河区域的进士数量。笔者根据朱保炯、谢沛霖所编《明清进士题名录索引》, 结合光绪年间《山东通志》中科举部分

收稿日期: 2022-01-11

作者简介: 李忠昊(1997-), 男, 山东滨州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运河文化研究。

①据朱保炯, 谢沛霖: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张曜, 杨士襄修; 孙葆田, 法伟堂等纂: 宣统·山东通志[Z]. 民国二十三年影印本, 卷六·科举整理所得。

②分别是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山东。来源: 总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的进士表，将自明洪武元年（1368）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536年间，山东运河区域进士数量进行统计，并加入明清历任皇帝在位期间进士人数在整个山东总进士人数所占比例，来考察山东运河区域进士数量变化。由于明代洪熙和泰昌两位皇帝在位时未举行科举考试，故略去不考。大致将京杭运河流域定于山东西部，包括兖州府、东昌府、济南府的德州，以及清代所设的济宁直隶州和临清直隶州，得到表1。

表1 明清运河区域州县进士数量表

| 年号<br>(年份)     | 兖<br>州<br>府 | 东<br>昌<br>府 | 清代     |  | 总数<br>(人) | 山东<br>进士<br>总数<br>(人) | 占山东<br>进士<br>总数<br>的比例<br>(%) |       |
|----------------|-------------|-------------|--------|--|-----------|-----------------------|-------------------------------|-------|
|                |             |             | 德<br>州 | 济<br>宁<br>直<br>隶<br>州<br>临<br>清<br>直<br>隶<br>州 |           |                       |                               |       |
| 洪武 (1368-1398) | 13          | 5           | 1      |  | 19        | 47                    | 40.43                         |       |
| 建文 (1399-1402) | 1           | 0           | 0      |  | 1         | 3                     | 33.33                         |       |
| 永乐 (1403-1424) | 10          | 8           | 0      |  | 18        | 43                    | 41.86                         |       |
| 宣德 (1426-1435) | 3           | 2           | 1      |  | 6         | 15                    | 40.00                         |       |
| 正统 (1436-1449) | 15          | 2           | 0      |  | 17        | 32                    | 53.13                         |       |
| 景泰 (1450-1457) | 9           | 0           | 4      |  | 13        | 22                    | 59.09                         |       |
| 天顺 (1457-1464) | 7           | 8           | 3      |  | 18        | 31                    | 58.06                         |       |
| 成化 (1465-1487) | 35          | 24          | 7      |  | 66        | 153                   | 43.14                         |       |
| 弘治 (1488-1505) | 26          | 15          | 3      |  | 44        | 120                   | 36.67                         |       |
| 正德 (1506-1521) | 26          | 31          | 3      |  | 60        | 122                   | 49.18                         |       |
| 嘉靖 (1522-1566) | 83          | 70          | 21     |  | 174       | 395                   | 44.05                         |       |
| 隆庆 (1567-1572) | 10          | 18          | 1      |  | 29        | 73                    | 39.73                         |       |
| 万历 (1573-1620) | 74          | 63          | 9      |  | 146       | 461                   | 31.67                         |       |
| 天启 (1621-1627) | 14          | 11          | 3      |  | 28        | 70                    | 40.00                         |       |
| 崇祯 (1628-1644) | 43          | 19          | 3      |  | 65        | 180                   | 36.11                         |       |
| 顺治 (1644-1661) | 12          | 18          | 8      | 8  | 13        | 59                    | 415                           | 14.22 |
| 康熙 (1662-1722) | 22          | 25          | 11     | 13   | 11        | 82                    | 424                           | 19.34 |
| 雍正 (1723-1735) | 5           | 4           | 3      | 3  | 1         | 17                    | 102                           | 16.67 |
| 乾隆 (1736-1795) | 15          | 15          | 8      | 26   | 3         | 67                    | 361                           | 18.56 |
| 嘉庆 (1795-1820) | 13          | 7           | 1      | 8  | 3         | 32                    | 209                           | 15.31 |
| 道光 (1821-1852) | 23          | 16          | 5      | 17   | 7         | 68                    | 261                           | 26.05 |
| 咸丰 (1851-1861) | 6           | 9           | 2      | 5  | 3         | 25                    | 75                            | 33.33 |
| 同治 (1862-1874) | 4           | 4           | 5      | 3  | 1         | 17                    | 115                           | 14.78 |
| 光绪 (1875-1908) | 18          | 6           | 1      | 12   | 4         | 41                    | 268                           | 15.30 |
| 总计             | 487         | 380         | 103    | 95   | 46        | 1112                  | 3997                          | 27.82 |

注：此表根据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所统计。

从表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明代洪武年间到清代光绪末，山东运河区域进士总数达到1112人，所占山东省内总进士数比例平均每朝代维持在27%左右。在洪武、建文、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

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咸丰年间，都超过了平均比例，正统、景泰、天顺年间甚至超过了50%。虽然自清代开始占比总体有所下降，但在咸丰年间仍达到30%，这其中还包含有行政区划调整、朝廷录取政策调整的影响。应该注意到，表1所列府县只是山东沿运地区的大城市，而有一些小城镇并没有统计在内，包括济南府的德平县、平原县、齐河县、陵县；曹州府的朝城县、成武县、郓城县、濮州等，这些城镇或分布于大运河沿岸，或分布于大运河支流沿岸，其风气或多或少都受到大运河影响，如果加上这些城镇的进士人数，山东沿运地区进士占比则会进一步上升。

明末清初，因战乱导致运河受阻，而这一时间段山东进士人数平均占比15%左右，与运河贯通时相比明显减少。这表明不同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进士数量与京杭大运河在不同时期的运行状况呈正相关，突出表现在明代中期、清代中期运河畅通繁荣，进士数量占比也高；明末清初运河通航能力进士数量降低。这从明清两代山东运河区域进士人数及占山东进士总数比例上可以更明显地展示出来，详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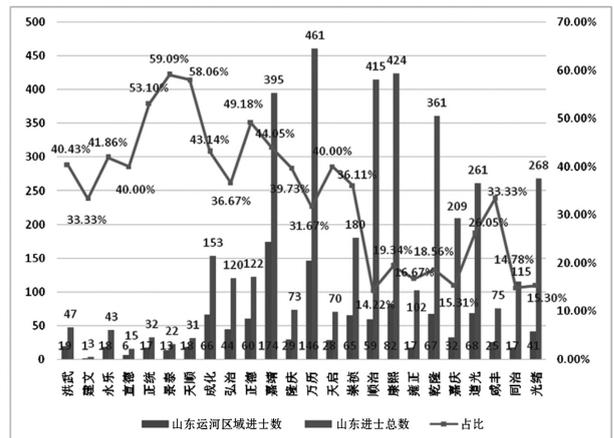


图1 明清各朝山东运河区域进士数量对比图

图1是明清不同年份山东进士录取数量与运河区域进士录取数量的变化。结合表1发现洪武至天顺年间，山东运河区域进士数占比平均在50%；在正德至天启年间，数量与占比逐渐呈下降趋势；在乾隆至咸丰年间，占比连年回升；而在顺治、同治和光绪年间进士数明显低于其他时期。

这与京杭运河发展状况几乎同步。明中期，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卫河、会通河、中运河、里运河、江南运河各河段经多次整治改造，畅通无阻，“明代复循会通故道，屡事疏筑，卒使南北通利，一气贯输后，乃专行河运焉”<sup>[5]</sup>；至清代，管理体系日趋完善，朝廷对漕运规模、漕粮征收、各类船只通航时间都有了明确规定。如明洪熙元年“许运粮官船附

载已物，以资私用”<sup>[9]</sup>，雍正七年规定漕船载米不得过五百石，准另带土产一百石。

山东段是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重点整修河段。自明永乐年间始，在山东运河流域兴建南旺分水闸，“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解决了冬季水源不足的问题。又新开凿南阳新河、广济河，修置水门大堰、设置水柜调节水量，每年挑浚河道，以防泥沙淤积、运输能力下降。经过一系列改造，京杭运河成为真正的南北大动脉，山东沿运城市位于京杭大运河中部，交通便利，“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输运以供国用，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sup>[1]</sup>。经济上的繁荣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当地广设书院。同时，大运河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山东运河区域广泛接受来自其他地区的新知识，为考取进士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而在明清之交，战事频仍，运河失修，山东沿运地区进士数量遂急剧下降。清政权稳固后，清廷不惜耗费巨资，全力经营、治理大运河。大运河逐渐恢复了往日兴盛。山东沿运地区进士人数也随之增多。嘉庆年间，国力大衰。此时黄河下游河道已变得淤塞不堪，多次溃堤，给运河漕运造成重大威胁，加上税卡林立、官员贪污受贿等因素，运河的通航能力大大下降。至清后期，内忧外患，天灾不断，导致农民起义频发，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捻军，以及后起的义和团，都曾在鲁西地区多次鏖战，运河漕运陷入瘫痪，“终清之世，海运遂以为常”<sup>[1]2581</sup>，致使京杭运河山东段区域失去经济和文化的优势，进士人数下降就成为必然。

通过对山东运河区域进士数量和不同时期运河通航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可知，尽管政局与社会的整体平稳是进士数量居高的最大保障，但运河交通带来的文化交流在推动当地文化事业发展方面亦起着重要作用。

## 二、明清山东运河区域进士数量的地域分布

明代京杭运河大抵流经山东的兖州府、东昌府、济南府西北部一部分。清代进行行政区划调整，“（雍正）八年，济宁州仍属兖州府……十三年，升泰安、曹州二州为府。乾隆四十一年，仍升济宁、临清为直隶州。凡领府十，州二、散州八，县九十六。”<sup>[10]</sup>山东运河区域主要由六府、一都指挥司变为十府、二直隶州，但京杭大运河仍大致流经兖州府、东昌府、济宁直隶州、临清直隶州、济南府西北部一部分。

为了方便沿运地区与山东各府进行横向对比，笔者将各府进士人数进行整理得到表2，以期在对比中得出结论。

表2 明清代山东各府进士数量统计表

|       | 明代        |           | 清代        |           | 总计        |           |
|-------|-----------|-----------|-----------|-----------|-----------|-----------|
|       | 数量<br>(人) | 占比<br>(%) | 数量<br>(人) | 占比<br>(%) | 数量<br>(人) | 占比<br>(%) |
| 济南府   | 540       | 30.56     | 360       | 16.11     | 900       | 22.52     |
| 兖州府   | 372       | 21.05     | 119       | 5.33      | 491       | 12.28     |
| 青州府   | 271       | 15.37     | 313       | 14.01     | 584       | 14.61     |
| 莱州府   | 177       | 10.02     | 333       | 14.91     | 510       | 14.98     |
| 登州府   | 125       | 7.07      | 353       | 15.80     | 478       | 11.96     |
| 东昌府   | 278       | 15.73     | 103       | 4.61      | 381       | 9.53      |
| 武定府   |           |           | 192       | 8.60      | 192       | 4.80      |
| 沂州府   |           |           | 114       | 5.10      | 114       | 2.85      |
| 泰安府   |           |           | 76        | 3.40      | 76        | 1.90      |
| 曹州府   |           |           | 106       | 4.74      | 106       | 2.65      |
| 临清直隶州 |           |           | 47        | 2.10      | 47        | 1.18      |
| 济宁直隶州 |           |           | 118       | 5.28      | 118       | 2.95      |

注：据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张曜、杨士驥修，孙葆田、法伟堂等纂：宣统《山东通志》，民国二十三年影印本，卷六，《科举》整理所得

由表2可知，明清时期，山东各府进士数量差距较大。首先是不同府之间的差异，如济南府进士人数占比一直遥遥领先，这肯定与济南府作为省府，资源丰富、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并且户口人数多有关。其次，明清两代同一府差距也比较大。如兖州府、东昌府从明代的较大占比，降为清代的5.53%与4.61%，这种现象与清代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将临清州、济宁州设为直隶州，朝廷将科举进士数量分配到每个省的改变有关。因此，为了排除行政区划的改变对运河区域进士人数占比的影响，笔者将明清两代运河沿岸单独摘出，并将山东分为鲁中、鲁东、鲁南、鲁北、鲁西等区域，结合明清各府进士总数，研究山东运河区域进士分布比例，得到图2。

虽然图2中，山东运河流域范围比实际京杭大运河流域范围略有扩大，囊括了东昌府、兖州府的其他县，并加入了德州。但依然可以告诉我们，明清两代，京杭运河沿线各府州县科举兴盛、人才辈出，不仅直接影响其所流经区域，还向外进行辐射，带动附近府州县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也说明了，在京杭大运河流经山东西部地区后，并没有因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改变人们对于教育的重视。相反，京杭大运河带动沿线的城市发展，吸引了全国各地人口迁居于此。如临清州“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sup>[11]</sup>；济宁州“其居民之鳞集而托处者不下数万家，其商贾之踵接而辐凑者亦不下数万家”<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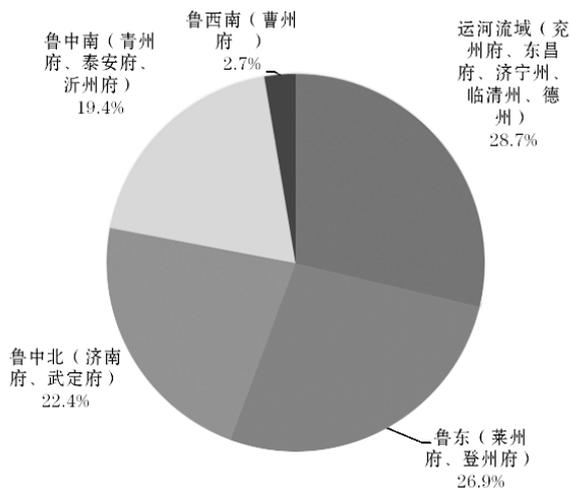


图2 山东各区域进士人数占比统计图

间接带来了许多人才。

### 三、明清山东运河区域进士数量增加的原因

山东运河区域进士人数与京杭大运河大发展情况息息相关，京杭大运河带来的改变确实从侧面影响了该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水平。

####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文教事业的兴盛

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开通后，南北货物往来于此，诸多外来人口在此定居，推动了运河沿岸城市的发展，形成了一批工商业城镇，成为明清整个山东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到康熙时，济宁已是“南船北马，百货萃集，人物殷富，繁华之习，浸淫乡里”<sup>[4]</sup>。经济的发展向外辐射，使许多村落因运河而兴，如临清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变为“南北往来交会咽喉之地，在东昌郡之北焉，其属邑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输运以供国用，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sup>[12]</sup>，成为名震一时的大城镇。

经济的发展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山东运河区域广开学校、广设书院、广招学生。明朝建立之初，政府就开始注意地方学校的建设，朱元璋曾说：“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sup>[13]</sup>清代依然沿袭明代，政府大力支持开设学校，学校遍布山东各地，明代山东兴建书院54所，清初共建府、州、县学188所（含曲阜四氏学），其中运河区域拥有46所<sup>①</sup>，包括东昌府学、济宁州学、临清州学、东平州学、曲阜四氏学、东昌卫学、聊城县学、鱼台县学、馆陶县学、嘉祥县学、汶上县学、泗水县学等等。这些学校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而

明中期以后，随着科举名额的扩大，府州县学的人数也相应增加，宣德年间以后，运河区域许多府州县学的名额扩大了一倍，以应科举之需。

除了学校，明代书院教育也有所发展，“初太祖因元之旧，洪武元年（1368）立洙泗、尼山二书院，各设山长一人。”<sup>[14]</sup>自此以后，书院在山东运河区域广泛建设起来，据统计，明代山东运河区域共设立书院42所，清代增设和改建后共计86所<sup>[15]</sup>（如表3），其中有名的诸如鱼台县崇德书院，曲阜县尼山书院、洙泗书院、春秋书院、昌平书院，滋阳县颜子书院，聊城东林书院，峰县台儿庄兰陵书院，嘉祥县曾子书院、嘉祥书院等等。其中据不完全统计，仅从康熙到道光年间，山东创办的书院就有75所，正是因为这一时期国家政权稳定，重视京杭大运河河道的管理，交通优势显现，大运河区域经济繁荣。这一优势，势必带动山东沿运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运河区域学校的数量和质量，都高于其它地区，书院的规模和数量也处于领先地位。文化教育的发展，为科举输送了大批的优秀考生。山东大运河兴盛期间，运河区域进士数量比例占据山东进士各区域榜首，也就不足为奇了。

#### （二）交通的便利带来了文化交流的区位优势

从表2中可见，进士数量较多的府县都为交通发达的地区。山东自古以陆路交通为主，例如陆路交通所横穿的济南、青州一线，纵贯的德州、济南、兖州一线等。而京杭大运河的经过，给山东西部地区带来一条新的交通线，“大运河南自台儿庄流入山东境内，依次流过峰县、滕县、邹县、鱼台、济宁、嘉祥、汶上、东平、东阿、寿张、阳谷、聊城、堂邑、博平、临清、夏津、武城、恩县、德州，至桑园镇进入直隶境。”<sup>[16]</sup>明清京杭大运河流经山东的部分几乎占了全长的1/3，这独特的地理位置，北系京师，南控江淮，不仅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更对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帮助。

首先，吸引了大量人才，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将自己独特的思想带入山东运河区域，助力产生新思想新文化。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中描写济宁“济州南北之交，人物之盛甲于齐鲁，往往名公巨卿、文人墨士，安其风土而寄迹焉，故侨寓特多。”<sup>[16]</sup>如明代方孝孺、王畎、宋迺，清代李曰道、王大猷、陈陞、李言、罗绍伦、于京等等，其中不乏进士出身，他们进

① 据张曜等修，孙葆田等纂：宣统山东通志[Z]. 学校志，民国二十三年影印本；李取勉：清代山东学校教育研究[M]，湖南：湖南师范大学，2004：6-9.

表3 明清两代山东运河区域书院分布表

| 明代    |     |       |       | 清代    |     |      |       |    |   |
|-------|-----|-------|-------|-------|-----|------|-------|----|---|
| 府     | 州/县 | 书院数量  | 总计(所) | 府     | 州/县 | 书院数量 | 总计(所) |    |   |
| 济南府   | 德州  | 3     | 5     | 济南府   | 齐河县 | 1    | 12    |    |   |
|       | 平原县 | 1     |       |       | 德平县 | 3    |       |    |   |
|       | 陵县  | 1     |       |       | 陵县  | 1    |       |    |   |
|       | 聊城市 | 1     | 平原县   |       | 1   |      |       |    |   |
|       | 茌平县 | 2     | 德州    |       | 6   |      |       |    |   |
|       | 冠县  | 2     | 聊城市   |       | 6   |      |       |    |   |
|       | 东昌府 | 堂邑县   | 1     | 13    | 聊城府 | 堂邑县  | 1     | 17 |   |
|       |     | 临清州   | 1     |       |     | 莘县   | 1     |    |   |
|       |     | 馆陶县   | 1     |       |     | 冠县   | 1     |    |   |
|       |     | 濮州    | 1     |       |     | 茌平县  | 1     |    |   |
| 观城县   |     | 1     | 博平县   |       |     | 2    |       |    |   |
| 朝城县   |     | 1     | 清平县   |       |     | 1    |       |    |   |
| 恩县    |     | 1     | 恩县    |       |     | 1    |       |    |   |
| 武城县   |     | 1     | 高唐州   |       |     | 3    |       |    |   |
| 兖州    |     | 1     | 泰安府   |       |     | 东平州  | 1     |    | 8 |
| 滕县    |     | 1     |       |       |     | 东阿县  | 5     |    |   |
| 邹县    | 1   | 平阴县   |       | 2     |     |      |       |    |   |
| 兖州府   | 金乡县 | 1     | 24    | 临清直隶州 | 临清州 | 1    | 4     |    |   |
|       | 鱼台县 | 2     |       |       | 丘县  | 2    |       |    |   |
|       | 曲阜县 | 2     |       |       | 夏津县 | 1    |       |    |   |
|       | 滋阳县 | 4     |       | 济宁直隶州 | 鱼台县 | 3    | 14    |    |   |
|       | 泗水县 | 1     |       |       | 金乡县 | 1    |       |    |   |
|       | 济宁州 | 1     |       |       | 济宁  | 8    |       |    |   |
|       | 嘉祥县 | 1     |       |       | 嘉祥县 | 2    |       |    |   |
|       | 郛城县 | 1     |       |       | 兖州  | 1    |       |    |   |
|       | 汶上县 | 2     |       |       | 滋阳县 | 2    |       |    |   |
|       | 阳谷县 | 2     |       |       | 峰县  | 3    |       |    |   |
| 东阿县   | 2   | 滕县    | 1     |       |     |      |       |    |   |
| 平阴县   | 1   | 兖州府   | 邹县    | 1     | 22  |      |       |    |   |
| 郳城县   | 1   |       | 泗水县   | 1     |     |      |       |    |   |
| 总计(所) | 42  |       | 宁阳县   | 2     |     |      |       |    |   |
|       |     |       | 曲阜县   | 5     |     |      |       |    |   |
|       |     |       | 梁山县   | 1     |     |      |       |    |   |
|       |     |       | 寿张县   | 3     |     |      |       |    |   |
|       |     |       | 清河县   | 2     |     |      |       |    |   |
|       |     | 郛城县   | 3     |       |     |      |       |    |   |
|       |     | 曹州府   | 单县    | 1     | 9   |      |       |    |   |
|       |     |       | 巨野县   | 1     |     |      |       |    |   |
|       |     |       | 朝城县   | 1     |     |      |       |    |   |
|       |     |       | 范县    | 1     |     |      |       |    |   |
|       |     |       | 濮州    | 2     |     |      |       |    |   |
|       |     | 总计(所) | 86    |       |     |      |       |    |   |

注：本表仅统计山东运河流域书院数量。因京杭大运河所带来的影响难免扩大，因此在统计京杭大运河山东段主要流经区域的基础上，又涉及运河辐射的周边区域。

注：据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书院和科举》编制而成

一步促进了当地的尚文之风。

其次，交通的便利方便了科举士人外出游历，和入京考试。临清到北京400余公里，“一舟之运，约当十车”，运费大约为陆运的1/60。有诗言曰：“一自髫年为禄仕，挂帆常向鲁门行。”（明·王问《泊城武县》）<sup>[17]</sup> 旅途费用的降低、眼界的扩大便利了士人知

识水平的提高和进京赶考。

最后，该地区位于京杭大运河中段，“水陆交通，泉货聚集，实京师要会之地也”<sup>[12]</sup>，交通便利，与京津江浙互通有无，可得风气之先。漂海录中记载使者所述：“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巷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问之则皆曰‘我不识字’”，但“济宁、临清，繁华丰阜，无异江南，临清为尤盛”<sup>[18]</sup>。临清深受运河文化的熏陶，不类于其他北方城市，其“文教聿兴，科第接踵，衣冠文物甲于东方”<sup>[19]</sup>。反观沂州府南部山区等地，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进士数量只占山东总数的3%，这制约了其科举发展。

（三）尚文的社会风气夯实了深厚的文化教育底蕴

作为儒学的发源地，山东西部地区自古以来便是文化的中心。曲阜县虽工商业不甚发达，但其作为周公封地、孔子故乡，孕育了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发达，并随运河辐射。如聊城市“近邹鲁之乡，沾孔孟之化。初尚夸诈之习，后变淳良之风”<sup>[19]</sup>；东昌府“尚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有古之风烈。人尚劲悍，民事渔猎。俗近敦厚，家知礼训，习俗节俭，人多读书”<sup>[20]</sup>；兖州府“鲁宅少昊之墟，渐周礼之泽，重礼崇义，尊贤尚亲，遗风流俗载，在经艺飒乎弗可尚矣”<sup>[21]</sup>；曲阜县“礼仪之国，周孔之遗，莫不慕学，彬彬尔雅，焉绅之家，穷治经术，讲明礼乐，其他亦敦朴。乡分为三，西忠信，东智仁，北礼仪”<sup>[22]</sup>等等。

因此，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尚文尚礼之风更甚。济宁州“济当河槽要害之冲，江淮百货走集多贾贩民竞刀锥趋末者众。然率奔走衣食与市者也，郊野之民务耕种，愿朴畏法，士美秀有文，彬彬儒雅，里中庆吊。往来有亲睦之风，人多善良，急公赋，怯争讼，无暴戾恣睢之习”<sup>[6]</sup>；德州县“当水陆之冲，五方杂糅，语言嗜好亦区以别，士重廉耻，敦礼仪，能确然自守，不逐流俗，地虽介乎齐赵而无功利之习，被服率多修政华而不靡，妇女亦勤操作不为冶饰”<sup>[23]</sup>；临清州“舟车毕集，货财萃止，诚天下佳丽之地，所以衣冠文物胜于他邑，又云崇信让，重廉耻，不好健讼，服贾者居田十之六七”<sup>[12]</sup>。

这种尚文的社会风气使得山东运河区域既重视物质基础，更重视文化建设，不仅官方重视教育，民间也把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义学、私塾等私人教育广泛设立，据《济宁直隶州志》记载：“康熙五十二年，今天下州县多立义学”<sup>[6]</sup>，济宁的义学、社学设有19处，包括各级儒学。而截止到民国六年，济宁直隶州

共有私塾712处<sup>[24]</sup>，包括金乡县336处、嘉祥县23处、鱼台县253处及济宁市100处。民国《临清县志》描述明清时民间教育盛景：“数百年来得才为盛。是时，上作下应，庠序如林，有家塾、有公塾。又城市外陆续添设义学多处，童而习者，经书制艺而外，并及诗赋楷法”<sup>[25]</sup>。乾隆《德州志》也记载德州虽“直畿南北，冲水陆之交，舟车互错，五方杂糅，语言嗜好区以别矣”，但义学使得“人文飏起，名卿蝉联，实甲山之左”<sup>[26]</sup>。

同时，以文为尚也带来了文化传承，出现大量“科举家族”，如兖州鲍氏家族、聊城傅以渐家族和邓钟岳家族等等。由此可见，长期受儒学浸染的尚文社会风气，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 四、余论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进士数量与京杭大运河通航情况联系密切。在运河稳定年份，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带动沿运地区经济的发展，便利区域间的互动交流，促进了沿运地区文化的繁荣，书院兴盛、文教活动频繁，加之山东沿运地区本身所拥有的儒家文化底蕴与良好的社会风气，使当地进士数量居山东省乃至全国前列。然而，清末运河航运能力大为削弱，山东沿运城镇逐渐衰落，致使进士数量大大下降；海运使沿海城镇发展起来，科举重心遂转移至此。由此可见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对促进山东沿运区域的文化繁荣意义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对京杭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sup>[27]</sup>

京杭大运河于我们而言，不仅仅是一条运输航线，更是中华文明的象征，由其衍生出来的运河文化滋养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运河文化亦是齐鲁文化的组成部分，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秦晋文化等区域文化因大运河而串联，形成了一条绚丽多彩的文化带。在今天，大运河的交通地位虽不复往昔，但于我们仍有特殊意义，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如何充分挖掘和提炼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主要文化特色和内涵，将教育现代化与运河文化充分结合，乃是重中之重。

#### 参考文献：

- [1] 于睿明.胡悉宁,修纂.康熙·临清州志[Z].清康熙十三年刻本.
- [2] 李林甫.唐六典[Z].明刻本.
- [3] 戴圣.礼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04.
- [4] 胡德琳,蓝应桂修纂.乾隆·济宁直隶州志[Z].清乾隆五十年刻本.
- [5] 杨士驥,等,修.孙葆田,等,纂.民国·山东通志[Z].民国七年铅印本.
- [6] 徐宗干,修.许瀚,等,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Z].清咸丰九年刻本.
- [7] 胡德琳,修.周永年,盛百二,等,纂.乾隆·东昌府志[Z].清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 [8] 潘荣胜.明清进士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6:1194-1229.
- [9] 杨士奇.明仁宗实录[M].洪武元年刻本,洪熙元年正月乙未条:224.
- [10] 赵尔巽.清史稿[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2581,1381.
- [11]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甲编[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923.
- [12] 张度,等,纂.乾隆·临清直隶州志[Z].清乾隆五十年刻本.
- [13]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95-1696,1686.
- [14] 刘锦藻.续文献通考[M].台北:台湾商务,1987:3246.
- [15] 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书院和科举[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53-58.
- [16] 李泉,王云.山东运河文化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6:81.
- [17] 刘士林,耿波,李正爱,等,著.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99.
- [18] 崔溥,著.葛振家,点注.漂海录·中国行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193-194.
- [19] 岳浚,修.杜诏,等,纂.雍正·山东通志[Z].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0] 赵祥星,纂.康熙·山东通志[Z].清康熙四十一年刻本.
- [21] 陈顾,纂.乾隆·兖州府志[Z].清乾隆三十五年刻本.
- [22] 潘相,纂.乾隆·曲阜县志[Z].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
- [23] 王赠芳,王镇,主修.成耀冷烜,纂.道光·济南府志[Z].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 [24] 济宁市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济宁市教育志(1840-1988). [M]. 济宁:山东济宁市教育印刷所,1998:48-49.
- [25] 徐子尚,修.张树梅,等,纂.民国·临清县志[Z].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 [26] 王道亨,修.张庆源,纂.乾隆·德州志[Z].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 [27] 管胜锋,主编.沂尚·创意中国调研报告[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9:171.

# 《公羊董仲舒治狱》发微

## ——兼论“春秋决狱”与“决事比”异同

何元博

(青海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西宁 810000)

**摘要:** 今本董仲舒《春秋决狱》最早被记载于《汉书·艺文志》中, 被称为《公羊董仲舒治狱》, 其书名与版本存在一个衍变的过程。自宋代王尧臣《崇文总目》中将其称作《春秋决事比》以来, “春秋决狱”与“决事比”遂逐渐被混淆, 但二者绝非全然无别。儒生所倡导的“春秋决狱”并非是一种正式的法律, 其准则为“原心定罪”, 其目的是创建一种凌驾于制定法之上的儒家规则, 以之更深地参与进讼狱乃至国家治理之中; 而“决事比”则为一种正式法律形式, 是经过皇帝批准之后的判例汇编, 是对于汉律的补充。汉人虽然重视以伦理为基础的“春秋决狱”, 但是并没有将其完全等同于国家法, 认为只有皇帝正式颁布的诏令才有普遍法律效力。汉人这种处理法律与伦理的权衡态度, 也为今天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 董仲舒; 春秋决狱; 决事比

**中图分类号:** B23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2)05-0105-06

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与“天人感应”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其核心思想来自于春秋公羊学, 可以说有关于他的研究基本都是依托于这个主干而展开的。而在董仲舒的公羊学之上又有两个重要的源头: 儒学和律学。《春秋繁露》《董仲舒公羊治狱》则分别是其核心观念的两个载体。此二者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彼时儒法两家相互影响和交融的结果, 也是董仲舒试图将儒家公羊学思想贯通进天下治理与朝堂讼狱的一次尝试。

### 一、董仲舒“春秋决狱”学术溯源

#### (一) 董仲舒著述的三个系统

关于董仲舒著述情况的相关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儒林列传》之中, 谓汉武帝即位后, 董仲舒“为江都相, 以春秋灾异之变, 推阴阳所以错行……著灾异之记”。<sup>[1]3128</sup>且因为此书“有刺讥”被下狱当死, 遇诏才被赦免。但《史记》并未写明此“灾异之记”的具体书名是否就是叫“灾异记”, 亦或“灾异之记”, 只是对“天人感应”一类文章的泛称。

但被赦免的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随后任胶西相时因“恐久获罪, 疾免居家”, 于是“以修学著书为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也有“上大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 颇著文焉”<sup>[1]510</sup>的记载。

透过《史记》所载, 可以发现在汉武帝一朝董

仲舒的著述经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任江都相时, 此时董氏的著作偏重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流; 第二个阶段是董仲舒从胶西相的任职上免官之后, 以著书为事。《史记》评价董仲舒云: “汉兴至于五世之间, 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 其传公羊氏也。”<sup>[1]3128</sup>则此时董氏所治之学, 所修之书, 很可能是对正统公羊学的经义申说。

而后《汉书·艺文志》有载“《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sup>[2]1714</sup>又《汉书·董仲舒传》载:

仲舒所著, 皆明经术之意, 及上疏条教, 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 《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 复数十篇, 十余万言, 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sup>[2]2526</sup>

另据《后汉书·应劭传》载: “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 朝廷每有政议, 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 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 动以经对, 言之详矣。”<sup>[3]1612</sup>其中的“《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即应是《艺文志》中所谓“《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的另一个称呼。

据此, 除《史记》所载不在此体系中的“灾异之记”外, 《汉书》《后汉书》已明确将董仲舒的作品分

收稿日期: 2021-12-29

作者简介: 何元博(1994-), 男, 四川西昌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法律社会史研究。

成了三个系统：其一是“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的《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其二有关政议的“《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其三是“说《春秋》事得失”的《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等数十篇。

从时间与写作目的上来看，第一部分涉及经术与上疏的内容，应该主要是董仲舒任胶东相及更早之前的著作，类似于《汉书》中《举贤良对策》的性质，是以正统春秋之学来治国理政的方针对策。第二部分则是致仕之后作为类似“顾问”的角色，对朝廷政议，特别是涉及决狱的部分献言献策。第三个部分则是董仲舒对于“春秋事得失”的经义申说。

这三个系统的著述正好也对应着董仲舒自身不同的身份，前两者一个是主要针对于政事；另一个主要是针对于断狱，是董仲舒作为儒家出身的朝堂重臣，将自身所学运用于国家治理的实践；而第三部分则更多是以经学博士的身份对《春秋》进行公羊学角度的极具个人色彩的诠释。

## （二）《公羊董仲舒治狱》版本目录

《隋书·经籍志》中的《春秋决事》十卷即是《汉书·艺文志》中的《公羊董仲舒治狱》，这一点在后续的目录学著作中有着清晰的脉络，毋庸赘言。因汉人记载《公羊董仲舒治狱》只言多少事，而未言卷数，不清楚到隋时此书是否存在佚失。但按照应劭“（董仲舒）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sup>[3]1612</sup>的描述来看，恐怕此时已经有所散佚，并非全本了。

《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仅易《隋书》中的《春秋决事》十卷为《春秋决狱》十卷，并且将其移入子部内，其余内容无变化。

但至北宋梅尧臣《崇文总目》中，不仅将《春秋决狱》改为了《春秋决事比》，还明确说明了十卷已阙，“今颇残逸止有七十八事”<sup>[4]</sup>。可见到了南宋王应麟时，《春秋决狱》里所存的残篇更是屈指可数了。

董仲舒《春秋决狱》，其书今不传，《太平御览》载二事。其一引《春秋》许止进药，其一引夫人归于齐。《通典》载一事，引《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应劭谓：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隋、唐志：十卷。今仅见三事而已。<sup>[5]</sup>

按之，则《春秋决狱》一书在唐宋间已亡佚大半，剩余七十八事也在两宋之间散佚殆尽，唯零碎分布于《通典》《太平御览》《白氏六帖》等书之中，至南宋时仅能见其中三事。

至清中期时考据学家王谟著有《汉魏遗书钞》载

有董仲舒《春秋决事》六事<sup>[6]</sup>，其后马国翰辑有《玉函山房辑佚书》载《春秋决狱》共八事<sup>[7]</sup>；同时代的黄奭辑《黄氏逸书考》中有《董仲舒公羊治狱》一书，仅录六事，并无《驳五经异义》中“为姑讨夫”和《后汉书》中“武帝外事夷狄而民去本”两则<sup>[8]</sup>。薛允升则著有《汉律决事比》四卷<sup>[9]</sup>，今已不存。随后沈家本在《汉律摭遗》中也录《春秋决狱》六则，认为是董仲舒所作，且马国翰多出的两则，一则与决狱无涉，只是对《汉书》的摘录；而“为姑讨夫”一则“不言仲舒果否为决狱之文，无他可证，《玉函辑本》谓案其文义亦臆度之词。”<sup>[10]</sup>程树德《九朝律考》从之，只录其余六则。<sup>[11]</sup>

按之，自清人有意识辑佚以来，前后至少产生过六个版本的《春秋决狱》，除薛允升本已不可考外，可以将剩余五本分为两个系统，即马国翰所辑八事本和以王谟、黄奭为代表的六事本。沈家本针对此问题已有高论，今人也普遍采用六事本的《春秋决狱》为定本。

另外颇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学人这种对于《春秋决狱》有意识的辑佚，不仅是因为辑佚学的成熟与兴盛，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缘由是因为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的复兴，在中晚清学界蔚然成风。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等一大批公羊学大家相继出现，尤其是刘逢禄、龚自珍二人，对“春秋决狱”问题有很深入的研究。《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

武进刘礼部逢禄据经决事，有董相风，以《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天道决、人事备，以之断史，可以决天下之疑。乃断诸史刑礼之不中者。为《议礼决狱》四卷。自珍承其学，效董氏例，张后世事以设问之，得一百二十事。为《春秋决事比》十一篇。<sup>[12]</sup>

龚氏另著有《春秋决事比问答》五则，郑任钊认为：“迨至龚自珍，清代公羊学的风貌骤然为之一变。龚自珍不再专注于学术层面上的公羊学研究，转而致力于援公羊学说抨击时政，倡言变法，真正发挥了公羊学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sup>[3]493-536</sup>而对于董仲舒《春秋决狱》一书的辑佚与再发掘，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进行的。

## 二、“春秋决狱”与“决事比”异同

在对董仲舒著作的版本目录进行辨章考镜后，能够发现其三个著述系统的书名在流传过程中都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在《隋书》中被称作《春秋决事》，在两唐书中被题为《春秋决狱》，降至北宋梅

尧臣时，已被改称为《春秋决事比》了，这实为此书版本流传上的一大转折点。此后“春秋决狱”与“春秋决事比”被后人混为一谈：大学者如钱谦益在给吴希哲《麟旨明微》一书写序时题为“董仲舒作春秋决事比”<sup>[14]</sup>，公羊学家龚自珍也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春秋决事比》<sup>[15]</sup>，其余很多学者虽未如此明显地直接将其混淆，但也常常混用，并没有将二者关系和区别彻底厘清。

所谓“春秋决狱”又称“引经决狱”，是指在断狱时引入了“公羊学”中的诸多义理，并结合“原心定罪”等方法作为原则。传统上认为董仲舒是“春秋决狱”的开创者，但也不乏学者认为汉代之前就有以《春秋》决狱的现象，尤其是《孔子家语》中所载的诛杀少正卯、断父子相讼之狱的案例<sup>[16]</sup>。而直到魏晋南北朝时还有“春秋决狱”的余绪，程树德在《九朝律考》中就辑有魏晋到北周的《春秋决狱》共25事。因此，对于春秋决狱问题的研究，除了董仲舒这个极为重要的代表人物外，也往往需要上溯或下延，我们才得以见其全貌，得以区分“春秋决狱”和“决事比”二者的区别。

“春秋决狱”的断狱方法尽管能在先秦典籍中找到许多蛛丝马迹，但其实对于士大夫而言，引用《诗经》《尚书》《春秋》等经典以表达自己观点、增强说服力的行为在春秋时期已经很常见了，这体现在彼时社会生活、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即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sup>[17]</sup>

在这种好用经典的风气下，对五经的引用自然也会常见于某些涉及法律的问题之中，但并无系统性，也不见于相关规定中，很难说此时就出现了“春秋决狱”这一断狱方式，只能说是其先河与源流。

“春秋决狱”真正的出现还是在汉初，由于统治者对经学的提倡，以倪宽、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开始倡导“引经决狱”的观念，此即“春秋决狱”的产生。而决事比被普遍理解为一种正式的比附判例制度，就目前所见文献而言，渊源自秦时的廷行事，其最初形式就是在遇到各类疑难案以及法无明文规定的案件时，比附既有的法条和判例，然后予以裁断。

“决事比”的正式出现最早见于汉高皇帝七年（前200）的诏令中：

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sup>[21]106</sup>

依文意，则此时的“比”应当是专门针对于各类廷尉所不能决断的疑狱，须比附相关的律文并上奏皇帝。

由此可见，“决事比”与“春秋决狱”之间存在着

一些共同点，比如二者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针对于那些法无明文的疑难案件，比照一些案例来进行断决。

但二者绝非全然等同，甚至区别非常大。“决事比”产生于汉高祖时，是只针对于讼狱的法律制度。董仲舒所撰《春秋决狱》则是其“老病致仕”后，因武帝遣张汤数问政议得失（《汉书》作“大议”），才作的“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而无论大议还是政议，显然不可能皆是与断狱有关的事情。而且彼时董仲舒已经致仕，他只是给出自己的意见，真正进行“比律令”行为的是廷尉，至少二者在早期明显是有所区别的。

诸如《汉书》所载孝武帝时“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显然也很难全部都理解为春秋决狱。甚至可以说“春秋决狱”的出现，正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对于既有的基于律文和判例的“决事比”不尽认同，因而试图加以修正和补充。

自“春秋决狱”的方式出现以来，就有着与“决事比”合流或者说向其侵蚀的趋势，以求将“五经”作为真正意义的判决依据。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律儒家化或者法律伦理化的一个表现。但终汉一代“春秋决狱”的方式都没有能真正取代“决事比”，成为其同义词。因为春秋经义始终不可能解决所有需要比附的法律问题，再者因为学派不同，立论不同，汉人对于经义本身使用时也会存在很多争议，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今古文之争。

最后，“春秋决狱”只是司法官员个人的实践或者学说主张，并不一定能上升到“决事比”的程度。要完成从“春秋决狱”到“决事比”的转化，必须通过再整理与皇帝的首肯。而“春秋决狱”中所包含的很可能不仅仅有亲自完成的判例，也有为了阐明自己学说观念的所编造出的故事与理论。因而后人对于“春秋决狱”与“春秋决事比”的混用，实是一种很大的误解。

从时间上看，“比”这一法律形式的出现，也是在董仲舒“春秋决狱”之前的，至少二者在早期是明显区别的。

### 三、“春秋决狱”与国家制定法

#### （一）从“春秋决狱”到“决事比”

“春秋决狱”所引用的都是儒家经典，会更关注礼与法的冲突，其准则为“原心定罪”，是希望构造一种更在制定法之上的儒家规则。而“决事比”则更多是比照律条或判例，仅是对法律的补充，是经过上意裁决后的汇编，代表皇帝意见首肯后的司法制度。

“春秋决狱”自诞生伊始，其性质就是一种基于儒家立场的断狱方式，具有很浓厚的个人色彩和学派色彩，而非一种正式的法律形式，甚至引经决狱在某种程度上恰恰体现了经学和律学、儒生和文法吏之间

的冲突。

由《春秋决狱》现存的几个案例也可以看出，董仲舒援引经义决狱，在彼时也远远超过了“比”的范畴，进而可以观察到“决事比”与“引经决狱”二者在理路上都是有微妙差异的。前者要求比照其他律令以裁断，后者则是要求根据春秋大义、公羊经学来进行审判，二者不仅有别，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会爆发冲突。比如董仲舒《春秋决狱》中的“武卒盗强弩弦”一则：

甲为武库卒，盗强弩弦，一时与弩异处，当何罪？

论曰：“兵所居比司马，阑入者髡，重武备，贵精兵也。弩彘机郭，弦轴异处，盗之不至盗武库兵陈。”

论曰：“‘大车无輹，小车无轨，何以行之？’甲盗武库兵，当弃市乎？”

曰：“虽与弩异处，不得弦不可谓弩，矢射不中，与无矢同，不入与无镞同。”

律曰：“此边鄙兵所赃直百钱者，当坐弃市。”<sup>[18]</sup>

从文可知，“比附”与“引经决狱”实为思路并不相同的两个决狱方式。本案中第一个“论曰”即明确用了“比”的概念，将兵所居比为司马门，与禁中相等，认为按律阑入者应髡。后一个“论曰”引《论语·为政篇》，以证明此事的严峻性，认为应当弃市，这就是典型的引经决狱了。最后的“律曰”虽认为也是当坐弃市，却是在经义的逻辑下将弦、弩视为一体，进而其所盗之赃已值百钱，引律决断。

是以《汉书·艺文志》只云《董仲舒公羊治狱》，汉人提及也只用“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称呼，不提“决事比”三字。“决事比”与“春秋决狱”虽有类似之处，但显然也是有一定区别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汉时应劭“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sup>[31]613</sup>如《决事比例》和《春秋断狱》毫无区别的话，是断不用如此区分的。

再看仲舒晚年所撰的“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就目前保存下的六则决狱案例来看，显然来源颇为驳杂。如“大夫放鹿”一则，就源出自《韩非子·说林上》，讲的是“孟孙猎得麀，使秦西巴持之归”<sup>[19]115</sup>的故事，被董仲舒将人名去掉，然后写入《春秋决狱》中，以阐述自己的政治和决狱观点，而这显然和汉代决事比的形式是不同的。

而东汉初有所谓“辞讼比”，《东汉观记·鲍昱传》载：

昱奏定辞讼比七卷，决事都目八卷，以齐同法令，息遏人讼也。<sup>[31]1023</sup>

《后汉书·陈宠传》记载：

宠为昱撰辞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昱奏上之，其后公府奉以为法。<sup>[31]1549</sup>

很明显，即便官员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与判例撰写了相关书籍，也需要上奏皇帝之后，公府才会“奉以为法”。而董仲舒《春秋决狱》是否经历过这个流程，也是史所阙载的。

另外东汉时陈忠依其父故廷尉陈宠之意整理法律，“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敝。”足见在其时要成为“决事比”的先决条件，是需要整理成文并上奏皇帝，在得到其首肯后方具备普遍的法律效力，否则就只能是一己之见。

在今六事本董仲舒《春秋决狱》中有“拾道旁弃儿养以为子”一则：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sup>[20]</sup>

以往对于这个案例的论述大多集中在对容隐制度的讨论上，却很容易忽视这则案例的特殊性。这个案例是现存董仲舒《春秋决狱》中唯一在文中言明是通过了皇帝诏令的，但相似的内容在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又出现在了诏书里：

夏五月，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sup>[21]251</sup>

梁治平先生认为：

仲舒之时已有诏令，宣帝何必再颁诏书？历史上，就同一内容重复颁发诏令之事并不少见，这或许是因为法纪松弛，执行不力，或许只是要突出地表明某种立场。在此例中，仲舒所引“诏”的内容与范围我们不得而知，仲舒所要适用的原则却只是“父为子隐”；至汉宣帝本始四年，其诏书确立的原则乃是“亲亲得相首匿”，容隐范围远在父子之外。新法并不只是重复旧法，同时还修订了旧法，提出了更宽泛、更明确的原则。这或者可以成为一种解释。<sup>[21]</sup>

梁先生此说当然可谓一家之言，但考虑语境，这个案子中其实存在更为合理的解释。在《汉书·刑法志》有载：

及至孝武即位……转相比况，禁网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sup>[2][101]</sup>

按之，由于武帝时禁网浸密，再加上自高祖以来的案例累积，到了武帝中后期决事比乃至繁多无用。因而“拾道旁弃儿养以为子”这一案例中虽然有“诏不当坐”，但此诏书可能只是武帝针对于本案的判决意见，尚未上升到决事比的高度，不具备被后来案例所依循的效力。

即便此案上升到了“决事比”的高度，也可能因为汉武帝中后期决事比过多，罪同论异等因素，在“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的情况下，导致彼时的决事比法律效力远不能与后世相比，很多决事比只能沦为具文。直至董仲舒去世后，春秋决狱之影响日益增大，才在宣帝时通过诏书对此做了正式的规定。这一案例恰可反映“春秋决狱”和“决事比”的异同，以及“春秋决狱”所做出的判决需要上升到国家制定法的地步，需要经过怎样的程序。

## （二）“春秋决狱”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借鉴

2021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同时强调了建设法治中国，需要“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sup>[22]</sup>。而董仲舒“春秋决狱”正是最能体现中华法系中独特文化因子的制度之一，对其批判性的继承，去粗取精，也将有助于当前法治中国的建设与发展。

从思想源流来说，“春秋决狱”发轫自儒家思想，依据五经所体现的精神来对案件进行裁决，可以说是在国家制定法之外的一个补充，本质上是将儒家伦理当作中华法系最重要的法源。辩证的来看“春秋决狱”本质上是对于国家制定法的一种损害，特别是其中“原心定罪”的思想，更容易成为司法扩大化和滥用的根源，有违当前刑法学中的罪刑法定以及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这是今天法治中国建设中绝对需要警醒和摒弃的部分。但与此同时，也需要看到“春秋决狱”其实是对于中国社会传统伦理的尊重与延续，符合民众的常情常感与道德要求。当今刑法学界就有观点认为“法益作为入罪的基础，而伦理作为出罪的依据”<sup>[23]</sup>，而这其实与“春秋决狱”所秉持的理念大体一致。

从“春秋决狱”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中我们发

现：法律是一门平衡的艺术，伦理绝对不能代替法律，但是法律也需要照顾人民群众的常情常感，不能够过于冰冷而失去人性的温度。

而“春秋决狱”的本质就是如何去处理伦理与法律的关系，如果说“春秋决狱”是将伦理放在了国家制定法之上的话，那么从“春秋决狱”到国家制定法的转化过程其实就体现汉人如何去重新平衡二者间的关系，同时也给予了今天法治中国建设以重要启示：即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对于那些引发重大社会舆论，特别是法律判决结果与人民群众常情常感相违背的案件，可以作为酌定情节的一种，适当考虑其中的伦理道德因素，从而更好地辅助司法审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积极发布与所谓“情法冲突”有关的指导案例进一步解释和细化法律，弥补法律中的模糊与缺漏部分，发挥好其释法的职能。

法学家苏力在其名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论证道：“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sup>[24]</sup>而研究“春秋决狱”以古鉴今，取精用宏，将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建设法治中国。

## 结语

《董仲舒公羊治狱》在流传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书名的衍变问题，尤其是自宋代王尧臣《崇文总目》将其称作《春秋决事比》以来，“春秋决狱”与“决事比”遂被人混为一谈。通过汉代典籍及其大背景的梳理，发现董仲舒所著《董仲舒公羊治狱》，也即今传所谓《春秋决狱》一书，并非全然是汉人意义上的决事比，而是以事例为载体，主要阐述“引经决狱”，混合了董仲舒个人政治与学术观念的著述。对于“春秋决狱”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处理法律与伦理的冲突，从而有助于法治中国的建设。

##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 范曄.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4] 王尧臣.崇文总目[M].钦定四库全书本:卷2-3.
- [5] 王应麟.困学纪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759.
- [6] 王谟.汉魏遗书钞[M].钦定四库全书本,卷14-4.
- [7]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203-1204.
- [8] 黄奭.黄氏逸书考[M].钦定四库全书本.卷55-3.
- [9]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8:12428.
- [10] 沈家本.汉律摭遗[M]//沈家本全集(卷9-22).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22.
- [11] 程树德.九朝律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3:161-162.

- [12]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3:727.
- [13] 姜广辉,编.经学今诠五编[M]/中国哲学第二十六辑.大连: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493-536.
- [14]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O].钦定四库全书本,卷29-28.
- [15] 龚自珍.定庵文集[O].钦定四库全书本,卷1-78.
- [16] 朱宏才.汉以前的“春秋决狱”研究[J].攀登,2014(1):110-115.
- [17]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16)[M].北京:中华书局,2009:5480.
- [18] 白居易.白孔六帖[M].明嘉靖刊本,卷91-20.
- [19] 韩非子[M].钦定四库全书本:卷7-15a.
- [20]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2016:74.
- [21] 梁治平.古法丛谈[J].文史知识,1990(1):77-78.
- [22]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N].人民日报,2021-01-11(01).
- [23] 罗翔.刑法学讲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9.
- [24]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6.

## Research on Dong Zhongshu's Trial

——Also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rison and the Decision

HE Yuan-bo

(History School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0, China)

**Abstract:** Dong Zhongshu's "Spring and Autumn Prison" was first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Han Chronicles of Art and Literature. It is called "Dong Zhongshu's Ruling the Ram in Prison". The title and edition of the book have a process of evolution. In Chongwen Zongmu written by Wang Yaochen of Song Dynasty called it "Spring and Autumn Jueshibi", "Spring and Autumn Jueshibi" and "Jueshibi" gradually confused. However, they are by no mean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e "Spring and Autumn Trial" advocated by Confucian scholars is not a formal law. Its principle is "original conviction". "Jueshibi" was a formal legal form, a compilation of precedents approved by the emperor, and a supplement to the Law of Han. Although the Han people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Trial" based on ethics, they do not equate it with the national law, but have universal legal effect only through the official imperial edict. Han people's attitude of balancing law and ethicd also provided valuable cultural resour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oday.

**Key words:** Dong Zhongshu; Spring and Autumn Prison; definitely something than

(上接第104页)

## On the Number of Jinshi in the Shandong Canal Are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 Zhong-h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65,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Hongwu period in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end of the Guangxu period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total number of Jinshi in the Shandong Canal area reached 1,112, accounting for an average of 27% of the total number of Jinshi in Shandong Province per dynasty. The number of jinshi in the canal area in the mid-Ming Dynasty and the mid-Qing Dynasty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decline was particularly seriou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and late Qing Dynasties. There was a large gap in the number of Jinshi among the prefectures along the Shandong Canal. The gap betwee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same prefecture is also relatively large. In general,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Shandong Canal regio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education,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th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Key words:**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andong Canal region; jinshi